·西南民族大学华风经济学丛书·

区域成长：文明嬗变的区域画面

基于分工演进的视角

Regional Growth: A Regional Picture of the Transmutation of Civilization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the Evolution of Labor Division

李 皓◎著

中国经济出版社
CHINA ECONOMIC PUBLISHING HOUSE

出版咨询：李煜萍
pkulyp@163.com

区域成长：文明嬗变的区域画面

基于分工演进的视角

Regional Growth: A Regional Picture of the Transmutation of Civilization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the Evolution of Labor Division

上架建议：经济类



定价：39.00元

· 西南民族大学华风经济学丛书 ·

区域成长：文明嬗变的区域画面
基于分工演进的视角

Regional Growth: A Regional Picture of the Transmutation of Civilization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the Evolution of Labor Division

李 皓◎著



北 京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区域成长：文明嬗变的区域画面／李皓 著.
北京：中国经济出版社，2013.12
ISBN 978－7－5136－2141－0

Ⅰ.①区… Ⅱ.①李… Ⅲ.①区域经济发展—研究—
中国 Ⅳ.①F12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2）第 283633 号

责任编辑　李煜萍
责任审读　贺　静
责任印制　张江虹

出版发行　中国经济出版社
印 刷 者　北京科信印刷有限公司
经 销 者　各地新华书店
开　　本　710mm×1000mm　1/16
印　　张　14
字　　数　206 千字
版　　次　2013 年 12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3 年 12 月第 1 次
书　　号　ISBN 978－7－5136－2141－0/F·9574
定　　价　39.00 元

中国经济出版社 **网址** www.economyph.com **社址** 北京市西城区百万庄北街 3 号 **邮编** 100037
本版图书如存在印装质量问题，请与本社发行中心联系调换（联系电话：010－68319116）

总序

开创经济学“民族分工”新视野

“有志不在年高”。一个未满十岁的“孩子”要出书,还是“系列”文库,是不是有些匪夷所思?但这却是事实。西南民族大学经济学院在成立九周年之际,小儿科大手笔,推出了自己的“华风”经济学文库,可喜,可贺,可嘉。

世界大学史,千余年矣;中国大学史,百余年矣,中国的民族大学史,六十余年矣。足见中国的大学幼稚,足见中国的民族大学幼稚。而眼下中国的大学,办有经济学院、经济学系的,犹如过江之鲫,数不胜数。西南民族大学经济学院成立于2003年12月,可谓中国高校中最年轻的,所以我说她还是一个“孩子”。一个“九龄童”出经济学文库,不无遭遇不屑甚至讥诮之虞。何以见得?话得从1895年说起。甲午中日一战,清廷惨败,识者以为盖在科学技术落后,一时间,维新变法思潮高涨,兴西学以育人呼声四起,中国的新式大学由是诞生。有趣的是,“洋务派”兴学具有强烈的实业目的,是谓实业救国;“维新派”兴学具有强烈的改良思想,是谓改革救亡。——虽然他们都是基于甲午的危机认知,都是基于“科教兴国”的长远追求。而经济学呢?撇开政治理念和意识形态不说,自亚当·斯密和卡尔·马克思以降,经济学即分别沿着形式化的和制度化的两条路径演进。一前一后,影响至深至远,循此脉络,人们当不难理解今日中国大学何以会有经济学的“分野”:除了“西方经济学”与“政治经济学”的杯葛,还有主流经济学与草根经济学、官房经济学与民生经济学、资方经济学与劳工经济学等的对峙。至于中国民族高校的经济学专业,

就更不足为人道了，那潜意思就是说，你民族大学还办什么经济学专业呀？

想想也不无缘由。实事求是地讲，五千年农耕文明早熟，滋养了“华夏中心”；两千年“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强化了“等级名分”。因此，国人之骄傲和自豪，每每张扬在踞守“第一”维护“第一”上；实在不济，也要来一个“原本我们”怎么样、“先前我们”怎么样，所谓“中体西用”“中源西流”是也。应该承认，这不仅是现代中国前进的文化传统障碍，而且也是中国的大学尤其是中国的民族高校及其学科建设面临的一个文化传统障碍。不过话又说回来。假如没有当初的北洋大学，或许就不可能有日后的马寅初。我们也不妨设想，若没有今天中国的民族高校的经济学专业，能否有今后中国的“各民族共同繁荣发展”？当然，毋庸讳言的是，中国的民族高校的经济学专业还很幼稚；但同样毋庸讳言的是，中国的大学，中国的大学的经济学专业，不都还很幼稚吗？所以，中国的民族大学，是可以办经济学专业的，也是一定能够办好的。这不是勇气问题，也不是信念问题，更不是能耐问题，而是一个客观现实的需要问题。

“走自己的路，让别人说去吧。”相较各种各样的“中心”“名分”“等级”，中国的民族高校，或许更应该致力于学科建设和专业教学本身。

举例说来，就经济学而言，作为五十六个民族“和合偕习”的大家庭，中华民族的振兴必得建基于中华民族的共同团结奋斗，只有经由各民族的共同团结奋斗，我们才能建立起坚实的物质经济基础，以实现全民族的共同富裕共同繁荣发展。但是，共同团结奋斗、共同富裕、共同繁荣发展，并不是政治上层建筑和国家行政安排能够做得成的，它必须通过更为基本的、全面的、市场化的“民族分工”来实现。在我看来，在一个多民族的现代“民族国家”，推动经济社会发展，解决社会经济问题，绝无可能“去民族化”。也就是说，国民经济“又好又快”的增长，经济社会的稳定、持续发展，构建资源节约型的和谐经济、环境友好型的和谐社会，绝对离不开有效的“民族分工”。也许你可以不在乎这个“民族分工”，但如此一来，你也不得不为你的抉择支付代价。现代经济学也许可以较好地解释社会分工、自然分工、国际分工、区域分工、产业分工、技术分工，但什么是

“民族分工”，以目下的现代经济学，恐怕还不好解释。所以我也同时认为，在研究一般经济学原理和一般分工理论的基础上，深入研究少数民族经济和民族地区经济，进一步研究“民族分工”，或将是中国的民族高校经济学科的特色和优势之所在。当然，中国的民族高校的经济学科也会重视一般经济学的研究和教学，这种“局部与整体”的关系，当不言自明。

经济学是舶来品，中国大学的经济学科建设和经济学教学，也有一个“中国化、时代化、大众化”的“三化”问题。而在中国的民族高校，经济学的“三化”就更显艰巨、具体和迫切。作为教学和科研的结晶，西南民族大学经济学院的“华风”经济学系列文库，是专注于经济学“三化”的成果之一，所以可喜；是不懈于一般经济学的成果之一，所以可贺；是致力于“民族分工”的成果之一，所以可嘉。

“寻宇文，初习华风”。（刘知几《史通·杂说中》）华风，是中华民族的风华，自然而然内在“民族特色”。“稍近华风，遂脱瘴死。”（苏辙《移岳州谢状》）华风，是经济学人好作品，学术文采都站在前沿。“华风濡染变狂獉，光气将开色色新。”（赵翼《经临途次杂纪以诗》之三）华风，是经济学院“学术立院”圭臬、“服务社会、培养人才、传承文化”宗旨的彰显。不欲扬名立万于经济学江湖，旨在为经济学殿堂添砖加瓦。“华风”文库的问世，还仅是西南民族大学经济学院“少年不识愁滋味”的一个起点，我们有理由期待着西南民族大学经济学院在“民族分工”领域作出更大的努力和贡献。

周兴维
2012 年 6 月 16 日
识于西蜀凤栖山莲溪山庄

自序

“有一种鸟儿是永远也关不住的，因为它的每片羽翼上都沾满了自由的光辉。”

——摘自电影《肖申克的救赎》

在思想蒙尘、投机盛行的时代，严肃思考凸显荒唐可笑，精神探险亦觉无足轻重。被喧嚣世界裹挟的我们，已然无法感知国学大师王国维投湖时内心的波澜，也无暇体会历史学家陈寅恪临终前一行清泪里杂陈的五味。我们只顾前行，唯独忘却为自己的灵魂寻宁静归宿；我们只顾在皮囊里填塞永不满足的欲望，唯独忘却在精神世界里找寻栖息净土。现实碾压之下，我辈小民远非不食烟火的圣徒，但稍作遐想，难免不为自己随波逐流的生活态度心怀愧疚，生出一番“心为形役，田园将芜”的人生慨叹。生活劳作之余，我时时为这些情绪所感染，企望在自己沉闷的小屋里推开一扇小窗，借助自由、独立之精神双翼，掠过世俗的天空，作酣畅淋漓的思想探险，借以满足无处安放的好奇心，也稍减终日无所事事、沉溺于网络与游戏的负罪感。

胸怀如是梦想，我开始了本书的构思与写作。这个始于新千年的构想，一再推迟，固然因为现实的掣肘，更源于能力之欠缺、笔力之不逮。“区域成长”是一个看上去大而无当的话题，涵盖经济学、社会学、伦理学、历史学、政治哲学甚至宗教学等相关知识领域；如若透过区域成长去梳理人类文明演进的脉络，则更显云雾缭绕，前路茫茫。所幸先哲们似乎已预备好破题解难的所有思路——在网络时代，它们触手可及。所以，某种意义上，本书的写作过程当为一次精神朝圣之旅。随心所欲的阅读习惯使我有机会采撷哲人们闪亮思想的片段，而本书核心的工作就是把这

些思想的碎片编织成对区域问题研究的系统化表述。

本书以人类活动的空间载体——区域作为研究对象，期望透过区域跳动的脉搏去触摸个人与国家的命运，去感受人类文明投射在区域舞台上的多元色彩。研究以经济学的研究思路和分析方法为进路，尝试将众多有价值的思想和观点融入其中，以期从全面、完整、系统的综合性维度探讨区域问题，揭示区域成长的过程和规律。其中，马克思主义对人的自由和人的解放的理解，定下了本书的基调，成为本书的基本价值取向；阿马蒂亚·森关于"实质自由"的论述则把这一价值取向具象化，以此既可以建立区域成长的伦理维度，又能找到衡量区域成长可量化的尺度；从斯密、马克思、涂尔干、杨格和杨小凯对于分工问题的讨论中，可以发现区域成长实质上是由分工演进而诱致的一系列综合变动过程。分工演进作为区域成长的核心内容，其影响所及不仅仅在于区域的经济层面，也渗透到区域的社会层面、政治层面和人类个体的精神层面，涉及区域系统的各环节、各层次。由此，可以从分工演进的视角去构建一个区域成长的分析框架；杜能、勒施等人的区位理论及克鲁格曼的新经济地理学为区域成长提供了微观层面的分析，他们对经济活动空间分布及其动态演进过程的认识，成为理解区域经济现象和区域经济过程的基石；杨小凯、克鲁格曼关于交易地理集中和生产地理集中的精彩论述，深化了对诸如区域差异、城市化、产业集群等区域现象的理解；克鲁格曼的新贸易理论为区域间的产业间分工、产业链分工及相关的区际联系和区际贸易问题提供了解释；哈耶克和波普尔则提供了考察区域成长的不同视角，把区域成长与文明演进理解为一个自发秩序的演进和扩展过程。人类理性固然可以在其有限的认知范围内对这一秩序起到或促进或阻碍的作用，但理性的滥用却往往是灾难性的。一个开放的社会结构，一个尊重个体自由及强调区域在制度实验、制度试错中首创精神的环境对于区域可持续成长而言必不可少。还有，新制度经济学大家，如科斯、诺斯、巴泽尔，特别是奥尔森等人关于国家和政府的理论，为笔者把国家和政府行为纳入区域成长分析提供了基础的理论支撑。最后，斯塔夫里阿诺斯、黄仁宇、斯宾格勒等历史学家的著作为本书的写作提供了可供借鉴的历史观、历史分析方法和足

够丰富的历史素材。

本书的写作具有自娱性质，如果说它还有丁点价值的话，或许在于它始终把价值理性置于工具理性之上，把研究的思想性置于研究的技术手段之上，进而尝试在此基础上构建一个完整系统的区域分析框架。按照笔者的理解，区域成长不仅是经济活动量的积累和质的飞跃，更是一个文化繁衍过程，是文化在“器物层次”、“组织层次”、“精神层次”[①]上的整体变动，体现着文明嬗变的历史进程。而这一变动过程的主体是人，目标也是人，区域成长的实质就是人类从物质的贫乏与精神的桎梏中不断得到解脱的过程。因此，与通常经济学著作从实证分析肇始，以规范分析和政策分析终结的结构不同，本书的研究始终把价值理性放在优先考虑的位置，从规范分析始，把区域成长问题首先看作一个道德哲学问题（或者说伦理问题），把人看作区域成长的主要手段和唯一目标，从以人为本的区域成长观的确立入手，构建起区域成长可量化的尺度，进而在实证分析中，探讨如何应用工具理性达到区域成长目标，并提炼出相关分析的政策含义。上述讨论是本书基础性的工作，而本书最重要的努力是试图跳出新古典经济学的狭隘视界，构建一个完整系统的区域分析框架。它以分工理论为核心，通过古典经济学、新经济地理学、新古典经济学、新制度经济学、经济社会学等多个学科的交叉融合，把区域成长的逻辑理解为由分工演进导致的区域整体变动过程。在这一过程中，分工演进推动区域市场网络、科层网络和社会网络的生成、发育和进化，通过市场网络、科层组织（如政府组织与企业组织）及社会网络间的相互替代、补充及其相互作用和影响，使得区域在物质层面、组织层面和精神层面上发生整体变动。另外，本书的写作作为思想朝圣之旅，它对思想观点的关注远远超过它对技术手段的关注。考察这些年中国经济学的成长之路，可喜的是，我们终

① 文化三个层次的划分方法源于人类学家马林诺夫斯基，并由费孝通先生引入中国。按照马氏的划分，文化是由器物层次、组织层次和精神层次构成。器物层次是文化的物质层面的反映，如人类的生产、生活工具；组织层次是文化在组织层面的反映，如各种社会、经济和政治的正式与非正式组织以及维持其运转的制度体系；精神层次是文化在人类精神层面的反映，如伦理道德和价值体系等。

于开始逐步摆脱了意识形态的干扰，在研究范式上开始与国际接轨，使我国的经济学研究可以在国际舞台上与他国学者对话；但遗憾的是，我们在移植他国研究成果时，更多地关注技术手段上的改进和创新，而对他国学者的优秀思想成果缺乏吸纳包容之精神。事实是，一个民族所能取得的成就总是与这个民族在思想上所能达到的高度相一致。正如克伦威尔所说："人所能高攀的顶点超不过人所知道的高度。"

本书写作过程中，精神探险的愉悦感和好奇心的满足感始终是这项工作的动力源，也是对这项工作最高的奖赏。尽管从本质而言，相对于无始无终的时间之矢和无边无际的洪荒宇宙，人及人类只可能是一种短暂而微不足道的历史存在，人类任何有企图的行为都将淹没在无涯时空中。难怪昆德拉会感叹"人类一思考，上帝就发笑"。但人的奇特性就在于每一人类个体总会用自己独特的生命体验去对抗"上帝"安排的宿命。就像希腊神话中的西西弗斯，明知永远无法把巨石推上山顶，却依然徒劳地在山顶和山脚之间努力地运作。我想，西西弗斯的故事深刻地诠释着这样的人生哲理：人生的荒诞性无所不在，但如果非得给人生确定一个终极意义，那么它大概就在于个人以其有限的心智和体力绝望地与人类宿命相抗争，不断地探寻"上帝"给人类划定的时间和空间边界，不断地追问未知世界到底还有多少秘密可以被人类解读。我痴迷于这样的个人体验，也乐于怀着最为虔敬的态度，用弱小的心智去实践这项永远也不可能达成的任务。我知道，那里是我的精神家园。是为序。

内容提要与本书相关说明

一、内容提要

本书以分工演进为逻辑线索，由总而分，组织了六章内容。通过对区域成长的表象和实质、维度与尺度的讨论，将区域成长聚焦于两个分析维度上，即经济维度和社会人文维度（包括文化与政治）。其中，第三章到第五章是区域成长经济维度的逐步展开。这部分内容，由静止而动态，由封闭而开放，从分工演进的视角重新构建了区域经济发展的理论体系，并用区域历史和区域实践中的典型案例回应了理论分析；第六章则从区域成长的社会人文维度（主要是从文化与政治领域）的讨论，从分工演进的视角，重新梳理了区域成长中经济、文化与政治的互动关系，特别强调了经济发展是区域成长的物质内容和基础，但社会人文发展却构成了区域成长的内核。

第一章为总论。在对区域、区域增长、区域发展、区域成长等概念进行梳理和辨析的基础上，从分工的视角重新定义了区域概念，并对区域成长的内涵进行了阐述；本章通过对区域成长的历史回溯和全球鸟瞰，汇总了全书关切的重要区域问题，进而以分工演进为主要线索，给出本书研究的逻辑结构和分析框架。

第二章是关于区域成长的表象与实质、维度与尺度的讨论。透过区域成长的表象，批判了区域成长问题上存在的种种错误观念，指出了人是区域成长的唯一目的和重要手段，强调了“以人为本”，以“人的自由而全

面的发展”为内容,以人的“实质自由”的不断扩展为目标,进而重建区域成长的伦理维度,对于区域研究和区域实践具有重要意义。

第三章是关于区域经济增长的短期分析。在对分工及分工思想进行简单梳理的基础上,从分工的角度定义了一个与新古典经济学不一样的“短期”概念,进而研究分工给定条件下区域经济的表现。核心是从新古典经济学理论和分工理论分别给出区域经济短期增长的不同解释,强调区域经济在短期中表现出来的“有极限的增长”是分工不能深化和扩展的结果,也从反面论证了区域的长期可持续增长可能根源于分工水平的不断提升。

第四章是关于区域经济发展的长期分析。本章通过对区域经济动态过程的分析,从分工演进、报酬递增与区域成长间的逻辑关系出发,论证区域经济成长的本质不是经济规模或就业水平的总量变动,而是分工演进导致的区域经济的系统性整体变动。表现为微观经济主体不断繁衍和成熟,表现为产业结构、空间结构和制度结构的高级化过程,而那些在区域经济的短期均衡中起决定作用的物质资本和劳动力投入就不再是决定性的因素。

第五章是开放条件下的区域成长讨论。本章是第三章和第四章所讨论话题在开放条件下的进一步展开,也是对区域经济问题的一个总结。在描述现实区域经济的开放性特征及其当代表现(全球化与区域一体化)的基础上,提出了一个开放条件下区域经济的简化分析框架,从开放条件下的需求边和供给边变动来整体性地解释区域经济运行,描述了开放环境对区域经济系统变动的放大作用,分析了区域关系中重要的方面,如区域分工、区际贸易、区域一体化、区域竞争等因素对区域成长的影响,考察了开放世界对区域经济产生的最重要的后果,即地方专门化和区域一体化,探讨了区域差异性极大的大国经济如何进行区域关系的有效治理,进而不断优化大国内部的区域竞争合作秩序。本章特别强调了:全球化和区域一体化浪潮下,区域间分工与协作的规模和紧密程度超过以往任何时期,区域间竞争的范围和强度也超过以往任何时期。区域独善其身的时代已经成为过去,世界经济正通过日益发达的全球分工网络紧密

联系在一起。区域成为这张巨大分工网络上的节点,区域经济越来越依赖于它在全球分工网络中所处的位置,区域成长也越来越取决于它是否能从这个网络中控制、整合和提取更多的资源。

第六章是关于区域成长中的社会人文维度的讨论。这一章沿着第二章中提及的包含文化、政治等因素在内的社会人文领域重新审视了区域成长,讨论了分工如何塑造了区域的社会人文面貌和价值信仰体系,指出:当前社会既是一个由分工导致差异不断扩大的社会,又是一个由分工导致更加紧密联系的"有机团结"的社会。差异的扩大导致了文化多元的特征,而人与人更加紧密而广泛的联系导致人类需要有一个维持人类交往的共同价值基础(普世价值)。本章还讨论了区域的社会人文面貌和价值信仰体系又怎样影响到了区域经济的运行和区域经济绩效。本章还会为全书打上最后一个补丁,即把国家和它的各级地方政府这个极端重要的角色纳入分析的视野。分析了不同角色定位的国家(政府)的利益取向和决策偏好怎样影响了区域运行的绩效,指出国家和它的政府的成长与成熟既是区域成长的条件,又构成了区域成长的一个重要内容。

二、阅读建议

总会有一些人对本书产生些许兴趣,而他们可能来自不同的领域,有着各异的知识结构,兴趣点也并不相同。根据阅读者多样性的需求偏好,提供一些投不同阅读者所好的阅读建议,既是提高本书效用水平的重要尝试,也是让有限的出版资源使用效率得以提升的重要途径。

首先,本书既可以作为区域经济学的学术专著,也可以作为历史人文读本,提供给读者多样化的阅读选择。如果你喜欢历史人文,那么请你省略掉那些枯燥乏味的理论分析部分,把重点放在第一章的第二节,第二章,第六章,以及第三章到第五章中关于区域历史、区域现实和典型案例的分析讨论上。本书的这些历史人文内容,仍然构成了一个完整的故事,让你可以领略区域研究的全貌,认识区域成长的方方面面,从区域的脉动中触摸文明的嬗变,在区域的空间尺度上,感受文明的多元色彩,在区域的层面上理解个人命运和国家前途。而如果你偏好区域研究的学术思

考，不妨把全书当作一个整体。因为，本书是一个关于区域故事的全新理论架构。从分工演进的角度重新构建区域研究的理论框架，这是一个雄心勃勃的计划，我不能说我已经完成了这个工作，更不能确定它到底有多大的价值，但它总会给你些许的启发，为你的相关研究提供可以借鉴的另类思维。

其次，本书虽然是对区域问题的讨论，但它承载的是对区域中每个鲜活的个体命运的关注，是对人类文明的思考。本书基调是人道主义的，它总是把人的全面而自由的发展作为出发点和归宿地，把区域看作每一个个体生命的托命之所，把人的物质满足和精神解放看作区域成长的实质。在这个意义上，区域是一块块的试验场——技术和工具的试验场，信仰体系和价值理念的试验场，制度与文化的试验场，各种社会经济组织的试验场。通过这些实践，区域为人类未来的发展和文明进化道路的选择提供可供参考的各种可能性和实际途径。阅读者如果对此感兴趣，不妨可以根据作者的写作诉求，去理解本书的学术倾向和精神旨趣。

三、不得不说的遗憾

无论怎样辩解，本书过于简化的理论模型，几乎完全被省略掉的统计手段和计量验证，无疑是本书最大的硬伤，它使得本书逊色不少。这不能不说是一个巨大的遗憾。笔者总喜欢用历史说事儿，拿现实中的故事作案例，这并不是漠视统计和计量检验，实在是出于个人知识结构的局限，也由于疏懒的个性，缺少做精细的统计和计量检验的热情。如果要为本书中缺少对统计资源和计量手段的应用找个正当的说词，那只能是笔者认为历史是已经充分沉淀的资料，经得起检验，而历史资料的应用也可以增加文章的可读性和历史纵深感。至于偏好现实中的案例，只是因为它们是鲜活的、有趣的。

至于第六章的编排，也不能不说是本书的一个遗憾。它本来应该是两章内容，一章为区域成长的文化维度的讨论，另一章则是区域成长的政治维度的讨论，但由于时间过于紧张，不能达成此愿。个中原因，既有笔者渗入骨髓里的懒惰，也有贪图多快好省的功利情结，还有社会大环境的

驱使。当代中国人总是把对速度的追求放在首位,连生产文字垃圾的速度也由于绩效考评的需要,而不断地被高等院校和研究院所的各级领导所强调。所以,在这一章中,一些话题并没有充分展开,一些表述显得力不从心,只有期待以后不断完善了。

目 录

第四章 分工演进、报酬递增与区域成长

第五章 开放条件下的区域成长

CHAPTER 1

总 论

"在原理上全部经济理论能从空间的侧面加以重新阐明。"

——奥古斯特·勒施(August Lösch)

穿越时空,俯瞰我们这个美丽的蓝色星球。文明在岁月之河里流淌,在区域的土壤中生根发芽、开花结果。时间勾勒着文明的历史轮廓,空间描绘着文明的缤纷色彩。回溯历史,曾经繁华织锦的地区或容颜老去,或满目疮痍,不复昔日光彩;而在一些并不起眼的地域空间上,却绽放出用最新人类文明成果的乳汁灌溉滋养的绚丽花朵。在感叹世事变迁的同时,我们也感受到区域这个神奇的空间概念带给我们的无限遐想,是造物主天意的捉弄还是我们自己创造着区域的兴衰成败?往事越万载,区域的故事历久弥新。本章将在相关概念梳理的基础上,通过对区域成长的历史回溯和全球鸟瞰,汇总本书关切的重要区域问题,进而以分工演进为主要线索,给出本书研究的逻辑结构和分析框架。

第一节 区域、区域发展与区域成长

一、区域的一般及分工视角下的区域概念

(一)区域的一般

“区域”像个可以随意打扮的小姑娘,在不同的语境下,有着不一样的内涵。作为一个空间载体,区域所承载的不仅仅是人类的经济活动,也承载着特定空间范围内自然地理、社会人文和历史等多方面的信息。因此,每个研究者都会因为自己的研究偏好,形成自己心中的“区域”印象。即使在经济学领域,学者们也会因为自己关注的重点不同,而形成对区域的不同理解。

其中,魏后凯认为:“区域是根据一定的目的和原则,而划定地球表面的一定范围的空间,是因自然、社会和经济等方面的内聚力而历史奠定,并具有相对完整的结构,能够独立发挥功能的有机整体。”[①]安虎森认为:“区域又是一种经济组织,这种组织是市场选择的结果,而非人为安排的结果,它是随城市的形成而出现的。”[②]事实上,区域是一个确实存在但又难以给出完整定义的概念。一般而言,区域具有如下含义:其一,区域既是一个实体概念,又是一个抽象概念(在区域经济学文献中,“区域”与“空间”这两个词往往不需要作细致的区分)。作为实体概念的区域,它确指地球表面具有明确边界范围的实体空间;作为抽象概念的区域,是人们观念的产物,它可能只有一个模糊的想象边界,也可能只是存在于观念意识中的空间。而它的内涵也就因人而异。其二,区域的内聚力、结构、功能、规模和边界构成区域的五个要素(也有文献将经济中心、经济网络和经济腹地作为构成区域的要素)。所谓“内聚力”,主要强调了区域形成过程中,由于自然地理、历史人文和经济联系等因素而在特定空间域面上把微观主体和各部门、机构整合为联系紧密的整体;所谓“结构和

① 魏后凯.现代区域经济学[M]北京:经济管理出版社.2007:11.

② 安虎森.区域经济学通论[M]北京:经济科学出版社.2001:1.

功能”,则是从结构主义观点出发,强调了构成区域的要素在时空、层次上的组合方式和相互关联对区域功能的影响;所谓“规模和边界”,则强调了由于内聚力的存在,在一定空间域面上形成了与其他空间域面非常明显的分异。同时,区域还具有动态性,不仅区域内部各要素及其重要性是变动不居的,区域的规模和边界也会有所变化。另外,区域还具有一定的等级体系,体现出层次性。不同等级区域的规模可能相差甚大,但经济意义上的区域是不能无限细分的。由于现实经济中存在着不同等级规模的区域,区域就具有层次性。通常可分为国家主权内部的经济区域(当然一个国家内部的区域也有层次划分)、国家层次的区域[①]、跨越国界由几个国家构成的区域(如欧盟)以及由几个国家部分地区共同构成的经济区域(如大湄公河次区域)[②]。

(二)分工视角下的区域概念

如果我们不是从区域的表面特征,而是从区域形成的客观机理去理解区域概念,可能形成更本质的“区域”定义。上述分析表明:形成区域的关键性力量是内聚力。而内聚力的形成,则源于特定空间域面上的各个单元(或各个主体)之间发生的经济、社会、人文等各种紧密联系,这些联系把各个单元整合起来,形成与外部空间有明显区际分异的相对独立、完整空间。在经济意义上,联系总是因为分工而产生,只要有人群的地方就有分工,分工的水平(包括分工的深度和广度),决定着各地理单元(或各主体)间交往的程度,而相互靠近的地理单元,由于交流更容易,分工的效率更高,更可能形成紧密的联系,从而形成内聚力量。因此,从分工的视角去重新诠释区域的概念,将更能体现“区域”的实质。

由此,笔者认识的区域概念可作如下定义:区域就是通过分工而把相邻的地理单元、经济主体、个人,各种组织、部门和机构编织起来,形成具有一定结构和功能、规模和边界的特定空间域面。区域的结构和功能、规

① 现有多数文献将区域的空间范围划定在一国边界之内,并不考虑国家层次和跨国界的区域问题。

② 大湄公河次区域(缩写 GMS)是指湄公河流域的 6 个国家和地区,包括柬埔寨、越南、老挝、缅甸、泰国和我国云南省。该区域总面积 256.86 万平方公里,总人口约 3.2 亿。

模和边界也就取决于分工的广度和深度。简言之，区域就是具有内在聚集力量的分工网络体系在地域空间上的实现，是分工的空间组织形式。也许有读者会对这个定义提出各种各样的质疑，请稍安勿躁，在本书后面的讨论中，这个话题会被反复提及并不断细化。

二、区域类型和区域经济存在的客观基础

（一）区域类型的划分

区域划分由于实践需要和研究需要的不同带有随意性，在本书的研究中，下述三种区域划分方法由于研究内容和视角的不同，可能被同时使用。

其一，按布代维尔的区域划分方法，将区域分为均质区（又称同质区）、节点区（又称功能区）和规划区。均质区强调的是区域内部的同质性，即自然要素、人文要素和经济要素同质，社会经济发展水平相近，面临的问题相似的同质化区域；节点区又称极化区或功能区，指由功能上彼此紧密联系的异质单元组成的区域，其内部具有功能相互联系、等级分明、核心突出等特点；规划区则是指为了以最经济的方式实现一定目标而设定的连续空间，目的是为便于解决特定空间范围的问题而实施一系列的政策与规划。

其二，按克拉森的区域划分方法，根据人均收入比和增长率比两个指标，将区域划分为繁荣区、处于扩张过程的欠发达区、潜在的欠发达区以及落后区。其中，人均收入和增长率均高于平均水平的区域为繁荣区，人均收入较低而增长率高于平均水平的区域为处于扩张过程的欠发达区，人均收入高于平均水平而增长率较低的区域为潜在的欠发达区，人均收入和增长率均较低的区域为落后区。

其三，在区域政策研究中，为制定有针对性的区域政策，往往把区域划分为不同问题的区域，如过度膨胀区、萧条区和落后贫困区。过度膨胀区域主要是指人类活动过度分工出现了不经济的现象，并导致公共产品和公共服务无法满足社会经济需要的区域；萧条区指曾经达到过较高的发展水平，但当前正处于增长迟滞或衰退的区域；落后贫困区主要指增长

乏力、发展水平低下的区域。

（二）区域经济存在的客观基础：区域经济学的解释与分工理论的再解释

现实中，区域经济是一种客观存在，但它存在的基础是什么？是什么造就了经济区域间存在着明显的区际分异（作者注：在此，安虎森先生把区域经济看作"块状"而非新古典描述的"平滑"经济，也就是说经济表现在空间上并不是连续而平滑的变动，不同的空间单元间存在着断点。如中国安徽与江浙地区虽然地理邻近，但经济表现差异明显）。事实上，这一问题关系区域经济学的学科命运。胡佛在其《区域经济学导论》中把区域经济存在的客观基础归结为生产要素的不完全流动性（资源禀赋差异）、经济活动的不完全可分性（意味着集聚经济，或经济活动外部性）以及产品和服务的不完全流动性（意味着转移成本或距离成本，包括运输成本、时间成本、信息成本和心理成本）。

我国区域经济学重要奠基者陈栋生先生对此提出了较为深刻的解释：其一，关于生产要素的不完全流动性。假定生产要素在空间上能够完全自由流动，各个要素的供给自然会从资源富集地区流向稀缺地区，以致要素价格、成本和收入就会趋于均等化，经济活动整合划一，也就不存在所谓区域经济。然而，事实上生产要素在一国范围内具有不完全流动性。这种不完全流动性包括两层含义：一是指生产要素不是都能够流动的，其中有些能够流动，有些则是固定不动的。前者如人口、劳动力、资金、物资设备和技术等；后者如土壤、矿藏、地形、水文和气候等自然资源和条件。这些自然资源和条件的不均匀的地理分布，便成为"某些经济活动会产生在某个区域"的一个基本解释。我国黄河流域与长江流域，因气候、水文和地形地貌等自然差异，而形成农业尤其是粮食种植业的不同特点，山西是煤炭资源的富集地区，由此而产生以煤炭产业为主体的山西经济特征。要素不完全流动性的第二个含义是指，能够流动的生产要素其流动性是有限的或不完全自由的。对这种要素流动的约束来自许多方面，主要有：①管理体制。出于国家行政管理的需要而对要素流动作出种种规定，如户籍管理制度，使人口的迁徙和居住地的选择受到一定制约。②主

体利益。利益动机是流动约束的内在原因,资本追逐利润率、劳动者向往高收入,违背这些目标,会使流动自行停滞。③历史文化。传统的习俗和观念,常常使许多人不愿离开本乡本土,一国人口的流动频率往往还同该国的文明程度成正比,文盲或文化层次低的人,由于就业面窄而流动受限。显而易见,生产要素的不完全流动性使得经济活动不可能形成空间上的均匀分布,构成区域经济分异的基础。其二,关于经济活动的不完全可分性。要素的不完全流动性只是解释区域经济存在的一个必要条件,绝非充分条件。我们可以作这样的假设:在资源赋存和自然状况完全一致、要素可以充分流动的一片均质的平原上,经济活动按照逻辑将出现什么格局呢?有人或者会认为各种产业都集中在某一地点,也有人或者相信各种产业将均匀分散于整个地区,还有人想象各种产业会以杂乱无章、毫无规则的空间格局分布。实际结果都不是这样,而是形成一种有层次、有规划,秩序井然的"空间景观"[①]。不论是杜能的"农业区位理论"、韦伯的"工业区位理论",还是克里斯塔勒的"中心地理论"、勒施的"经济空间秩序"理论,无一例外地为我们表达了这样一种理念,即:经济活动在空间上并不是杂乱无章,而是按照某种逻辑有规律地分布的。特别是在现代经济中,城市作为人类活动的中心舞台,其内部的空间结构非常精致、复杂,但不失秩序。而这种以城市为中心的区域经济是不能单纯用自然条件来解释的,它的基础之一就是来源于经济活动的不完全可分性。经济活动的不完全可分性由产业的规模经济和集聚经济(或称外部经济)所决定。一个企业生产规模在一定限度内增大,一般可收到节省单位产品的成本和提高效率的好处,这就是企业规模经济。若干个企业集中于一个地点能为各个企业带来成本节省等经济利益,比如,有专门的机器维修与制造业可以为各企业服务;有专门的劳动力市场,可以向各厂提供所

① "景观"的概念来自勒施,他在《经济空间秩序——经济财货与地理间的关系》(商务印书馆,1995年)中应用区位理论,论证了经济活动围绕城市中心而形成的正六边形空间形态,以及由此延伸出的12个经济活动密集区与经济活动稀少区交替的扇面分布,具有经济上的合理性。后人把这种空间结构叫作"勒施景观"("廖什景观")。但是对经济活动在地理空间上有规律、有秩序分布的认识,可以追溯到杜能的"农业区位理论",也可以在克里斯塔勒的"中心地理论"中看到明确而清晰的表达。

需要的劳动力;各企业享有购买原料方面的便利;有公用事业、道路以及社会文化生活等便利,这就是外部经济或集聚经济。规模经济和集聚经济使得各生产要素和经济单位集结在一定空间,从而形成以城市为中心的区域经济。其三,关于产品和服务的不完全流动性。陈栋生先生主要从距离成本来理解,空间是有距离的,从一端到另一端,不仅要耗费时间,而且要付出费用,克服空间分离的耗费即距离成本。经济活动中的生产地、原料地和市场地往往不会同在一处,企业在选址时必然要考虑三者的距离最短、运输费用最低的区位;消费者去商店购物,既要占用一定时间,也要支付一定的路费,因而愿意就近购买。这些距离成本限制了自然天赋优势的发挥和空间集聚经济得以实现的程度,使经济活动局限于一定的空间范围。所以它构成区域经济存在的又一重要基础。

上述只是从经济层面考察了区域经济存在的客观基础,区域经济的存在还与政治因素、社会因素和文化因素相关联。其一,政治体制的不同会产生不同的区域。同样是日尔曼人,在德国统一前,西德和东德就是两个完全不一样的区域;同样是中国人,两岸三地都各自属于不同类型的区域。其二,宗教的异质性往往形成重要区域分界线。宗教信仰差别很大的地域空间,即使空间相邻,也难于构成一个经济区域。比如,中东地区虽然与欧洲毗邻,但两个地区的经济活动特征和经济表现差异非常明显。其三,民族性格、人文特征的差异性也会对区域的形成产生影响。以拉丁民族为主体的经济区域(如西班牙、葡萄牙)与以日尔曼民族为主体的经济区域(如德国)也有明显的差别。而在我国,边疆民族地区与内地有差异,即使是内地,河南人、四川人、安徽人、浙江人、东北人也在文化背景、风俗习惯、性格等诸方面多有不同。总之,由于不同的经济活动在不同的区域空间上各自存在着不同的成本—收益比较,因此,区域经济必然存在。

其实,从分工角度重新阐释区域经济存在的客观基础亦完全可行。从区域内部而言,由于历史的、自然的、人文的、经济的各种原因的汇聚,围绕着一些主要产业而在特定空间域面上形成的分工网络体系,比其他空间域面形成这样的体系具有明显的优势,从而形成不同于其他空间的

特定区域；从区际分工而言，一些产业在某个特定的区域上展开具有比较优势，由此自然形成区际分异。从分工视角解释区域经济存在的客观基础还会在以下各章逐步展开，此不赘述。

三、区域增长、区域发展与区域成长

从概念上，“增长”①只关注经济活动中量的变化，“发展”②则既强调了经济增长中质和量的关系，也关注了区域的社会和人文变动过程。在某种意义上，区域发展与区域成长有相似的内涵，但笔者之所以更强调“成长”的概念，则完全因为“区域成长”更强调区域变动的整体性、持续性、历史累积性和长期动态演化特征。

本书可以用“区域发展”也可以用“区域成长”作为书名。而对“区域成长”一词的偏好，既源于罗斯托的启发，也来自人类个体发育过程与区域运动过程的类比。

在罗斯托的名著《经济成长阶段——非共产主义宣言》(1959 年)以及不那么出名的《政治和成长阶段》(1970 年)等著作中，“成长”都是最重要的关键词。他的经济成长阶段理论，时间尺度不是 5 年为期，也不是以 10 年、20 年甚至 50 年为期。在他的经济成长阶段理论中，从传统社会阶段向为起飞准备条件的阶段，其时间跨度可以上千年；而从起飞准备阶段向起飞阶段的时间跨度也可以达到数百年。我们以西方世界近现代化过程为例，从文艺复兴(14 世纪末)、宗教改革、地理大发现到工业革命(18 世纪末)，最后形成工业文明(19 世纪)，这近五百年的历史就是为起飞准备条件到经济起飞的时间跨度。之所选择如此长期的时间尺度，很重要的原因在于：只有在一个长期的时间跨度上，才能把经济过程中那些波动和曲折以及那些次要的影响因素过滤掉，真正看到发展的长期趋势

---

① 对“增长”概念进行讨论不是本书的重点，此处所理解的“增长”，主要来自新古典宏观经济学，不论是新古典中哈罗德—多马模型还是索洛模型都是通过投入与产出间的关系，分析产出的变动。因此，产出的变动就成了理解“增长”的关键。

② “发展”这个概念意义涵盖很广，作为本书的另一个重要的关键词，对这一概念形成和发展的追溯，对这一概念的理解，将在下一章中逐步说明。在这里不再赘述。

和发展中最本质的东西。

而人类个体发育过程与区域运动过程的类比,也有助于我们很好地理解“增长”和“成长”的区别。对于人类个体而言,“增长”意味着体重、身高等人体表面特征不断的变化过程,而“成长”对于个体而言,它是一个生理的逐步成熟过程,更是心智的逐步成熟过程。在这个类比中,“成长”就具有了整体变动、逐步走向成熟的含义。

所以,本书研究的,不是以短期增长来衡量的区域变动,而是区域在一个长期连续的大尺度时间范围内的持续演化过程;所关注的,不仅是区域经济活动中量的积累和质的飞跃,也包括社会的持续进步、个人自由的不断扩展以及区域发展中的文化自觉过程。也可以这样理解:区域成长是文化在“器物层次”(物质、产品的生产层面)、“组织层次”(体制机制层面)、“精神层次”(人的精神和心理层面)上的整体变动和逐步成熟的过程,体现着文明嬗变的历史进程。

四、被遗忘的空间维度和区域层次:区域研究的意义

(一)新古典经济学的缺陷及空间研究的意义

在萨缪尔森看来,经济学主要研究资源配置问题,具体而言无非是:生产什么(What)? 怎样生产(How)? 为谁生产(Who)? 但并没有涉及在哪里生产。随着经济学研究的深入,更多的学者相信人类面临的经济问题虽然都与资源配置相关,但绝不是新古典那种理想状态下的资源配置,现实中的资源配置要复杂得多,约束条件也要多得多,历史因素、制度因素、文化因素、心理因素、地理因素等都会对我们的选择产生重要影响。因此越来越多的学者认为经济学是一门研究人类行为(特别是经济行为)选择的学问。如果说行为选择是经济学研究的对象,那么人类活动的空间选择问题,就不仅仅是资源配置问题,还涉及微观主体的空间选择如何造就了不同类型的区域,如何形成了区域间不同的发展格局,如何影响着区域间的交往。

新古典经济学里没有空间概念,甚至找不到城市这个术语。在微观经济学领域,消费者理论并没有回答消费者在哪里消费的问题;生产者理

论也并没有告诉读者如何选择生产区位和销售区位；市场理论也只讨论了市场结构问题，而没有回答市场在哪里形成。在宏观经济学领域，它无法深刻解释生产的地方专业化和国际贸易（区际贸易）中的产业内贸易问题，无法解释城市的形成、发展和演变，也无法理解产业集群、城市群等经济现象。

由于上述缺陷，新古典经济学不能在空间（区域）层面上，对经济发展给出答案，不能解释当代经济中极其重要的很多经济现象，也不能解释即使条件相近或空间相邻的区域为何发展存在明显的差别。区域（空间）问题的研究，为经济学提供了非常重要的第四根支柱：Where？

（二）区域是经济问题研究适宜的空间尺度

首先，区域作为一种经济的空间组织形式，是区域内个人、企业、市场和政府交互作用形成现实经济运行的空间载体。离开这个载体，经济活动不复存在。

其次，区域层次的经济研究既能弥补国家层次经济研究的不足，也能克服微观层次的经济研究中空间因素的缺失，它也是联系宏观与微观的中观层次。把区域作为研究经济问题的空间单元（或空间尺度），可以克服宏观层次研究的大而不当，也可能克服微观层次只见树木不见森林的片面与狭隘。

第三，把区域作为研究经济问题的基本空间单元，根本原因还在于区域是一个要素完整、各区域差异明显，且在全球或国家分工体系中承担独特功能的分工网络节点。因此，区域研究对指导具体的区域经济实践有不可替代的作用，尤其对于禀赋空间差异明显的大国，其意义不可小视。

第二节　区域成长的历史回溯、全球鸟瞰及区域问题的提出

一、区域成长的历史回溯

相当多的人类学家相信,地球上所有的人类都来自同一个地方——非洲东部和南部的大草原[①]。非洲大草原孕育了人类,但人类却并不满足于在这样一个小小的天地里混日子。几十万年来,他们四处漂泊,足迹几乎踏遍了地球的每一个角落。在漫漫的迁徙征途上,他们根据自然地理环境的不同、资源禀赋的差异,用辛劳的双手造就了一个个类型各异的自然经济区域,又用智慧把他们耕耘的区域变成了农耕区或畜牧区,进而把他们改造成城市区和工业区。人类在每一片自己生存的区域上挥洒汗水、播种智慧,形成经济、政治、文化的多元发展格局,我们生存的地域空间被一块块区隔开来,最终形成了散布于地球表面、千姿百态的空间单元。

(一)采集渔猎时期的区域

相对于浩瀚永恒的宇宙,人类只是渺小的存在;相对于已经有 50 亿年历史的地球母亲,人类从诞生到现在的历史也只不过短短的一瞬。考古学家们的研究表明,人类作为一种直立动物(原人)出现的时间大约在 400 万年前,作为一种具有思维能力的动物(智人)的历史也只有 4 万年,人类进入文明时代[②]的时间则更晚,距今不到 6000 年。而 6000 年以前的人类尚处于使用石制工具,以采集渔猎为生的蒙昧时代(或者说是部落文化时代),经历了从旧石器时代到新石器时代的漫长过程。这一时期科学技术的进步相对缓慢,从使用自然天成的石器到打制石器再到磨制

---

① 人类起源于非洲大草原的观点虽然得到很多佐证,但仍然只能是一种流传广泛的假说,而人类多地区起源的看法也并非无稽之谈。

② 根据历史学家的理解,人类进入文明时代是以城市、文字、阶级的出现和艺术、科学的初步形成为标志。而现有的考古资料表明,苏美尔人创造的两河流域文明是人类历史上最早出现的文明,距今不到 6000 年。另外,对人类早期历史有多种解读,本文的相关资料主要取自:斯塔夫里阿诺斯. 全球通史(第 7 版)[M]. 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3 - 18.

出更加锋利适用的石器，人类用了近400万年的时间。由于落后技术条件的限制，人类还不可能成为真正意义上的生产者，几乎全部的人类所需都仰赖自然的赐予，石器、弓箭等工具的使用只不过提高了采集和渔猎活动的效率，并没有改变人类从属于自然，并作为生物圈和食物链中的一个环节而存在的现实。因此，人类早期的生存状态，完全取决于自然条件，而人类经济活动的空间则必然以食物资源为指向，由于食物资源的空间差异性，形成了不同的自然经济区域，它们或者是食物采集区，或者是捕渔区，或者是狩猎区。这种以天然食物资源的空间分布为指向的经济活动，不仅存续时间很长（我们至今仍可以在黑非洲或其他闭塞落后的地区发现其活标本），且对区域演变的过程产生了重要的影响，当今一些农耕区域或畜牧业区域往往也可能就是原始人类的食物采集区或狩猎区。

（二）古文明时期的区域

在新石器时代晚期，人类对自然的支配力进一步增强，特别是植物栽培技术和动物驯化技术的出现，为人类进入文明时代准备了技术前提，使得人类从自在的存在发展到自为的存在成为可能。由此产生了人类历史上第一次伟大的飞越，即农业革命。农业革命的产生和农业文明的形成，还得益于灌溉技术的掌握和冶炼技术的发展，金属工具的运用大大提高了人类的耕作效率和耕作范围。另外，犁、车轮等的出现也助推了农业文明的进程。当农业文明的第一缕曙光出现在美索不达米亚平原，农业文明就以其显见的优越性迅速在各大陆开花结果，并形成了令后人叹为观止的几大早期的农业文明核心区域，即两河文明、尼罗河文明、印度河（恒河）文明、黄河（长江）流域文明及古希腊罗马文明。[①] 古文明是水孕育的文明，主要体现为流域经济。如两河流域、尼罗河流域、印度河恒河流域、长江黄河流域，经济活动的空间分布以农业相关资源为指向。这些区域发展的特点是到达一定的高度就自然停滞，甚至逐步消亡。历史上辉煌无比的古文明，唯一存续到现在的只有中华文明。

① 早期农耕文明核心区域形成、发展到衰落或消失的时间大概在公元前3500年到公元500年。



图1－1 北纬30度[①]：一条穿越古文明的神奇纬度线（示意图）

古文明时期的区域虽然主要是点状分布的农耕区域，但地域分工已经初显端倪。城镇区域作为农耕社会的必要补充，承担了小商业和手工业的产业功能，作为行政中心的政治职能，以及作为军事堡垒的军事职能；同时，相对开放的城镇化区域，也由于其便利的交往条件而成为文化交融发展的高地；另外，随着动物驯养技术的成熟，畜牧业区域也在迅速发展起来，而且很多畜牧业区域一直存续到现在。

（三）中古世纪时期的区域

在公元500年到公元1800年间（在中国相当于隋至清中叶），西罗马帝国毁灭在日尔曼蛮族的铁蹄下，欧洲进入中世纪，形成基督教世界；小亚细亚、阿拉伯半岛、伊朗高原和埃及被阿拉伯人控制，形成伊斯兰教世界；印度古文明陨落在雅利安人的打击之下，孕育了新的文明因子；而中国在经历了南北朝的长期离乱之后，又重新成为一个大一统的帝国，翻开了其农业文明史上最辉煌的篇章。这一时期农耕文明在更大的范围展开和发展，农耕区域在空间上由分散的点状逐步扩展成为以北纬30度为中

① 北纬30度，是一条神奇的纬度线，古埃及、古巴比伦、古印度、中国四大古文明自西向东排列，而自西向东的排列，也是古文明按发生时间顺序的一个排列。

心轴线、东起东亚西至地中海的农业文明核心带。这一核心带的形成，使得区域间的交往日益频繁，加快了技术进步的步伐。在此期间，中国的火药、造纸术、指南针、印刷术传播到其他地区，阿拉伯人航海技术传入欧洲，而中国人也受惠于其他地区的文明成果，特别是明季传入中国的高产作物如土豆、玉米和番薯等。在这一千多年的时间里，由于耕作范围的扩大，以及技术的进步，全球人口翻了近2翻，达到近9亿的水平。

人口的繁衍，农耕区域由点到面的扩散，为商业和手工业的发展提供了条件，为城镇的兴起提供了沃土。在海洋贸易还是一项成本高昂、充满风险的事业的时候，欧亚大陆上（主要是陆上丝绸之路）上已经产生了一些具有世界影响的商业城市，如长安、巴格达、君士坦丁，都是那个时代的世界性大都会；而随着航海技术的进步，海洋贸易后来居上，地中海周边产生了佛罗伦萨、威尼斯、热那亚等著名港口城市，北海周边产生了阿姆斯特丹、鹿特丹和伦敦这样一些世界性港口城市，而中国的杭州、泉州等城市在这个时代也崭露头角，成为中国海上贸易的标志性城市。

（四）工业文明时期的区域

公元500年，古希腊罗马文明衰落。在经历了漫长的中世纪后，西方世界开创了区域成长的新局面，诞生了现代文明。18世纪中叶，经过文艺复兴、地理大发现、宗教改革和科学革命的长期准备，在英国产生了席卷全球的第一次工业革命，诞生了世界上第一个以城市和工业为主要内容的经济区域（这个区域可以粗略地表述为从伦敦到格拉斯哥的制造业带），催生了伦敦、曼彻斯特、利物浦、格拉斯哥这样的工商业城市；随后莱茵河流域的工业化、城镇化区域也迅速发展。一战后，人类历史上又发生了第二次工业革命。在距今两百多年的时间里，这两场革命把人类社会带到一个前所未有的高度。工业文明时期，生产力的巨大进步彻底重构了整个世界和区域的面貌，时至今日，人类几乎踏遍了地球的每一个角落，甚至在茫茫宇宙中留下了自己探索的脚印。技术的不断进步似乎正在为人类改造和征服自然创造一种无限的可能性，伴随技术进步而来的是财富的惊人增长。不仅如此，工业文明还为人类引入了资本主义的制度体系和市场经济的经济运行机制。在这个制度体系里，对利润和财富

的疯狂追逐成为人类生存的常态和终极意义，而市场机制则使得生产者不再是为自己生产产品，而是为整个市场网络中的人群提供产品，其产量也就不再以自己的消费量为限，而是以市场的规模为限。

此时，经济活动的空间逐渐摆脱了自然资源空间分布的约束，出现了以城市为指向的特点。城市的构造日益复杂、规模日益庞大、功能日益完善，成为经济活动的主要空间载体。在这个时代，工业化、城镇化发展快速的区域成为工业文明的中心地带，从伦敦到格拉斯哥的制造业带、以鲁尔区为代表的莱茵河流域地区、从芝加哥到多伦多的北美五大湖区、以纽约为中心的美国西海岸，这些曾经名不见经传的区域，一跃而成为全球的中心，其地位一直延续到当下；那些农耕文明区域，如黄河、长江流域和印度河、恒河流域，则无一例外地衰落了。这个时代还是一个海洋文明取得辉煌成就的时代，那些海上贸易的枢纽性区域取得了其他地区无法企及的重要地位，伦敦、阿姆斯特丹、纽约、东京，甚至中国的上海，这些面向大海的城市，要么成为地区性的经济中心，要么成为了全球性的国际大都会。而那些内陆性的中心城市，如洛阳、长安、巴格达，已如明日黄花，逐步被边缘化了。

二、区域成长的全球鸟瞰

如今的地球不再是那个苍凉孤寂的蓝色星球，近70亿人类个体几乎挤满了每一块适宜生存的空间，各式各样奇怪的人造建筑和设施、密集连绵的城市和乡村使得这个星球局促不堪。在某种意义上，人类大规模地重塑了他们赖以生存的星球。

（一）人类活动的主要舞台正逐步转移到城市，大都市圈成为全球经济最集中、经济发展水平最高的区域

伴随着工业文明的到来，城市日益成为人类生产生活的中心舞台，由城市而城市群、由城市群而大都市圈，见证了三百多年来工业文明的辉煌。目前，全球表现最活跃的地区集中在五大都市圈，包括五大湖、纽约、巴黎、伦敦和东京等。北美五大湖都市圈分布于五大湖沿岸，从芝加哥向东，经过底特律、克利夫兰、匹兹堡，一直延伸到加拿大的多伦多和蒙特利

尔，是著名的北美制造业带，也是电气化时代全球的工业中心。纽约都市圈是世界五大都市圈之首，它北起缅因州，南至弗吉尼亚州，几乎囊括了整个美国西海岸，跨越了10个州，其中包括波士顿、纽约、费城、巴尔的摩和华盛顿5个大城市，是当今美国经济的中心。其核心城市纽约是世界经济和国际金融的神经中枢。伦敦都市圈，以伦敦—利物浦为轴线，连接着伦敦、伯明翰、谢菲尔德、曼彻斯特、利物浦等数个大城市和众多中小城市。面积约4.5万平方公里，人口3650万，是产业革命后英国主要的生产基地和经济核心区。其中，由伦敦城和其他32个行政区共同组成的大伦敦是这个都市圈的核心，其面积约1600平方公里的土地。大伦敦区曾经是日不落帝国的心脏和全球的工业中心，如今它的制造业功能已经外移，从而慢慢演变成一个金融和贸易中心。而近些年来以创意产业为主的新兴产业开始在大伦敦地区异军突起，成为仅次于金融服务业的伦敦第二大支柱产业。东京都市圈则是后起之秀，总面积1.34万百平方公里（包括东京都、崎玉县、千叶县、神奈川县），占全国面积的3.5%；人口则多达3400万人，占全国人口的27%，GDP则占到日本全国的1/3以上。巴黎大都市圈以巴黎为中心，沿塞纳河、莱茵河延伸，巴黎都市圈覆盖了法国巴黎，荷兰阿姆斯特丹、鹿特丹，比利时安特卫普、布鲁塞尔和德国科隆，包括了4个国家的40个10万人口以上的城市。其中，由7个省组成的大巴黎地区是这个都市圈的核心。整个大区面积仅为法国国土面积的2%，但人口却占到了19%，是欧洲人口最密集的都市地区。

当然，全球发达的地区不仅仅上述五个大都市圈（城市群），篇幅有限，不能一一细数。另外，在新兴工业国家，也出现了快速发展的城市化区域，如中国的“长三角”、“珠三角”地区正在成为具有全球性影响的经济增长极。其中，“长三角”地区在全球城市群中可以排到第六位。

（二）一些区域在新经济的刺激下成为全球区域成长的明星地区

随着创新日益成为区域经济成长的引擎，那些拥有强大创新能力、在全球分工体系中处于产业链高端的区域，成为经济发展最活跃的地区。特别是在新经济的引领下，一些区域迅速崛起，成为最耀眼的明星（如硅谷、曼哈顿、班加罗尔等），受到全球的追捧。硅谷（Silicon Valley）位于美



图 1－2 全球六大城市群(都市圈)示意图

国加利福尼亚州的旧金山经圣克拉拉至圣何塞近 50 公里的一条狭长地带,是世界最为知名的电子工业集中地。它以具有雄厚科研力量的美国一流大学斯坦福、伯克利和加州理工等世界知名大学为依托,以高技术的中小企业群为基础,并拥有思科、英特尔、惠普、朗讯、苹果等大公司。20 世纪 80 年代后,生物、空间、海洋、通信、能源材料等新兴技术的研究机构纷纷出现,该地区客观上早已成为美国乃至全球高新技术的摇篮。在发展中国家也有这样的明星区域,印度的班加罗尔就是其中之一。班加罗尔是印度南部城市,从 1991 年开始,印度中央政府开始实施"软件技术园区计划",班加罗尔建立了印度第一批计算机软件园区、信息技术园区、出口加工园区。此后马德拉斯、海得拉巴等南部城市的高科技工业园区也发展起来,形成印度南部著名的软件产业"金三角"。以班加罗尔为代表的印度信息产业发展,使印度这个失落太久的国度油然生出一股自豪感,也使它可以怀揣着"世界办公室"的梦想上路。

创新往往被狭义地理解为技术创新,事实上各个领域都可以持续不断地创新,如制度创新、管理创新,等等。在以创新而获得明星地位的区域中,以不断的金融创新而掌控全球金融制高点的区域——曼哈顿,让世

界瞩目。这里是世界金融的心脏，也是全球文化的重心。它处于纽约市中心区，总面积仅有 57.91 平方公里，占纽约市总面积的 7%。纽约著名的百老汇、华尔街、帝国大厦、格林威治村、中央公园、联合国总部、大都会艺术博物馆、大都会歌剧院等名胜都集中在曼哈顿岛。曼哈顿 CBD 主要分布在该区内曼哈顿岛上的老城（Downtown）和中城（Midtown）。其中，位于老城、面积不足 1 平方公里的华尔街——CBD 的金融区，就集中了几十家大银行、保险公司、交易所以及上百家大公司总部和几十万就业人口，成为世界上就业密度、资金密度最高的地区和全球最重要的金融创新产品的生产基地。而中城则是曼哈顿的总部经济区和豪华居住区，帝国大厦、克莱斯勒大厦、洛克菲勒中心等一些著名的建筑都坐落在这个区。

（三）失衡的空间，贫富的两极

在全球范围内，区域发展是非常不平衡的，而且不平衡发展的态势一直在持续着，没有改善的迹象。到目前为止，全球约有 10 亿人口仍然饱受着贫困的折磨，这 10 亿人主要集中在撒哈拉以南非洲和亚洲贫困带。

近一个多世纪以来，贫困就一直在困扰非洲大陆，尤其是撒哈拉沙漠以南非洲地区，贫困的顽固性和蔓延态势，让人揪心。世界银行的数据显示，从 1981 年到 2005 年该地区约有一半的人口生活在贫困线[①]下，日均消费水平仅为 70 美分，每年大约有 180 万人死于腹泻，其中 90% 是 5 岁以下的儿童。尽管部分亚洲欠发达区域成功地实现了经济起飞，但东亚和南亚地区仍然深陷贫困的泥潭。在 1981 至 2005 年间，得益于中国经济的快速发展，以及中国在减贫方面的巨大投入，东亚地区贫困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从近 80% 下降到 18%（约为 3.3 亿人）。南亚地区就没有那么幸运了，多年的发展虽然也使其贫困率从 60% 下降至 40%，可是由于人口总量的增长，贫困线以下的人口数并未减少。此外，在拉美和东欧局部区域也仍有许多人生活在贫困之中。

---

① 在我国，绝对贫困线的标准根据能够保证最低生存需求的食物消费和非食物消费划定，并随时间而动态调整，如 1985 年的绝对贫困线为农村居民人均年纯收入 206 元，2011 年末此标准已经上升至 2300 元（约合每天人均纯收入 1 美元）。在国际上，联合国的贫困线标准是每天生活费在 1.25 美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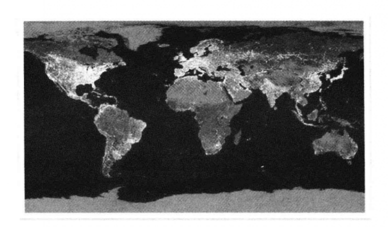


图1-3 从全球夜间灯光折射出的世界人口分布与经济发展图景

(四)全球分工深化,区域在国际分工网络中扮演日益重要的角色,区域生产的地方专门化特色日趋强化,区域一体化的步伐正在加快

随着全球化浪潮席卷全球,区域独善其身的时代一去不复返了。二战后,国际贸易的增长速度远远超过了全球经济的增速,贸易全球化背后的推动力量则是全球分工的不断深化。全球分工在形式上是国家与国家之间的产业内和产业间分工,但其支撑力量却是区域生产的地方专门化。也就是说,区域间的专业化分工是全球分工深化的主要特征,而国际竞争不仅是在国家层面的竞争,更是区域间的竞争。

全球产业内分工、产业间分工和区域的地方专门化生产是一个事物的两个方面,产业中相关的各个部门以及相关的要素市场在空间上的聚集生长,会产生明显的聚集效应,形成竞争优势明显且规模庞大的产业集群,从而可以向区外(包括国外)提供质量优异、成本低廉的专业化产品。这种产业的地方专业化随处可见,如浙江温州的打火机、眼镜,义乌的拉链、饰品和玩具,永康的五金,海宁的皮革,慈溪的渔钩,绍兴的轻纺等产业,都形成了高度专业化生产的特色。从现实情况看,那些越深卷入全球化的区域,产业的地方专门化特色就越明显,也就越依赖于这些输出性的产业以实现地区繁荣。

区域分工不仅表现为产业间分工,区际的产业内分工甚至以更快的速度在发展着。产业内分工在地域上的表现形式就是产业链的全球化布

局日益成为常态。全球化生产网络的形成，使产品的“国产”概念越来越模糊，而参与其中的区域，成为生产网络中的一个一个节点。以 IT 业为例，全球 IT 产业呈现出在北美、欧洲和亚洲一些空间节点上以专业化分工的方式，形成聚集发展的态势。其中，核心技术研发和全球营销环节集中在北美西海岸，服务外包则集中在印度西南部和中国沿海地区，关键零部件则相对集中于中国台湾地区，硬件生产环节、外设和组装环节则高度集中于中国大陆。

与全球化并行的另一个重要区域现象是区域一体化。一波又一波的全球化浪潮放大了区域经济的波动，在赋予区域以更大的发展空间和发展机遇的同时，也把衰退的风险和外部世界的挑战强加给卷入其中的区域。各国、各地区为了充分利用开放的经济环境（全球化）带来的机遇，拓宽区域发展空间，统筹好国内和国际两个市场，提升区域竞争力，规避开放环境（全球化）的杀伤力，都不约而同地选择了区域一体化。选择区域一体化意味着每一个区域都试图把自己这条“小船”与其他区域绑在一起，从而实现在开放环境下平稳前行的发展目标。在国际上，欧盟、北美自由贸易区等区域一体化组织正逐步走向成熟，在国际经济中发挥着日益巨大的作用。在国内，中国加入 WTO 后，一股区域一体化的热浪席卷而来。沿海地区，“长三角”城市群、“珠三角”城市群、京津冀城市群日渐成形；中部地区，人们已经可以触摸到中原城市群、武汉城市群、长株潭城市群的胎动；而在西部地区，成渝城市群、关中—关水城市群、北部湾城市群的打造，也已经上升为国家规划；而诸如“泛长三角”、“泛珠三角”、“西三角”等种种提法和动议，不绝于耳。

最后，20 世纪，人类通过自己的努力在一些区域发展中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田纳西河流域治理、鲁尔工业区改造、北海道开发都成为问题区域走上持续发展道路的经典案例，而政府通过引导相关企业聚集发展的各类园区建设，也取得了良好的效果，这些园区成为区域发展的重要支撑力量。当然政府对区域发展的干预并不总是成功，过度干预导致区域衰退或者畸形发展的案例也比比皆是。

三、研究问题的提出

对历史的回溯和对现实的考察所引申出来的问题主要集中在以下几点。这也是本书重点讨论的内容。

其一,不同区域空间的经济表现何以反差如此强烈？是什么因素决定区域的产出水平和就业水平？一些区域的贫困落后是宿命还是偶然,脱贫之路在哪里？昔日繁荣富庶的区域何以“铅华褪尽”？有没有区域“驻颜之术”？区域间明显的社会人文差异是如何形成的？区域间的人文差异又怎样影响了区域的演进过程？

其二,影响经济主体空间决策的因素是什么？是什么导致经济活动空间分布如此不均匀？经济为什么越来越集中于少数面积极其有限的区域空间上？空间一体化能否实现？实现的途径怎样？

其三,区域内部经济活动的空间组织是如何形成和演变的？是什么促成了不同区域空间结构的不同特征？

其四,开放的环境怎样重塑了区域面貌？地域分工体系如何影响着区域成长？怎样才能改善区域分工和区际关系,构建区域间最优的竞争合作秩序？

其五,国家和各级政府在区域中应该扮演什么样的角色？区域政策有无必要？如有必要,其着力点在哪里？

第三节　基于分工演进的区域经济理论:一种新尝试

一、从空间维度重构经济理论的可能性

“在原理上全部经济理论能从空间的侧面加以重新阐明”[①],这是68年前勒施为区域经济学勾画的一幅动人前景。而自沃尔特·艾萨德(Walter Isard)以来,构建一个清晰、完整,系统化的区域经济理论体系成

① 奥古斯特·勒施. 经济空间秩序[M]. 王守礼,译. 北京:商务印书馆,1995:1.

为区域经济学者孜孜以求的目标。但时至今日，区域经济学的发展仍然处于摸索阶段。当你查阅相关书籍文献，你会感叹于这一领域浩如烟海的资料信息，你也会困惑于何以这些资料没能够给你提供一个关于区域经济学的清晰面貌？近二十多年来，相关领域内的一些重要突破重新唤起了人们对区域经济学的关注，也为区域经济理论体系的构建提供了可能。特别是20世纪后期分工理论、新经济地理学和经济社会学的新进展让区域经济理论的进一步发展有了更加坚实的基础。由于区域经济问题的复杂性，有必要建立一个以分工理论为主线，综合古典经济学、新古典经济学、新经济地理学、经济社会学相关成果的理论体系。其中，分工理论能够较好地解释区域经济成长的实质，而由分工演进推动的市场网络、科层网络和社会网络的发展则是推动区域经济动态变化的基本力量。在区域经济的短期分析中，由于分工水平给定，区域经济的表现主要取决于技术、资本和人力等要素投入，新古典宏观经济理论可以为其提供适宜的分析框架；而新经济地理学和经济社会学则不仅能为区域经济的长期动态过程分析提供有力的工具，也能够为经济活动的区域根植性和区域经济的差异性提供恰当的解释。从区域分工演进推动市场网络、科层网络和社会网络的形成与发展，进而左右区域经济的不同表现和长期动态变化的思路，综合古典经济学、新经济地理学、经济社会学和新古典经济学的成果，对区域经济理论整合的逻辑框架和基本内容架构进行探讨，将会是区域经济理论逐步走向成熟的重要一步。

二、区域经济研究诸视角的简要述评

（一）从区位理论到新经济地理学——区域经济学学术传统的构建与复兴

如果说区域经济学有自己区别于其他经济学科的学术传统，那么区位理论无疑就是最能体现区域科学学科体系特色的原创性理论。尽管这一学术传统没能融入主流经济学，但它卓越的洞见仍然会让每一个接触到它的人怦然心动。近二十年来，新经济地理学的长足进步使得这一传统得以在更大的范围内复兴，它不再局限于经济活动空间分布规律的考

察,而是跨越了区域科学、产业经济学、国际贸易理论、经济增长理论、城市理论等多个领域,在一个更加综合的视角上整合了现有学术资源。

区位理论和新经济地理为我们提供了一个理解区域经济的空间自组织过程的完整框架。如果说区位理论给出了在给定市场中心(城市或中心地)条件下,经济活动空间秩序的一般特征(经济活动的空间分布及由此形成的有序空间组织);那么,新经济地理学则不仅为我们解释了这个市场中心是如何形成的,单一中心如何演化为双中心和多中心,更为我们提供了一个从报酬递增理论理解区域经济可持续成长的视角。

(二)区域经济学研究的古典经济学视角

作为亚当·斯密《国富论》的主题,分工是贯穿该书的逻辑线索。在这部巨著的最显要位置,斯密指出:"劳动生产力上最大的增进,以及运用劳动时所表现的更大的熟练、技巧和判断力,似乎都是分工的结果。……在一个政治修明的社会里,造成普及最下层人民的那种普遍富裕情况的,是各行各业的产量由于分工而大增。"[①]毫无疑问,分工理论是古典经济学最深刻的见解之一。

在阿林·杨格和杨小凯等人的努力下,这一古典经济学传统得以发扬。杨格在其经典论文《报酬递增与经济进步》(1928)[②]中借用了迂回生产这个概念,把分工理论向前推进了一步,杨格认为分工取决于市场规模,而市场规模又取决于分工,经济的动态演进就蕴含在分工与市场规模相互作用的过程之中,从而用分工自我繁殖的累积性变化过程使斯密定理[③]所描述的市场规模与劳动分工的关系动态化,并进一步论证了市场规模与迂回生产、产业间分工相互作用、自我演进的机制。杨小凯(2000)[④]等人提出了一个以分工的内生演进为内核的新兴古典增长理

① 亚当·斯密. 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M]. 北京:商务印书馆,1974:1-2.

② 阿林·杨格. 报酬递增与经济进步[J]. 经济社会体制比较,1996(2).

③ 斯密定理是斯密关于劳动分工与市场规模间关系的假说。其具体含义是,只有当对某一产品或者服务的需求随着市场范围的扩大增长到一定程度时,专业化的生产者才能实际出现和存在。简言之,就是劳动分工受到市场规模限制。

④ 杨小凯,张永生. 新兴古典经济学和超边际分析[M]. 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0.

论，这个理论深化了斯密、杨格等人关于分工的认识，指出：经济增长是分工内生演进导致报酬递增产生的结果，经济发展的各个侧面，如产业结构的优化升级，区域经济空间结构的高度化及企业组织结构、产权制度的变迁等都是分工内生演进的必然结果。在这一视角下区域经济成长被看作区域分工演进和专业化水平不断提高的必然结果，分工演进而诱发的一系列结果，如产业结构、空间结构、制度结构的高级化体现了区域成长的实质。

（三）区域经济学研究的经济社会学视角

马克斯·韦伯、涂尔干、格兰诺维特等人在经济社会学领域的贡献为我们讨论区域问题打开了另一扇窗。这个视角超越了经济学家的狭隘视界，从经济之外的"非经济因素"来探讨区域经济问题，揭示区域内社会与经济之间复杂而深刻的关系。

马克思指出："人的本质并不是单个人所固有的抽象物。在其现实性上，它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①]事实上，每个个人都不是原子式的孤立个人，个人决策不仅依赖于他人，也依赖于整个社会。这种个人与他人、个人与社会的互动性，决定了人是被他人、被社会塑形的。在经济活动中，个人不仅仅要在各个决策方案间进行成本—收益比较，也必须在社会、他人的审视下，从社会（他人）为其设定的有限选择集中选择具有经济理性的行为。因此，由于个人经济行为中社会性约束因素的存在，区域经济的研究也就不能只局限于经济层面。区域不仅是经济活动的空间组织形式，也是承载着独特社会人文因素的空间单元。在经济社会学视角下，经济是嵌入社会之中的[②]，区域经济绩效不仅取决于经济本身，也取决于区域经济赖以运行的社会人文环境。目前，区域成长中的社会因素开始被人们所关注，比如从区域文化探讨区域发展差异的论述已经很多，

---

① 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一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第二版），1995：60.

② 关于经济嵌入社会的观点以及后文社会网络分析方法比较详细的介绍请参见：汪和建．经济社会学——迈向新综合［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6：35－41．或 GRANOVETTER, MARK. 1985. Economic Action and Social Structure: The Problem of Embeddedness. 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91：481－550.

但从社会网络、社会资本的角度考察区域经济问题的文献还很少。

(四)区域经济学的新古典经济学视角

区域经济学研究的新古典视角以哈维·阿姆斯特朗、吉姆·泰勒的《区域经济学与区域政策》为代表,体现了用新古典经济学的宏观经济理论来阐释区域经济问题的尝试。其中,新古典的投入产业方法、凯恩斯就业和产出水平决定的理论在该书中得到广泛的运用。这是一条研究区域问题的有益尝试,应该说,区域的资本积累、技术进步、人力资源提升都是区域成长可以观测和计量的直接因素,在分工给定前提下,即在区域经济的短期分析中,这一视角能为区域经济的表现提供分析框架。但在区域经济长期动态分析中,新古典经济学视角却显得单薄而苍白,资本、技术和人力等因素与其说是区域成长的因素,不如说是区域成长的结果。另外,新古典视角也忽略了区域问题的特殊性,把区域经济学等同于国民经济学。

三、区域分工演进:区域经济社会变迁的主基调

分工演进和专业化经济的发展不仅是一个经济过程,体现着区域经济成长的实质;它们同时也是一个社会过程,潜移默化地改变着区域经济赖以存在和发展的社会人文环境,塑造着区域经济的不同色彩。如果我们以受精细胞的分裂过程来类比区域经济中的分工演进,区域也是由一个结构简单的细胞体经由不断的分工裂变逐步演变为结构复杂、功能完善的社会经济有机体的。

(一)区域分工演进的经济后果

分工演进对区域经济的影响是深刻而多方面的。首先,区域经济产业结构的变迁是分工在时间维度上的展开。产业结构的演进表现为机器生产代替手工生产,新的技术和新的机器不断涌现,整个社会生产从原料投入到最终产品的产出过程中,生产环节不断增多,生产工序不断细化,迂回生产链条不断延长,工业规模不断增大,资本品生产的比重逐渐提高,同时交易的规模和范围也随之扩大。这个过程极大地增进了最终产

品的生产率。上述过程中，中间产品种类的增加、生产环节的增多、生产工序的细化必须以经济组织内部分工和经济组织间的社会分工水平的不断提高为条件。

其次，区域经济空间结构的变迁是分工在空间维度上的展开。报酬递增问题是解开经济活动空间分布和演进之谜的关键。新兴古典经济学和空间经济学文献认为，经济活动的空间集中源于报酬递增。克鲁格曼指出："这种生产在地理上的集中正是某种收益递增的普遍影响的明证。"[①]因此，任何一个完整的空间模型都必须首先阐释报酬递增的来源和性质，进而厘清报酬递增与经济活动空间聚散的关系。在众多解释报酬递增的理论中，分工理论无疑是最具一般性的。分工演进与报酬递增的关系可以理解为："就整个经济体而言，分工演进导致分工网络的扩大，而分工网络的扩大表现为中间投入品和最终产品的多样化，这种多样化生产格局使得微观主体间的经济关联日益紧密和复杂，经济活动的外部性（金融外部性和技术外部性）得以增强，整个经济体乃至微观主体都因为外部规模经济的强化而呈现收益递增，这又进一步刺激了分工网络的扩大，由此经济体进入一个自我强化的循环累积过程。"[②]

第三，经济微观层次的结构变动和制度结构的变迁是分工发展的必然要求。经济微观结构是经济微观层次上各要素间在时空方面的有机联系与相互作用的方式，它决定了微观经济系统的功能和特征。在经济系统的微观层次上，经济组织与市场是经济运行的微观基础。就经济组织结构变迁而言，它的变化在形式上主要表现为经济组织从家庭向手工工场，再由手工工场向古典企业，最后向现代企业逐步变迁的过程，在内容上则体现为经济组织的财产组织制度框架和组织管理制度等制度结构的不断调整和变化。就市场结构变迁而言，市场的发展经历了由分割的小市场向统一的大市场的变化，市场制度不断完善，市场的交易方式不断丰富，市场交易的媒介更加便捷，要素市场不断发展和创新。市场与经济组

① 保罗·克鲁格曼．地理与贸易［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2：5.

② 李皓，杨海燕．区域空间结构演进机制再认识［J］．西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科版），2008（2）：118.

织这一系列的变化都是分工和专业化发展的必然结果,经济微观结构演进的持续动力机制可以理解为:在科技进步的催化之下,市场交易效率不断提高,规模经济日益显现,从而促进了社会分工和经济组织内部分工的发展,分工和专业化的发展又推动了市场和经济组织的结构变迁。如此循环,构成了经济微观结构的持续演进。由分工和专业化发展引起的上述变动,必然对现存制度体系构成压力,并最终导致正式制度和非正式制度的重新调整和安排以适应这种变化。

(二)区域分工演进的社会后果

涂尔干认为分工演进最重要的作用在于它会导致新的社会秩序的产生。涂尔干指出:"如果说分工带来了经济收益,这当然是很可能的。但是,在任何情况下,它都超出了纯粹经济利益的范围,构成了社会和道德秩序本身。有了分工,个人才会摆脱孤立的状态,而形成相互间的联系;有了分工,人们才会同舟共济,而不是一意孤行。总之,只有分工才能使人们牢固地结合起来形成一种联系,这种功能不是在暂时的互让互助中发挥作用,它的影响范围是很广的。"①"尽管社会成员完成交换的时间非常短暂,但它们之间的联系却远远超出了这段时间之外。他们在执行每项职能的过程中,却必须依赖他们,继而最终形成了一个牢固的关系系统。"②"事实上,分工所产生的道德影响,要比它的经济作用显得更重要些。"③因此,在涂尔干那里,分工不仅造就了新的经济形式而且衍生出了一种新的道德信念。与此同时,在社会分工条件下,非契约因素(法律与道德)也内在地构成了契约(交易)关系的组成部分。分工演进的社会后果是正式制度(如法律)和非正式制度(如道德)的重构。

沿着涂尔干的分析思路进一步演绎,分工的演进会造就一个联系越来越紧密而规范的社会网络,这里的"社会网络"是指一个人同其他人形成的所有正式和非正式的人际交往关系。社会网络分析重点考察的不是

① 涂尔干. 社会分工论[M]. 渠东,译. 北京:三联书店,2000:24.
② 同上书:184.
③ 同上书:20.

个别人或个别群体，而是他们之间的相互关系。也可以这样理解，社会网络是指由一系列社会关系连接在一起的节点（个体或组织）的总和，社会网络中的个体和组织的经济行为不仅受其所处的总体社会环境的影响和制约，也受其在社会网络中所处的位置的影响，区域社会资本正是附着于社会网络之上对区域经济的成长有着至关重要的深远影响的资本因素。

综上所述，分工演进是理解区域经济社会长期动态变化的关键。而分工演进导致的经济后果和社会后果的相互作用则构成了推动区域经济成长的基本机制。

四、市场网络、科层网络与社会网络的互动：区域成长机制

通常，经济学者把市场、科层组织看作资源配置的手段。经济体系正是在市场这只"看不见的手"和科层组织这只"看得见的手"的推动下得以运行和成长的。目前的研究中，很少有学者把社会网络也看作资源配置手段和经济驱动的力量，事实上，不论市场网络、科层网络还是社会网络，都是分工发展的产物。市场网络和社会网络是社会分工的两个侧面，市场网络是社会分工的经济后果，而社会网络则是社会分工的社会后果；科层组织则很显然是组织内部分工的产物。既然三者是分工现象的不同侧面，我们就没有理由将其割裂开来考虑。

三者之中，关于市场网络和科层网络（或科层组织）的分析，现有文献已经有相当成熟的讨论，这里仅就社会网络进行分析。社会网络的存在是一个分工社会的普遍特征，它可以理解为在市场网络之外和科层组织之外的个人或组织之间相互联系的网络。通过它，人们的精神（情感）需求得以满足，也通过它经济活动得以延伸（如中国人很多的生意是在酒桌上谈成的），还通过它社会经济资源得以重新配置。社会网络是一个动态的体系，经历了从垂直网络结构（以家族和宗法制度为特征）向扁平网络结构逐步转化的过程，社会网络的扁平化使得个人或组织在网络节点上的地位逐步拉平，社会从威权控制向平民化转变，这既体现了经济市场化的要求，也体现了社会进步的要求。社会资本则是建立在社会网络之上，能够使得个人、企业和区域从中得益的无形资本。对于个人和企

业而言,社会资本是指个人可以通过其社会网络的节点位置,从社会网络中提取和控制资本、信息、知识或其他资源,从而实现收益增殖的能力。对于区域而言,区域社会资本是建立在社会网络基础上,利用紧密、发达、完善而规范的社会网络体系实现价值增值的能力,因此区域社会资本的积累体现在社会网络结构的扁平化、交往关系的规范化以及社会网络的紧密、发达和完善程度。更一般地,区域社会资本的积累为人们提供了规范理性的人际关系准则、共同的宗教信仰、伦理道德观、价值取向和文化认同(用以提供区域成长的精神动力),在提供个人经济激励、建立区域内紧密完善的人际互信关系和降低交易成本方面,社会资本的积累无可取代。在区域经济的驱动机制中,社会网络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方面,是区域资源配置和推动区域成长的重要手段。

另外,社会网络的特征和社会资本类型的差异性也是构成经济活动区域根植性的重要原因。现实中,区域经济是一种客观存在,但它存在的基础是什么?是什么造就了经济区域间存在着明显的区际分异(在此,安虎森把区域经济看作"块状"而非新古典描述的"平滑"经济),这一问题关系区域经济学的学科命运。胡佛在其《区域经济学导论》中把区域经济存在的客观基础归结为生产要素的不完全流动性(资源禀赋差异)、经济活动的不完全可分性(意味着集聚经济或经济活动外部性)以及产品和服务的不完全流动性(意味着转移成本或距离成本,包括运输成本、时间成本、信息成本和心理成本)。胡佛对经济活动区域根植性的理解是基于经济层面的考察。其实,由于经济在某种意义上是嵌入社会之中的,所以经济活动也深深地植根于其所处区域的社会网络之中,并受到区域内积累的社会资本的支撑,在一个区域内有效的经济活动在其他异质区域可能效率低下。经济活动的空间转移不仅受到经济因素影响,也受到社会网络和社会资本的空间异质性的影响,所以社会网络和社会资本的空间异质性往往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区际分异标志。正因为如此,中东地区虽然在空间上与欧洲毗邻,但两地的区域经济却以迥然不同的姿态呈现在世人面前。正是经济活动的这种区域根植性,使得区域经济呈现多元化特征。

五、区域经济理论体系整合的基本架构

基于上述认识，“区域经济”不是通过单一侧面就能反映的经济范畴，我们不能用盲人摸象的态度来片面理解区域经济。只有通过古典经济学分工理论、新经济地理学、新古典经济学、经济社会学等多个视角的交叉融合，并形成一个有机整体，才能够为区域经济研究提供一个相对完整的理论轮廓。下面，根据前面的分析，从逻辑框架和内容体系对整合后的区域经济理论基本架构进行尝试性的探讨。

（一）区域经济理论的逻辑框架

从区域经济社会发展逻辑上看，由于区域技术进步、知识积累、人口扩张、市场扩张等因素，促进区域分工不断演进，进而导致区域市场网络、科层网络和社会网络的形成和发展；随着市场机制、科层组织（政府组织和企业组织）的不断完善，社会网络的高级化和社会资本的不断累积，并通过市场网络、科层组织及社会网络间的相互替代、补充及相互作用和影响，区域经济社会得以发展；而区域经济社会的发展又将为区域分工演进提供技术、知识、人口、和市场等条件，从而使得区域经济的发展呈现循环累积的自组织特征。（见图 1 –4）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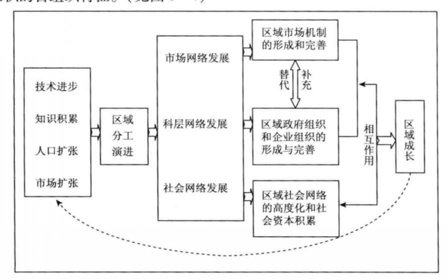


图 1 –4　基于分工演进的区域经济理论逻辑框架

这一逻辑框架还存在一个缺陷,它把区域系统看成了一个孤立系统,没有考虑区际分工和区际联系对区域发展的影响。因而,在实际处理中,可以将外部因素内化为促进区域分工演进的内部因素,从而简化开放系统条件下区域经济问题的分析。

(二)区域经济理论整合的基本内容架构

根据上面的讨论,区域经济理论主要包括五个部分。一是区域经济学的理论基础部分。它由古典经济学分工理论、区位论和新经济地理学、经济社会学和新古典宏观经济理论的相关部分构成。二是区域经济的短期分析。它主要是运用新古典宏观经济理论对区域经济的短期表现进行解释。三是区域经济的长期分析。它是以分工演进的经济后果和社会后果来对区域经济的长期动态变化进行探讨,它既涉及运用古典经济学分工理论和新经济地理学研究分工演进导致报酬递增和经济活动在空间上的自组织,进而推动区域经济长期可持续发展的机制和区域经济差异的经济成因;也涉及运用经济社会学研究分工演进导致社会网络高级化和社会资本积累的机制,进而理解区域经济成长的社会机制及区域经济差异的社会成因。四是开放经济条件下的区域经济分析。这部分可以在描述现实区域经济的开放性特征及其当代表现(全球化与区域一体化)的基础上,给出一个从开放条件下的需求边和供给边变动来整体性地解释区域经济运行的分析框架,描述了开放环境对区域经济系统变动的放大作用,分析区域关系中重要的方面,如区域分工、区际贸易、区域一体化、区域竞争等因素对区域成长的影响,进而探讨了区域差异性极大的大国经济如何进行区域关系的有效治理,不断优化大国内部的区域竞争合作秩序。五是区域经济政策分析。该部分自然应该是上述分析的逻辑演绎结果。

总之,区域经济学完全可以构建一个基于分工理论,并整合其他学科相关成果,在逻辑上一以贯之,内容上清晰完整的系统化分析框架。在勒施和艾萨德所处的时代,他们的想法可能由于过于超前而无法实现,但在社会科学进展迅速的当代社会,我们距离这一目标越来越近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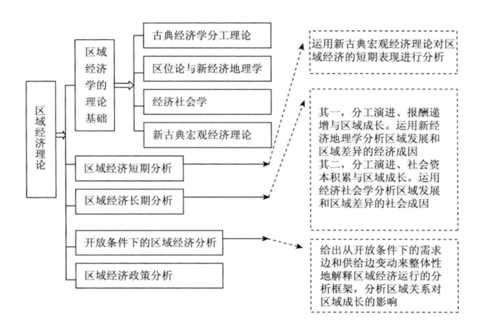


图 1－5　区域经济理论整合的基本内容架构

六、区域成长分析从经济领域向社会人文领域的延伸

区域经济问题不是区域问题的全部，而区域经济的发展（或增长）也绝对不是区域成长的全部。可以说，区域经济问题是我们讨论区域成长的出发点，但它却注定不是区域成长话题讨论的终点。就笔者的感受而言，区域是一个多维度的社会经济现象，而区域成长也必然不是单一维度的变动。一般意义上，区域成长是经济、政治和文化维度综合变动的结果，区域分析需要一个多维度的思考。其中，区域经济尽管是区域成长的基础性内容，但包括政治、文化在内的社会人文领域的变动可能是区域成长更本质的内容。

当讨论完区域经济问题以后，一定会发现，其实区域成长的话题远远不止在经济领域。当你不是作为一个游客，而是作为一个文化的体验者游历异乡的时候，多元文化带给你的，绝不仅仅是视觉冲击，而一定是心灵震撼。你一定会感受到宗教是如何把阿拉伯世界和基督教世界分成了对比强烈的两个世界，又是怎样把世界涂抹成多姿多彩的画面；你也一定

会好奇:与我们毗邻而居的一群人,仅仅是由于宗教信仰的不同,价值观念的差异,就产生了迥异的生产、生活方式。而当你作为一个游子在美国工作、学习的时候,你也一定会发现,政治因素怎样把中国和美国改造成了天壤之别的国度。如果说区域经济问题是区域成长的基础和条件,也是区域成长最为直观、可见的内容,那么,文化和政治等社会人文发展却很可能是区域成长中最本质、最关键的方面。我们或许应该花更多的精力去探讨是什么因素影响了区域的社会人文面貌和价值信仰体系的形成,为什么不同区域的政治和文化特点是如此的不同;而区域的社会人文面貌和价值信仰体系又怎样影响到了区域经济的运行和区域经济绩效。文化、政治等社会人文环境对区域的塑形作用,在新古典经济学中不会被提及,但它就在那里,让你不可能不对它投以深切关注。

CHAPTER 2

区域成长的表象与实质、维度与尺度

“自由不仅是发展的首要目的，而且是发展的主要手段。”

——摘自阿马蒂亚·森《以自由看待发展》

人类总是在矛盾、彷徨的心境中去探索它那飘摇不定的未来。什么是进步？何谓发展？怎样理解区域成长？其实在人类历史上从来就没有简单的答案。动笔写下这一章的时候，对自己的立场也并没有多少底气。我们不能认为在关于区域成长的问题上，有绝对可靠的标准，我们也不能认为完全对立的观点中，有一方一定是错误的。人类历史告诉我们，我们对自己的认知能力是如此的低下，以至于我们需要在不断地试错后，才能逐渐找到一条看似可行的发展路径。所以房龙在他的《人类的解放》（或译作《宽容》）一书中，主张人类要有勇气向各个方向探索，主张人类应该对那些异己的思想和行动保持宽容；而波普尔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强调了自由对于人类未来的重要意义。本章就是在对现实流行的各种“发展”思想进行梳理、比较的基础上，提出笔者内心认可的发展理念和它的价值取向。因此，本章基本上都是规范分析的内容，相关的观点属于见仁见智的一孔之见。

第一节　文明进化及其悖论

一、文明进化中的人与自然

（一）人及人与自然的关系

人是什么？在历史唯物主义看来，人是由其自然属性和社会属性共同规定的有机生命体。就自然属性而言，人首先是在自然[①]中孕育成长的自然存在物，它产生于自然，又通过与自然进行物质和能量交换而获得存在和发展的各种条件。人的这种自然属性并不能把人与自然界的其他生物区别开来，因此，在更深刻的意义上，人的本质体现在其社会属性中。马克思在《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中指出："人的本质并不是单个人所固有的抽象物，在其现实性上，它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②]但是，不管人的社会属性多么重要，它都必须以人的自然存在为前提，即人与自然的关系是人与人关系的基础，人与人的所有关系都必须依赖于人与自然的关系而存在。由于人与自然的关系可以通过生产力反映，而人与人的关系则主要通过生产关系体现，因此，人与自然的关系是人类需要面对和处理的首要关系，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讨论的重点虽然是生产关系的产生、发展和演变，但却总是把生产力作为解释上述变化的基础性因素。在此意义上，人类文明史首先是人与自然关系的演进史，进而才能是社会关系的变迁史。

（二）文明进化中人类异化于自然的过程：人与自然关系史的说明

人类诞生以来，人并不是自然的异化物。在相当长的时间内人类的

① 在不同语境中，"自然"一词有着不同的含义。按照恩格斯《自然辩证法》一文的理解，"自然"是宇宙中"各种物体相互联系的总体"，即整个自然界。因此，广义而言，人类社会系统只是这个总体的一个组成部分。但为了研究人与自然关系的方便，有必要把自然系统与人类系统作一区分，由此形成了狭义的"自然"概念，即人类系统之外的自然界总体。本文所指"自然"即是指这种狭义的"自然"概念。另外，"自然"不完全等同于"自然环境"，"自然环境"特指人类生存和发展所依赖的各种自然条件的总和，它强调的是对人类有直接或间接影响那部分自然因素，因此它是"自然"的一部分。

② 马克思. 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A].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 1 卷)[M]. 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56.

信仰体系是亲自然的，其行为规范是与自然相和谐的。但是，当人类的文明发展到一个高度，人不再被动地顺从于自然，而是把自然当作可以改造和征服的对象时，人异化于自然的过程就悄然发生，并且愈演愈烈。特别是进入工业文明阶段后，人对自然的改造和征服逐步走向极端，并且日益把自然推向人的对立面，使自然成为随时可能毁灭人类文明的潜在威胁。

6000 年以前的人类，经历了从旧石器时代到新石器时代的漫长过程。由于落后技术条件的限制，人类还不可能成为真正意义上的生产者，几乎全部的人类所需都仰赖自然的赐予，石器、弓箭等工具的使用只不过提高了采集和渔猎活动的效率，并没有改变人类从属于自然，并作为生物圈和食物链中的一个环节而存在的现实。面对强大的自然力，生产力落后的人类只能崇拜依附、被动顺从。正如马克思所说："自然界起初是作为一种完全异己的、有无限威力的和不可制服的力量与人们对立的，人们同它的关系完全像动物同它的关系一样，人们就像牲畜一样慑服于自然界。"[①]从人口因素看，由于低下的技术水平和自然生产的有限性，人类在新旧石器时代的总人口规模相当小。据估计旧石器时代人口规模为 125000 人，新石器时代人口也不过 532 万人[②]。从经济活动的技术特征看，石器、弓箭的运用不足以对自然界产生实质性的破坏，而火的发明虽然对自然界是个威胁，但当时的人仅把它的使用限制在取暖和烹饪食物上。从消费特征看，石器时代的消费是以食物消费和祭祀消费为主，不仅消费数量有限，而且消费的对象极少。在新石器时代晚期，人类对自然的支配力进一步增强，特别是植物栽培技术和动物驯化技术的出现，不仅为人类进入文明时代准备了技术前提，也从根本上重构了人与自然的关系。随着农业革命的完成，人类社会经济系统从一个依附于自然的自在系统成为一个自为系统；农业生产方式的产生，虽然大大缓解了由于人口增加而产生的人与自然的紧张关系，但是，人与自然的冲突，随着文明的演进不是减轻了，而是加剧了，人类异化于自然的进程由此开启。在公元前

---

① 马克思.德意志意识形态[A].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 1 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81 - 82.

② 斯塔夫里阿诺斯.全球通史(第 7 版)[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14.

7000年到公元0年(即新石器时代晚期到人类早期农业文明中心形成、发展并逐步消失的时期),地球上的人口规模从532万暴增至2.3亿,40倍于新石器时代晚期。人类的农耕活动导致开发区域内森林植被破坏,大量的灌溉用水和生活用水需求导致水资源短缺,而较高强度的农业垦殖活动又导致耕地逐步贫瘠化甚至荒漠化,这成为人类早期文明区域衰落的重要诱因。随着人类征服能力的不断提升,在公元500年到公元1800年间的一千多年的时间里,人类尽可能延展了其活动的空间尺度,把湿地、草地和森林等重要的环境因素都逐步改造成耕地或牧场。但总体而言,农业文明还是一种有节制的文明形态,农业文明的人口规模、技术特征、消费特征、生产方式、思想观念和价值体系,并不支持人类对自然的无休止剥夺,因此这种文明形态总体上对环境的破坏性影响还是被限定在自然能够承受的范围之内,它对自然产生的破坏也只是局部性的。

工业文明时期,生产力的巨大进步彻底重构了整个世界的面貌,使这个世界在各个方面都表现出与以往任何文明形态不一样的典型特征。相比农业文明与采集渔猎时代,工业文明以它无与伦比的技术创新能力和财富创造能力给人以深刻的印象。在技术创新上,两次工业革命最显著的技术特征是能源开发和利用技术上的革命性变革。煤开发出来,运用到蒸汽机上,开创了蒸汽机时代;石油和水力也相继被开发出来,创造了电气时代。工业革命使人类找到了大规模利用自然动力的途径,从而也就找到了驱动人类飞速进步的巨大源泉。由此,人类开启了向各个领域大踏步前进的历史进程。时至今日,人类几乎踏遍了地球的每一个角落,甚至在茫茫宇宙中留下了自己探索的脚印,技术的不断进步似乎正在为人类改造和征服自然创造一种无限的可能性。伴随技术进步而来的是财富的惊人增长。在第一次工业革命期间(1860—1913年)全球工业生产增长了近7倍[1],对此,马克思在其《共产党宣言》中感叹道:“资产阶级在它的不到一百年的统治中所创造的生产力,比过去一切世代创造的全部

① 斯塔夫里阿诺斯.全球通史(第7版)[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356.

生产力还要多，还要大。”[①]不仅如此，工业文明还为人类引入了资本主义的制度体系和市场经济的经济运行机制。在这个制度体系里，对利润和财富的疯狂追逐成为人类生存的常态和终极意义，而市场机制则使得生产者不再是为自己生产产品，而是为整个市场网络中的人群提供产品，其产量也就不再以自己的消费量为限，而是以市场的规模为限。

与上述巨变形成强烈反衬的是生态环境令人揪心的持续恶化过程。伴随着人类对自然支配能力的不断强化，自然界承受的压力空前巨大。WWF（世界自然基金）组织提供的《地球生命力报告：2008》对全球生物多样性状况和全球对资源环境的耗费情况进行研究，指出：“如果用世界脊椎动物的种群数目 1686 来量度，在过去的 35 年里，全球生命地球指数（反映生物多样性的基础指标——作者注）已经下降了近 30%。……这是以往的报告中未曾有的。”“人类对地球生物资源的需求——人类生态足迹，现在已经超出了地球再生能力的 30%。全球性的生态超载正在增加，结果造成生态系统退化和废物累积在空气、土地和水体中。由此产生的森林砍伐、水资源短缺、生物多样性减少和气候变化正在使所有国家福祉和发展的风险性增加。”“在过去 45 年里，由于人口增长和个人消费的增加，人类对地球的需求已经翻了一番还多。……如果我们照此以往，那么到 21 世纪 30 年代初，我们将需要两个同样大小的地球来满足人类对商品和服务的需求。”[②]

一部人类文明发展史就是一部人与自然关系的演进史，一部人类产生于自然又异化于自然的过程史。从采集渔猎原始文明到近现代工业文明，既见证了人类辉煌的文明成就，也见证了因自然变迁和人为扰动而导致生态环境日益恶化的痛苦过程。在某种意义上，人类正在创造着足以毁灭自身的文明形态。人类正在失去它存在和发展的最重要的依凭，人类通过把自己强大的改造和征服能力加诸自然之上，最终把自然塑造成

---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共产党宣言［A］．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 1 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277.

② 世界自然基金会（WWF）．地球生命力报告（2008）［R］．2008－2，原报告载于：http://www.wwfchina.org/wwfpress/publication/policy/ChineseLPR2008.pdf.

自己的敌对面。人从自然中孕育出来,现在自然却要用自己的行动来抵制人的存在了,这看似荒诞,但这样的荒诞却在工业文明里真实地发生了。对过去工业文明的认真反思已经刻不容缓。

二、文明进化中的人与人

(一)分裂的人类个体:人类生活中的形而上和形而下

人无疑是上苍最神奇的造物。不知从何时起,人类的同一个肉身被分成了两个部分——精神的人和物质的人,或者说形而上的人和形而下的人。《易经》有云,"形而上者谓之道,形而下者谓之器",形而上形成了人的精神世界,形而下造就了人的物质世界,文明也就此分成了精神层面的文明和器物层面的文明。

人类的精神与物质当然不是泾渭分明,二者的依赖与背离在哲学家、伦理学家和神学家那里得到最充分的关注与讨论。在古代世界,贫乏的物质世界使睿智之士都懒得对它投去匆匆一瞥。于是,爱唠叨的苏格拉底倡导人类应该过一种有"德性"的生活,撂下锦衣玉食的释迦牟尼希望人类从物欲和情欲的幻象中解脱出来,和蔼可亲的孔老夫子要人们"止于至善",刻板得一塌糊涂的康德也宣称他最敬畏的无非是"头上的星空"和"心中的道德"。而在那些道貌岸然(在这里笔者并没有把这个词作为贬义词使用)的宗教人士那里,合乎宗教仪轨的有道德的生活无疑成了人类生活的全部。现代文明里,情况开始发生变化,在这个个人主义高扬的时代,人类的物欲和情欲被充分地发掘出来,洪水猛兽般吞噬着每一个人类个体,并把精神、道德这些虚幻的东西逼到角落。目不暇接的产品和服务让人们没有时间分身去观照一下他们的灵魂世界,正像《摩登时代》里的卓别林,被完全裹挟在物质生产的链条里而不能自拔。

因此,不论是古代和现代,人类从来都没有找到自己的安身立命之所。他们要么忍受着物质与精神的双重羁绊,要么是被束缚在毫无物质基础的想象精神世界里,要么是被强加的产品和服务充塞得满满当当,无法为精神留下转身的余地。卢梭的名言"人生而自由,却无往不在枷锁之中",恰如其分地反映出人类从古而今所面临的深刻困境。

（二）他人就是地狱：人与人关系的异化

萨特称自己的学说是“存在主义的马克思主义”，在关于人类异化问题的讨论上，萨特与马克思确实高度一致。在他的哲理剧《禁闭》中借他人之口说出了“何必用烤架呢，他人就是地狱”的存在主义名言，从而把现代社会人与人间关系的异化夸张到耸人听闻的地步。“他人即地狱”当然不是人类关系的全部，因为个人的生存和发展必须假借他人之手，假借社会这个平台才能实现。但是“他人即地狱”也真实地反映出：个人在假借他人和社会实现自我的时候也同时成为他人的猎物、他人的工具。

在不同的时代，这种人与人关系的异化有不同的表现。在发明文字之前，从古老遗存以祭坛和祭器为主的特点可以揣测，当时的人们生活在神性的世界中，祭司是这个世界上最受人艳羡和敬畏的美差。这群神神叨叨的祭司们宣称拥有通往神灵世界的特别通行证，从而也就拥有了通过神谕掌控部落和氏族的特殊权力，就在当下我们仍然能在很多地方找寻上述情形的一鳞半爪。如印度的种姓制度中，最高种姓——婆罗门就是祭司阶层，在一些伊斯兰国家中神权仍然凌驾于世俗权力之上，即使是相对发达的天主教世界，教皇仍然被看作上帝在人间的代表，拥有巨大的权力（当然其威权已经无法与中世纪的教皇同日而语了），而那些邪教组织的教主们也正是通过这种方式控制信徒。无疑，在神灵统治的世界中，神灵和他们的人间代表掌控着人类的精神世界，左右着人类的意识形态和价值体系。物质上的贫困和精神上的绝对被控制，是后来的人把这样的社会叫作蒙昧社会的根本原因。因此，在人类的早期，由社会分工导致的职业分化，形成了不同的社会阶层，而由于权力在社会各阶层间的非均匀分布，形成了等级秩序。控制与被控制、奴役与被奴役成为现实社会的常态。工业文明到来后，竞争被奉为至高无上的法则，弱肉强食被认为天经地义。在缺乏完善市场制度的地方，如一百多年前的美洲殖民地，也如今天加勒比海周边那些充斥着暴力和毒品的地区，这种竞争不仅演变为对财色的贪婪追逐，更演化为肉体上的相互屠杀。马克思曾愤怒地指控：“资本来到世间，从头到脚，每个毛孔都滴着血和肮脏的东西。”

当然，那些道德家、宗教人士或者西方马克思主义者只看到了文明演

进中让人不能忍受的尴尬情状,他们被文明进化中的阴暗面蒙住了双眼,从而忽略了那些不易察觉的点滴改善。其实,现实的社会演进并没有那么糟糕。分工的发展,伴随着市场制度的不断完善以及人类心智的不断成熟,人们在这个日益紧密的分工网络中正逐步找到他们之间正确的相处之道。这些话题将会在后面讨论,这里不再赘述。到目前为止,仍然可以肯定地指出人与人之间的异化关系普遍存在于当今各种类型的社会和区域中。

三、文明进化中区域的使命

举目眺望那些曾经作为文明地标的区域,如文明首先光顾的美索不达米亚,文艺复兴时期的佛罗伦萨、威尼斯或阿姆斯特丹,抑或是伦敦这样一些工业文明的发祥地,我们无疑会对区域这个神奇的空间概念充满敬畏,因为上述区域曾经像灯塔一样照亮了人类未来的发展道路。百度一下那些当下风光无限的区域,如硅谷、曼哈顿,它们几乎每天都在吸引全球的目光;再关心下国内的区域新闻,出现频率最高的无非是“北上广”,“长三角”“珠三角”这样一些词汇,我们无疑也会由此联想到区域对于文明之意义,这些特定的地域空间承载着世界和国家的命运。

人类生存的每一个区域都以其不一样的味道让人惦念,区域中每一个鲜活个体的命运都足以牵动人心。而任何类型的区域在现实世界中都有被研究的价值,都有被借鉴和对比的意义。像我讨生活的这片天地——成都平原,尽管没有上海、北京那样的地位,但作为中国西南部的中心城市,作为西部大开发的重要桥头堡,作为城乡统筹的示范区域,它仍然有着不可替代的作用。而我出生长大的地方,那个满目疮痍的彝族聚居区——凉山,它贫困的经济状况、迟滞的社会发育状况和特殊的人文环境,仍然值得我们长时期的关注。其实,我们生存的每一个区域都是世界文明的一滴水,都是真实世界的一分子,都可能为人类的未来贡献我们料想不到的正能量。

正是在上述意义上,区域在文明的进化中负有重大的使命。区域是一块块的试验场——技术和工具的试验场,信仰体系和价值理念的试验

场，制度与文化的试验场，各种社会经济组织的试验场。通过各种各样的实践，区域为人类未来的发展和文明进化的道路提供可供参考的各种可能性和实际途径。区域也是一块块相互竞争的空间，人类通过不同区域经济社会的表现的比照，会逐步积累起关于区域发展的各种知识，形成一些共识。而那些有效率的地区成为其他地区可以效仿的榜样，使得落后地区可以充分利用后发的优势，快速地获取可以提高效率的经济资源或非经济资源。

更重要的，区域是每一个个体生命的托命之所，它需要为每个人类个体在物质和精神上的各种需求提供满足的手段，为他们自由而全面的发展提供实际可行的途径。总之，区域是一个比民族、国家等概念更加具体和实在的存在，个人的命运固然受到民族、国家的影响，但真正使人成就其本质的，是更加具体而实在的一个个区域。

第二节　区域成长的表象

一、区域成长的表象

到过很多地方，有繁华富贵的超大城市，也有穷山恶水的贫困之乡。但细细品味，似乎每个区域都有不一样的幸福与悲哀。我们见证过拉美地区曾经的繁荣，也目睹了它繁荣过后的创痛与不堪；我们曾经热切地期盼东欧地区会在“社会主义”的阳光普照下走向人类文明的新高点，看到的却是集权专制下惨淡的血痕和无辜屈死的冤魂，是短暂辉煌后轰然倒塌的历史闹剧；我们也曾寄望于西方文明的滋养下，全球各个地区会获得持续的繁荣和进步，但除了少数地区成功移植了西方外，大多数的地区仍然为贫困所累。

在现代文明的熏染下，人类形成了这样的共识：增长比停滞好、富裕比贫困好、发达比欠发达好。这些共识当然没有任何问题，但它们都没有触及“成长”的实质，它们只是区域成长的表象。更危险的是，当这些共识走向极端的时候，往往会产生令人始料不及的恶劣后果。增长、富裕、

发达，这些美好的字眼，事实上经不起细细把玩。对增长的过度追求，对繁荣、发达的过度强调对人类甚至可能是毁灭性的。沿着这样的路径，每向前一步，其实都不能确定我们是离地狱更近了还是离天堂更近了。增长、富裕、发达这些字眼的核心无一例外指向人类生活的物质层面。增长，无非是以货币计量的GDP规模的不断扩张；富裕，是一个可以用人均可支配收入量化的指标；发达，尽管也涉及文化、制度等非物质因素，但在常人眼中，发达不过是那些摩天的大厦、飞驰的汽车，是超市里琳琅满目的商品，是快速更新的一代代电子产品。

人类发展到今天，逐步形成了无节制的消费主义倾向，把物质产品的疯狂生产和物质消费的穷奢极欲发挥到前所未有的程度。沉醉在无边无际的物欲中，我们甚少关注我们真正需要什么，我们又失去了什么。人类在努力追求高速增长、创造区域繁荣的时候，是否曾进一步地追问自己：这就是我们需要的繁荣吗？这就是值得我们为之奋斗的发展吗？曾几何时，增长变成了纳粹德国发动战争的有力武器！而以集权催生的发达与繁荣，不过成为了少数人巧取豪夺的工具！这些所谓的增长、繁荣和发达都不过昙花一现，狂风过后，留下一地鸡毛而已。

二、被误读的区域成长

当前，一些区域在发展中面临的社会溃败、生态恶化、贫富差距扩大、文化衰败、道德沦陷、吏制腐败等现象，无一不说明区域发展理念完全偏离了公民的愿望，忽视了公民的真正需求。这一切也说明缺乏伦理考量的区域发展是不可持续的发展。区域不仅仅是一个空间概念，也不仅仅是经济活动的场所，它实实在在地承载着我们每一个人的命运，是我们的梦想得以生根、发芽、开花、结果的土壤。但是现实中，错误的导向，往往导致区域走向歧路，甚至成为公民的噩梦。因此，有必要梳理一下我们对于区域发展的各种观点，指出这些观点中哪些应该成为共识、哪些需要修正。

（一）以增长为中心的物质消费主义

当人类从虚妄的神权统治或是从专制的世俗统治中解脱出来，却又陷入另一个泥潭里，这个泥潭看似无形，其实跟神权和专制社会对人的桎

梏并没有实质的不同。在神权社会，神的谕旨规定着我们应该做这、不应该做那。而且这些谕旨大多都还会告诉我们，人不是来这个世界享乐的，人生存的目的要么是赎买前世的罪孽（如佛教），要么是赎买人类的原罪（如基督教），人应该通过忍受贫困、灭掉情欲、折磨精神来为自己挣得一张通往未来美好世界（比如天堂或极乐世界）的通行证；而那些专制的社会，比如古代中国，则要求人们要顺从于世俗的统治者，顺从于家族的意志，要“对自己狠一些”，最好是把人欲消灭在萌芽状态。在这样一些社会里，束缚是有形的，看得见也感受得到，个人被严格控制的情形显而易见。在当今这个社会，每个人似乎都是在市场和社会上可以自由自在游动的鱼儿，殊不知，他们也被一张无所不在的网所困住。今人与古人的差别只不过是五十步和一百步的差别而已。这张困住现代人的网叫做消费主义或者物质主义，它最激烈的表现就是唯增长论。

这张消费主义之网之所以无形，是因为它是一种逐步生长的潜移默化的力量，这种力量借助它取得的辉煌成就大行其道，不容置疑，不容推翻。当我们对香车和别墅投去艳羡一瞥的时候，当我们被 LV 和香奈尔品牌搞得心摇神移的时候，当我们对一掷千金的富豪们心存敬畏的时候，你是否意识到你其实已是网中之人。在现代社会，我们不是操控在上帝手中的棋子，也往往不是专制暴力下的可怜虫，但却在潜意识里被一种精神力量所控制，深陷其中，浑然不觉。

巨大的生产能力为现代社会走向物质消费主义奠定了物质基础，而现实中经济权力的不对等，导致了话语权在社会各阶层间的不对等，也为物质消费主义的泛滥创造了可能性。即使是在民主化程度很高的地区和国家，经济权力和政治权力在社会各阶层间的不均匀分布，也导致了话语权集中于一小撮人的情况。2008 年下半年，美国次贷危机爆发后，这个堪称民主典范的国度突然发现，整个国民完全在无知无觉的状态下，被玩弄于一小撮金融寡头和投机政客的股掌之中。一场声势浩大的“占领华尔街”运动得到民众的广泛声援，但是这次民众话语权的宣誓运动并没有获得实质的成果，它就像一次滑稽的行为艺术，虽然激起了社会涟漪，但很快沉寂下来，话语权仍然操控在那些持有金喇叭的强势集团手中。

美国尚且如此，何况那些民主还不成熟、言论自由还受压制的地区和国度。因此，尽管现代社会的政治架构和市场经济的内在伦理要求平等、强调自由、尊重民主，但实际情况并不乐观。从小到大，我们被各种各样的书籍、报刊、电影、电视所包围，这些媒体往往并不像它们自己宣称的那样公正、客观、透明，而是被社会中的强势阶层或利益集团所掌控。这一小撮人不仅控制经济、政治命脉，也操纵着人们精神领域的话语权。他们或者他们的吹鼓手们（那些所谓的精英知识分子）把精心包装的文化符号和价值理念，通过上述各种各样的渠道灌输给社会大众，并固化在每个人大脑中。不仅如此，这一小撮人也通过各种各样的社会组织，包括政府组织，来宣扬他们所谓的"主流价值"。这些"主流价值"、文化符号披着华丽外衣，鼓动人们不停地追逐强势集团、成功人士为他们设定的人生目标。而芸芸众生也像被打了鸡血，把人生都耗尽在追逐物质和情欲满足的路上，但是他们不知道，他们永远只能在路上，终点是没有的，因为终点永远只掌握在那一小撮人手里。

毫无疑问，在我们这个看似自由自在的世界上，在我们每个人看似风光的生活背后，一张网早已把我们网罗其中。按照西方马克思主义的重要代表马尔库塞的观点，我们生活在一种意识形态极权之下（西方马克思主义主要是以西方资本主义世界作为研究和批判对象，那些非西方世界的地区和国家情况可能并不相同——笔者注），变成了"单向度的人"。"单向度的人"意味着：我们每个个体都心甘情愿地接受现行社会给我们命定的一切，变成了没有独立思考能力，缺乏批判精神和超越精神，沿着物质消费主义这一单一维度拼命狂奔的动物。走笔至此，我开始有些佩服那个哲学狂人尼采说过的一句话"人是应该被超越的动物"。就现代社会"单向度的人"而言，人确实应该被超越。

物质消费主义的极端表现就是唯增长论。我们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小平同志一再强调"发展才是硬道理"，很显然，小平同志所指的"发展"并不局限于经济领域，更不局限于经济领域的规模扩张。但它应用到中国的区域发展实践中，就常常被地方政府曲解。人们还是普遍地认为，物质丰富了，所有的问题就迎刃而解了，因此增长就是一切，一切为了增长。

现实告诉人们，物质的富裕固然是区域发展的基础，但人们的需求是有层次性的，物质需求只是在人类需求中居于较低层次。有研究表明，社会动乱并不一定只发生在经济落后的区域（或国家），相反，那些经济开始迈过温饱进入小康的区域（或国家），在其公民的较高层次需求得不到满足时，更容易发生群体性事件，导致国家、地区动荡。正如北非地区是非洲经济状况最好的地区，但却也是目前非洲最动荡不定的地区。亚历西斯·托克维尔在《旧制度与大革命》一书中分析法国大革命产生的原因时，特别强调了一个现象：在专制的王权和神权双重统治之下，民众并不知道自由为何物，即使双脚、双手被铐住，也没有觉得有何不妥；大革命前夜，专制统治开始松动，民众的自由开始增加，这就好比卸掉了手上的镣铐，这种状况并没有让民众感恩于社会的进步，而是发现脚上的镣铐是多么的令人难受！解放的双手迫不及待地要去解除双脚的束缚。法国大革命不是因为社会没有进步，也主要不是因为民众生活质量下降，而是因为民众在发现自由的价值之后，产生了急于摆脱所有束缚的集体冲动，这种冲动汇成了法国大革命的洪流。因此，只考虑满足公民物质层面需求，用挥霍无度的消费主义来引导区域发展，而根本不考虑公民其他方面的需求，无疑是短视的，最终的结果是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

（二）以精英控制为特色的威权主义

很多中国人历来都像盼星星盼月亮一样期盼救世主的出现，他们心中有一种精英情结，认为区域能否发展取决于是不是有个为民作主的好官、清官，他们心甘情愿地听命于这些精英的摆布。因此，有很多人特别羡慕新加坡模式，希望有一个好人政府来主导区域发展。这种建立在精英治理基础上的威权主义在区域治理中的有效性并不具有普遍性，它也只适合于新加坡这样的弹丸之地。而新加坡的成功，一方面，与它相对于东南亚其他国家和地区具有更优越的政府治理效率有关系；另一方面，更与它优越的区位条件有关系。在某种意义上，与其说新加坡的成功是它有效治理的结果，不如说是它的区位条件使然。看一看它所处的地理位置，这个处在马六甲海峡枢纽位置的地区，不想成功都难。

事实上，市场经济天生是平等派，它不允许有一个凌驾于市场之上的

威权政府。而政府本身也是一个巨大的利益主体,以最大化自己利益为首要决策目标。威权主义导向的区域发展必然导致市场扭曲,甚至形成市场依附于政府的可怕格局。在市场经济条件下,任何一个层级的政府一定都是有限政府,现代政治最重要的成果就是把政府关进了笼子里,从而让市场发挥基础性的作用。那种指望道德高尚的政治强人的善心改变区域命运的观点,实在虚妄。在崇尚威权控制的社会里,像李光耀这样明智的领导人并不容易找到,这样的社会倒是更容易产生萨达姆、卡扎菲、波尔布特这样一些以民众为鱼肉的政治变态狂,也容易滋养红色高棉、塔利班这样一些恐怖政府组织。

(三)不考虑代际公平的人类中心主义

"今朝有酒今朝醉"的末世心态正在人类社会快速漫延,这种心态也传染给了众多的地方政府,为了当前的利益,地方政府无所不用其极,导致资源被大量浪费性使用,生态问题、环境污染问题层出不穷,愈演愈烈。当然,天地之间人是唯我独尊的,资源环境只是在增进人类福利上才显得有意义。因此,可以不反对人类中心主义。但人类是一个需要不断延续的生物群落,如果不考虑子孙后代的需要而滥用资源、破坏生态,恐怕就很不道德了。因此,区域发展也需要在代际公平的意义上考虑经济社会的长期可持续性。

第三节　区域成长的维度与尺度

一、区域分析的维度

区域是一个多维度的社会经济现象,而区域的发展或成长也不是单一维度的变动。一般意义上,区域成长是经济、政治和文化维度综合变动的结果,区域分析需要一个多维度的思考。因此,本书虽然以区域经济问题的探讨贯穿始终,但并不是就经济谈经济。笔者也越来越强烈地感觉到:新古典经济学的歧路就在于把经济问题孤立出来而不考虑经济问题与其他问题紧密的相关性。抽象掉其他因素仅仅考虑经济问题,既是主流

经济学成功之处，也是主流经济学缺乏解释力的关键。抽象方法的运用，确使得经济学变得更加清晰明了和逻辑井然，但也使得经济学更像屠龙之术，在区域问题的分析中显得苍白无力。离开对包括政治、文化等因素在内的社会人文维度的考察，就无法获得关于区域成长完整清晰的认识。

（一）经济维度

区域经济系统是维系区域运行的基石，它提供着区域系统的物质循环流和能量循环流，故经济维度是区域分析最重要的维度。它考察区域经济生活中的生产、流通、交换和消费诸环节，研究微观经济主体的抉择、产业组织的状况、市场结构与效率以及区域的空间利用、结构优化和经济运行效果，关注居民的收入增长和收入分配、公共产品和服务的供给和分配、就业和劳动权利保障等。上述这些都是衡量区域发展的重要指标，但并不是唯一重要的指标。本书的第三章到第五章主要就是对这个维度的探讨。

（二）政治维度

人类进步的历史也是政治权力从高度集中于少数群体，逐步扩散、下移到普通民众的过程，这就是通常所谓的民主化过程。在某种意义上，政治是经济的延伸，它是社会各阶层表达利益诉求、进行利益协商、解决利益冲突的一系列制度设计。因此，区域政治生态构成了经济活动重要的环境因素，现实中没有完全游离于政治之外的经济活动，经济活动的利得在一定程度上取决于政治制度这个重要的约束条件。以最简单的交易活动为例，在中国古代社会虽然也广泛存在着市场，但交易活动的利得（预期收益）却受到政治权力的扭曲，一个集权的政治体制是不可能产生完善而自由的市场经济的。白居易的《卖炭翁》里官府与卖炭翁间的交易很明显是受政治结构扭曲的交易，因为这样的政治结构造就了不平等的市场主体。而现代民主政治应该是一种强化市场型的政治结构，当市场受到强势阶层的压力而扭曲时，民主就可以作为一种校正的力量而发挥其作用。

政治采取的具体形式取决于社会各阶层的对话能力，集权与民主是

其中最极端的两种政治制度，而在集权与民主之间存在着一组政治制度的谱系，它们因为集权多一些还是民主多一些而有所差别。一个区域要得以健康成长，必须营造与之相匹配的政治生态。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政治的任务就是要捍卫区域中每个社会成员充分的话语权，捍卫每个市场参与者平等的市场主体地位，创造一种市场面前人人平等的政治格局。因此，政治进步不仅是区域成长的重要条件，它本身就构成了区域成长的重要内容。

（三）文化（社会人文）维度

"文化"一词涵盖甚广，因此有必要从本文的研究目的出发，对"文化"进行界定。通俗地讲，文化是"指一个国家或民族的历史、地理、风土人情、传统习俗、生活方式、文学艺术、行为规范、思维方式、价值观念等"[①]。而社会学家的文化概念更加宽泛，也更加系统，如马林诺夫斯基将其定义为："文化是指那一群传统的器物、货品、技术、思想、习惯及价值而言的，这概念实包容着及调节着一切社会科学。"[②]同时，马氏对文化的内容进行了归类，指出文化包括"物质设备"、"精神方面的文化"、"语言"和"社会组织"。费孝通则把文化分解为三个层次：①器物层次的文化，主要是文化的物化形态，包括人类文明创造的物质成就；②组织层次的文化，是一套人类社会运行的组织系统和体制安排；③精神层次的文化，则是指文化所内含的价值理念、信仰体系和意识形态。如果说器物层次的文化是文化的表现，组织层次的文化是文化的载体，而精神层次的文化则是文化的内核。本书正是在精神层次上讨论文化问题。由此，本书所理解的文化，特指文化内含的价值观、信仰体系、意识形态以及在此指导下的传统习俗、礼仪规范、生活方式和思维方式，等等。

翻开人类发展的历史，我们会感到迷惑：究竟谁主宰着区域的命运？对此古人会把问题抛给无所不能的上苍。而近代的学者则可能从地理区

---

① 关于文化，有太多定义，上述通俗定义来自百度百科，网址：http://baike. baidu. com/view/3537. htm.

② 马林诺夫斯基．文化论[M]．费孝通，译．北京：中国民间文艺出版社，1987：2.

位上找答案。温带地区的人们确实比热带地区的人们更富裕,在热带我们只能在中国香港地区、新加坡这样的弹丸之地感受到现代生活的火热场面。但这不是答案的全部。如果纬度的高低决定着区域经济发展的水平,那么,为什么在温带仍然有一大批与贫困进行着不懈斗争的区域?这些地区的人民并不比热带的穷朋友们更幸福。无疑,地理区位只能解释区域经济的部分表现。人们或许(特别是新古典经济学家们)还会认为,是资本的多寡和技术的差异导致区域的贫富不均。确实,资本和技术是导致区域差异最直接的可观测因素,但是进一步的讨论会让持此观点的人们陷入尴尬:那又是什么导致了地区间资本和技术的差别?显然,新古典经济学家们注意到了引致经济发展最直接的因素,但那只是区域发展的表象,而发展的根源并不在这里。在某种程度上,笔者倒是赞成道格拉斯·诺斯的观点:资本和技术是经济发展的结果而不是原因。于是制度经济学家们发展出了一套用制度解释国家(区域)经济表现差异的研究路径,这是一个重要的进步。但是,我们还需要进一步追根溯源。因为,我们不难观察到这样的现象,同样的制度安排,在A区域可能是高效率的,但是照搬到B区域就完全行不通。中国古人发明了一个成语,叫“淮橘成枳”,原意是指同样的种子在不同的气候土壤条件会结出不同的果实。制度其实也就像这样的种子,落到不同的“气候土壤”中,会结出完全不一样的果实,而这个“气候土壤”就只能是文化。

无疑,文化是构造区域画面的核心元素,文化进步构成了区域成长的重要内容。区域文化基因不仅支撑着社会的价值理念和信仰体系,指导着微观主体的行为选择和交往方式,更决定着制度运行的效率。从而,文化对区域发展至关重要,对区域表现影响深远。如果说制度重要,那么文化作为“制度之母”[①],更加重要。社会学家马林诺夫斯基在其《文化论》中也特别强调文化研究的重要意义:“我们亦将见,社会组织除非视作文

① 文化为制度之母的观点来自塞缪尔·亨廷顿及劳伦斯·哈里森主编的《文化的重要作用——价值观如何影响人类进步》(新华出版社,2002年2月)的作者之一——戴维·兰德斯(David S. Landes)。

化的一部分，实是无法了解的，一切对于人类活动，人类团集，及人类思想和信仰的个别专门研究，必会和文化的比较研究相衔接，而且得到相互的帮助。"[①]马克斯·韦伯对各种文明和宗教的比较研究中也发现，文化使局面完全不一样。

最后，需要指出的是，下文紧接着要讨论的区域成长的伦理维度，是文化维度中最重要的一个方面。就本书而言，这个维度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它规定着区域发展所秉持的基本价值取向。本书的讨论把政治维度和文化维度合并为社会人文维度，并在第六章有较为详细的分析探讨。

二、从异化到自由而全面的发展：马克思主义人学发展观

（一）马克思主义人学发展观与区域成长的伦理维度

在西方学者（特别是西方马克思主义者）眼里，存在着两个马克思，一个是青年马克思，一个是老年马克思。他们认为青年马克思是唯心主义和人道主义的马克思，比如在其早期代表作《1844 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以下简称《手稿》）中对人类异化现象等问题的讨论就带有强烈的人道主义色彩。而老年马克思以《资本论》鸣世，在这本著作里看到的是冷冰冰的唯物主义和经济分析。这种两个马克思相互对立的观点其实是对马克思的误解。从《手稿》到《资本论》前后确实经历了较长的时间跨度，但有一个核心命题始终贯穿于马克思各期的著作中，那就是对人类命运的关注。

笔者始终认为，马克思主义是最深刻的人道主义，对人类命运的深切关怀是马克思理论体系最核心的命题。马克思从人的本质分析入手，批判了现实世界中人的异化现象，进而从人自由而全面的发展出发，提出了人类发展的目标。在马克思看来，人的发展与解放就其本质而言是人摆脱物质上的贫困与精神上的桎梏而获得自由的过程。毫无疑问，人的自由的扩展是区域发展的最高命题，离开人自由而全面的发展，区域发展就

---

① 社会学对文化重要性的认识可以参见：马林诺夫斯基．文化论[M]．费孝通，译．北京：中国民间文艺出版社，1987：2.

失去了它的灵魂。因此,马克思主义人学为区域发展提供了一个参照系,有助于我们树立正确的区域发展观,澄清区域理论中的错误认识和区域实践中的错误倾向。在很多地区的区域实践中,工具理性代替了价值理性,区域发展的伦理维度被弃之不顾,区域中的公民只是作为区域发展的手段和工具而存在,而公民作为区域发展唯一目的的一面却被淡忘了,以至于区域发展丧失了其道德合法性,缺乏伦理维度考量的区域发展注定是不可持续的发展。

（二）异化的普遍性和资本主义世界异化现象的具体表现

异化概念最初是黑格尔提出的一个哲学概念。在黑格尔那里,异化是指“主体发展到了一定阶段,分裂出自己的对立面,变为了外在的异己的力量”。马克思借用异化的基本哲学含义,并将之推广运用到社会和经济领域,由此形成了马克思主义异化理论。马克思认为异化现象是私有财产制度和社会分工固定化条件下的必然结果,具有普遍性。

在《手稿》中,异化理论占有相当重要的地位,是早期马克思批判私有制和资本主义的利器。在手稿中,异化首先是指异化劳动,主要表现在四个方面:其一,劳动产品和劳动者相异化。即“工人生产的财富越多,……他就越贫穷”[①]。其二,劳动本身和劳动者相异化。指劳动是一种强制性的、被迫的、外在于劳动者的劳动。其三,人同自己的类本质相异化。指人由于其社会本质的丧失,蜕变为一般动物。其四,人同人相异化。即人与人的对立。当然,马克思认为异化不仅仅是指劳动异化,它也包括家庭、国家、宗教、道德、艺术等诸多方面的异化现象,而劳动异化是其他方面异化的基础。手稿虽然是以资本主义世界为例分析了异化的诸表现及其成因,但马克思强调的是在私有制和社会分工固定化的条件下,异化是普遍存在现象,不独资本主义如此,在中世纪甚至更早的时代亦然。

在《资本论》中,异化概念只是偶尔提及,但书中的所有讨论都更加深刻而全面地揭示了资本主义社会普遍存在的异化现象,也更加深刻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M]. 北京:人民出版社,1979:90.

地剖析了异化产生的根源。无疑,不论《手稿》还是《资本论》,都是把揭示人类糟糕的生存状态及这种生态状态背后的原因作为己任。体现出马克思自始至终都是把人及人的发展作为核心贯穿于各个时期的研究中。

(三)未来社会发展的理想蓝图

马克思不仅对充斥着异化现象的现实世界给予强烈的批判,也对未来理想社会的蓝图进行了勾勒。在马克思眼里,未来理想社会将是"一个把每一个人都有完全的自由发展作为根本原则的高级社会形态",在那样的社会里"个人的独创的和自由的发展不再是一句空话","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我们无法对马克思预见的准确性作出评价,但是在他的勾勒中传递着一个强烈的信息:人的自由发展和人的全面发展是未来社会发展必须禀持的基本价值理念。

三、以自由看待区域发展:重建区域发展的伦理维度

上面论及的各种区域发展的错误导向都说明一个问题:合意的区域发展必须把价值理性放在首位。即我们必须回答:什么样的区域发展才是值得我们珍惜和追求的区域发展。也就是说,我们有必要从伦理维度上提出衡量区域发展的客观尺度。

从马克思人学发展观看,人的自由而全面的发展是区域追求的最终目标。但是如何才能衡量人的自由而全面的发展呢?这似乎是一个难于回答的问题。不过,笔者发现在马克思与另一个关注弱势群体命运的经济学家——阿马蒂亚・森之间存在着研究上的延续性。阿马蒂亚・森在讨论发展和贫困问题时提出了"实质自由"的概念,它指人们具有的能够选择其珍视的那种生活的"可行能力",包括免受困苦的各种基本能力,也包括能够识字算数、享受政治参与等方面的自由。由此,森把发展看作是扩展人们享有的实质自由的过程。其中,免于贫困和健康生活的能力始终应该是赋予每个公民的基本能力,知识获取和技能提升的能力则是关键性的能力,它不仅是基本能力的重要保障,也是扩展能力的前提,而社会参与和政治参与能力也需要在发展中不断提升。事实上,人是在包

括政治参与在内的各种社会参与中获得价值实现感和归属感的。森不仅在理论上构建了区域发展的伦理维度,他也通过帮助联合国建立可量化的指标体系(如人类发展指数),把他的以自由看待发展的理论落实到具体的区域实践中。

把实质自由扩展作为区域发展的衡量尺度,体现了把人放在区域发展的首要位置的以人为本的科学发展理念,是和谐社会的必然要求。

CHAPTER 3

区域经济的短期分析

“在原有欲望已被满足的情况下，要取得更多的享乐量，只有发现新享乐或扩充旧享乐。”

——摘自戈森《人类交换规律及人类行为准则的发展》

分工演进是本书考察区域经济社会运行的逻辑线索，本章在对分工及分工思想进行简单梳理的基础上，从分工的角度定义了一个与新古典经济学不一样的“短期”概念，进而研究分工给定条件下区域经济的表现。核心是从新古典经济学理论和分工理论分别给出区域经济短期增长的不同解释，强调区域经济在短期中表现出来的“有极限的增长”是分工不能深化和扩展的结果，也从反面论证了区域的长期可持续增长可能根源于分工水平的不断提升。另外，由于本章一些重要观点来自戈森的启发，故把此章最显著的位置留给这位不太走运的德国学者，以示敬意。

第一节　相关概念的一个说明

一、分工及区域分工水平的衡量

（一）分工及其类型

分工是一个大家熟视无睹的经济现象，但真要给分工下个定义，也并不容易。查阅百度百科和维基百科，对分工的定义也并不完整。从字面

意义解，分工（division of labor）就是社会劳动的分解和分化。结合笔者对分工的理解，可以这样来定义分工：分工是在一定条件（市场条件、技术条件等）下，社会劳动得以在社会经济组织间和社会经济组织内部逐步分解、细化和独立化，进而导致社会经济整体变动的过程。这里将分工理解为一个过程，是强调分工的动态性；而把分工与社会经济整体变动联系起来，是强调分工之于社会经济的重要意义。

在上述定义下，分工可以分成两大类型：社会分工与组织内分工。组织内分工，不仅仅指企业组织内部的分工，也是包括政府组织、社会组织在内的各种组织内部的分工，这种分工导致了组织内部的规模经济，即随着组织内部的规模扩大，分工效率得以体现和提升，呈现出组织长期平均成本曲线（LAC 曲线）向下倾斜的趋势。社会分工则可以理解为社会经济组织间的分工，这种分工导致了正外部性，即随着社会经济组织间分工的日益发展、组织间的相互依赖性增强，每个组织的效率增进、技术进步、成本降低，都会对其他相关的组织产生良好的促进作用，从而在整个社会层面呈现报酬递增的局面。

本书正是在规模经济意义上讨论组织内分工，在正外部性（外部经济）意义上讨论社会分工。组织内分工的意义在亚当·斯密那里得到了充分的认识，而在新古典经济学中分工并没有得到重视，在各种讨论规模经济的文献中，甚少把分工看作规模经济的根源，这是一个很大的遗憾。而社会分工的理解在马克思那里达到了相当的高度，马克思指出："只有在出现劳动的社会分工或者说社会劳动的分工的情况下，产品才能成为商品，商品交换才能成为生产的条件。"因此，在马克思看来，分工事实上构成了整个市场经济的基石。

（二）分工思想的产生与发展

分工是人类社会最古老的经济现象，因此分工思想也是人类最早形成的经济思想。关于分工，从人类刚进入文明状态就已经有了较为深入的认识。如中国古代关于职业、劳动等社会分工现象，对生产过程中的内部分工现象都有相当程度的认识。如春秋时，《考工记》对手工业分工门类进行了考察，并对每一手工业门类内部的生产分工情况进行了介绍。

管仲把人群按职业划分为四类（即士、农、工、商）的职业分类方法仍然在当今社会得到广泛的应用；他提出的同业聚居可以“相语以利，相示以巧”，“相语以利，相示以赖”，从而提高劳动生产率的思想，也与斯密和区域经济学对分工和产业聚集的认识不谋而合。孔子、孟子考察了脑力与体力分工而导致的“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的社会分层现象，对由此产生的等级差别的社会政治秩序提出了深刻的见解。荀子、墨子等对分工的优越性和必然性提出了各自的观点。古希腊思想家对分工问题也有相当深入的讨论，苏格拉底的弟子色诺芬在其《经济论》中描述了他作为雇佣兵在波斯王宫中看到的那些精美无比的用具和器皿，从而延伸出他关于分工的讨论，在他看来，人不可能精通所有的技艺，因此分工是社会所必需，而那些精美的器物正是分工的结果。苏格拉底最得意的那个大块头弟子柏拉图则把分工理论发挥到一个相当的高度，不仅讲到了分工的优势，也看到分工的社会后果。在《理想国》里，他强调了分工不仅是人性特点和经济生活的要求使然，也是社会分裂为不同阶层的基础，脑力与体力的对峙以及社会各阶层间的对峙，都是分工的结果。

关于分工最精彩的论述来自亚当·斯密、马克思、杨格和杨小凯，四人对分工与市场、分工与技术进步、分工与经济内生增长间的关系等方面进行了深入的分析，本书的第二章第三节及前文中有较为详细的介绍，也会在以下的讨论不断涉及，此处不再赘述。

（三）市场的深度和广度：区域分工水平的一种衡量方法

分工与市场是一个问题的两个侧面，二者相互是对方的镜像，因此，可以从市场的状况看到分工的状况。或者说，我们可以把市场看作是分工最重要的表现，进而可以通过对市场的考察分析分工水平。

本书中，笔者认为有两个市场维度是衡量分工水平的基本维度。其一，是市场的广度（也可理解为分工的广度）；其二，是市场的深度（也可理解为分工的深度）。在本书中，市场广度和深度将会作为两个非常重要的概念和衡量指标，来判别区域经济的分工发展状况。

市场的广度（分工广度），一是指市场规模之大小，它可以衡量区域经济有多少生产者和消费者参与到分工网络之中；二是指市场最终产品

和服务种类之多寡，这一指标特别反映了社会分工的规模和水平。

市场的深度（分工深度），它指的是产品或服务的生产中，从要素投入到最后产出所经历的被分解、细化的所有连续的环节的多寡。按照庞巴维克首先提出并由杨格发扬光大的"迂回生产"理论的观点，现代经济的生产特征是以分工为条件的"迂回生产"，由于分工的发展，产品生产环节日益拉长，生产环节的不断拉长既意味着中间产品（含中间服务）的种类日益繁衍，也意味企业内部生产管理经营流程的日益细化①。在这里，市场深度更主要指中间产品种类的繁衍情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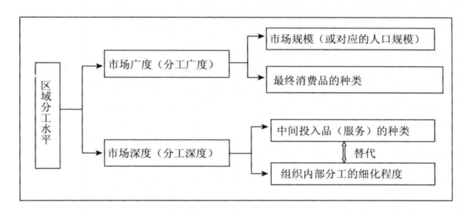


图 3-1　区域分工水平的衡量尺度

二、分工意义上的"短期"概念

（一）新古典经济学中的"短期"

新古典经济学中有短期分析和长期分析，所谓短期就是说在一定的时间内，生产者没有办法调整全部生产要素，而长期则是指可以调整全部的生产要素的一个时间低限值。在新古典经济学中，短期实际上是一个

① 在一定条件下，组织内部分工与社会分工可以相互替代。组织内的一个环节或一个职能，可以独立出来，成为社会化的中间产品或服务。如会计服务可以外包给专业化的会计师事务所，一些营销工作可以外包给专业化的营销组织，零部件等中间投入的生产可以外包给相关的专业化组织，另外，诸如运输、包装等也都可以外包给社会化的专业组织完成。所以，组织内分工的提升，也可看作分工深度的提升。

以要素投入,特别是资本品投入的可变状况来定义的时间尺度。

但这个"短期"概念有相当大的局限。如果我们考虑到区域经济的供给边存在着一个稳态水平时,即在要素投入可以无限增加或变动的情况下,经济增长也会因为供给边稳态水平的存在而变得不可能,考虑到区域经济的需求边也会由于分工不能深化而存在一个需求极值,这个新古典经济学定义的"短期"就变得可有可无了。[①]

(二)分工意义上的"短期"

如果从分工的角度来理解"短期","短期"就是指分工水平不发生变化所持续的时间,按照分工水平的衡量尺度,"短期"在表现形式上,就是市场深度和广度不发生变化所持续的时间。

第二节 区域短期增长:新古典经济学的解释

我们可以把区域看作把要素投入转化为产出的经济组织形式,在资源条件、各种内部环境和外部环境不变的情况下(即短期情况下),区域经济的供给能力将直观地取决于要素投入,而区域经济供给能力的实现还将受到区内需求和区外净需求的约束,两种力量的均衡决定了区域经济短期总量水平。因此,本节运用调整后的索洛模型确定区域经济短期供给能力,运用凯恩斯总需求方程,确定区域需求状况。在模型中,产品市场价格和金融市场利率等价格因素均为外生给定,不影响供给能力和需求水平。

一、区域经济的短期供给能力

(一)区域经济中的要素投入

其一,自然条件和自然资源。自然条件从广义上讲应该包括自然资源,从狭义上讲,则是指除自然资源以外的所有影响经济增长的诸自然地

---

① 关于区域经济短期稳态水平存在的讨论和关于区域经济在分工给定条件下存在着一个需求极值的分析,将在本章第二节进行阐述,这里并不展开。

理因素，包括地理位置、地质条件、地貌条件、水文条件、气候条件，等等。自然条件和自然资源是决定区域经济供给能力的基础因素，从生产的物质形态看，自然资源、自然条件和劳动是生产过程中的基础投入品。在区域经济的早期阶段，它们具有至关重要的作用，甚至是决定区域差异的核心变量；但在现代经济条件下，上述因素可能不再是区域经济的决定性因素，但仍然是不能忽略的因素。自然条件和自然资源的影响主要体现在以下方面：其一，直接影响农业和采矿业的发展和分布，因为其劳动对象是直接的自然资源，或是对自然条件的利用。其二，间接影响原材料工业和其他加工工业的发展和布局，如材料工业、重型机械以及以农业原料为主的轻纺工业和食品工业的发展和布局。其三，也影响区域产业结构的形成和发展，依据农矿业对区域经济发展的影响程度，区域的经济结构可以分为资源型、资源加工型和加工型三种类型。资源型经济结构指的是区域自然资源赋存状况良好，资源的地域组合状况较为理想，自然资源对区域专业化部门的形成和发展起决定作用；区域向外输出的是直接的采掘工业产品、农产品或资源含量较高的材料工业产品和重化工产品。资源加工型经济结构是指区域内具有部分资源，资源组合不理想，部分重要资源仍然需要区外输入。加工型经济结构指区域缺乏发展经济所需的自然资源，农矿产品、能源主要依赖区处输入，通过不同层次的加工和再加工向外输出加工工业产品。最后，建立在自然资源基础上的农矿业是区域初始资本积累的源泉之一①。

其二，劳动力投入。人既是区域经济发展的手段，更是区域发展的目的。区域供给能力的形成依赖于劳动力的数量投入（它是区域供给能力形成的基本保证，又将对要素投入结构产生深远影响），也依赖于劳动力行为（指劳动者在就业机会、职业选择、劳动报酬、劳动条件等方面的反映，劳动力行为与劳动者的道德观念、素质、知识水平和动机有关），还受到劳动力素质的影响。在本章中，我们仅讨论与短期供给有关的劳动力

① 关于自然条件和自然资源的分析，主要借用了郝寿义、安虎森《区域经济学》的观点。相关资料参见：郝寿义，安虎森．区域经济学［M］．北京：经济科学出版社，1999：127.

存量。

其三,资本。在现实经济中,资本总是相对于其他直接要素更加稀缺的要素,也因此在资本主义早期和20世纪中期的各种文献中,资本被赋予了最重要的地位,占据了最多的篇幅。如哈罗德-多马模型几乎就是在强调资本是唯一重要的经济增长因素。

其四,区域经济中的其他投入要素。上述要素是区域供给能力形成的直接要素,但区域内科学技术水平、制度效率、经济结构的合意性、企业组织形式和管理水平、市场条件、分工水平、经济活动的空间组织形式以及社会网络状况和社会资本的积累等因素都是影响区域供给能力的重要因素。但在短期均衡中,我们都不考虑这些因素的变化。

(二)区域经济短期供给能力的确定

在这里,我们将影响区域供给能力的其他因素都内化于劳动力和资本投入而不作为单独的解释变量来确定区域经济的供给能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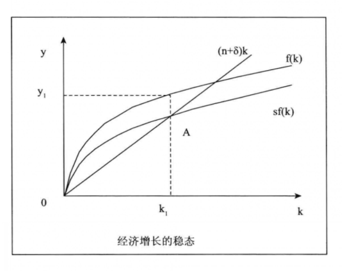
于是可以借用柯布-道格拉斯函数来构造一个区域的短期生产函数:$Y = F(K, L) = L^{\alpha}K^{\beta}$,这个区域生产函数的缺陷是它无法准确反映其他因素是如何影响供给能力的,但在一个静态的短期分析中,它可以理解为,其他因素都通过影响K和L而产生作用,因此,它可以作为区域短期供给能力的一个近似表述。当然如果需要更细化的表述,可以将综合技术水平和其他影响因素分解开,形成模型:$Y = A(t)L^{\alpha}K^{\beta}\mu$。其中,$A(t)$表示综合技术水平(如经营管理水平、劳动力素质、科技进步等);α和β分别表示资本产出的弹性系数和劳动产出的弹性系数;μ为随机误差项,表示除上述三因素外的其他因素对供给能力的影响,另外,如果区域经济规模报酬不变,则$\alpha + \beta = 1$。

(三)区域短期供给能力的稳态水平确定

下面,运用索洛模型对区域短期供给能力进行分析。模型的假设前提:①资本与劳动存在替代关系,资本产出比可以改变;②资本与劳动的边际生产率递减;③市场是完全竞争型的,价格机制起着主要调节作用;④不存在技术进步,即使有微小的技术变动,也是中性的,即不改变资本

和劳动的比例。

令 s 为储蓄率，n 为人口增长率，δ 是用于固定资产的折旧，$k = K/L$ = 单位劳动的资本量，Δk = k 的增加量，$f(k) = Y/L = y$ = 单位劳动的产出。在单位劳动产出中一部分通过储蓄形成投资（$sf(k)$），这部分投资又可以分解成两个组成部分，一部分形成单位劳动的资本增量（Δk），另一部分则用于补充折旧资金和新增劳动力的资本需求 $(n+\delta)k$，于是有公式 $sf(k) = \Delta k + (n+\delta)k$。在报酬递减的经济系统中，随着单位劳动资本存量的增加，单位劳动的产出增量逐步减少（如图中的 $f(k)$ 曲线所示），单位劳动的投资增量也逐步减小（如图中 $sf(k)$ 曲线所示），当单位劳动资本存量达到 k_1 水平时，有：$sf(k) = (n+\delta)k$，$\Delta k = 0$。此时，单位劳动资本存量不再增加，单位产出水平亦不变，即达到了经济稳态。



3－1　要素边际生产率递减条件下区域经济稳态的形成

在稳态水平下，经济体供给能力的增长与劳动力增长率相同，这意味着单位劳动意义上的经济增长停滞（单位劳动产出水平将长期稳定在 y_1）。在劳动力不增加的情况下，即 $n=0$ 时，区域总体意义上的经济增长率亦为零。索洛模型为我们提供了一个区域经济的静态特征，若区域经济满足上述前提，那么区域经济将是一幅令人窒息的画面。因此，分工给定条件下，区域经济的规模受到供给能力的限制，呈现“有极限的增长”

局面。在现实的区域经济中，区域经济稳态，并不真正是一个稳定状态，事实上，分工演进、市场网络、科层网络和社会网络功能的复杂化和完善化，制度变迁、技术变迁、产业结构变迁、企业组织的演进、社会资本积累还有经济活动空间组织形式的变化等多种因素都为区域摆脱稳态、保证供给能力（单位劳动意义上）在长期内的持续变动提供了可能。在一个长期的区域供给能力形成过程中，区域供给具有实现规模报酬递增的能力，从而使区域的可持续发展成为可能。索洛模型只是为我们提供了一个比较的基准，为我们研究区域经济的动态演进过程提供了一个比较对象，因此在区域经济模型中它不具有现实意义，但具有理论意义。

二、区域经济的短期需求分析

（一）区域需求的构成及其决定

其一，投资需求。投资需求是区域内一定时期内全社会形成的固定资产投资和存货增加额之和，其规模是一定时期（一般为 1 年）内区域各部门、各行业用于建造和购置固定资产所投入资金的数量总额。根据凯恩斯理论，投资需求是由资本边际效率和利息率这两个因素的对比关系所决定。资本边际效率，是指增加一笔投资所预期可得到的利润率，它会随着投资的增加而降低，从长期看，呈现“资本边际效率递减”的规律，从而减少投资的诱惑力。投资需求是总需求的重要构成部分，尤其是就总需求的两大构成即投资需求与消费需求各自的不同特点来看，消费需求的增长相对稳定，不易发生急剧的变动，而投资需求则上下摆动的幅度很大，其摆动幅度对总需求的影响也比较大。在短期分析中，我们假定投资需求为外生给定。

其二，消费需求。消费需求由居民个人消费需求和社会集团消费需求组成。按凯恩斯理论，它取决于家庭的收入水平，具体而言，可支配收入（即 $Y-T$，T 为税负，等于 tY，t 为税负率）构成了对家庭消费最基本的约束，即消费是 $Y-T$ 的函数，消费又可分解为两个部分：自生消费 C_0 和派生消费 $C_1(Y-tY)$。自生消费是与收入无关的部分，派生消费则是由

家庭收入派生出来的那部分消费，其中 C_1 为边际消费倾向。

另外，在短期分析中政府支出（G）由外生给定。区外净需求是区域出口（X）与区域进口（M）之差（其中，$M = M_0 + m(Y - tY)$），也不在此处讨论。于是，区域需求函数为：$Q_d = C + I + G + X - M$。

（二）区域需求扰动的乘数效应

在区域需求函数中将各项需求的表达式代入，于是可计算出因消费项变动而诱致的总需求变动，用区域乘数 $k = \frac{1}{[1 - (C_1 - m)(1 - t)]}$ 来反映二者的关系，这意味着，消费需求的较小量变动，可以导致区域需求的较大量变动。同样，其他需求因素的变动也会引起类似变动。

三、区域经济的短期均衡

在短期内，区域供给具有刚性，在区域需求小于供给的情况下，需求的影响是主导性的，决定着区域的产出水平。而在区域需求大于区域供给的情况下，区域产出达到区域供给能力的边界，剩余需求转化为对区外的购买。

第三节　区域短期增长：分工理论的解释

一、戈森第三定律再认识：从需求边定义的增长极限

（一）被忽略的戈森第三定律

赫尔曼·海因里希·戈森（Hermann Heinrich Gossen，1810—1858年）是个时运不济的学人，这个自称经济学界哥白尼的经济学天才比他的时代早生了30年。30年后，戈森在其第一定律和第二定律中阐释的那些观点和理论，才被门格尔、瓦尔拉斯、杰文斯这样一些边际革命先驱重新发现；而他的第三定律却至今甚少被人提及，这个看似稀松平常的第三定律事实上蕴含着对经济增长的基本看法。

在第三定律中，戈森指出：在原有欲望已被满足的情况下，要取得更

多的享乐量，只有发现新享乐或扩充旧享乐。对上述观点稍作延伸，可以发现：该定律实际上从需求边定义了经济增长的极限。

假定经济系统中只有一种产品和一个消费者，该产品需求[1]决定于效用最大的消费量，由于边际效用递减，则：$\partial U/\partial Q=0$；推而广之，当经济系统中存在 m 个消费者和 n 种无替代性、无互补性的产品时，根据上述最大消费量的决定条件，可加总得到经济系统对这些产品的总需求：$Q_D=\sum_{i=1}^{m}\sum_{j=1}^{n}\text{Max}Q_{\text{dij}}$，其中 i 为第 i 个消费者，j 为第 j 种产品。当产品间具有替代性时，增加其中一种产品的消费量，会减少另一种产品消费量；当产品具有互补性时，增加其中一种产品的消费者，也将导致其互补产品需求增加。但不管产品间的替代性和互补性如何，只要给定产品种类，能够产生最大效用水平的需求量也就决定了。因此，从戈森第三定律延伸出来的结论显而易见：从需求边看，在人口规模给定条件下，社会总需求取决于最终消费品的种类，这实际上是从需求边定义了经济增长的极限。

（二）分工与戈森第三定律

再进一步讨论，可以发现，既然社会总需求取决于人口规模和最终消费品的种类，这种增长将取决于分工的广度，即参与到区域分工网络中的人口规模[2]和由分工水平决定的最终消费品种类。

二、分工给定条件下的区域供给：从供给边定义的增长极限

供给的变化，一是取决于要素投入的多寡，二是取决于投入转化为产出的转化效率。假定要素投入足够多，那么产出就只取决于投入到产出间的转化能力和转化效率。区域的短期供给中，由于分工水平不发生改变，即分工的广度和深度均不发生变化，因此区域对要素的生产加工能力就取决于短期最大生产能力，而由于生产的“迂回”程度不发生变化，因

① 此节讨论的需求（包括加总的需求），是不考虑购买力而仅从效用最大化角度定义的对各种产品的最大需要量。

② 那些在区域网络分工体系中并不参与产品（包括服务）生产的非劳力人口，事实上也在分工体系中承担着消费者的分工角色，也应该将他们视作分工体系中的一员。

此区域从投入到产出间的转化效率也不变，区域短期供给就最终取决于由“迂回生产”决定的短期最大生产能力，这是一个固定的值。

三、来自历史的检验：古代史中的增长宿命与渭河流域兴衰

（一）有极限的增长：古代区域发展的宿命

工业文明到来之前，世界各国、各区域的发展甚至不如蜗牛爬行，不仅发展滞缓，而且发展到一定阶段后必然衰落，逃不了盛极而衰的历史宿命。西方世界是这样，东方的中国也如此，概莫能外。

中国长期以来领先世界，但明中叶是中国与世界发展的分水岭，翻过这条分水岭，看到的是蹒跚而行、日渐颓唐的老大中国和朝气蓬勃、日新月异的西方世界。在历史学家黄仁宇笔下，那个在历史上毫不起眼的年份——万历十五年（公元1587年），实际上暗含着解读中国历史的密码，这一年，也可以被看作最伟大的农耕文明即将让位于工商文明的历史起点[①]。在外国学者佩雷菲特《停滞的帝国——两个世界的撞击》中，清中期以后的清帝国——这个自不量力、目空一切的井底之蛙，不过是一条僵而不死的百足之虫，所谓“康乾盛世”，不过是中国古代农耕文明的最后一抹亮色，最后一曲挽歌。翻开中国古代史，这部漫长而伟大的农耕文明史，也是一部不断遭遇挫折和停滞的民族伤痕史，一部循环往复、治乱交替的王朝更替史。元代散曲名家张养浩一句“兴，百姓苦；亡，百姓苦”，道尽了这个民族的历史宿命。具体到每个区域的发展，中国的农耕社会有近五千年的历史，竟然找不到一个能够长期繁荣的区域，治乱交替始终是区域发展中不变的主题，每个区域的成长都被限定了它的极限。这一规律，放之整个古代社会皆然，古罗马城从建城到毁于蛮族之手，不过四百年时间，真正辉煌的时间则不过二百年；两河流域，尼罗河、恒河、印度河流域那些富庶之地，如今已是历史的回忆。

---

① 其实具体的时间、年代并不重要，中国农耕文明和西方工商文明力量对比的转折性变化，是一个长期积累的过程，并不发生在某个具体的年代，万历十五年也确实是一个并不怎样让人记忆深刻的年份。但作为一种标志，这一年被黄仁宇赋予了特殊的符号意义。

有人(如黑格尔)感叹中国古代其实并没有历史,只有过去的不断重复,这是对中国古代史的真实描述。笔者将这种状况在区域成长中的表现概括为“有极限的增长”,这种增长在生产方式上几千年没有太大变革;在对外贸易中,我们的辉煌止于对唐长安城的记忆;在工商业发展上,我们的最高点停留在《清明上河图》中所描绘的宋代开封城(时称“汴梁”或“东京”)景象;在文化发展上,唐诗和宋词为我们树立了难以逾越的高峰;在精神创造领域,中华民族的后世子孙从来没超过诸子百家所达到的哲学高度。下面,我们将从那个承载着中华民族历史宿命的流域——渭河流域为例,看一看中国古代治乱交替的历史投射在区域上的影像。

(二)渭河流域的兴衰

渭河是黄河第一大支流,发源于甘肃省渭源县鸟鼠山,流域涉及甘肃、宁夏、陕西三省(自治区),在陕西省潼关县注入黄河。这条大河自西向东把天水、宝鸡、咸阳、西安、铜川和渭南等历史名城串联起来,大致包括甘肃省定西、天水、平凉、庆阳等地市的一部分或大部分,陕西关中盆地及延安、铜川等地市的大部分或全部,流域面积 13.48 万 km^2,其中甘肃占 44.1%、宁夏占 6.1%、陕西占 49.8%。干流全长 818km,从西至东横贯关中平原,宝鸡峡以上包括天水为其上游,河长 430km,河道狭窄,河谷川峡相间,水流湍急;宝鸡峡至咸阳为中游,河长 180km,河道较宽,多沙洲,水流分散;咸阳至入黄口为下游,河长 208km,比降较小,水流较缓,河道泥沙淤积。

整个流域自然地理环境比较接近,属于温带暖温带半湿润半干旱大陆性季风气候区和落叶阔叶林或森林草原地带。流域内,自然资源禀赋亦具一致性,占关中 80% 面积的渭河以北地区属于以煤炭为主的能源资源富集区,南部秦岭狭长的山地地带属于以有色金属、铁矿和贵金属为主的金属矿产分布区,生物和农业资源也依南北两个自然地理带有较一致的分布。同时,流域地区人文历史、民情风俗亦同源同脉,这里是中华人文初祖炎帝、黄帝带领中华先民活动的地方,在同属黄河文明之主体渭河文明的文化背景之下,作为周秦汉唐时期京畿之地,各行政区在语言文化、传统风俗、生活习惯、农耕方式等方面具有一致性。

如果说中华文明的摇篮在黄河流域，那么黄河文明的摇篮就在渭河流域。从神话、传说和考古发掘看，这里是炎帝、黄帝的族居地和陵墓所在地，这里有远古时代的蓝田人和大荔人文化，有新石器时代仰韶文化的典型代表半坡遗址，这里还创造了中国最古老的文字。这块神奇的土地上，形成了中国历史上早期最成熟的农耕区，而渭河在陕西秦岭北麓形成的冲积平原，人们习惯上将其称作“关中地区”或“关中平原”，曾经孕育了中国最灿烂的农耕文明，享有“天府之国”的美誉。自西周起，历史上先后有 13 个王朝建都于此，历时 1100 多年。

自西周至汉唐，渭河流域更是步入了其历史上最辉煌的时期。作为周王朝的发祥之地和秦帝国的龙兴之地，渭河流域以其优越的自然地理条件和区位条件以及长期持续的经济开发而成为历史的幸运儿，周武王依靠它推翻了殷商统治，始皇帝依靠它横扫六合。西汉初，张良建议高祖刘邦定都关中时，曾精辟地论述道：“关中左淆函，右陇蜀，沃野千里，南有巴蜀之饶，北有胡苑之利，阻三面而守，独以一面东制诸侯。诸侯安定，河渭湾维天下，西给京师；诸侯有变，顺流而下，足以委输。此所谓金城千里，天府之国也。”可见，自西周起渭河流域就已经是全国首善之地，其境内肥沃的土地、丰富的物产支撑着帝国中枢的正常经济运转。到唐代，渭河流域得到进一步的发展，起自山西的李唐王朝最终也定都于此。经过唐王朝的早期经营，渭河流域成为全国乃至全球最富庶的区域。以当时都城长安为例，唐长安城在隋大兴城的基础上不断扩建，城市面积达 84 平方公里，是汉长安城的 2.4 倍，明清北京城的 1.4 倍。比同时期的拜占庭帝国都城（君士坦丁堡）大 7 倍，比当时伊斯兰世界的中心巴格达城大 6.2 倍。在其鼎盛时期，长安城人口多达百万，是世界历史上第一个人口超百万的国际性大都会。同时，唐代的渭河流域作为欧亚大陆桥（古丝绸之路）的东端起点，与西端起点君士坦丁堡交相辉映，共同谱写了东西世界文明发展和交往史上壮丽的篇章，来自欧亚各国的商贾云集于此，带来各地的珍奇特产，中国的丝绸、茶叶、陶瓷制品从这里起运，穿越绿洲、沙漠进入中东抵达地中海。

从中、晚唐开始，中国经济重心就有了东移南迁的迹象，并在一些人

为因素和自然因素的影响下，渭河流域经济社会发展开始迟滞，地位逐步衰落。唐中叶安史之乱成为这一地区衰落的起点，晚唐更由于频繁的兵祸而一蹶不振；进入五代十国，相对稳定的东、南诸地区获得了长足的发展，而渭河流域则长期在战乱中难得喘息；到北宋立国，全国经济重心已经向南移到黄河下游地区；而南宋时期，中国经济重心向更东更南的地区移动，宋都亦南迁至江南杭州。明清、民国时期，渭河流域经济社会得到一定程度的恢复和发展，但常常处于恢复发展与天灾人祸交替发生的状态，始终无法达成可持续的发展。这一地区，在整个古代史中的发展高峰，从来没有超越中唐时期。

四、中国古代史和区域增长极限的不同解读

中国历史总体呈现出的治乱更替的周期性规律和其在区域发展中表现出来的有极限的增长，是一个让人着迷的话题，激发了太多人的想象力。在中国古代，历史诠释者的著作或演义里，对中国历史都曾有过思考，但这些思考不是流于表面，就是以史载道。流于表面的历史诠释，总是以妇寺（那些长着漂亮脸蛋的女子和受尽屈辱的太监）干政为历史作结，如《东周列国志》开篇就把西周的灭亡归于那个不爱笑的褒姒，《封神演义》把商的灭亡归于那个可怜巴巴的妲己；以史载道者，则不是在写历史，而纯粹是以历史作为传播儒家思想的载体，最著名者莫过于司马光的《资治通鉴》，它虽然是本了不起的史书，却通篇是君臣、父子、夫妻的道统思想，煌煌数百万言，其实就“仁”、“义”、“礼”、“智”、“信”五个字足以概括。

近代以来，中国才有真正的历史思想，但对于中国古代史之诠释，仍不甚完善。目前有三种主要的研究思路来为中国古代史解码。

（一）来自土地制度和政治结构的解读

多数的近当代学者以土地制度和政治结构为王朝的更替作结。此一论者认为，中国每一个王朝的早期，都由于人口规模较小，土地分配相对平均，以家庭为单位的自耕农业经济得到广泛发展，有力地促进了农业经济的快速复苏和发展。因此，每一个稳定王朝的早期都会呈现兴旺之兆。

但在王朝的中后期，由于土地制度和政治结构之局限，人口日繁，而官绅对土地的兼并亦日甚一日，自耕农经济无以为继，大量农民沦为失去土地的佃农或流民，一个小小的扰动因素，就会成为压垮王朝的最后一根稻草。

（二）来自政府治理的解读

也有大量人士以政府腐败和管理无效来为历史寻求答案。目前，我们大大小小的媒体天天都在大谈特谈反腐，执政党更把反腐成败视作党、国命运的根本；而市井坊间，百姓们最重要的消痰化食之资，无非也是"表哥"、"房姐"，或者"干爹门"、"不雅视频门"这样一些永远新鲜的话题。但对于"腐败"概念，百姓们很少有深刻的理解。事实上，嫖个妓、包个"二奶"、搞几块名表、占几套经济适用房不过是腐败的表象。腐败，按照其生物学本意，是指由于细胞变质或坏死，导致机体组织失去正常功能的现象。由这个最基本的生物学意义上的腐败来理解腐败实质，它不是单个个体细胞的变质或坏死，而是整个机体组织正常功能的丧失。

明末清初的大思想家黄宗羲痛感大明王朝的灭亡，埋首于中国历史的梳理，发现了一个重要的现象，后人（如当代学者秦晖）名之为"黄宗羲定律"，它是指这样一种现象：历史上的税费改革不止一次，但每次税费改革后，由于当时社会政治环境的局限性，农民负担在下降一段时间后又涨到一个比改革前更高的水平。这也就是黄宗羲所谓的"积累莫返之害"。稍作延伸，可以这样理解这个"定律"，即王朝从兴起到衰亡的过程，都是一部财政从轻徭薄赋到横征暴敛的过程，王朝的衰亡源于财政的崩溃。何以王朝的财税变化会出现这样一种规律性？其实它跟政府运行的效率大有关系。王朝甫一建立，执政者都知道精兵简政的道理，如汉帝国的建立者以"约法三章"，行"黄老之术"，为"文景之治"局面的形成奠定了基础。但逐步地，不受约束的官府与地方利益集团（士绅阶层）会发现鱼肉百姓其实是件技术含量很低的工作，于是裙带关系大行其道，权钱交易由地下而公开。为了寻求权力租金（即权力垄断的利得）最大化，官府的部门日繁、规模日大，而运行效率则由于执政为利益集团的理念、执政中的人浮于事、阳奉阴违、损公肥私等因素日益下降，行政资源浪费严

重;更危险的是,百姓不满情绪的上升又找不到发泄出口,大量的行政资源就不得不用于维护社会稳定,行政支出的不断上升就变成了每一个王朝普遍存在的现象,而行政支出的不断上升只有依赖于赋税的不断增长,税赋徭役的日重一日,变成了压垮王朝的最后一根稻草。

(三)来自管理技术局限的解读

从管理技术局陷来为中国古代缺乏持续增长提供解释,历史学家黄仁宇可谓独辟蹊径。由于非正统历史学者的背景,黄仁宇的研究带有野狐禅的味道,但也正因为如此,也才可以别开生面地提出一些新鲜见解。他提出了一种大历史观(Macro - history),主张历史研究应该着大处着眼,从细微处着手,从长远的社会、经济结构观察历史的脉动,洞悉其背后深刻的自然环境、经济和文化因素,从中西的比较揭示中国历史的特殊问题,进而在整体上把握历史发展的趋势和走向。他的研究注重人物与时势的交互作用、理念与制度的差距、行政技术与经济组织的冲突,以及上层结构与下层结构的分合。

在对中国古代史的解读中,黄仁宇认为中国古代历史中事实上存在着通过发展工商业经济,带动中国率先走出农耕经济社会的一些潜在条件,如宋代的商业经济非常繁荣,明代的手工业工场也已有相当发展,而整个的农耕文明时代,中国在技术进步上长期领先世界,但这些因素都未能造就新的经济类型或者工商文明,中国社会总是处于盛衰交替的农耕经济模式。对此,他提出了一个关键性的概念——“数目字管理”,从管理(行政)技术的局限,提出了耐人寻味的观点。“数目字管理”是指整个社会资源均可如实计算,整合进一个记录系统,可以自由流动和交换。而这个“数目字管理”的理想状况是:“如果社会可以接受财产权绝对且至高无上,一切就可以加加减减,可以继承、转移及交付信托。因此,物质生活的所有层面,不论是私人或公共,就可以在数字上处理。财富的可交换性利于财富的累积,创造出动态的环境。”黄仁宇这个表述看上去很啰嗦。但却表达了制度经济学的核心观点:至高无上的排他性财产权的设计和由此基础而形成的财产权交易系统(实际上就是能够准确反映资源稀缺性的价格机制)是传统农耕社会向现代工商业社会转型的基本条

件,所谓“数目字管理”就是建立在上述基本条件上的技术手段。中国古代之所以没有办法向更高级的文明形态转型,就在于缺乏这样的财产权制度和基于产权制度的交易系统,由此无法实现“数目字管理”,也由此产生了技术手段和经济组织间的冲突,也造成了王安石、张居正等改革者的改革理想与现实的冲突。例如,工商业在中国古代并非没有发展的基础,特别大的国内市场、大量有国际竞争力的先进技术和丰富多样的产品,这些都是工商文明产生的重要条件。但是由于“数目字管理”技术的缺乏,比如经济组织内部的簿记系统、组织间往来的账户系统以及国家对工商业征税的凭证系统均不能有效建立,工商业发展无法为国家庞大的财政支出提供助力,国家财政只能来自农业。因此,执政者毫无意愿和动力去推动工商业经济的发展,“重农轻商”、“重本抑末”就成为每一个王朝根本的政策取向,在这种政策取向下,工商业发展失去了最重要的政策环境,从而古代中国只能长期处于治乱交替的农耕社会,数千年来,这一状况几无实质变化。

五、中国古代史与区域增长极限的分工理论解释

从经济角度看,是不可持续的区域增长局面造就了王朝盛极而衰的历史宿命。而区域增长的极限,则源于缺乏促进分工发展的技术条件、政治架构、政府治理和实施“数目字管理”的手段等因素。农业内部的技术进步和产能增加只能维持一个短时期的增长局面,在一段时间内,必然达于极值;分工不能发展,致使工业和商业部门不能从农业的附属地位中独立出来,成为支撑经济持续增长的新动力,最终形成了有极限的区域增长和治乱交替的古代历史。

CHAPTER 4

分工演进、报酬递增与区域成长

“在一个政治修明的社会里，造成普及最下层人民的那种普遍富裕情况的，是各行各业的产量由于分工而大增。”

——摘自亚当·斯密《国富论》

在区域经济的短期均衡分析中，需求边和供给边都存在极限值，区域增长是一种有极限的增长。那么，区域持续成长是否可能？区域经济的本质是动态的，没有一个静态的短期分析能够对区域经济过程作出合理的解释。在一个很长的时间尺度下，区域经济成长表现为分工与市场的相互推动，表现为微观经济主体不断繁衍和成熟，表现为产业结构、空间结构和制度结构的高级化过程，那么区域经济的短期均衡中起决定作用的物质资本和劳动力投入就不再是决定性的因素。本章通过对区域经济动态过程的分析，从分工演进、报酬递增与区域成长间的逻辑关系出发，论证区域经济成长的本质不是经济规模或就业水平的总量变动，而是分工演进导致的区域经济系统性整体变动。在区域经济层面，这种整体变动主要体现在市场和经济组织变迁、产业深化和经济空间秩序的重构等方面。

第一节　区域经济中的分工演进与长期动态过程

一、区域成长中分工与增长的故事：工业革命与英国制造业带

（一）风云际会之地：工业革命时期的英国制造业带

有时，我真宿命地认为亚当・斯密是上帝派到世间的引路人。这个终生与书籍、母亲和朋友为伴，思想敏锐、行动木讷而又道德高尚的遗腹子，在最恰当的地理空间、最合适的时代，以最完美的方式完成了历史赋予他的使命。作为他那个时代的幸运儿，斯密不仅可以站在配第、魁奈、休谟、洛克的肩上为芸芸众生指点迷津；他更生活在早期工业文明的中心地带，日益扩大的手工业工场和正在萌动的机器大工业火热的生产场面，启发了他对经济社会问题的深刻洞见。他见证了儿时生活的小镇柯卡尔迪日益繁荣的景象，对那个他时常路过的制针工场由于分工而发生的种种奇迹充满好奇；而他求学和工作过的地方——格拉斯哥，也正是开启机器大工业的伟大发明家瓦特（瓦特比斯密小 13 岁，与斯密有过交往）出生和工作过的地方，瓦特最重要的研发成果，就是在格拉斯哥大学作修理工兼助教时完成的。

在工业革命时期，名不见经传的格拉斯哥像一列高速行驶的列车，穿越了历史的迷雾，在悠扬的苏格兰风笛声中迎来了属于它的辉煌时代。它快速地成长成为人口上百万的工业重镇（如此的人口规模，在古代6000 年的文明史中只有长安和罗马达到过），成为当时英国第二大城市和学术重镇。而整个英国制造业带，从伦敦、伯明翰、考文垂、曼彻斯特、利兹、谢菲尔德、布拉德福德、利物浦到格拉斯哥，都深深地卷入工业化大潮。那些曾经美丽宁静的田园小城，一跃而成为著名的工业化都市。在这些地区，纺织业、造船业、采掘业、钢铁冶金业、机器制造业、运输业、金融业等产业如雨后春笋，迅速成长，撑起了日不落帝国的荣耀。

就是在这块神奇的土地上，斯密伟大的思想和瓦特伟大的发明风云际会，谱写了工业革命最动人的篇章。这既是历史的偶然，更是历史的必然。

（二）分工发展绘就的英国制造业带的奇迹

如果要为亚当·斯密的思想形成找到一个客观的现实基础，那么一定是工场手工业快速扩张和早期工业革命给斯密留下的深刻印象。从这些印象里，斯密找到了繁荣和发展的真谛——分工。从市场这个镜像观察工业革命时期的英国制造业带，非常明显的变化表现在三个方面。一是中间投入品（产业化的机器设备生产）的种类以链式反应的速度快速增加，反映出分工的深度（迂回生产的程度）得到极大的提高，最终产品的产能达到了惊人的地步。二是最终消费品（包括商品和服务）的种类增加，反映出分工广度得以拓宽。三是卷入分工网络中的劳动力规模空前扩大，也体现出分工广度大大拓宽。

英国制造业带的兴起首先得益于纺织业中的市场扩张，由市场扩张推动技术进步，进而促进了分工发展和新兴产业的诞生。早在工业革命之前，由于英国禁止进口棉布和棉织品，为棉纺业发展提供了机遇，加之英国本身形成的毛纺业传统和强大的国际贸易强势地位，纺织业这个农牧业的延伸产业获得了千载难逢的发展机遇，巨大的市场需求与有限的产出能力发生了尖锐的冲突，也刺激了对大规模生产的强烈需求，大规模生产的需求引发了相关机械的研发热潮。在纺纱领域，约翰·凯 1733 年发明了能提高纺织速度的“飞梭”，理查德德·阿克赖特 1769 年发明了能够快速抽出又细又结实的线的水力纺纱机，詹姆斯·哈格里夫斯于 1770 年发展了珍妮纺纱机，塞缪尔·克朗普顿 1779 年发明的走绽纺纱机，综合了水力纺纱机和珍妮纺纱机的优点；纺纱速度的大幅度提高，使得下游织布环节无法跟上步伐，埃德蒙·卡特赖特牧师于 1785 年取得了蒸汽动力织机的专利，逐步纠正了纺纱和织布的不平衡。高效率的新式棉纺机也激发了对新动力机械的需求，于是瓦特的“万能”蒸汽机应时而生，而这又催生了对煤和钢铁等采矿、冶金技术的需求。亚伯拉罕·达比、亨利·科特等在采掘、冶金领域的新发明以及蒸汽机在这些领域中的应用大大提高了煤炭和钢铁产量，到 1800 年，英国生产的煤、铁产量比世界其他地区的总和产量还要多。上述产业中技术进步和产能扩张又进一步带动了运输业的技术进步和效率提升，路面的硬化技术，铁轨铁路机

械、蒸汽船舶应运而生。而运输业的高效率则带动了商品贸易、旅游出行等贸易服务业以更快的速度发展。上述产业的发展都需要资本积累或资本集中作为条件，于是金融业摆脱了典当或小额借贷的小打小闹局面，发展甚至超过了实体经济的速度，金融业最为发达的伦敦成为整个制造业带的心脏。整个工业经济和相关的金融业、运输业发展积累起来的财富，不仅仅用于了扩大再生产，也产生了对多样化消费品的需求，刺激最终消费品种类的不断衍生。最后，一个引人注目的现象是，越来越多的劳动者和家庭，不再是独立自给的经济单元，他们被迫卷入这场革命，成为失去生产资料的雇佣劳动大军，而那些生活优雅的乡村士绅，也不得不放下架子，挤身于那些脑满肠肥的暴发户们中间，争夺工业革命这场盛宴中显眼的席位。

英国制造业带的变化不仅发生在技术领域和产业领域，分工引致的各种变化也不仅可以从市场中直接观察到，还可以在技术进步和经济组织的内部变化中感受到。工业革命时期的技术进步有“需求引起发明”的因素，有专利制度激励发明的因素，但在实践层面上，技术研发中的分工却是技术进步一个重要的促成因素。如“万能蒸汽机”的发明过程中，并不是瓦特一个人在战斗。根据杨小凯的考证，瓦特和巴尔顿的研发活动中，有六位企业家分担了研发资金筹集的职能。在具体的研发过程，瓦特和巴尔顿雇佣了大量相关人员，分别专注于发明的不同环节，并“依靠发明活动中的高度分工，他们终于在还没有机床的条件下，成功地制造出了商用的蒸汽机”[①]。而分工的发展，也促进了经济组织内部的深刻变化。组织内部的分工，在手工业工场就已经非常发达，如每织一尺布需要经过 14 道工序；每生产一枚胸针，需要经过 18 道工序。而在工业革命期间，组织内分工不仅发生在生产环节，其更深刻的意义在于不仅使得生产活动得以分解和细化，也产生了其他职能（如财务管理、经营管理）的分解和细化，形成了现代科层化的分工结构，产生了现代企业制度。经济组

---

① 杨小凯，张永生．新兴古典经济学和超边际分析[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0：138.

织内部科层化的分工结构和现代企业制度，实际上是庞巴维克、杨格所说的“迂回生产”在组织内部的实现，也体现了分工深度在组织内部的提升。组织内部的这些变化，把经济组织改造成为高效的投入产出转换器，提升了资源利用的规模、范围和利用效率。

二、区域经济的动态画面

区域经济过程是一幅动态的画面，画面上呈现的不是单一向度的变动，而是多个向度的共生互动。仅仅就经济层面言，从英国制造业带的兴起分析，我们至少可以观察到这幅画面中，在四个向度上发生的明显变化。

（一）产业深化和产业结构调整

在经济层面上，区域发展首先是一个产业深化的过程。正如我们对工业革命时期英国制造业带的分析，一个产业发生的扰动，如纺织业巨大的市场机遇这一需求扰动因素，不仅引发了纺织业本身的技术变革和产业扩张，也迅速波及其他相关产业领域（如动力机械领域、矿业、冶金、运输和金融领域），而这些被波及的相关产业又进一步带动了其他产业。这是一个分工带动旧产业发展、产生新产业的过程，既体现于分工广度（最终消费品种类的衍生及市场规模的扩大）的拓宽，又反映出分工深度（中间投入品种类的衍生和产业化）的提升。

（二）空间整合与空间结构演进

区域经济过程，也是一个经济活动适应变化的经济社会形势，在空间上不断优化，促成空间结构演进的过程。法国经济学家佛朗索瓦·佩鲁（F·Perroux，1950）[①]的“增长极”理论对此进行了高度的概括。在他的笔下，经济增长在一个国家（或区域）内是一个不平衡的、连续的动态过程。经济增长总是最先发生在那些区位条件相对优越因而投资回报率较高的地方。在市场规律的作用下，资金、技术和人才会大量向这些地区涌入，

① 弗朗索瓦·佩鲁．增长极概念，经济学译丛[J]，1988(9)．

形成一些具有规模效益的主导产业和一些具有创新能力的行业、企业。这些主导产业、行业、企业又通过其广泛的前向和后向联系使其周围聚集着越来越多的其他相关部门和各种服务性企业，从而形成经济的“增长极”。经济“增长极”的形成对区域经济将产生十分重要的影响，它犹如一个磁场对其他地区发挥着生产中心、商业中心、金融中心、信息中心和交通运输中心的吸引作用和辐射作用。从而带动周边地区的发展。当然“增长极”除了具有带动区域经济发展的辐射与扩散效应（亦有学者称为“涓滴效应”）外，其副作用也是明显的，由于要素收益的梯度性特征，在一国经济发展过程中，由于要素收益的地区差异，经济落后地区的资本、劳动力、专业技术人才、资源等被经济发达地区大量地吸走，从而形成极化效应（亦有学者称之为“回波效应”），给经济落后地区造成不良后果，使经济落后地区与发达地区差距越来越大。约翰·弗里德曼（J. Friedman，1966）[①]在《区域发展政策》中也描述了区域经济活动的空间过程，并把区域空间结构的演变划分为四个阶段，分析指出了每个阶段区域空间结构的形成原因及其基本特征。在前工业化社会之前，经济处于低水平的均衡状态，区域内部各地区之间相对封闭，彼此很少发生联系，这一阶段区域空间结构表现为均质无序。当经济进入过渡阶段（工业化过程的初始阶段），开始形成区域性经济中心（增长极），增长极的形成打破了区域空间结构的低水平均衡状态，经济活动向这个中心集聚，从而形成单个相对强大的经济中心与落后的外围地区。在工业化阶段，由于经济活动的空间范围随着区域经济总体水平与实力的迅速提高和增强而不断扩展，会在区域内其他地方产生一些新的经济中心。此时，区域空间结构就会出现若干个规模不等的“中心—外围”结构，这些中心—外围结构，以各自的经济中心在区域经济中心体系中的位置及经济和社会联系相互结合在一起，便构成了区域的空间结构。当经济进一步发展，进入后工业阶段，区域经济发展已达到较高水平，不同层次和规模的经济中心与其外围地区的联系也越来越密切，它们之间的经济发展水平差异不断

① John Friedman, 1966. Reional Development Policy: A case Study of Venezuela, The MIT Press.

缩小。在区域内逐步形成了功能一体化的空间结构体系,最终走向空间一体化。

另外,冈纳尔·缪尔达尔和阿尔伯特·赫希曼对不同区域空间在演进过程中呈现的不同发展趋势作出了分析。缪尔达尔的累积因果循环理论指出市场力的作用倾向于扩大而不是缩小地区间的差别,一个地区的发展速度一旦超过了平均发展速度,它的效率工资就会趋于下降。这样,与那些发展缓慢的地区相比,它就可以获得累积的竞争优势,从而导致发展快的地区发展越快,发展慢的地区越慢。赫希曼的核心边缘区理论则认为:在区域中,核心部分的发展固然会凭借扩散效应的作用,在某种程度上带动边缘区的发展,起着一种有利于缩小地区差别的作用,但与此同时,劳动力与资本却会从边缘区流入核心区,以提高收益,从而加强了极化效应,进一步促进核心区的发展,又起到扩大地区差别的作用;要缩小地区差别,唯一可行的办法是加强国家的干预。

陆大道(1988)在《区位论及区域研究》[①]中也提出了与弗里德曼相类似的空间演化规律,同样把区域空间结构演变分为四个阶段。第一阶段是区域的总体生产力水平低下、社会生产和生活封闭性明显、居民点散布、城乡交流少、道路网络不健全,区域空间结构总体上处于低水平的“平衡状态”,社会经济结构中以农业占绝对优势的阶段。第二阶段是手工业和采矿业日趋繁荣,初级原材料工业和制造业逐步兴起,健全的立体交通体系开始出现,区域商品生产与交换规模扩大,农村人口大量地流入城市,区域经济增长主要发生在城市,并导致区域内部的空间不平衡,远离城市的边缘地区仍然处于极不发达状态的过渡阶段。第三阶段是工业化和经济起飞阶段。在这一阶段,社会生产力得到进一步的解放,区域经济进入强烈动态增长期,以钢铁、机械、化工、动力、纺织等为主的第二产业及第三产业均迅速发展,交通运输网络深入区域的各个部分。区域中原有的城市逐渐发展成为大城市,空间结构从上一阶段的单一“中心—边缘”结构逐步演变为多核心的结构。城乡之间、城市之间的交流日趋

① 陆大道. 区位论与区域研究方法[M]. 北京:科学出版社,1988.

活跃，在这个过程中城市的等级体系开始形成，边缘落后地区也因此而得到一定程度的开发。第四个阶段是技术工业和高消费阶段。在这个时期，各地区之间的不平衡以及就业、收入、消费水平和选择机会等方面的差异逐步消失。区域内的空间和资源得到更充分合理的利用。城镇居民点、服务设施及其影响范围都已形成了各自的等级体系。区域空间中的各组成部分完全融合为一个有机的整体，空间结构在较高的水平上重新达到“平衡”状态。

（三）经济组织形式和运行机制的变动

区域经济发展在经济组织形式和运行机制方面，也会得到体现。此处，从两个层面分析经济活动的组织（在动词意义上使用该词）和经济运行。一是社会层面的经济组织和经济运行；二是具体组织（在名词意义上使用该词，如企业等）内部的经济活动组织及其运行。

在其社会层面上，经济活动的组织关注的是这个社会如何把经济主体（以及相关的其他组织，如政府和一些社会化服务部门）整合为一个相互配合、相互竞争、相互依赖的有机整体，实际上这是一个经济运行的机制问题。就此而言，社会层面的经济组织形式无非两种：命令式的计划经济和以价格信号来指挥的市场经济，纯粹的市场经济和纯粹的计划经济，都只是一种假想状态，现实经济的组织更多的是二者不同程度的组合。社会层面的经济组织和运行，日益复杂的区域分工局面和日益复杂的市场局面，使得命令、计划式的经济组织和运行机制逐步淡化，而以价格信号来组织和运行的局面逐步占据主导地位。

在一个具体的组织内部，如一个企业的内部，经济活动也需要有效组织，即使最简单如家庭这样的组织，也需要事权和责权的有效分解和组合。而规模越大、分工越细的组织内部，组织成本也越高，合理的经济组织形式就需要在组织成本和分工带来的效率增进之间找到一个平衡点。区域发展的过程中，经济组织内部的变化往往不易察觉，但作为区域经济微观主体，它对区域环境和外部环境的响应相当灵敏，这种响应必然反映在经济组织的规模和分工状况上，而规模与分工状况的变化又逐步地会产生对组织变革的要求，现代企业制度的产生，扁平化和网络化的企业组

织模式都是其表现。

（四）制度的变革与演进

从历史考察，进入近现代社会，制度的演进尽管也有波折与反复，区域发展中制度演进的方向和趋势却是清晰、明确的。笔者看来，这一趋势就是强化市场型的制度安排正逐步取代那些弱化市场或反市场的制度安排。主要表现在：其一，以集权、专制和命令维持的政治体制正让位于民主政体，政治权利的分散化和平等化不仅有利于培育平等的市场主体和平等的市场环境，更有利于个人财产权等更基础性的市场制度设计得到切实有效的保护。其二，契约精神和法律意识在各种制度设计中得到体现和强化。市场经济是契约经济，也是法制经济。契约的履行可以是自我履行的，但任何契约也需要一个终极的仲裁者，即需要第三方执行，政府是以拥有合法暴力为后盾的终极第三方。现有的各种制度，一方面确保了政府的终极第三方的权威，另一方面又严格地约束着政府，以此确保政府的公正、公平和公开，使政府成为服务于市场的强化市场型政府。其三，近现代社会，制度变革始终朝着消除各种各样的特权、维护个体平等的方向努力。中世纪后，欧洲封建特权和教会特权被荡涤殆尽，政府权力受到制度的严格约束，而市场中那些逐步成长起来的特权力量，特别像资本特权、垄断特权等，虽然始终没有得以根除，但作为一种平衡力量，制度在约束这些力量方面仍然起到了重要的作用。故此，可以肯定地指出：近现代社会的制度变革，体现着强化市场的特征，也说明近现代社会，维护市场的有效性始终是制度演变的基本逻辑。

第二节　分工演进与报酬递增：文献综述与理论综合

是什么因素导致区域经济中在上述四个向度上发生着整体性的变动？微观经济主体的繁衍和成熟、产业深化和产业结构升级、空间整合与空间结构演进、制度的变革和演化等区域经济成长中的动态过程，其内在的逻辑是什么？本书是从分工演进与报酬递增的相关理论中寻求答案的。

一、斯密经济思想的逻辑

分工思想是亚当·斯密《国富论》中最应受珍视的部分。《国富论》不仅以分工开篇，而且以分工贯穿始终，成为全书的逻辑线索。全书共五篇，一、二篇为理论分析，第三篇则从经济史来印证理论观点，第四篇为文献综述，第五篇为理论的政策运用。全书做到了逻辑与历史的统一、理论与现实的统一，其核心当然是前两篇。在这两篇中，分工思想构成了理论的逻辑起点、逻辑线索和逻辑终点，其第一篇的分析框架可以概括如下：国民财富的增长取决于劳动人口的增加和劳动生产力的提高——分工则是实现劳动生产力提高的核心手段——分工必然与交换相伴随——而货币是因交换的需要而产生——以货币为媒介的交换必须确定价格——由此进入价值决定理论和市场机制的讨论——最后形成收入分配理论。沿着上述分析逻辑，在第二篇里，斯密着眼于促进发展的途径分析，指出要促进经济繁荣，必须要扩大分工的规模、使分工不断细化，并使劳动人口不断增加，而这一切有赖于资本积累和资本集中。不过，当时的斯密更看重以资本积累为条件的扩大再生产，对以金融市场繁荣和股份制企业制度为条件促成的资本集中不够看好。无疑，斯密对经济发展的乐观看法，主要来自因分工持续演进而产生的报酬递增过程对经济可持续发展的支撑力量。

二、报酬递增理论的进一步发展

斯密之后，对报酬递增性质和来源的认识，主要集中在分工理论、马歇尔和传统经济地理学的关联效应和外部经济理论、“迪克西特—斯蒂格利茨”（简称“D－S”）垄断竞争模型以及艾瑟尔外部规模经济理论中。以下分析试图把上述理论和模型统一在以分工理论为主线的框架中。

到目前为止，对报酬递增最具解释力的仍然是分工理论。从斯密以来，分工理论经由马克思、杨格和杨小凯等人的大力推动，取得了丰硕成果。其中，杨小凯等人提出的以分工内生演进为内核构建的新兴古典经济学理论，为经济学发展提供了一个重要分析框架，深化了斯密、马克思、

杨格等人对分工的认识。用分工理论的核心观点去理解经济活动空间演进过程和区域经济增长的机制对研究者来说诱惑难于抗拒。斯密不仅讨论了由分工发展导致劳动生产力提高，形成企业内部规模经济，从而产生报酬递增的机制；而且也尝试从分工与市场的相互作用来理解报酬递增的累积循环过程，提出了"斯密定理"，认为"劳动分工受市场范围限制"。杨格则在其经典论文《报酬递增与经济进步》(1928)中借用了迂回生产这个概念，把分工理论向前推进了一步，论证了市场规模与迂回生产、产业间分工相互作用、自我演进的机制，提出了关于分工与市场关系的"杨格定理"。杨格指出："根据这种广义的市场概念，斯密定理可以改写为分工一般地取决于分工，……这绝不是同义反复，……这意味着不断战胜走向经济的均衡的力量的反作用力在现代经济体制的结构中，比我们通常理解的更广泛和更根深蒂固。"[①]在这里，杨格通过对分工与市场相互作用机制的分析，为我们描绘了经济体因分工发展而导致经济自发演进的动态画面和自组织特征。

新兴古典经济学文献则通过分工网络效应更加形象地解释了分工发展导致报酬递增的机制和市场与分工相互作用导致经济体自组织的循环累积过程。杨小凯用电话网络的隐喻形象地描述了分工网络效应：当网络中只存在一台电话机时，其使用价值为零，随着网络中电话机的不断增多，整个网络的使用价值不是简单地线性叠加，而是以正反馈形式非线性放大；而网络中电话机数量的增多也使得每一台电话的使用者获得的益处增加。同样，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一个以分工和专业化生产来组织的经济体，其效率优势取决于分工的规模(可以用市场的厚度和广度来衡量)；而每一个经济体中的成员获得的收益水平也会随着分工规模的增加而递增，这形象地说明了分工演进中的报酬递增现象和累积过程。

杨小凯对分工网络效应的描述还只是一个粗线条的勾勒，艾瑟尔模型则用主流经济学均衡分析方法对分工扩大导致报酬递增的机制作了进一步的说明。在模型中艾瑟尔区分了由企业内部扩张而产生的内部规模经

① 阿林·杨格：报酬递增与经济进步[J]，经济社会体制比较，1996(2)：54.

济及由分工扩大而产生的外部规模经济，用数学逻辑证明了“单个部件数量不变而部件种类增加时，将导致最终生产部门产出的扩张，显示出规模收益递增。……这种外部规模经济取决于最终产品市场规模而不是所有制造业产出都集中在某一区位。当内部规模收益和外部规模收益相互作用时，破坏均衡的是生产单位数量的变化而不是生产规模的变化”①。

阿尔弗雷德·马歇尔和传统经济地理学从关联效应及由此产生的外部经济问题来讨论报酬递增，马歇尔在其《经济学原理中》中列示了由微观主体间相互关联而产生的三种“当地外部经济”②，其一是相关产业的空间集中会形成一个专业技术工人共享的劳动市场，这个共享市场对工人和厂商都有利；其二是一个产业中心可以提供该产业专用的多种类、低成本的非贸易投入品，即“一个巨大的本地市场能够支持达到有效规模的中间投入品供应商的发展”③，而这些专业化的供应商又使相关产业更有效率；其三是技术外溢。正是上述当地外部经济的存在，使得相关产业的地理集中会产生报酬递增。

另外，将“D－S”垄断竞争模型应用于报酬递增的研究，可以从主流经济学的视角得到很有价值的结论④。在“D－S”分析框架下可以推导出报酬递增的两个来源：其一是最终产品生产企业报酬递增来源于消费者的需求多样化偏好，进一步推论可以得出“随着人均收入水平的提高，多样性需求欲望上升，企业的规模报酬递增程度也相应提高”⑤；其二，中间投入品生产企业报酬递增源于最终产品生产者对中间投入品的多样性需求，进一步推论可以得出“如果最终产品生产具有报酬递增特征，那么规模报酬递增程度与中间投入品之间的替代弹性有关，替代弹性越小，报酬

① 安虎森．空间经济学[M]，北京：经济科学出版社，2005：48－49.

② 该概念意指相关经济活动集中在某一区域而产生的外部经济。参见：保罗·克鲁格曼．发展、地理学与经济理论[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2：52－53.

③ 保罗·克鲁格曼：发展、地理学与经济理论[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中国人民大学出版，2002：53.

④ 限于篇幅，本文只引述该模型的有关结论，具体模型请见：安虎森．空间经济学[M]，北京：经济科学出版社，2005：35－72

⑤ 安虎森．空间经济学[M]，北京：经济科学出版社，2005：69.

递增程度越大”①。

三、相关理论的一个尝试性综合

仔细推敲上述对报酬递增性质和来源的解释,可以发现,它们具有内在一致性。其中,分工理论对报酬递增的解释更具一般性,其他对报酬递增的认识在某种程度上是对分工理论的补充和完善。马歇尔和传统经济地理学所涉及的关联效应和外部经济实质是分工演进中出现的分工现象,马歇尔和传统经济地理学找到了报酬递增最直观的原因,但他们把这种当地外部经济理解为相关产业集中的结果,看到的是报酬递增的表象,而没有看到背后起决定作用的是分工网络效应;“D－S”框架下消费多样性需求和最终产品生产商对中间投入品的多样性需求则是分工演进条件下,迂回生产方式导致的必然结果,因此笔者认为消费多样性需求和中间投入品的多样性需求尽管可以解释报酬递增现象,但它们毕竟只是分工发展的结果,而不是报酬递增的最终源泉。因此,分工演进与报酬递增的关系可以理解为:就整个经济体而言,分工演进导致分工网络的扩大,而分工网络的扩大表现为中间投入品和最终产品的多样化,这种多样化生产格局使得微观主体间的经济关联日益紧密和复杂,经济活动的外部性(金融外部性和技术外部性)得以增强,整个经济体乃至微观主体都因为外部规模经济的强化而呈现收益递增,这又进一步刺激了分工网络的扩大,由此经济体进入一个自我强化的循环累积过程。

第三节　分工、报酬递增与区域成长的简化分析模型

本节将在斯密和马克思的分工思想以及杨格、杨小凯、马歇尔、“D－S”垄断竞争模型和艾瑟尔等人分析的基础上,从区域可持续发展的角度提出一个区域经济长期分析的理论模型。

① 安虎森·空间经济学[M],北京:经济科学出版社,2005:72.

一、模型构建的几个前提假设

其一，根据第三章的分析，社会分工水平取决于分工的深度和分工的广度。分工广度主要由市场规模（人口规模或交易规模）以及最终消费品的种类决定。分工的深度取决于从原料投入到产品产出过程中中间投入品（包括中间服务）的种类多寡。

其二，组织内部分工水平则取决于技术条件决定的中间环节的分解和细化程度，也反映于组织内部员工的职能分化和部门独立化的程度（可以理解为企业内部的迂回生产程度）。组织内部分工与社会分工间有一定的替代关系，当组织内部的组织成本（组织协调各部门和环节的成本）高于组织间的交易成本时，组织内部的一些职能就可能转化为社会化职能，由其他组织承担，从而加深了社会分工的深度[①]。

其三，分工演进主要取决于两个条件：市场条件和技术条件。分工的发展，如一种新的产品和服务的诞生，或者一种新的中间投入品或中间服务的产生，都需要一定的市场规模为其支撑，即分工的经济性与市场为其提供的需求门槛高度相关，市场规模是分工发展的必要而非充分条件；技术进步则为分工提供了技术可能性，正如马克思分析的那样，工场手工业还是“一个以人为器官的生产机构”，劳动工具的分化和生产过程的分解程度不高，而机器大工业则是“以机器为器官的生产机构”[②]，工场手工业中的内部分工不能进一步提升的原因在于“这种狭隘的技术基础（指手工业）使生产过程得不到真正科学的分解……”[③]，工场手工业尽管创造了比手工作坊更高的效率，但因为技术的限制，它的优势并没有像机器大工业那样充分体现。因此不论社会分工还是经济组织内部的分工都必须建立在一定技术条件的基础之上，技术的进步使得分工的细化、生产环节

① 关于组织内分工与社会分工二者的性质及之间的替代关系，很多学者是从市场与企业的性质和关系来理解的，而不是从两种不同的分工组织形式来理解的，相关讨论可参见科斯和威廉姆森等新制度经济学家对企业性、市场与企业的关系以及资本主义制度的有关文献。

② 马克思．资本论（第一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5：423.

③ 马克思．资本论（节选本）[M]．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3：101.

的分解和部门的独立化成为可能,技术水平决定了分工发展可能达到的水平。

其四,假定最终消费品(含服务)种类无限可分,连续变动;假定中间投入品(含中间服务)的种类也是无限可分,连续变动。这一假定并不符合经济现实,但为了在边际意义上进行数理分析,姑且作这样的假设。

二、模型的一个简单推导

(一)分析的逻辑框图

本节分析的逻辑思路如下:技术和市场的扰动导致区域分工演进,促进社会分工的广度、深度以及组织内分工水平提升。社会分工广度的提升意味着最终消费品种类的增加,从满足需求的角度看,提高了整个区域的总效用水平,是区域成长的重要方面;社会分工的深度和组织内分工水平的提升,则对区域的供给边有决定性的影响,增加了区域的供给能力和供给效率。由此,即使在要素投入不改变的情况下,也由于报酬递增的因素而实现了增长,进而可以建立一个区域可持续增长的正反馈机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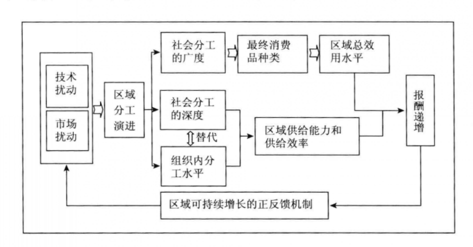


图 4－1　区域可持续增长的逻辑框图

(二)简要的数学推理

要素投入不变情况下,令 i 为最终消费品(服务)种类,令 j 为中间投

入品（中间服务）种类，t 为时间变量，在分工演进条件下，$\frac{\partial i}{\partial t}>0$；$\frac{\partial j}{\partial t}>0$。

其一，分工演进条件下区域经济的需求边。在第三章中业已证明，从需求边看，在人口规模给定的条件下，社会总需求（此处是指不考虑购买力约束情况下，满足效用最大化的需要量）取决于最终消费品的种类。即：对最终消费品需求的增长将取决于分工的广度，人口规模给定时，就决定于最终消费品种类[①]。得到：$Q_D=f(i)$，且$\frac{\partial Q_D}{\partial i}>0$，由于$\frac{\partial i}{\partial t}>0$，故有$\frac{\partial Q_D}{\partial t}>0$。即，总需求[②]将随着时间的流逝而不断增长。

其二，分工演进条件下区域经济的供给边。借用庞巴维克与杨格关于迂回生产的相关结论，得到：$\frac{\partial Q_s}{\partial j}>0$　$\frac{\partial j}{\partial t}>0$　$\frac{\partial Q_s}{\partial t}>0$。即，区域总供给水平将随着时间的流逝而不断增长。

其三，组织内分工水平的提升，可看作迂回生产程度的加深，是分工深度提升的表现之一。因为，在一定条件下，组织内的一个环节或一个职能，可以独立出来，成为社会化的中间产品或服务。如会计服务可以外包给专业化的会计师事务所，一些营销工作可以外包给专业化的营销组织，零部件等中间投入的生产可以外包给相关的专业化组织，另外，诸如运输、包装等也都可以外包给社会化的专业组织完成。因此，组织内分工水平的提升，其意义与上一段“其二”的结论类似，它提高了区域供给能力和供给效率。

同样的结论也可以从主流经济学“D－S”模型的分析框架得出，该模型对报酬递增的两个来源的分析，也说明报酬递增经济现象的产生源于分工广度的拓宽和分工深度的提升（相关分析见本章上一节的讨论）。

进一步的结论无非是：在资源要素的约束条件下，区域经济的可持续增长主要源于市场扰动和技术扰动诱致的分工广度的拓宽和分工深度的提升。

---

① 相关分析见本书第三章第三节。

② 此处的总需求是没有考虑购买力约束条件下，实现效用最大化的消费品（服务）需要量。

三、来自历史的检验：英国制造业带故事的解构

（一）问题的提出：工业革命何以诞生在英国制造业带而不是其他区域？

斯塔夫里阿诺斯在他的名著《全球通史》中曾经提到：从技术上看，英国人并不是最早使用蒸汽动力的民族，蒸汽动力的应用也并不始于工业文明。早在古埃及时期，聪明的古埃及人就学会了用蒸汽动力去开启那一扇扇厚重的神殿大门了。阿拉伯人也曾在数学、天文、医学和航海技术上领先于世界。而最让后人迷惑的则是中国这样一个大国，有如此广阔的市场，有如此先进的技术，工业革命的幸运之神却对它毫不眷顾。就此，李约瑟在他的《中国科学技术史》中提出了著名的"李约瑟之谜"[①]，其实对这个问题既可以正面回答，也可以避实就虚，从工业革命或近代最显著的科技进步为什么发生在其他地区（如英国制造业带）来回答，这个投机取巧的工作正是下文的任务。

（二）英国制造业带的奇迹：分工演进视角的解构

何以工业革命发生在英国？何以英国制造业带会神奇地兴起？原因特别多，这在中学历史教课书里都有详细的分析。但归根结底，众多的因素都可归结到一点：它们为分工的发展创造了条件。政治制度和产权制度的变革为市场经济的不断完善和成熟奠定了基础，为分工发展创造了适宜的机制和组织形式[②]；诸如纺织业等产业需求的大幅增长以及国际贸易的扩张，则为分工发展创造了市场条件；技术的长足进步，不仅是分工深化的条件，也是分工发展的结果。

其一，"光荣革命"和它的经济后果。1688 年，是世界历史的标志性年份。在这一年，不流血的英国"光荣革命"为世界人民建立了第一个现

---

① "李约瑟之谜"又称"李约瑟难题"，它由两个相反相成的问题组成，即"为什么在公元前 1 世纪到 15 世纪期间，在应用人类的自然知识与人类的实际需要方面，中国文明远比西方有成效得多？""为什么近代科学只在欧洲，特别是文艺复兴后的欧洲，而没有在中国文明（或印度文明）中产生？"对此难题的解答可谓汗牛充栋，莫衷一是。

② 在更本质的意义上，市场是组织社会分工的一种具体形式，而企业是组织内部分工的一种具体形式。以市场这种组织形式组织的社会分工，在完善的市场机制下具有最完美的灵活性和自我调节特征。

代政体。对于当时的英国普罗大众而言，他们可能只是为当时紧张的局势得到解决而松了口气，根本不会去畅想这一政体对未来世界的长远影响。自此以后，封建特权和封建等级秩序开始瓦解，神权也开始逐步退出世俗生活，更多地活动于人们的精神领域。曾经被这些旧的特权和旧秩序扭曲的市场开始建立一种更加平等的市场关系，那些贵族绅士和教皇教主神父们，不得不放下他们的架子，和市井百姓，共同组成一个叫"公民"的社会；在平等的市场关系下，形成了更加有效的价格形成机制和利益激励机制，为市场的发展提供了有力的保障；而个人则从世俗专制及神权统治中浮出水面，民众的公民意识开始觉醒，个人对自己个体现实幸福的关注超过以往任何时候，市场日益增多的获利机会也大大提升了个体投身于经济活动的动力。

其二，产权制度变革和它的经济后果。对个人财产神圣性的认识早在古罗马时期就已经确立，在古罗马法中，个人的财产权就作为一种天赋的自然权利而被确认，但是这种财产观到了中世纪就被神权和专制压抑在百姓狭小的精神角落里，不得展露。宗教改革和文艺复兴时期，财产权才又被人们重新拾起，并成为一个公众话题。这一话题不仅在学理上得到重申，而且在实践中得到践行。在学理上，英国学者约翰·洛克（John Locke，1632—1704）在他的政治哲学著作《政府论》两篇中对私有财产最坚定有力的维护和对政府行为的严格规范，成为现代国家政治构架的基本要素。洛克对私有财产神圣性的论述主要有两个方面：一是通过古罗马自然法的思想和重农学派自然秩序的理论论证私有财产是符合自然秩序的，先于政府而存在的天赋权利。洛克的财产不仅指不动产，更指人身自由和人身安全，由此洛克指出政府必须以维护人的自由、安全和实物财富为首要目标。在他看来，没有私有财产的社会没有公正可言。二是通过劳动与财产的紧密关系论证私有财产的神圣性。如果说古罗马法所谓的天赋权利和重农学派对私有财产符合自然秩序的理论更像是一套带有浓厚神学色彩的玄学体系，那么洛克必须为他的辩护寻找更为有力的逻辑证明。为此，洛克论证道，私有财产之所以神圣，是因为人们通过劳动使自然之物变为对自身有效用的物品，由于劳动附着于自然物之上，使自

然之物成为私人财产，因此劳动赋予了财产的神圣不可侵犯性。在实践中，英国人也走在前面，1763 年老皮特在议会上一次精彩演讲中的话被人们浓缩成“风能进，雨能进，国王不能进”，这种对财产权的敬畏之情不是政治家的煽情，而是财产权观念已经溶入英国人的血液中；不仅如此，英国也是第一个对知识产权立法的国家，1623 年的《垄断权条例》、1709 年的《安娜女王法令》，为英国奠定了技术进步的制度环境。

其三，需求扰动与技术扰动的共振。斯塔夫里阿诺斯特别强调需求扰动因素在工业革命中的重要作用，他认为：“棉纺织业的发展清晰地展现了‘需求引起发明’的模式。一个领域的发明产生了不平衡，往往就会刺激其他领域的发明来纠正这种不平衡。”[①]在这里他看到的是因需求扰动（棉纺业巨大的市场机遇）而带动技术进步，又迅速波及其他领域，引发在更广阔领域内的技术和市场的共振。二者的共振最终汇成了工业革命的洪流。

上述这些变化，都不是直接的经济增长，也都不是直接的分工发展，但没有这些变化就没有分工广度的拓宽和分工深度的提升，也就不会有英国制造业带的奇迹。

（三）上述解释的一个遗憾

如果仅从需求扰动与技术扰动的共振看，宋代至明清的中国江南地区和沿海地区也有完成工业革命、实现社会经济转型的条件，但这终于没有成为现实。原因何在？这可能不仅仅与政治环境、产权制度等因素相关，还与中国人的文化心理结构和社会网络特征紧密相关。从政治、文化和社会的角度去认识区域成长，分析区域差异的成因，也理所应当成为区域研究的重要内容。对这个话题的讨论将在第六章完成。

---

① 斯塔夫里阿诺斯. 全球通史（第 7 版）[M]. 彭书慧，等，译. 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351.

CHAPTER 5

开放条件下的区域成长

世界是平的。

——摘自托马斯·弗里曼同名著作

第三章和第四章的分析中,区域被看作一个个老死不相往来的孤岛,现实却正好相反。全球化和区域一体化浪潮下,区域间分工与协作的规模和紧密程度超过以往任何时期,区域间竞争的范围和强度也超过以往任何时期。区域独善其身的时代已经成为过去,世界经济正通过日益发达的全球分工网络紧密联系在一起。区域成为这张巨大分工网络上的节点,区域经济越来越依赖于它在全球分工网络中所处的位置,区域成长也越来越取决于它是否能从这个网络中控制、整合和提取更多的资源。本章是内容最庞杂、最难于处理的一章,它既是第三章和第四章所讨论话题在开放条件下的进一步展开,也是对区域经济问题的一个总结,还是更接近于现实,需要由现实来支撑,并用它去解释现实的一章。因此,本章在描述现实区域经济的开放性特征及其当代表现(全球化与区域一体化)的基础上,提出了一个开放条件下区域经济的简化分析框架,从开放条件下的需求边和供给边变动来整体性地解释区域经济运行,描述了开放环境对区域经济系统变动的放大作用,分析了区域关系中重要的方面,如区域分工、区际贸易、区域一体化、区域竞争等因素对区域成长的影响,考察了开放世界中最重要的成果,即作为地方专门化标志的产业集群问题和作为区域一体化标志的城市群问题,探讨了区域差异性极大的大国经济

如何进行区域关系的有效治理，进而不断优化大国内部的区域竞争合作秩序。

第一节　全球化与一体化浪潮中的区域

一、全球化：区域成长中绕不开的话题

（一）全球化及其历史

全球化，在现实世界里，被更多地赋予了经济意义，而忽略了它更加广阔深远的影响。比如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的定义指出："经济全球化是指跨国商品与服务贸易及资本流动规模和形式的增加，以及技术的广泛迅速传播使世界各国经济的相互依赖性增强。"事实上，全球化并不单纯是一个经济过程，它的触角已经伸向经济社会各个领域，渗透到了人类生产生活的方方面面。全球这个巨大的舞台上，上演的不仅仅是经济领域的纵横捭阖，它也把宗教、文化、政治的大戏一一上演。

全球化的涓涓细流，已经在这个蓝色星球上流淌了数千年[①]，但它汇成荡涤世界的洪流却不过四五百年的历史。按照《世界是平的》一书作者托马斯·弗里曼的观点，全球化的过程，就像 windows 操作系统的升级过程，经历了一系列的版本升级，而每一个版本又有着不一样的故事。

全球化 1.0 版。这个版本的故事发生在 15 世纪末，具体的年代可以是 1493 年到 1800 年。1493 年是哥伦布发现新大陆的一年，在这一年人类才开始把地球连成一个更加完整的整体（当然地球的形状和大小只是到了麦哲伦环球航行后才得以揭晓），世界地图上那些空荡荡的地方才开始逐步被填上实质性的内容。其实早在新大陆被发现之前，欧洲人为了绕过阿拉伯世界控制的欧亚非大陆上的商道，就开始了从海上开辟商贸航道的努力。1488 年，葡萄牙航海家迪亚士发现了非洲最南端的好望

① 之所以这样说，是因为全球范围内人类的交往和国家区域间的相互影响已经有非常久远的历史，并不是从哥伦布发现新大陆才开始。

角;1498 年,同样来自葡萄牙的达伽马沿着非洲海岸,绕过好望角向东航行,在印度西海岸登陆,第一次打通了欧洲和亚洲的海上贸易通道。新大陆和海上通道的巨大发现,正式开启了“全球化”的大幕。到 1800 年,欧洲人在 1.0 版本的全球化中是绝对的男一号,先是葡萄牙人、西班牙人成为海上贸易的霸主和殖民大户,荷兰人、英国人、法国人则后来居上,把大片大片的土地变成殖民地。这一版本的全球化充斥着暴力和血腥,海上贸易和海外殖民地的快速扩张是它的主要特点。此时的海上贸易还是一项利润极高但风险极大的事业,单个的小船队、小公司没有办法在海上长期生存,也没有办法面对美洲大陆的土著打击,更无力应付来自印度和中国的军事对抗。所以,大规模的海上贸易和海外殖民都必须有坚强的军事力量作为后盾,葡萄牙、西班牙以及后来英国强大的海军力量,成为推动这些事业的基础,而那些庞大的股份制海上贸易和殖民公司,如荷兰、英国的东印度公司,都有王室、贵族的大量股份,甚至那些专门从事海盗工作的匪徒也得到英国女王的资助。由此,我们可以说,1.0 版本的全球化是在国家层面上发生的,是以国家力量推动的。在这一过程中,世界从一个庞大的尺寸,变成了中等尺寸。

全球化 2.0 版本。2.0 版本的全球化,在时间上大致从 1820 年或 1825 年开始,一直持续到 2000 年。这一版本的全球化,主角不再是那些叱咤风云的海上强国,而是那些追逐着利润膻腥味的跨国公司(国际资本),全球化的内容则主要是生产要素在全球范围内的流动和整合,是国际资本在它适宜的地域空间上疯狂生长,是大规模的商品贸易、服务贸易和技术贸易在各国(区域)间快速地扩张。这个由跨国公司推动的全球化,把世界从中等大小压缩为小尺寸。

全球化 3.0 版本。托马斯·弗里曼乐观地认为,人类已经进入全球化 3.0 时代,这个新版本开始于 2000 年。在弗里曼看来,当前世界的竞技场已经被夷平,柏林墙的倒塌和苏联的解体意味着阻隔世界的政治体制和意识形态重新归于一统,windows 系统和互联网等新技术的出现则把个人推到前台,竞争在个人层面上展开,因此这一阶段全球化的主要元素是个人。弗里曼的看法可能过于乐观了,政治和意识形态作为全球化

的阻碍力量固然已经越来越弱，但国家与国家、区域与区域、企业与企业、个人与个人的竞争却更加激烈了，这个被“推平”的世界其实并不平坦，风险时时都在爆发，而主导这一过程的绝对不是个人，个人的分量在这一时期的全球化中得到了强化，但跨国公司和他们的政治代言人仍然是全球化的主要推手。仅仅在信息技术领域，主宰世界的无非就是苹果、IBM、微软、Intel 这样一些跨国巨头而已。

（二）全球化的表现与实质

经济领域的全球化，主要表现在几个方面。其一，快速成长的全球贸易。半个多世纪以来全球商品贸易、服务贸易和技术贸易均快速成长。1960 年，全球出口占全球 GDP 的 5.8%，1993 年占 15.8%，而 2011 年以出口为基准的全球贸易额则高达 18 万亿美元，占全球 GDP 的 30%。其二，FDI（外商直接投资）急剧扩张。2011 年全球 FDI 值达到 1.5 万亿美元，同期由《财富》杂志统计出的世界 500 强总收入达 29.5 万亿美元，约占全球 GDP 的 50%，其总利润也高达 1.6 万亿美元。其三，金融的国际化发展迅速，对全球经济产生深远影响，在促进资本优化配置的同时，加大了虚拟经济和实体经济的运行风险。伴随着国际贸易和国际投资的高速发展，金融的国际化得以迅速发展。2005 年全球金融资本总额达到 140 万亿美元。2010 年，全球第三季度银行跨境借贷余额达到 31 万亿美元，全年国际债券净发行额 14880 亿美元，外汇市场日均交易量约为 4 万亿美元。其四，跨国企业的全球地位得到进一步强化。跨国企业通过贸易、直接投资和金融等管道，迅速遍及全球，对世界经济的掌控能力不断提升，作为全球化的主要推手，其主导力量也得不断地强化。

我们可以把全球化描绘得有声有色，面面俱到，但要对全球化的实质下个结论，却不可能。站在不同的立场上，全球化的实质就会被肢解得支离破碎。目前，对全球化实质的解读至少有五种。解读之一：经济全球化的实质是在全球范围内实现资源的有效配置。全球化“实质乃是劳动分工在国际层面的重组、扩展和细化的过程”。在这一解读中，全球化是一个褒义词，它仅仅是在经济技术的层面上发挥着正能量，起到了优化资源配置的作用。解读之二：经济全球化的实质是资本主义的全球化。“资

本主义正在成为真正的全球性制度"，"资本主义的基本逻辑，即资本积累、竞争和利润最大化，已经从意识形态上渗透进世界的每一个角落"。在这里全球化被解读为资本的意志，是资本的意志以其不可阻挡的力量，把世界裹挟进它设定的系统，把其他类型的制度、文明、宗教、文化连根拔起，扫除净尽。解读之三：经济全球化的实质是市场经济的全球化，经济全球化的结果是把市场经济的优点和缺点也全球化了。这是一个比较中性的解读，既看到了全球化的优势所在，也不无遗憾地看到它的痼疾所在。解读之四：经济全球化的实质是剥削的全球化。这是经典的马克思主义或社会左翼对全球化的基本看法。在这一解读里，人类被划分成敌对的两个利益集团——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全球化是资产阶级的盛宴，但对无产阶级而言，它可能是一场不折不扣的灾难，是剥削的全球化，是潘多拉宝盒里释放出的瘟疫和祸害。

最后一种解读认为：经济全球化的实质在于客观事实与主观战略相互结合、相互作用的发展进程。这种观点来自欧盟文献，不带有偏见，具有中性和客观的特征，它事实上非常冷静地给出了全球化的逻辑。作为一种现实而客观地发生、发展着的过程，全球化是由主、客观条件所共同促成的。这一进程产生的客观条件是近代以来持续不断的科技进步，它为国际、区际的交往创造了各种各样便捷的条件，大幅度降低了交易的成本；而作为这一进程产生的主观条件，则源于资本的逐利动机和政治家们的野心。所谓主观战略即是指跨国公司的全球化战略和西方政治家资本主义全球化战略，跨国公司的全球化战略是求财，而西方政治家的资本主义全球化战略一方面是为跨国公司的求财行为提供支撑，另一方面又是西方政治家对西方文化和制度体系的自负导致的希望用西方文明一统江湖的野心。正如，小布什为他攻击伊拉克的行为进行辩解时所声称的那样，对伊拉克的战争被他看作是另一次消灭异教徒的"十字军东征"[①]。

随着全球化的深入，越来越多的区域被卷入其中。由全球化开启的

---

① 十字军东征(The Crusades, 1096—1291 年)是一系列在罗马天主教教皇的准许和鼓动下，由西欧的封建领主和骑士对地中海东岸的国家(阿拉伯世界)发动的持续了近 200 年的宗教性战争。

高度开放的经济环境，对于每一个区域而言，既是巨大的机遇，也是巨大的挑战。

二、让我欢喜让我忧：全球化浪潮中的区域故事

（一）我的城市，我的全球化

我幸运而悲摧地生活在一个低调而不失现代的城市，足不出成都，甚至足不出户，就可以感受到万国博览会的盛况，感受到扑面而来的全球化气息。在这个城市里，来自日本、美国、德国、法国的各式汽车挤满了城市的每一条道路，LV、普拉达等各种各样高档奢侈品专卖店以其无比鲜亮的门面招徕着有钱人，麦当劳、肯德基、苹果手机专卖店随处可见，星巴克、卡布奇诺、兰桂坊让你有机会体验西方休闲文化的魅力，而沃尔玛、伊藤洋华堂、家乐福、好又多、宜家等众多的国际大型零售卖场则大口大口地吞噬着这个城市的商业利润。在这个城市里，大量的全球500强企业开始在这里落地生根，而国内大型企业也纷纷落户于此，企图抢占这个西部大开发的桥头堡。2012年，成都市对外进出口总额达到475.4亿美元（同期，成都市地区生产总值为8000亿元，约合1300亿美元），在出口产品中工业制成品比重已经达到85%以上，其中高科技产品的出口额占到45%以上。具体到我最基本的生活单元——家庭，仔细观察，我使用的电脑、软件和打印设备，听的音乐、看的书籍和电影，常用的相机、手机和吉他都充斥着国际元素，除了脚下的土地和被严重污染的空气，我不能够坚定地指出哪样东西是“本土”的。

（二）与全球化共呼吸：被全球化绑架的区域故事

中国加入WTO，绝对是一个全球标志性的事件，这一事件对全球的影响已经显现，但并未充分展开。而中国在度过加入WTO的蜜月期后，也开始意识到，“出来混，总是要还的”。WTO不是一个馅饼，倒更像一个魔咒，让你感激它的同时，也憎恶它。

“珠三角”，这个高度依赖对外出口的区域，在经历了全球化带来的正能量、实现30年高速的经济增长后，突然发现自身在全球化的开放环

境中其实是多么的脆弱！东莞这个改革开放的活标本，“珠三角”的前哨阵地，自2008年开始就陷入了企业倒闭和集体逃亡潮中，而东南沿海的用工荒和日益高企的劳动力成本，让我们不得不为“珠三角”城市群的未来充满担忧。同样的故事也发生在“长三角”地区，只不过惨烈程度稍微轻一些。

不独中国面临着全球化带来的机遇和风险，就连美国的大量区域也在全球化面前有些弱不禁风。在全球化中，我们看惯了硅谷和华尔街创造的各种奇迹，也深刻地体味到了全球化对美国制造业的打击。在最近几年，美国产生了一股强烈地排斥中国的社会心理，美国人在享受着价格低廉的“中国制造”（注意这个打引号的中国制造是Made in china而不是Made by china）的同时，也感受到产业空壳化的痛楚，以至于美国民间和政府都弥漫着对中国的不满。这个国度失业率曾经一度高达不可忍受的10%以上（在美国人看来，就业是人的基本权利，4%的失业率可以看作是自然失业率，而一旦失业率超过4%，政府就会承受来自社会各界的压力），而这种影响对美国一些区域而言简直可以用惨不忍睹来形容，底特律的遭遇在开放的世界里具有标本意义。

案例链接

底特律的花开花落

2013年3月中旬，电气化时代最伟大的工业城市之一、汽车工业奇迹的缔造者、全球汽车之都——底特律，突然之间再次成为全球关注的焦点。这倒不是因为它又创造什么工业奇迹，而是因为它陷入了有史以来最大的危机之中。

这个在1701年由法国探险家建立的据点，逐渐发展成为毛皮商聚集的交易中心；19世纪中后期，它因在五大湖区的交通枢纽地位带动了航运和造船业的兴起；20世纪初，因为福特的创举，这座城市开启了属于它的镀金时代。20世纪五六十年代，福特、通用、克莱斯勒、道奇等世界知名汽车厂商齐聚于此，打着底特律烙印的汽车飞驰在

各个国家的公路上，达于鼎盛的城市也一跃而成为全美五大都市之一，人口规模达到185万。但60年代以后，这个大都会开始了它的衰退之旅，汽车产业受到日本、韩国等国家的冲击而日薄西山。主导产业及相关产业的衰落，加之种族冲突、社会治安等社会问题的滋生，城市中大量的精英人口流失，黑人人口占到了城市人口的85%。2010年，底特律人口不到72万人，在60多年的岁月中，人口锐减了100多万，这在现代城市发展史上，也算创造了一个另类的奇迹。

如今的底特律，也曾试图通过大力发展娱乐业等产业手段来复兴城市，但属于它的时代一去不返了。公园成了小动物们嬉戏的天堂，市中心的夜晚死一般沉寂（没有人敢在天黑后的市中心步行），到处废弃的住房和工厂默默诉说着城市的兴衰故事。2013年2月下旬，整个城市更爆出破产危机。经济萧条正在导致这个城市财政崩溃、社会治安等公共服务无法到位，更多的人想要逃出这个城市，一个恶性循环的城市破败轨迹正在如期而至。底特律，开放时代创造的工业奇迹，也正在被开放的时代无情地抛弃。品尝到这种带着浓烈荒诞况味的区域，底特律不是第一个，也绝不会是最后一个。

三、区域一体化：全球化背景下的区域选择

（一）区域一体化的内涵和形式

区域一体化是指地域相邻的两个以上地区或国家，在区域分工或国际化不断深化，经济联系日益密切的基础上，通过政府间谈判和签订协议的形式，相互采取比区域外更为开放自由的贸易投资政策，并在体制框架和调节机制上，结合成的经济合作组织和国家经济集团。

区域一体化的形式多种多样。按照由低级到高级的类型或层级顺序，可分为特别优惠关税区、个别商品的一体化、自由贸易区、关税同盟、共同市场、经济联盟、货币联盟、经济与政治联盟等。从空间范围上，也可以把区域一体化划分为国家层面的区域一体化和国家内部的区域一体化。

(二)全球化背景下的区域一体化故事

在全球化浪潮之下,每个区域(国家)都不可能完全掌控全球竞争的胜负,它们更像全球化汪洋中的小船,为了共同对付日益激烈的全球竞争并尽可能规避全球化的风险,区域(国家)间的合纵连横也悄然展开,特别是地理邻近而互补性强的区域间往往会为了共同的目标结成联盟。即使像美国这样的超级经济大国,也希望通过各种各样的联盟来巩固它的全球霸主和世界警察地位。为此,美国倡导建立了包括美国、加拿大和墨西哥在内的北美自由贸易区;同时,随着美国战略重点东移,它与日本、韩国和东南亚诸国间的战略联盟日益成型,影响到了中国的国家安全和经济安全。而苏东巨变后,欧洲从欧共体变成了欧盟,欧元的诞生、欧盟各国间各种壁垒的破除,标志着一个前所未有、高度一体化的新欧洲正在向我们走来。

区域一体化不仅发生在国家层面,也在一个国家内部的区域间起着重要的整合作用。看一看加入 WTO 以后,中国"长三角"地区发生的变化,就会强烈地感受到,彼此原本疏离的区域之间,正被一种无形的力量拉得越来越近,城市与城市、大城市与小城镇、城市与乡村正被一张分工之网网罗其中,彼此承担着不一样的分工职能,进而每个较小的区域都被整合进一个更大的区域中,成为更大区域中不可或缺的一份子。这种区域一体化整合往往跨越行政边界,形成一个庞大的地域性分工网络体系。比如,苏州、无锡和常州是属于江苏的地级城市,但是在区域一体化的过程中,它们与上海、杭州等城市的关系越来越紧密,从而被整合进了"长三角"的核心区域,在"长三角"的地域分工体系中扮演着重要的分工角色。这就造成了它们与同处一个省的宁(南京)、镇(镇江)、扬(扬州)等城市的关系反而没有它们与上海等城市的关系那么紧密,在发展上,它们受到上海的影响比受到南京的影响更明显。

在现代开放经济条件下,全球化赋予了区域新的历史使命,区域成为全球分工网络中的一个节点,区域经济越来越依赖于它与外部的关系,区域成长越来越取决于它从全球分工网络中控制、提取和整合资源的能力,而区域要在全球竞争中获得竞争优势,也越来越不可能单纯地依赖自身

的发展，它必须与其他区域进行紧密的区域合作，共同构建一体化的区域格局，从而在更大的空间尺度上获取提升自身竞争力的各种条件，实现它在全球竞争中的利益保障和利益提升。

第二节　开放条件下的区域成长理论

一、区域开放性、区域关系和被放大的区域经济波动

在开放条件下，区域不再是一个一个老死不相往来的孤岛，区域的命运也不完全掌握在自己手中，开放的环境不仅放大了区域系统经济扩张和收缩的尺度，也放大了区域系统面临的机遇和风险。

即使在全球化还没有到来之前，区际的往来就已经非常频繁，开放的环境给区域和世界带来了意想不到的巨大影响。如果没有汉武帝发动的对匈奴的持续战争，匈奴人就不会跑到欧洲去讨生活，而匈奴闯进欧洲的结果就是导致了欧洲森林中那些食肉寝皮的日尔曼蛮族被赶到古罗马帝国的领地，最终这群蛮族成了罗马新的统治者，在摧毁罗马文明的同时，他们也把欧洲带进了漫漫的中世纪，谁也不会想到一场发生在亚洲的战争最终改变了世界历史的进程；同样，唐开元年间发动的一场与阿拉伯阿拔斯王朝的战役（怛罗斯战役）中，被俘的唐军把造纸术和指南针带到了阿拉伯世界；而基督教世界发动的“十字军”东征中一个意外的成果却是把古希腊古罗马文明时期的文献从阿拉伯人手里重新带回到欧洲，而这些文献竟然成为文艺复兴时期欧洲人重要的精神粮食；中国也是开放世界的受益者，来自世界各国的大量外来农作物传播到这里，土豆、玉米、西红柿、大豆、番薯等大量的外来农作物彻底改变了中国人的食物结构，大大拓宽了中国人的生存空间，也使得中国人口在清代发生了爆发式的增长。当然，开放的环境在放大区域系统变动尺度的同时，也放大了区域系统的风险。美洲在欧洲人还没有造访之前，是一片宁静而闲适的生存空间，人口规模达一千两百万人的阿兹特克人——美洲印第安人的一支，生活在以特诺奇蒂特兰（即今天墨西哥城）为首都的广大地区，但从 1521

年西班牙人入侵后，到 1600 年，这一地区人口就锐减到 100 万，开放的世界用大规模的屠杀和瘟疫把阿兹特克人消灭殆尽。而这个开放的世界也差点搞得中国人亡国灭种。

开放环境对区域经济系统的放大作用，在人类步入全球化后，显得更加明显。以硅谷为例，这个位于旧金山湾的狭长谷地，人口占全国的 0. 83%，却创造了占全国 5% 以上的 GDP，人均 GDP 达到 83000 美元（以上为 2008 年数），居全国之冠。作为全球高科技领域的标杆，硅谷已经成为美国最大的出口基地和经济发展的火车头，正是依凭高科技产业领域的大规模出口，成就了这个让世界瞩目的高科技高地。而开放环境对区域经济系统的风险的放大作用，在全球化中也日显突出，前文所讨论的底特律就是一例，而“珠三角”、“长三角”的快速成长和当前所面临的困境也是一例。

也许我们用“蝴蝶效应”来总结开放条件下区域间的相互关系和相互影响比较贴切。美国气象学家爱德华 · 罗伦兹（Edward N. Lorentz）1963 年在一篇提交纽约科学院的论文对蝴蝶效应进行了描述，强调了初始值的极微小的扰动可能会造成系统巨大变化的现象。他形象地指出：“一只南美洲亚马逊河流域热带雨林中的蝴蝶，偶尔扇动几下翅膀，可以在两周以后引起美国德克萨斯州的一场龙卷风。”其原因就是蝴蝶扇动翅膀的运动，导致其身边的空气系统发生变化，并产生微弱的气流，而微弱的气流的产生又会引起四周空气或其他系统产生相应的变化，由此引起一个连锁反应，最终导致其他系统的极大变化。其实，开放条件和由此在区域间形成的紧密联系，有足够的力量重塑一个区域，也有足够的力量摧毁一个区域，因为一个区域内发生的小小扰动，可能很快就会变成严重影响其他区域的风暴。

二、开放条件下区域经济成长的一个分析框架

区域经济运行总是需求和供给变动的结果，因此，分析开放经济下的区域经济增长，最行之有效的办法就是对比封闭的区域经济的需求和供给，开放条件下的区域经济的需求边和供给边发生了哪些方面的变化？

哪些变化为区域经济提供着正能量？哪些变化对区域经济的运行带来了风险和负面影响。

基于此，本节关于开放条件下区域经济变动的分析框架可以用下图表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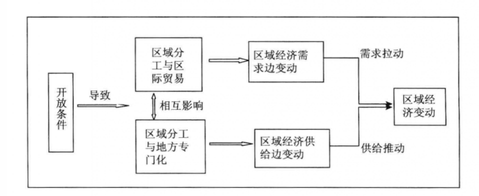


图5－1　开放条件下区域经济分析框架

三、区域分工和区际贸易：被开放环境重塑的区域经济需求边

（一）区域分工与区际贸易：一个日益重要的研究领域

区域关系中最重要的关系是区域分工和由此产生的区际贸易，而区域分工是区际贸易与其他区域联系形成的基础。从空间角度看分工的组织形式有区域内分工和区域间分工，区域内分工在第三章、第四章已经谈及，而区域间分工（区域分工），也可以称作地域分工，它是区域与区域之间根据自身的条件，在各种因素（包括偶然因素）影响下，形成为彼此提供地方专门化产品（区域输出型产品），从而使社会分工跨越单一区域而在空间上形成的分工组织形式。区域分工的意义，一是通过资源的跨区域整合，达成资源在更大空间范围上的优化配置。二是通过区域分工实现经济活动在空间上的有效组合，并通过分工演进形成累积性区域专业化生产优势。三是通过区域分工形成的竞争合作关系，促成区域间政治、经济、文化、科技的融合和交流，从而使得有效率的政治经济和文化制度和先进的科学技术得以在空间上相互渗透。而区际贸易则是从需求边改

造了区域所面临的需求状况，它为区域产品提供了一个潜力巨大的外部市场，也产生了区域对区外需求过度依赖的脆弱性特征。在开放条件下，离开对区域分工和区际贸易的分析，就无法形成具有解释力且相对完整的区域经济分析框架。

保罗·克鲁格曼作为国际经济学领域的领军人物，也日益认识到区际分工和区际贸易是一个越来越基础性的话题，对这些问题的讨论完全可以作为分析国际分工和国际贸易的逻辑起点。在他看来"国际经济学和区域经济学之间的界线已经变得越来越模糊了"[①]。从欧洲一体化的进程中，克鲁格曼感受到，随着欧洲成为一个要素可以自由流动的统一的大市场后，用标准的国际贸易理论范式研究欧盟成员国间的关系已经越来越没有意义，欧盟国家间的国际经济问题更像是区域经济学中的话题，而在区域层次上讨论国际经济关系，将带给我们更丰富的信息和更深刻的洞见。如中国对外国的商品出口主要集中在东南沿海地区，而美国对中国的出口则以西海岸的加州为最。当我们不再把国家抽象为一个点，而是一块块彼此发生、发展着密切联系的区域时，区际分工和区际贸易就成为比国际分工和国际贸易更基础的问题。

（二）区际分工、区际贸易与区域需求的新变化

跨区域的社会分工，从产业角度既可以是不同区域间的产业间分工，也可以是产业链各环节在不同区域布局而形成的区域间产业内分工；而对区域本身而言，区域分工的发展意味着生产的区域根植性和地方性特色日趋明显化，形成以输出型产业为主体的地方专门化产业体系，从而区域发展日益取决于输出型产业面临的外部市场环境。因此，卷入区域分工越深的地区，就越是依赖于外部需求对区域经济的支撑作用。此时，区域在利用更广阔、更巨大的区外市场的同时，也深受区外市场波动之苦，如广东东莞和浙江温州就是非常典型的例子。广东东莞"三来一补"[②]的

① 保罗·克鲁格曼．地理与贸易[M]，北京大学出版社，2000：8.

② "三来一补"是改革开放之初广东沿海地区首创的以充分利用劳动力成本优势而发展出来对外贸易模式，具体指来料加工、来样加工、来件装配和补偿贸易。

对外贸易模式,充分利用了当时劳动力成本优势和国际巨大的市场需求而取得了巨大成功,但随着区外市场逐步饱和及区外需求向其他地区的转移,伴之以区域内部劳动成本的上升,东莞如今面临着巨大的经济衰退和经济转型压力。

区域分工和区际贸易使得区域在获得广阔但充满风险的区外市场的同时,各区域在封闭性条件下形成的大量产业也面临着巨大的区外冲击,它们在更有竞争优势的区外对手面前,往往只有黯然退出竞争舞台,从而导致大量地方自给性产业被区外竞争对手所吞噬。对改革开放后贫困地区的考察可以发现,这些地区大量存在的以手工、半机械和小规模机械为生产条件的自给性产业,如农具等常用铁器加工、小规模农副产品加工业、地方印染和家庭纺织业,等等,都成为了历史的记忆;而那些地方性的小铁厂、酱油厂、水泥厂、砖厂都被区域外大型钢铁厂、食品厂、化工厂等挤压得失去了存身之所。

开放性条件下,输出型产业的需求扩张和自给型产业的需求萎缩成为区域发展中的一个普遍现象。以此而言,开放条件,对于区域而言总是一柄双刃剑,在此环境下,每一个区域都面临着充满机遇和风险的外部市场,也面临着外部区域对本地市场、本地产业的冲击。

(三)需求边变化拉动的区域增长和区域贫困化增长

区域分工与区际贸易为区域经济提供了与封闭条件下完全不一样的需求环境,开放的区域日益依赖于区外市场和外部需求以获取发展的条件和动力,由此形成了解释开放区域经济增长的理论。在这些理论中,道格拉斯·诺思提出了经济基础理论,他认为:任何区域的经济活动都可根据产品销售市场分为基础部门与非基础部门两大类。基础部门的产品或劳务主要是面向区外市场的,因此也称为输出部门。非基础部门是面向区内市场的生产与服务活动,因此也称为自给型部门。基础部门影响并决定区域总体发展,而非基础部门只是总体发展的条件和结果。基础部门的扩张所造成的非基础部门生产的增长,是对基础部门在职能上的支持。基础部门与非基础部门之间存在着一种稳定的关系。那么,区域经济增长可用一个简单的数学模型表示,可写成 $Y = kX$。这里 Y 表示区域

总产值(或区域总就业人数、产量等),X 表示基础部门产值,k 表示区域经济乘数。因此,按此理论,区外需求是区域增长的主要原动力。一个区域输出产业规模越大,赚的收入就越多,从而构成一个庞大的消费市场,带动区域内自给型产业的发展;同时,外部需求的扩大,会带动区域内输出生产业和服务业的发展,引起区域经济成倍增长。区域输出通过乘数效应带动区域经济增长。很显然随着区域分工的发展,区外需求的增长对区域增长具有重要意义。另外,大宗出口理论[①]也是从区际联系中寻求区域增长的动力。

区域分工和区际贸易并不总是能提高区域的总体福利水平,由区域分工和区际贸易拉动的区域增长,也可能导致区域经济的贫穷化增长[②],使得区域福利水平低于增长前。在国际贸易理论中,贸易条件是一个很重要的概念。所谓贸易条件,就是出口产品和进口产品的相对价格,当出口产品价格与进口产品价格之比变大时,我们称之为贸易条件改善,意味着区际贸易会增进区域总体福利水平;当出口产品价格与进口产品价格之比变小时,我们称之为贸易条件恶化,在贸易条件严重恶化条件下,区际贸易会降低区域福利水平,导致“贫困化增长”。在这种情况下,区域若遭遇贸易条件恶化,则意味着由于出口增长而对区域产生的利益将被进口商品相对高的价格水平所吞噬。如中国江浙纺织产品出口地区与美国加州高科技产品出口地区间的贸易,当纺织品价格相对下跌,在贸易平衡(区域层面上)条件下,意味着为了获得等量的加州高科技产品,江浙纺织品生产地区必须耗费更大量的资源、投入更多的要素、出口更多的产品,增长带来的利益向加州转移,导致江浙地区的福利净损失。

一般而言,区域中出现以下情况,就可能导致贫穷化增长。情况一:当经济增长过度依赖于增长地区的出口部门。情况二:增长地区的出口

---

① “大宗”一词意指在该区域所有输出活动中最重要的产品。正常情况下,它指一些初级产品,如毛皮、矿产、谷物等。但也可包括服务,如旅游服务业。大宗理论很明显带有美国和加拿大西北部开发的历史印痕,这些地区的经济活动从一开始就是为了满足外部市场的需求而生产的,通过外部生产要素的大规模投入,形成了高度专业化和外向型的经济体系。

② “贫困化增长”指如果转移至其他地区的利益部分超出了本地区增长利益,那么本地区的福利水平(可以用社会无差异曲线代表的效用水平衡量)就会低于增长前。

份额很大从而对市场价格影响明显。情况三:增长地区进口边际倾向($\frac{\Delta I/I}{\Delta Y/Y}$,即区域进口增量变动率与区域收入增量变动率之比)较高。情况四:出口产品在整个市场上需求价格弹性非常低时[①]。这四种情况,要么会恶化贸易条件(如情况二和情况四),要么会在恶化的区域贸易条件下,导致增长利益向区外转移,使得增长地区出现没有福利增进的区域增长(如情况一和情况三)。

四、区域分工与地方专门化:被开放环境重塑的区域经济供给边

(一)开放条件下区域经济供给边的变化

考察改革开放以后的中国区域经济的发展,一个很显著的现象就是生产的地方专门化、区域经济的特色化特征日益明显。特别是中国加入WTO以后,以产业集群形式快速成长起来的各类地方专门化的产业组织如雨后春笋,成为区域发展中的热点和亮点。由此现象可以联想到:开放的经济环境,事实上也在很大程度上重新塑造着区域经济的供给边,使得供给边在供给内容(供给的产品和服务)、供给能力和供给效率上发生巨大变化。

开放条件下的区域供给变化具体表现在如下方面:

其一,供给的产品种类和产出规模受到区域分工的约束和刺激。①有竞争力的商品和服务受到区外巨大市场的刺激,具有了大幅度扩张其产能的潜力,并可能在未来的发展中进一步巩固和提升其竞争力;②大量的区域自给性产品和区内缺乏竞争优势的产品将面临萎缩,逐步被区域外部供给所取代。

其二,有竞争力的产业部门,其生产过程中的投入端因为更优越的资源配置环境而得到进一步优化,并导致这些输出型产业成为区域产业体系的主导和支柱力量。这主要是因为:区域间要素的自由流动,使得区域输出型产业能够在更大的空间范围里整合资源,提高生产要素的质量、降

① 安虎森. 区域经济学通论[M]. 北京:经济科学出版社,2005:523.

低生产要素的投入成本，提升输出型产业的区域竞争力，从而导致区域经济越来越依赖于输出型产业部门。

其三，生产的地方专门化特征日益明显，产业集群等地方专门化的产业组织大量涌现，这些集群化的产业部门，借助于集群优势，大大提升了输出性产业的产出能力和产出效率，并形成累积性的竞争优势。

（二）供给边变动推动的区域增长：基于新贸易理论的解释

从区域的角度看，传统的贸易理论总是把区域差异性看作区域分工和区际贸易最根本的原因。比如，在亚当・斯密那里，其绝对优势理论从生产的空间差异性入手，强调了不同地域空间上生产成本的差异性对国际分工和国际贸易的影响；大卫・李嘉图的比较优势理论则以生产的机会成本为出发点，强调每个地区（国家）都应该把资源投入于机会成本最小（即能获得最大贸易好处）的产业领域，以"两利相权取其重，两害相权取其轻"的比较优势原则组织国际分工；而赫克歇尔—俄林的模型则以资源禀赋的差异来解释国际分工与贸易。

克鲁格曼看到，基于区域差异性的传统贸易理论并不能完整解释现实，现实中相当比例的国际贸易（而且这一比例还有不断提高的趋势），特别是经济特征相似国家之间的贸易（比如发达国家间的产业内贸易），并不建立在资源禀赋的差异上。他的研究结果表明："各国并不一定因为本国的资源禀赋而参与国际分工，国际分工在一定程度上是本国的历史、某个偶发事件和过去的政策的产物；国际贸易产生的原因也不完全是比较优势，而在很大程度上则是由规模报酬递增驱动的。"[①]这种观点在德国人李斯特的《政治经济学的国民体系》和日本学者的动态比较优势理论中也有所反映。

事实上，克鲁格曼等人提出的国际贸易新理论，也为区域经济提供了一个基于区域供给边变动来解释区域分工和区际贸易的思路。当我们把区域经济的关注点放到快速发展的地方专门化部门，会明显地观察到这些部门的发展往往并不完全基于先天的优势，而是一系列历史的、偶然的

---

① 保罗・克鲁格曼．克鲁格曼国际贸易新理论[M]．黄胜强，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1：译者的话．

或政策的因素作用的结果。大量的地方专门化部门取得的比较优势是累积性和后天获得性的，而这种累积性和获得性的比较优势，则源于一个报酬递增经济环境的形成。正如前面的分析，在开放经济条件下，至少有以下因素促成了一个报酬递增的经济环境的生成：其一，要素的自由流动为区域经济的地方专门化部门提供了更优越的资源要素条件。其二，地方专门化部门的高度集聚特征和集群化发展的组织模式，使得部门和企业间可以充分享受到外部经济和规模经济。地方专门化部门的规模越大，所产生的金融外部性和技术外部性[①]就越强，区域系统报酬递增的趋势就越明显，供给边的输出型产业的产出能力和产出效率也就越高。其三，地方专门化部门的报酬递增现象也与部门、企业间更紧密的社会联系、更加诚信的社会环境等逐步积累的社会资本相关，与部门、企业间最小化交易成本的努力有关。[②]

五、来自实践的检验：产业集群现象及基于供求变动的成因解释

（一）产业集群现象："第三意大利"和"长三角"中小企业集群

产业集群是开放经济的重要成果，是地方专门化部门发展到高水平阶段的产物，目前已经成为区域经济研究的热点话题。在开放尺度很大的区域中，产业集群甚至成了区域最重要的符号标识。如硅谷的高科技产业、班加罗尔的IT服务外包产业、纽约的金融服务业、米兰的时装业，等等。无疑，在区域发展中集群成为日益重要的支撑和推动力量，产业集群的竞争力往往决定着区域的竞争力。因此，在中国各种各样的区域规划和区域政策中，集群的培育都是不能被忽略的内容。

从国外看，产业集群的发展推动区域发展的案例比比皆是，如"第三意大利"就是一个依靠中小企业集群获得长足发展的典型案例。

---

① "金融外部性"和"技术外部性"的概念是克鲁格曼从马歇尔《经济学原理》关于外部性的讨论中提炼出的两个重要概念。金融外部性强调的是通过市场联系而产生的企业、部门间相互的积极影响；而技术外部性则强调的是技术的扩散和外溢而在企业间产生的相互积极影响。其实，技术外部性也包括一个企业或一个部门的技术进步对其他相关企业或部门产生的积极影响。

② 关于社会资本积累和交易成本最小化的社会因素分析，参见本书第六章，此处不再赘述。

案例链接：

“第三意大利”——具有典型意义的新兴产业区标本

“第三意大利”是一个经济地理意义上的名词，如果把意大利分成三大块特征明显的经济区域，那么它的西北部地区(包括米兰、都灵、热那亚等重要城市)是最早成熟和发展起来的工业化、城市化区域，这一地区是意大利的“工业三角地带”，全国的经济中心和工业中心。习惯上，人们把这一块区域叫作“第二意大利”(意指传统工业发达的区域)。意大利南部地区，则是以农业为主的落后区域，是意大利贫困、犯罪和黑手党的渊薮，人们将之称为“第一意大利”(意指以农业为主的区域)。而“第三意大利”则主要指意大利的中部和东北部地区，这一地区曾经是以农业为主的区域，但从20世纪中期以后，这一地区迅速发展成为以中小企业集群为主体的新兴工业区，为了区别于“第二”和“第一”意大利，人们把这一片新兴的工业化区域称为“第三意大利”。

表5-1 “第三意大利”部分地区产业集群一览

地区	比耶拉	皮亚琴察	帕尔马	蒙特别鲁那	卡尔皮	萨斯索罗	卡拉拉	阿雷佐	博罗尼亚	布赖恩扎
产业集群	毛纺织	自动化设备	食品	滑雪靴	木工机械、针织品	瓷砖	石制品	珠宝	包装机械	家具

“第三意大利”作为中小企业集群化发展的成功案例，其成功模式被总结为“弹性专精”(也有学者称之为“柔性专业化生产”)。“第三意大利”始于20世纪50年代后，初期的发展依靠着这一地区经济落后而导致的低成本生产优势，在区域竞争中取得了最初的成功，而它真正的起飞则源于中小企业间网络式的密切合作。在这种网络式密切合作中，产生了柔性专业化的生产经营模式。该模式下企业运用全能性机器和训练有素的、适应能力强的劳动力，对市场需求的快速

对市场需求的快速变动作出灵敏反应，进行多样的、产品频繁变化的专门化产品集合式生产，从而在质量、品牌与创新方面保持领先。而各中小企业间精细的分工和网络式的密切合作，造就了具有高度市场适应性和灵活性的地方专门化产业集群和表现优秀的区域特色经济。

20 世纪 80 年代中期以来，我国浙江、江苏等省也开始大量出现中小企业集聚区域。与意大利新兴产业区的雏形相像，这些中小企业的发展也主要依赖于中国低劳动力成本优势而迅速占领了国内和国际市场。例如浙江省在改革开放以来，年销售额超 10 亿元的市场就超过 60 个。由于中小企业集群的重要支撑和推动作用，浙江省一改计划经济时代的颓唐与失落，成为改革开放以来经济发展速度最快、经济发展质量最好的地区之一，也成为“长三角”经济区最重要的制造业基地。在浙江省，温州的产业集群发展在全国具有典型意义。全市现有民营企业 13 万余家，180 多家企业集团，其中有 33 家跻身全国民营企业 500 强行列，4 家占据中国企业 500 强席位。在整体实力提升的同时，品牌影响力也越发显著，现已形成“中国鞋都”、“中国电器之都”等 27 个“国”字号生产基地，建成 10 个中国驰名商标、16 个中国名牌产品、65 个全国免检产品，其中有 8 个品牌跻身中国 500 个最具价值品牌行列，驰名商标和名牌产品持有量在全国同类城市中名列前茅。在表 5－2 中，可以清楚地看到，具有高度地方专门化特征的各式产业集群支撑起了区域经济的脊梁。人们谈到温州就会想到打火机、眼镜，到了义乌则必须去看一下小商品城，绍兴的轻纺化纤、永康的五金产品、海宁的皮革、慈溪的鱼钩，等等，都成为当地地方性的商品标识。

表 5－2　浙江部分地区产业集群一览

地区	温州	义乌	绍兴	永康	海宁	慈溪	永嘉	金乡	大唐	瑞安	柳市	台州
产业集群	鞋、服装、眼镜、打火机	小商品	轻纺、化纤	五金	皮革、服装	鱼钩、长毛绒	纽扣、泵阀	标牌、包装	袜业	汽摩配件、理发用品	低压电器	精细化工、摩托车

（二）产业集群概述

（1）产业集群的概念与内涵。关于产业集群的概念，一个简单的解释是“通过共同区位（co - location）获得比较优势的一些产业的地理集中”。但这个定义难免与产业集聚或集聚经济的概念相混淆。Jacobs 和 DeMan 认为“尚没有一个准确的产业集群概念……不同维度（的界定）都有一定意义”[①]。他们总结了产业群涵盖的一些重要维度，包括经济活动的地理空间集聚，产业部门之间横向和纵向的关联，相同技术的使用，核心部门（即大企业、研究中心等）的存在 ，企业网络或企业协作的质量，等等。Rosenfeld 在界定产业集群时，所考虑到的因素除了横向和纵向的关联，还包括集群的规模，集群的经济或战略重要性，产品（服务）的范围，以及相同投入的使用等方面。他并不赞同界定集群时单一地考虑相关产业的规模或者就业人数的多少，而是更多地强调社会互动和企业协同的重要性。国内学者也试图对产业集群进行界定，如张辉认为：“产业集群在我国主要指集中于一定区域内特定产业的众多具有分工合作关系的不同规模等级的企业和与其发展有关的各种机构、组织等行为主体通过纵横交错的网络关系紧密联系在一起的空间集聚体。”[②]

作为一种经济活动的空间现象，产业集聚或集聚经济是区域经济学（或者主流经济学）中很早就被发现并提出的概念，比如马歇尔不仅提出了经济活动中产业集聚的现象，也给出了集聚的三个成因（见本书第四章第二节）；佩鲁的增长极理论等也都提及了经济活动的集聚现象。但产业集群显然有着更丰富的内涵。比之产业集聚，产业集群从形式而言，它应该是产业集聚的高级形式；从历史发展而言，产业集群是产业集聚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从内容而言，产业集群更强调企业间精密的分工和协调；更强调由企业网络联系的紧密性和不可分割性。因此，在定义产业集群时，首先要考虑它是产业集聚的一种实现形式；其次要考虑到它是产

① Jacobs D, Deman A. Clusters, industrial policy and firm strategy: a menu approach[J]. Technology Analysis and Strategic Management, 1996, 8(4): 425 - 437.

② 张辉．产业集群竞争力的内在经济机理[J]．中国软科学，2003(1)：70 - 74.

业集聚发展到高级阶段的产物;第三要考虑到企业间紧密而精细的分工和联系。考虑到这三方面的因素,本书借用波特的观点作为产业集群的定义:"产业集群是一组在地理上接近的互相联系的公司和关联的机构,它们同处或相关于一个特定的产业领域,由于具有共性和互补性而联系在一起。具体而言,是指在特定的领域内大量的具有相互关联性的公司、专业化供应商、服务供应商,相关产业的企业以及有关机构,按照一定的经济联系所形成的地理集聚体。"[①]由此,产业集群的内涵主要包括四个方面:第一,空间集聚性。产业部门和相关机构在特定空间区域内,必须有集中的现象或者集聚的趋势。第二,外向性。具有区域竞争力的产业(作为集群的核心产业)通过对外输出产品和服务为区域创造财富,它们是构成产业集群的重要组分,是经济发展的核心驱动力。第三,结构和层次性。整个产业集群主要由三大部分以"金字塔"的形式组成,处在"金字塔"顶端的是出口导向型产业,处于中间层次的行业部门则主要包括专业供应商(原料供应商、中间产品供应商)和服务供应商等支撑性产业,而支撑产业集群的基础性部门(如相应的公共服务、共享的基础设施和产业配套设施、区域内自给性产业以及技术、人力资源、资本和制度环境等)构成其底座。当然,产业集群内的产业不包含上述所有的产业部门,而主要是金字塔顶端和中间层次的部门构成,但这三个层次却是一个相互依赖的统一整体。第四,联系性。相关产业和企业彼此之间以前向、后向或旁侧的产业关联,资源、要素市场和产品市场的共享,基础设施和专业配套设施的共享,专业供应商和服务供应商的共享,或者以企业的竞争与合作等多样化的形式,建立起紧密而广泛的联系,形成企业间的精细而网络化的分工体系。

(2)产业集群的类型和辨识。波特将产业集群从企业间产业联系的角度,把产业集群划为两类:一为纵集群,由通过买卖关系而联系在一起的产业组成;一为横向群,组成这类集群的产业通常共享终端产品市场,或使用相同技术和劳动力,或者需要相似的自然资源。产业集群的划分

① 转引自:百度百科"产业集群"词条。

还可以有其他方法，如按集群的技术特征：高技术产业集群和传统产业集群。又如按集群的组织特征：轴轮式集群（以极少数巨型企业为轴形成与其他企业紧密合作关系而产生的集群）与中小企业集群。而产业集群的辨识方法和标准，根据波特的定义可以归纳为三个基本要素，分别是地理边界、产业边界以及产业联系，而如何确认集群，则有定性和定量的方法。其一，定性方法。专家意见法、产业感知法和企业访谈法都具有针对性强、能够收集难以统计的时新信息等特点，但依赖于专家等个体感性认知，系统数据收集困难，结论普适化受限。其二，定量方法。其中，多元统计聚类法透视出产业间重要的依存关系，但部门全覆盖及产业在集群间截然分组不符实际；主成分分析法辨识结果相对理想，但数理解释牵强；Czamanski 法逻辑严密，突出集群内部产业间的相互关联，但对支撑性部门雷同的集群处理需要改善。因此，在具体的辨识上，往往需要定性和定量方法的综合运用。就具体的辨识标准而言，简单的方法是在确定产业集群合理的地理边界的基础上，用就业区位商和企业数两个指标作为判断产业集群的标准。比如，某研究提出的一个经验标准为：就业区位商≥3，企业数≥100 家，以此作为辨识产业集群的标准。

（三）产业集群的成因分析

强调产业集群是开放经济的产物，主要是基于开放条件为产业集群的形成提供了需求上的条件和供给上的可能性。

（1）产业集群形成的区外需求拉动。很难想象，一个规模庞大的产业集群能够在一个封闭的区域系统中存在和运行。我们考察到的每一个典型意义上的产业集群，都是外向型、输出型的集群。事实上，只有一个巨大的外部市场才能支撑温州的打火机、眼镜生产，才能支撑那些单位价值更低的小商品生产；也只有一个巨大的外部市场才能支撑硅谷的苹果、HP，支撑新竹的半导体材料产业，支撑班加罗尔的服务外包产业。

（2）产业集群形成的供给因素。正是区域分工和区域贸易下促成的地方专门化生产，推动了区域报酬递增趋势的形成，进而形成要素不断流入、生产日益集中，相关的专业化供应商和服务商大量出现，网络式的生产格局日益成型，最终产生了产业集群这种新型的产业组织形式。

第三节　区域分工、区域一体化与区域成长

一、区域一体化与区域成长的理论分析

(一)区域一体化的动因分析

中国加入 WTO 后,一股区域一体化的热浪席卷而来,诸如"泛长三角"、"泛珠三角"、"西三角"等种种提法和动议,不绝于耳。国家和各级政府也在不遗余力地推动这一进程,比如"泛长三角"的概念就在国务院《关于进一步推进长三角地区改革开放和经济社会发展的指导意见》中得到明确,而珠三角为了谋求更大的发展,由广东省倡导和发起,通过"泛珠三角区域合作与发展论坛"和"泛珠三角区域经贸合作洽谈会"等合作平台的建设,正在加紧打造"9 + 2"[①]区域合作框架。在国际上,欧盟、北美自由贸易区等区域一体化组织也逐步走向成熟,在国际经济中发挥着日益巨大的作用。何以区域一体化风靡一时? 区域一体化的动因是什么?

如前文分析,开放的经济环境(特别是一波又一波的全球化浪潮)放大了区域经济的波动,在赋予区域以更大的发展空间和发展机遇的同时,也把衰退的风险和外部世界的挑战强加给卷入其中的区域。如何充分利用开放的经济环境(全球化)带来的机遇、拓宽区域发展空间,统筹好国内和国际两个市场,提升区域竞争力,规避开放环境(全球化)的杀伤力,成为每个区域日思夜想的迫切问题。区域一体化就是这一迫切需要的自然结果。选择区域一体化意味着每一个区域都试图把自己这条小船与其他区域绑在一起,从而实现在开放环境下平稳前行的发展目标。

(二)国际区域一体化和国内区域一体化的理论分析

(1)国际区域一体化的理论。

---

① "9 + 2"是指沿珠江流域的广东、福建、江西、广西、海南、湖南、四川、云南、贵州 9 个省(区),加上香港和澳门两个特别行政区在内的 11 个地区组成的区域合作框架。

由于区域一体化既是国际分工的深化与全球性网络化生产格局形成后的必然选择，也是国家（区域）谋求更大发展的必然要求，区域一体化为各国所重视。目前对国际区域一体化的研究主要集中在以下方面。

其一，对关税同盟的研究和相关理论分析。关税同盟是经济一体化过程中，早期阶段采用的基本组织形式，也是目前国际区域一体化进程的最基础的内容。相关研究通过对取消关税和对外统一关税所引起的贸易变化，分析了区域一体化的各种效应。该理论一直在国际区域经济一体化理论中居于主导地位，也是最为完善的部分。关税同盟可以给参与国带来经济利益的观点在古典经济学时期就早已存在，早期理论界对此几乎也是一片肯定赞同之声，认定：以比较利益为基础的自由贸易可扩大各国的经济利益，带来生产和消费的有益变化。关税同盟在区域内实行关税减免，从而趋向于自由贸易，这必然导致成员国的福利增加，而对于整个世界来讲，福利也是增加的。但随着研究的深入，学者们对关税同盟的效应给予了更客观谨慎的阐释。关税同盟效应包括静态效应和动态效应。①静态效应包括贸易创造、贸易转移、社会福利效应。贸易创造效应（Trade Creation Effect）是指关税同盟内部取消关税，实行自由贸易后，关税同盟内某成员国国内成本高的产品被同盟内其他成员国成本低的产品所替代，从成员国进口产品，创造了过去不发生的那部分新的贸易。从世界范围来看，这种贸易创造导致的生产转换提高了资源配置效率。贸易转移效应（Trade Diversion Effect）是指由于关税同盟对内取消关税，对外实行统一的保护关税，成员国把原来从同盟外非成员国低成本生产的产品进口转为从同盟内成员国高成本生产的产品进口，从而使贸易方向发生了转变。从世界范围来看，这种生产转换降低了资源配置效率。社会福利效应（Social Welfare Effect）是指关税同盟的建立对成员国的社会福利将带来的影响[①]。此外，关税同盟建立后，可以减少行政支出，减少走私，可以改善贸易条件，加强集体谈判力量。②动态效应。包括规模经济

① 关税同盟的社会福利效应的相关讨论，参见前文。本章的第二节第三点关于区域贸易产生的贫困化增长的探讨对此作了分析。

效应、竞争效应、投资效应等。其中,规模经济效应可以产生一个报酬递增的经济环境[①],竞争效应则可以打破垄断、促进技术进步,投资效应则是指非成员国为了绕过同盟国的关税壁垒而直接投资于同盟国,进行产品生产的现象。

其二,自由贸易区理论。自由贸易区是当前经济一体化最基本的形式,它通过消除区内贸易壁垒来实现成员国之间的贸易自由化,是比关税同盟在一定程度上应用更为广泛的一体化形式。自由贸易区有以下两个显著特征:第一,自由贸易区成员国在实行内部自由贸易的同时,对外不实行统一的关税和贸易政策。第二,实行严格的原产地规则,只有原产于区域内或主要在区域内生产的产品才能进行自由贸易。

其三,共同市场理论。关税同盟理论和自由贸易区理论是国际区域经济一体化的基本理论,它的一个主要假设是成员国之间的生产要素是不流动的。共同市场是比关税同盟更高一个层次的国际区域经济一体化,它不仅通过关税同盟而形成的贸易自由化实现了产品市场的一体化,而且通过消除区域内要素自由流动的障碍,实现了要素市场的一体化。共同市场的概念早期出现在 1956 年斯巴克的报告中,但总的来讲,二战后,“共同市场”一词已被广泛使用。在共同市场中,由于阻碍生产要素流动的壁垒已被消除,使得生产要素在逐利动机驱使下,向尽可能获得最大收益的地区流动,但社会、政治和人类的生活习性等原因,又使得劳动这种生产要素并不一定会因共同市场的建立而出现大规模的流动。而资本则不然,只要资本存在收益的不相等,即资本的边际生产率在不同地区存在一定的差异,那么它就会不停地流动,直到各地的边际生产率相等为止。从静态的角度上讲,配置收益是共同市场所能产生的高于关税同盟的收益(即要素自由流动后经济效率提高所增加的收益)。当经济一体化演进到共同市场之后,区内不仅实现了贸易自由化,其要素也可以在区内自由流动,从而形成一种超越国界的大市场。一方面使生产在共同市

① 关于规模经济效应的讨论,参见前文。本书第四章第二节关于报酬递增的理论探讨中有相关分析。

场的范围内沿着生产可能线重新组合，从而提高了资源的配置效应；另一方面，区内生产量和贸易量的扩大使生产可能线向外扩张，促进了区内生产的增长和发展。这可以用“大市场理论”来理解。大市场理论的核心思想是扩大市场是获取规模经济的前提条件；市场扩大带来的竞争加剧将促成规模经济利益的实现。西托夫斯基和德纽分别从“小市场”和“大市场”的角度分析了大市场理论的经济效应，西托夫斯基认为“小市场”的经济会出现“恶性循环”，因此建立共同市场之后，大市场的经济会出现“良性循环”，德纽认为大市场建立后，“经济就会开始滚雪球式的扩张”。

其四，协议性分工理论。该理论认为：在实行分工之前两国都分别生产两种产品，但由于市场狭小，导致产量很小，成本很高，两国经过协议性分工以后，都各自生产一种不同的产品，导致市场规模扩大，产量增加，成本下降。协议各国都享受到了规模经济的好处。尽管协议各国都享受到了规模经济的好处，但是要使协议性分工取得成功，必须满足三个条件：①实行协议性分工的两个（或多个）国家的要素比率没有多大差别，工业化水平等经济发展阶段大致相等，协议性分工对象的商品在各国都能进行生产；②作为协议性分工对象的商品，必须是能够获得规模经济效益的商品；③对于参与协议性分工的国家来说，生产任何一种协议性对象商品的成本和差别都不大，否则就不容易达成协议。

其五，综合发展战略理论。对发展中国家经济一体化作出阐述最有影响力的是鲍里斯·塞泽尔基的“综合发展战略理论”。鲍该理论的思想包括以下要点：①把发展中国家的国际区域经济一体化视为一种发展战略；②它不限于市场的统一；③生产和基础设施是其经济一体化的基本领域；④通过区域工业化来加强相互相关性；⑤强调有效的政府干预；⑥把经济一体化看作是集体自力更生的手段和按照新秩序逐渐变革世界经济的要素。综合发展战略理论突破了以往的国际区域经济一体化的研究方法，它综合考虑了经济、政治和机构等多种要素，进而把国际区域经济一体化视为发展中国家的一种发展战略，看作是这些国家集体自力更生的手段和按新秩序逐渐变革世界经济的要素；该理论也不同于以往的

欠发达地区(国家)的发展理论,如缪尔达尔(Gurnar Myrdal)、普雷维什(Raul Prebisch)和辛格(Hans Singer)的中心—外围理论[①],以及以巴兰(Paul Baran)、阿明(Samir Amin)、弗兰克(Ander Gunder Frank)、卡多佐(F H. Cardoso)、桑克尔(OsualdoSunkel)、桑托斯(M. Santos)和伊曼纽尔(A. Emmanuel)等人为代表的国际依附理论[②],为我们进一步探讨发展中国家的国际区域经济一体化问题提供了参考的框架。

(2)国内区域一体化理论。

国内区域一体化本质上与国际区域一体化大体相同,因此在理论分析上可以大量借鉴国际区域一体化的相关理论,但二者的一些差别也导致了分析上的殊途。二者的差别之处主要在于两个方面,一是国内区域一体化不存在关税壁垒问题,二是国际竞争与国内地方政府主导的区域竞争有很大的不同,因此在区域一体化的推动和阻碍力量上并不完全一致。在国际区域一体化的众多形式中,国内区域一体化更像国际共同市场,不仅实现了贸易自由化,也实现了要素流动的自由化。因此,从理论上说,国内区域一体化可以达到最高程度的一体化,但现实也并不如此简单。这主要源于主导国际竞争合作的力量和主导区域间竞争合作的力量并不相同。特别是政府主导的经济系统中,这种差别更加明显。

在政府主导的区域经济中,国内区域一体化的阻力和动力往往都来自地方政府和地方性利益集团的利益诉求。因此,国内区域一体化问题不是单纯的经济问题,而更像地方政府间的博弈问题,它牵涉到的是各级

① 普雷维什的中心-外围理论认为世界"经济星座"由"中心"即富裕的资本主义国家和"外围"即生产和出口初级产品的发展中国家组成,中心国家和外围国家组成的现行国际经济体系是不合理的,它只有利于发达国家而损害发展中国家经济的发展。缪尔达尔则运用"扩散效应"和"回波效应"理论来分析现代国际经济体系对发展中国家的利益和损害,认为"回波效应"的力量超过了"扩散效应"的力量,经济发展的结果往往不是带来共同富裕,而是加剧贫富悬殊。因此他们建议发展中国家必须实行进口替代的工业化战略,打破旧的国际经济体系,以发展中国家合作的集体力量来与"中心"国家抗衡。

② 国际依附理论的支持者认为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关系是富国支配穷国、穷国依附于富国并受之剥削的"支配—依附"关系,因此他们建议发展中国家要实现真正的经济发展,必须进行内部彻底的制度和结构变革,彻底摆脱对发达国家的依附。

地方政府行政力量的运用和各级政府在政治市场上的话语权大小。比如，重庆和成都原都属于四川省，但两个地区长期互不服气。重庆一方认为成都作为四川省的省会所在地得到了来自省委省府的过多关照，获得了过多的投资和发展机会；重庆设市后，成都人也发现重庆作为中国最大的直辖市，它的一把手至少是政治局委员，其政治地位不仅远远高于成都市的一把手，也高于四川省一把手，一把手政治地位的悬殊也影响到了两个地区获取经济资源和发展机会的能力；成渝自古一家，在区域一体化的浪潮中也有强烈的意愿携手同行，作为西部大开发的桥头堡，成渝经济区的建设也自然是大家期盼中的大好事，但在《成渝经济区规划》尚未落地之前，双方为了各自的利益纠结不已，甚至为了这个一体化区域的正式名称而争吵不休，以至于这个规划不得不迁延时日，迟迟不能公布。中国有一句流行甚广的说法，叫“政府搭台，企业唱戏”，这恰好说明了，如果没有政府的搭台，企业的戏就没法唱，国内区域一体化往往就面临着这种行政力量和政治话语权干预的困境。①

二、来自实践的检验：从城市到城市群的发展看区域一体化

（一）基于分工视角的城市概念

从经济角度分析，现代城市是经济活动空间集中的必然结果，而经济活动的空间集中又是一种降低分工网络运行成本，从而更加充分利用和强化分工网络效应，提升报酬递增程度的经济空间组织形式。当分工网络扩大对企业带来的边际收益大于由于网络扩大和空间集中而增加的企业总成本（包括增加的交易成本和因非流动要素价格上升而增加的生产成本）时，空间向心力大于离心力，则空间集中成为必然。在这个意义上城市的经济本质是：把逐步扩大的分工网络压缩到一个较小的空间域面从而节约交易成本、提高分工网络效应而形成的经济活动高度密集区域。

① 关于地方政府间的博弈和区域关系的构建等问题的正式讨论，请参见本章第四节。

（二）城市的起源、演变和当代特征

从汉字“城”、“市”的不同涵义，可以推知，城市的起源是多源头的。军事需要使城市作为“城”的意义得以确立，而交易需要又使城市作为“市”的意义得到表现；行政、宗教祭祀、文化教育等方面的需要，则进一步丰富了城市的内涵。由此，城市自古以来就是集多种职能于一身的地域综合体。它在城乡间的分工体系中承担着工业和商业等产业职能，是经济中心、政治中心、文化中心和军事中心。著名历史学家奥斯瓦尔德·斯宾格勒指出，“所有伟大的文化都是城镇文化”，因此“底比斯就是埃及，巴黎就是法国，巴格达就是伊斯兰世界，罗马就是世界”，也因此“可以这么说，世界历史就是城市的历史”。[①]

城市是社会分工发展的产物，随着社会分工的发展不断地改变着它的产业内容、经济规模和城市性质。自从手工业和小商业从农业中分离出来后，它们需要为各自的发展寻找合适的地理区位，而这些产业合适的发展空间一定是方便大家到达，安全、宜居的地方，当手工业和小商业都向这些地方移动后，城镇就出现了。人类早期的城市，是广大的农村所包围的一小片地区，依附于农村社会和农村经济而存在。在某种意义上，古代城市的性质完全取决于它所服务的乡村社会的性质，而城市规模完全取决于农村社会对手工业制品和小商业服务的需求。

城市从来不是静止的经济社会现象，古代城市在经过不断的异化后，从量变中逐步产生了质变，进而形成了现代城市。与农耕文明的城市相比较，现代城市最直观的不同是人口规模的巨大差异，当今世界，人口上百万的城市比比皆是，而人类数千年的农耕文明史中，这样规模的城市屈指可数，笔者所知仅有长安和罗马曾经达到过这样的水平。翻一翻2011年的《中国城市统计年鉴》，可以发现中国281个地级城市中，只有8个城市的全市人口（户籍人口）小于100万；而全部副省级以上城市，全市人口不仅都远远超过了百万（见图5－2），而且有4个城市（分别是重庆、上海、北京和成都。图5－2重庆市全市人口虽然有3300多万，但市区人口

① 奥斯瓦尔德·斯宾格勒．西方的没落[M]．江月，译．长沙：湖南文艺出版社．2011：73，78.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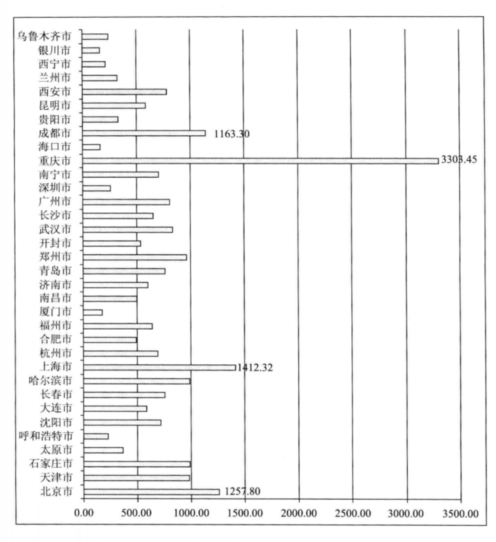


图 5－2　中国副省级以上城市人口规模（2011 年，单位：万人）

为 1542 万）全市人口超过 1000 万人。若以常住人口计，成都这样的城市人口已经达到 1500 万，而像上海、北京这样的城市，常住人口应该在 2000 万人以上。现代城市在其景观特征上，也与乡村的汪洋大海所包围的城市孤岛大相径庭。现代城市几乎都找不到作为“城”的痕迹了，大多数城市的城墙都已经拆除，城堡或被废弃，或被现代人作为历史教育的博物馆；而其作为“市”的意义、作为经济活动中心的意义，更加突出了。在更

本质的意义上，如果说古代的城市只是农耕文明的陪衬或者附带产品[①]，那么现代城市完全脱离了乡村的束缚，并进而成为支配乡村的力量。斯宾格勒指出："在这一点上，晚期城市首先与乡村相对抗，以其轮廓的线条来反对并否定所有的自然。它期盼成为一种不同于自然甚至高于自然的东西。"[②]城市的发展由小而大，由简单而复杂，由松散而紧密，正如一个受精细胞的分裂过程由结构简单的细胞体经由不断的分工裂变逐步演变为结构复杂、功能完善的社会经济有机体，并产生了诸如集市型城镇、功能型城市、综合性城市等多种形式。而在城市化进程的高级阶段，出现了城市群。在当代社会，城市和在此基础上形成的城市群已经成为推动区域经济增长和社会发展最重要的空间载体，吸纳了世界一半以上人口和绝大多数的产业门类，它们是人类经济活动（特别是商业、服务业活动）的中心，是人类居住的中心，是政治和文化的中心，还是新思想、新技术的策源地。

（三）城市化与城市群的产生：区域一体化的典型过程

笔者从经济意义上把城市定义为："把逐步扩大的分工网络压缩到一个较小的空间域面从而节约交易成本、提高分工网络效应而形成的经济活动高度密集区域"，意味着城市是一种整合经济活动的空间组织形式，而城市化也正是把各种经济要素、经济力量、经济组织和邻近的经济地理单元整合为一个分工协作、紧密联系的整体的力量。在此意义上，城市化过程就是一个非常典型的区域一体化过程。我居住的城市这几十年来的发展讲述了一个城市化过程如何重塑了城市景观，又如何把区域的各个经济地理单元和经济要素整合成日益紧密、不可分割的整体。

---

① 为此，斯宾格勒指出："那些外表上从乡村发展起来的东西并不是城市，而是某种意义上的市场，它只是农村生活的一个利益汇合点而已。在这里，没有独立生存的问题。一个市场中的某个居民可能是一个工匠，也可能是一个商人，然而他首先是作为一个农民来进行生活和思考的，""乡村的市镇衬托了乡村，它是乡村图景的一种强化"。参见《西方的没落》（2011 中译本）：74，77。

② 奥斯瓦尔德·斯宾格勒．西方的没落[M]．江月，译．长沙：湖南文艺出版社．2011：77.

案例链接

成都平原的城市化与区域一体化

（一）城市历史的简要回顾

北纬30度，是一条神奇的纬度线。这条线上，古埃及、古巴比伦、古印度、中国四大古文明自西向东排列（自西向东的排列，也是古文明按发生时间顺序的一个排列）。而把这条纬度线定格在102°54′E～104°53′E、30°05′N～31°26′N的空间范围内，就是成都这个城市的地理坐标了。从三星堆到金沙，从开明王迁都到都江堰水利工程竣工，从汉代的“天府之国”到隋唐的“扬一益二”，一个个华丽的瞬间把成都的文明史串连起来，构成了这个城市虽不恢弘却绵密雅致的城市文明史。作为一个具有悠久城市文明历史的区域，成都还创造过两个令人惊叹的奇迹：其一，它是中国历史上存续时间最久的未变更地理坐标的城市（其建城史可以追溯到公元前611年）；其二，它是世界历史上第一个创造出纸币这种信用工具和货币形式的城市。[①]

（二）近二十年城市的扩展和一体化过程

（1）主城区空间格局的演变。

大约在二十年前，成都市主城区（地理范围相当于现在的锦江区、武侯区、成华区、青羊区、金牛区和高新区的大部分）的城市化区域仅止于一环路，这一小块城市化区域以春熙路、盐市口为中心向四周辐射，形成了以商业为主的服务业区域，并兼有政务中心、公共服务中心（如邮电局）和市民居住区职能；在一环路附近，则零散地分布着规模不大的工业企业（主要是一些集体企业和街道企业）；主城区主要的工业区在成都东部二环路附近（当时称为东郊）。除此之外，则是大片的农田。从空间形态上看，当时的城市化区域犹如成都平原上

① 这种纸币产生于北宋，被为“交子”，至今成都还有一条伫立在东风大桥旁的小小街巷——交子街，这里大概就是世界最早的金融街了。

被农田的汪洋大海包裹得严严实实的一小块城市孤岛。

二十年后的今天，城市化区域已经扩展到三环路，并开始向绕城高速延伸，可以说除少数的地区（如城市的通风口、绿化带）外，成都市主城区都被水泥路面和各式各样的现代建筑挤满。在空间格局上，各地域单元在主城区中的分工角色及相互间的关系定位日益明确，呈现日益精细的功能区分工和日益紧密的空间配合关系，高度一体化特征日益明显。①一环路以内大部分地区成为城市心脏——CBD区域。这一区域以春熙路商圈、盐市口商圈和骡马市商圈为依托，形成了高端商贸零售业（如大型商贸零售商场、高端精品卖场、奢侈品专卖店等）、金融服务业、高端酒店服务业和文化娱乐业为主的业态。以金融服务业为例，一环路内，有349个银行营业网点，占主城区银行营业网点总数的37.7%，聚集了80%的分行、总部和外资银行以及40%的自助银行和ATM自动取款机。②在一环路—二环路之间及周边地带，逐步发展成为局部城区的区域性服务业中心（在二环路各重要的交叉路口，自发地聚集起服务于局部城区的区域性服务业中心，即商圈），这一地带也是社区性服务业集中区和城市居民的重要居住区。③在三环周边及以外地区，则主要是居住区、社区性服务业发展区和少量的工业集中发展区。当然，这一区域还存在一些观光农业区、城市通风口和城市绿化带。而主城区以前承担的工业职能则被挤到了邻近县、市、区。可以看到，成都市主城区经济社会发展的空间格局发生了巨大的变化。这种变化的基本趋势是：从较为散、乱的产业空间配置，薄弱的空间关系和无序的空间职能划分，逐步转向日益明晰的产业布局、日益精密细致的空间分工和复杂有序的空间职能划分。相关情况见图5-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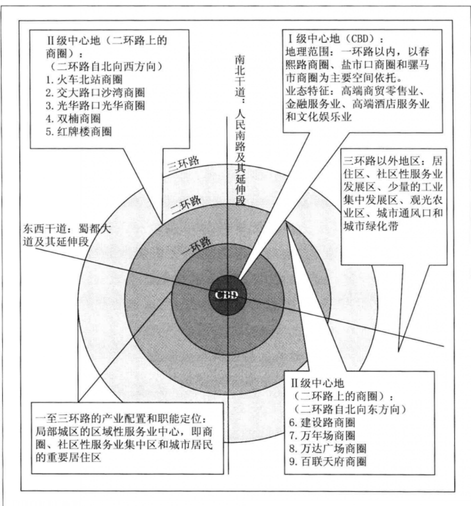


图 5－3　成都市主城区空间结构示意图

(2)主城区的扩展和组团式发展模式的引入。

为了适应城市的快速和功能整合,主城区正发生着新一轮的变化。①主城区进一步向外扩展。以高新区为例,2001 年 3 月,成都市高新区把原郫县部分地区纳入高新区管辖,成立了高新西区;2010 年,天府新区正式成立,新区涵盖了成都市的高新区南区、双流县、龙泉驿区、新津县及眉山市的彭山县、仁寿县及资阳市的简阳县的部分地区,准备打造以现代制造业为主、高端服务业集聚、宜业宜商宜居的国际

化现代新城区。②城市发展正在扭转过去的摊大饼做法，组团式发展理念开始形成。2006 年以后，成都市主城区发展不再按照摊大饼的方式一层层向外扩散，而是在东、西、南、北四个方向，建立四个城市副中心，以城市副中心为依托，建立东、西、南、北四个组团，以组团式发展逐步取代圈层式发展。

(3)成都市各区、市、县发展的一体化过程。

成都市辖九区(其中，武侯、金牛、成华、锦江和青羊五区属于主城区，龙泉驿、温江、新都和青白江属于近郊区)、六县(双流县、郫县、金堂县、大邑县、蒲江县和新津县)和四个市辖市(都江堰市、彭州市、邛崃市和崇州市)。成都市行政区划见图 5－4。



图 5－4　成都市行政区划图

在 20 多年前，成都市主城区和其他区、市、县的联系主要是行政隶属关系下的行政联系和政府系统在资源配置方面形成的联系；经济上的联系主要是主城区对各区、市、县的商品出售和工业制成品提供(量并不大)及区、市、县对主城区的农副产品供给。各区、市、县间的空间关系并不紧密，也没有形成各自的功能分工和角色定位。而目前各区、市、县间的功能分工和角色定位日益清晰。主城区作为全域成都的商贸服务、金融服务及其他现代服务业中心的地位日益明确，作

为中国西南地区的"物流和商贸中心"、"金融中心"和"科技中心"以及"交通枢纽"、"通信枢纽"的"三中心两枢纽"地位得到强化。而成都市近郊区域作为全域成都的制造业（工业）区的地位也更加明确，大量的工业项目（及主城区迁出工业）落户在近郊区域的双流、新都、龙泉驿和青白江等区县，成为成都市工业（制造业）发展区；而城市的远郊区域，如蒲江县、邛崃市、彭州市、都江堰市和大邑县等市县则作为全域成都的农副产品的供给地及旅游目的地而在产业发展上得到体现。同时，城市化也推动了成都平原城、乡间关系的发展和演变，城乡统筹的步伐在加快，而公共服务的均等化亦在一步步走向成熟。

（三）城市发展中城际关系的紧密化与一体化

开放条件下，城市的扩展（不仅是地理意义上，也是经济意义上）不仅会在空间形态上与相邻的区域（或城市）实现更加充分的交流与融合，也会在实际的经济活动中实现更加紧密的各种联系。成都市的发展也不例外，开放环境和区域自身的发展也推动了成都与德阳、绵阳，成都与乐山、眉山、资阳，成都与重庆等地的经济社会联系。我们固然不能说这些地区已经实现了区域的一体化发展，但这些城市间区域一体化的实践正在逐步展开。比如正在建设中的天府新区，就体现了成都市与眉山市、资阳市正在建立着日益紧密的联系，各种阻碍其一体化的力量也正在消解，如三市已经实现通信并网，实现了长途区号的共享，大大降低了通信成本；而拟建中的成都市新机场将坐落在资阳市的简阳县。同样，成（都）、德（阳）、绵（阳）、乐（山）共同打造的城市群也因为城际便利的交通条件、很强的互补性和悠久的历史渊源，正逐步成熟。

而众望所归的成渝城市群，已于2011年通过国家规划认可，正成为西部地区区域一体化发展最具活力的城市群。

2003年，旨在强化成渝合作的成渝经济区建设就已纳入国家发展战略，而随着成渝两地区域经济发展格局的变化，合作共赢成为双

方的共识。2006年,重庆市开始将向渝东南发展的思路进行调整,渝西经济走廊又成为重心,六大特色产业都摆到了成渝经济区里;时任重庆市委书记的汪洋到成都,与四川省领导签订了《关于推进川渝合作共建成渝经济区合作协议》,成渝经济区建设终于成为川渝两地的共同发展战略。2007年4月2日,四川省省长蒋巨峰和重庆市市长王鸿举在成都共同签署了《重庆市人民政府四川省人民政府关于推进川渝合作共建成渝经济区的协议》,双方达成了广泛的共识,一致认为,建设成渝经济区,需要建立开放、规范、竞争、有序的商品市场,破除行政壁垒,加强交通、物流合作,降低产品跨区域销售成本,取消两地的就业户籍限制,建立有利于人口合理流动的劳动力市场,建立流动人口"便参保、易转移"的社会保障体系,构建要素无障碍流动机制,促进产业互动、利益共享,构筑企业合作的绿色通道,进一步放宽民营经济投资领域,消除民营经济进入市场的障碍。依据合作协议,成渝两地将立足现有产业基础,共同培育和建设国家重大装备制造业基地、高技术产业基地、清洁能源基地、国防科研产业基地、优势农产品生产加工基地;在区域内整合产业,优化产业布局,构建分工合理、各具特色的产业集群。2007年6月,国务院批准成都和重庆同时成为国家统筹城乡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这是继南部的深圳、东部的上海浦东、北部的天津滨海之后,我国的第四个国家级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改革试验区的设立,为成渝经济区的全面形成和发展提供了一个良好的契机。与此同时,国家发展改革委也启动了成渝经济区规划编制工作,规划于2011年最终落地,成渝经济区终于迈出经济一体化发展最坚实的一步。

(四)城市群(都市圈):区域一体化的高级形态

在十多年前,城市群这个概念,对于绝大多数的中国人而言绝对是个陌生的概念。如今,它却成为了一个高频词,而各种各样的城市群也被各种媒体大肆炒作,仿佛中国人已经置身于城市群打造的诺亚方舟中,被上帝拯救是指日可待的事了。确实,我们要么是生活在一个城市群中,要么

是生活在我们自己臆想的城市群中。不管怎样，城市群已经日益影响到我们的生活，并为我们生活的城市或乡村提供了更多的可能，为我们安身立命的区域，源源不断地注入着活力。

(1)城市群(都市圈)的概念与内涵。

关于城市群(都市圈)的概念，众说纷纭。首先，城市群和都市圈是不是同一个概念；其二，怎样定义城市群(都市圈)和认识城市群(都市圈)的内涵？

对于第一个问题，部分学者认为，都市圈是城市群的一种典型形态，也有学者认为二者有明显的区别。从我们日常对两个概念的使用上，以及我们的主观感受中，二者应该有紧密的联系，但也有些许的不同。从全球五大都市圈与国内长三角、珠三角城市群的比较看，都市圈应该是城市群的一种类型，是城市群发展的高级形态，都市圈在产业形态上更偏向于后工业时代的产业部门，如金融、现代服务业更加发达；在空间景观上，都市圈的城镇分布更加密集，人口集中度更高；在内部联系上，都市圈各空间单元的联系更加紧密。由此，笔者认为，大都市圈是城市群发展的一个更高阶段，考虑到中国现实，笔者更偏好城市群一词，主要也是基于这样的考虑。

至于如何来定义城市群、认识城市群的内涵，目前，尽管也有不同的理解，但基本上都很靠谱。如袁家冬等人认为："都市圈是以中心城市为核心、以便捷的交通通道为依托、以城市职能的空间扩散为条件、以城市之间以及城市与区域间的整合为结果、以城市日常生活圈的空间范围为界限的高度区域一体化的城市功能区。可界定为：以中心城市职能的空间集聚与扩散为条件，由中心城市与多个周边城市和地区共同构成的，以城市日常生活圈的空间范围为界限的一个多核心的一体化的城市实体地域。"[①]姚士谋认为城市群是一个城市分布的区域系统，其概念可表述为："在特定的地域范围内具有相当数量的不同性质、类型和等级规模的城

① 袁家冬，周筠，黄伟．我国都市圈理论研究与规划实践中的若干误区[J]．地理研究，2006(1)：115.

市,依托一定的自然环境条件,以1个或2个超大或特大城市作为地区经济的核心;借助于现代化的交通工具和综合运输网的通达性,以及高度发达的信息网络,发生与发展着城市个体之间的内在联系,共同构成的一个相对完整的城市'集合体'。"①

从上述定义,可以概括出城市群的基本内涵。这里采用戴宾的观点②。戴宾认为,城市群具有地理和经济双重属性,地域性、群聚性、中心性和联系性是城市群的基本特征。其一,地域性。城市群首先是一个地域概念,具有特定的空间地理范围。其二,群聚性。城市群是若干城市的集合体,在有限的地域范围内聚集了一定数量的城市,或者说城市分布达到较高的密度。其三,中心性。城市群以一个或几个大中城市为核心,这些城市成为城市群经济活动的集聚中心和扩散源,对整个区域的社会经济发展起着组织和主导作用。中心城市可能是一个,出可能是多个,因而城市群既可以是单中心型,也可以是多中心型。城市群的中心性不仅指中心城市在城市群体中处于经济活动的核心,而且也意味着中心城市在整个城市群地域范围内的社会经济活动中处于核心和支配地立。其四,联系性。城市群的联系性特征是指城市群内不同规模、不同等级的城市之间存在着较为密切的社会经济联系,并逐步向一体化方向发展。联系性是由城市群的中心性必然派生出来的基本特征,也是现代意义的城市群与地理学意义的城市群的重要区别。

(2)城市群的形成和发展。

城市群的产生是城市发展、城市化深化的逻辑结果,是区域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的必然产物,也是区域经济一体化水平不断提升的重要表现。而城市群的生成、发展和演变,既体现了城市群自然、自发的生长过程;也体现了人为努力,特别是各级地方政府的积极推动,对于这一过程的促进作用。

城市群的形成和发展既可以是单个城市空间扩散而形成的城市群;

① 姚士谋. 中国城市群[M]. 合肥: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出版社,1992. 3-10.

② 戴宾. 城市群及其相关概念辨析[J]. 财经科学,2004(6):101-103.

也可以是多个城市在扩张过程中形成日益紧密的经济社会联系而逐步形成。从现有的城市群实例看，一个成熟发达的城市群的形成和发展，需要诸多条件，特别是中心城市需要有良好的地理位置和自然条件，如平原和宜居的中纬度地带，具有中枢的支配地位，集外贸门户职能、现代化工业职能、商业金融职能、文化先导职能于一身。而一个全球性的大都市圈则往往是国家社会经济最发达、经济效益最高的地区，具有发展国际联系的最佳区位优势，是产生新技术、新思想的"孵化器"，对国家、地区乃至世界经济发展具有中枢的支配作用。同时，城市群的产生也依赖于完整的城市等级体系建设和区域性基础设施网络的建设。目前，世界上业已形成的六大都市圈（城市群），几乎同时具有上述几大特征。另外，其他有名的城市群，如德国的莱因—鲁尔城市群，荷兰的兰斯塔德城市群，也体现了相似的特点。

三、空间上不断放大的分工网络：区域一体化问题的简要总结

从社会分工发展的角度看，城市群的产生和发展，是随着城市化的深化和区域一体化水平的提升，使得社会分工跨越行政地理边界，甚至跨越历史上形成的经济地理边界，从而在更大的空间尺度上整合资源、组织分工而形成的一种一体化地域综合体。城市化的深化导致的城市扩张、延展，绝不单纯是地理空间上的城市化区域的扩大，更是经济意义上把以前相对独立的空间单元纳入城市的社会分工体系，使得这些相对独立的地理空间单元变成城市的分工网络体系中承担一定的分工职能、实现城市部分功能的功能区，从而把这些相对独立的空间单元纳入一体化发展的轨道。因此，城市化的深入发展，不仅会在空间形态上与相邻的区域（或城市）实现更加充分的交流与融合，也会在实际的经济活动中实现更加紧密的各种联系。循着从集镇—小城市—中等城市—大城市—特大城市—城市群的城市化历程，城市发展的每一个阶段都表现出分工网络体系在地域空间上不断被放大的过程。分工的初步发展，手工业和小商业从农业中分离出来，并在空间上集聚成集镇。分工的进一步发展，手工业被工业代替，技术进步使得工业部门日益增多，工业生产的环节不断细

化；小商业也不再停留在小打小闹的局面，而是分成了商业和服务业，商业和服务业的门类也不断增多；同时，为生产、生活配套的各种公共服务部门也开始扩大；小小的集镇没办法容纳越来越大的分工网络，于是城市由小而大地发展起来；在开放条件下，城市进一步的发展结果则是：分工跨越城市固有的空间边界，在相邻的城市间或城市与区域间形成了广泛的分工关系，从而原有的城市强化了它具有优势的部门或领域，而把其他一些可以由另外的城市或区域更有效提供的内容转移出去，强化了别的城市、别的区域在这些方面的固有优势，从而开启由城市而城市群的一体化过程。这时的城市，不再是自给自足的孤岛，它成为一个更大的分工网络中的组成部分，它的发展也就越来越依赖于它在城市群中的地位和功能。所以区域一体化，不是从城市群开始的，它与城市化的过程相始终，是城市化的更高发展阶段。

第四节　大国区域关系治理：理论分析、历史教训与经验借鉴

在开放条件下，区域关系对区域经济影响至深。正如前文对国内区域一体化的分析，国内区域一体化的实践，并不等同于国际区域一体化，它涉及地方政府间的利益博弈和地方性利益集团间的利益博弈，牵涉到的各级地方政府行政力量的运用和各级政府在政治市场上的话语权大小。因此，区域差异明显的大国，如中国、美国、印度等，区域关系的处理不仅是市场力量角力的结果，也是考量政府执政智慧的技术活。

一、区域最优竞争合作秩序：大国区域关系治理的目标

区域最优竞争合作秩序（以下简称“最优秩序”）指既能最大程度地降低区际交易成本，保证全国市场的统一性和市场竞争的有效性，又能协调自由竞争条件下区域冲突，实现区际公平的一系列制度安排。在理论上，最优秩序理论的梳理可以从克鲁格曼等人的新经济地理学（以下简称“NEG”）、缪尔达尔的累积因果循环理论及奥斯特罗姆多中心治理理

论中找到线索。其中，NEG 理论和缪尔达尔对市场运行的空间结果的分析可以帮助我们理解最优秩序构建的必要性和必然性；马丁（Philippe Martine）结合内生增长理论与新经济地理理论，探讨了空间公平与效率间的权衡问题；奥斯特罗姆的多中心公共治理理论则为最优秩序构建提供了分析框架。

在实践中，对于大国（或国家联合体）而言，最优区域竞争合作秩序的构建极端重要。考之于春秋战国以来的中国历史：过度的分权，既造成诸侯割据、战乱频仍，也激发了区域创新，由于区际竞争而促成的制度创新，成为中华文明演进的动力源；过度的集权，虽也造就了秦皇汉武的盛世，但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制度的死锁无疑是理解王朝兴替的关键。考之于美国和欧盟的实践：美国宪法的联邦主义理念在中央集权与松散邦联之间找到妥协，以强而有力的联邦政府整合区域关系，实现区域一体化，保证自由竞争的市场秩序能够在跨区域层次上实现；又以独立于联邦政府的各州政府对州内事务的主导权确立了地方利益得到充分表达，各州在宪法框架下的制度试验和政策设计受到充分尊重和法律保护；辅之以代议制民主对联邦政府和州政府权力的约束，构建了稳定而灵活的处理区域关系的适宜机制。欧盟则在推动欧洲区域一体化过程中，逐步实现了商品和要素在各成员国间的自由流动，又通过强调空间公平的区域政策设计以校正市场运行的空间结果，协调了区域（成员国）间的利益冲突。

中国是一个国土广袤、人口众多、区域差异明显的国度。1949 年以来，经过多次调整，区际关系仍然存在诸多矛盾。一方面，区域间的利益冲突仍然没有得到有效化解，区域间经济交往中各种有形和无形的壁垒仍然存在；另一方面，中央政府试图通过经济资源和制度资源的配给来实现区域治理的努力正在削弱市场作为基础性资源配置手段的机制，而这一非市场化资源配置行为的效率和公平性也正受到实践的考验。从历史中总结教训，从他国经验中得到启示，无疑对于构建中国特色的区域竞争合作秩序具有特殊重要意义。

二、最优区域竞争合作秩序的理论分析

区域最优竞争合作秩序有两层含义:其一,最优秩序要求各地方政府拆除区域保护主义的藩篱,最小化区际交易成本,以实现要素流动自由和区际贸易自由,达成区域一体化;其二,最优秩序要求对自由竞争条件下的区域利益格局进行整合,特别是要校正市场运行造成的不公平的空间结果,实现区域协调与区域公平。

(一)市场自发作用下的空间秩序及其不合意性

缪尔达尔在对欠发达经济体的长期考察中,提出了累积因果循环理论。该理论认为,欠发达经济体的二元经济结构不仅体现在城乡对立上,也体现在区域的差异化发展中。在市场作用下,由于要素的趋利性,"回波效应"(back wash effects)总是大于"扩散效应"(spread effects),其结果就是区域差异的扩大化,形成地理空间上的二元结构,造成区域发展事实上的不公平。由此,缪尔达尔得出结论:市场力倾向于扩大而不是缩小区域差距。根据缪尔达尔的观点,市场可以产生有效率的资源配置结果,但它以局部空间的利益流出和发展机会的丧失为代价,造成区际的不公平。

NEG 理论的开创者克鲁格曼在其"核心 - 边缘"(简称 CP)模型中指出:即使是在初始条件完全相同、经济活动完全均匀对称的均质化地域空间上,若任由利伯维尔场(即自由市场)的运行,由于偶然的随机扰动,在报酬递增机制的累积循环作用下,经济活动总会倾向于在少数空间节点上集聚生长。这一倾向体现了经济活动的效率逻辑,即经济集聚是实现效率增进的空间现象。但在效率逻辑背后,我们也看到边缘区域长期稳定的存在。在效率增进的过程中,优质的资源要素总是向具有更高效率的核心区域流动,从而牺牲了边缘地区平等的发展机会。菲力蒲·马丁(1999)结合内生增长理论和 NEG 理论提出的模型也表明,经济活动的聚集度越高,就越有利于创新和经济增长,但也会导致更大的区际收入差距。基于此,马丁提出了区域政策在实现空间效率和公平中的重要作用,并进一步认为那些旨在降低边缘地区创新障碍和创新成本的政策措施(如边缘区信息通信基础设施建设、R&D 补贴、教育投资、有利于创业的

金融市场的培育等）比之于单纯的区域转移支付政策更有利于实现效率和公平的双赢。①

尽管方法不同，视角各异，但累积因果循环理论与 NEG 理论结论一致。自由竞争的市场机制导致了一个有效率的经济结果和空间格局，也形成了一个差距不断扩大化的区域画面，整体效率的增进以部分区域发展机会的丧失为代价。为此，最优区域竞争合作秩序的构建必须在整体效率增进和区际公平间求得平衡。一方面它要保护利伯维尔场的运行秩序和由此形成的空间结果；另一方面，它必须为区际公平提供解决方案。

（二）集权或分权模式下区域竞争合作秩序的构建及其局限

市场在空间公平的实现上无能为力，政府的科层治理体制就成为调整区际关系最重要的手段。下面就集权或分权模式下，单一权力中心在构建区域竞争合作秩序中的优势和局限进行探讨。

单一集权模式基于这样的假设：区域并非独立的利益主体，国家利益与区域利益天然一致。于是，经济资源与制度资源高度集中于中央政府，中央集中决策取代了地方分散决策，区域处于国民经济的附属地位，地方的独立性和灵活性完全被忽略。无疑，民族国家和统一大市场的形成是近现代国家强盛的基础条件，也是区域和谐关系形成的前提，而单一集权模式对此不无帮助。但单一集权模式下构建区域关系和处理中央与地方关系中存在三个难题。其一，该模式是用"政治市场"替代"经济市场"以配置资源，用区域间的政治话语权博弈替代了区域间的经济竞争。在"政治市场"上，以政治权力配置资源显然不比市场竞争配置资源更加优越，甚至会受制于利益集团的操纵而丧失其公平性，资源的非市场化配置明显是对市场机制的削弱，长远看并不是正确取向。其二，该模式的中央集中决策对地方分散决策的替代，可能导致制度安排和政策措施无法贴近于区域实际，导致制度空转和政策无效率。地方政府之所以存在的一

① 相关讨论参见 Martin, P. (1999): Are European regional policies delivering? El B Papers, 4, pp. 10－23 及 Martin, P, and G. I. P. Ottaviano (2001): Growth and agglomeration. I nternational Economic Review, 42, pp947－968.

个重要理由就在于它更加贴近于区域实际,更能够从区域的本位利益出发为区域的福利增进提供支持。因此,中央集中决策对地方分散决策的替代,并不能实现对区域发展的科学决策,也无法保证区域的正当利益得到维护。其三,该模式压制了区域创新能力的培育。创新是区域发展的不竭源泉,中央集中决策和集中化的资源配置机制,必然导致地方等、靠、要的思想,不思进取并不是地方之所愿,而是无奈的选择。

单一分权模式在构建区域关系中的优势正好在于它能弥补集权模式的问题,即它有助于区域主体的利益诉求得到充分表达,有助于保护地方积极性,有助于培育区域创新能力(特别是有助于区域制度试验和制度试错的实践),也有助于制定贴近区域实际的制度安排和政策设计。但它同样存在诸多难题。主要表现在,该模式将导致区域保护主义盛行,从而导致市场整体运行效率的低下。特别对于边缘地区,尽管区际比较优势原则下也能使边缘区域从区际贸易中获益,但相比获益更多的核心区域,区域要素向高梯度地区的单向流动、区际贸易条件的恶化及利益流失导致其发展机会远远小于发达的核心区域,对于它们而言树起贸易保护的藩篱至少在道义上具有正义性。而分权模式下的分散化决策机制也为区域保护主义大开方便之门。

(三)多中心治理:区域最优竞争合作秩序构建的适宜选择

上述分析表明,市场力量不仅无助于构建合乎区际公平要求的区域关系,更可能激化区际冲突;而依靠单一的行政权力中心也难以达成效率与公平兼顾的空间秩序。因此,区际关系的处理在更大程度上属于公共事务领域,最优秩序的构建有赖于合乎民意的公共决策,并需要通过一整套完善的公共治理机制来解决。在公共治理研究领域中,奥斯特罗姆夫妇(Elinor& Vincent Ostrom)的多中心治理理论对于本节的研究尤具启发意义。

多中心治理理论探讨了公共产品的有效供给和公共事务有效治理的可行模式,提出在市场体制和政府官僚体制之外,存在着一种可能的体制安排——多中心治理体制,这一体制对于公共领域的有效治理具有重大意义。在奥斯特罗姆夫妇看来,公共产品的供给或公共事务处理存在着

多个主体，中央政府、地方政府、公共机构、非政府组织、私人机构和公民个人都可能是公共产品供给主体或公共事务处理主体。公共产品供给和公共事务处理的多主体特点意味着同时存在着多个决策中心，公共产品供给是包括政府在内的多方共同作用的结果，而公共事务处理中也存在着多种力量的角力。因此，公共领域的治理体制不应该是单一中心治理体制，而是存在多个决策中心的多中心体制。在多中心治理体制中，有必要构建一套建立在契约委托基础上的规则体系以规范各决策中心的行为和权力运行边界，解决主体间的利益冲突，形成合力。就公共事务领域而言，多中心治理理论旨在说明：用政府特别是中央政府垄断公共权力的方式处理公共事务并不能达到“善治”，庞大的官僚科层组织决策在多样化的公民偏好面前无能为力；而多中心治理体制可以灵活反映公民偏好，艾莉诺·奥斯特罗姆认为该体制可以在“更为广袤的大城市地区内跨越每一个正式实体的职能上的或者地域上的约束，实现更为广泛的社群利益或者公共利益”[①]。当然，多中心治理的效率优势是有条件的，即：“如果多中心政治体制能够解决冲突，并在适当的约束之内维持竞争，那么它就能够以富有活力的安排来解决大城市地区各种各样的公共问题。”[②]运用多中心治理理论，文森特·奥斯特罗姆重新梳理了美国联邦主义者的文献，深入分析了联邦主义的实质，充分肯定了其在公共治理中的积极意义。文森特认为联邦主义实质上是一种自主分立、重叠管辖的多个政府单位共存并且同时直接面对公民个人的公共治理结构（文森特称之为“复合共和制”），体现了统一宪法框架下的多中心治理理念[③]。复合共和制的特点在于“每一个政府，包括州政府和全国政府，都被设计得具有其自己的意志，并在本质上相互独立。每一个政府都能够代理公民个人，关心个人的希望与恐惧，拥有一切手段，并有权采用一切方法，以执行委托

---

① 埃莉诺·奥斯特罗姆．公共服务的制度建构[M]．宋全喜，等，译．上海三联书店，2000：136.

② 同上．

③ 篇幅有限，此处不作深入讨论。相关论述参见：文森特著《复合共和制的政治理论》（毛寿龙译，上海三联书店1999年版）及麦克尔·麦金尼斯主编《多中心治道与发展》（上海三联书店2000年版）。

给它的权力。那些可以分别提供的事务,则根据自治原则,由各州内的政府处理。那些需要共同关心的事务,不能由各州分别处理,则要根据共存运作的自治原则由有限的全国政府处理。"[①]在这一治理结构中国家整体利益得以体现、各层级区域的主体性和积极性得到认可、跨区域的利益冲突得以化解、公民的多样性偏好得以表达,有效地避免了单一权力中心在公共治理中的局限。

多中心治理理论对区域最优竞争合作秩序构建的意义在于:区域最优竞争合作秩序的构建是涉及中央政府、各级地方政府和公民个人的公共事务,三者都是平等且独立的决策主体。但是公民的决策是分散的,无法形成统一的集体行动,这就需要公民通过委托契约赋予中央政府和各级地方政府一定范围和领域内公共事务管辖权力,明确各自的权力运行边界。因此,中央政府只是有限的全国政府,它的公共事务管辖权力仅限于那些不能由各级地方政府解决且又属于共同关心的事务;而地方政府的公共事务管辖权则主要限定在区域内部事务。无疑,多中心治理理论为我们处理区际关系问题提供了崭新视角。它不再把最优秩序的构建寄托于单一权力中心,而是希望通过公民、中央政府和各级地方政府的平等互动,构建灵活的多中心治理结构,达成中央和地方公共事务管辖权力的合理分割,满足公民的多样化偏好,保证区域活力和区域协调,实现国家整体利益。

三、区域竞争合作秩序构建中来自中国历史的教训

作为世界上绝无仅有的具有五千年文明积淀、人口众多、国土广袤且区域差异显著的国家,中国在其区域关系及中央和地方关系处理中积累了大量经验,但教训也非常深刻。

春秋以降,中国经历了四百多年的诸侯割据,东周作为中央政府徒具象征意义,弱中央、强诸侯的格局导致了四百年的战乱不休,区域本位利

① 文森特·奥斯特罗姆. 复合共和制的政治理论[M]. 毛寿龙,译. 上海:上海三联书店,1999:7.

益被置于至高无上的地位，分散化的决策机制导致区域利益冲突被放大到极致，只有依靠战争作为最终的解决手段。这样的区域关系后果是灾难性的。但这段时期也是中国制度创新和文明演进最关键的时期，诸子百家的智力创造后世子孙无法企及，诸侯间的制度竞争也导致具有竞争力和效率优势的制度安排脱颖而出，并迅速推行于各地。其中，秦国商鞅变法、魏国李悝变法、齐国管仲新政都是在区域激烈竞争的时势下产生的具有深远影响的制度创新成果。秦始皇统一六国后，鉴于弱中央的惨痛教训，反其道而行之，创造了影响中国历史进程的郡县制，建立了"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的高度中央集权国家，后世统一的王朝莫不是这一模式的变种。统一民族国家的形成及始皇帝对文字、货币和度量衡的统一，完成了区域一体化的任务，从而为汉代盛世打下了制度基础，也使得区域利益让位于国家整体利益。但始皇帝完全无视地方诸侯利益的做法立刻招致地方利益集团的强力反扑，秦二世而亡，不是亡于政府的腐败，而是亡于制度过于激烈的变动，亡于地方诸侯本位利益的惯性。汉高祖吸取秦之教训，部分地复原了分封制，但推行到景帝时期，地方诸侯的坐大又一次危及国家统一，"七国之乱"印证了分封制度难以克服的痼疾。从汉武帝以后，中国处理区域及中央与地方关系的郡县制逐步成为基础的制度安排，其影响甚至达于今日中国。但是，郡县制也并不是处理中国区域关系及中央和地方关系的最优选择。历史表明，此后的中国并没有进入一条持续发展的康庄大道上，而是落入王朝周期性更替和区域分分合合的循环往复怪圈中。中国历代的王朝短则数十年，长也不过三百多年。其中原因固然很多，集权模式下形成的制度死锁无疑是其重要因素。几无变通的制度长期行之于帝国全境，而地方政府又无法更无权根据变化的区域形势作出相应的制度变通，王朝的败亡成为必然。

考之中国历史，可以得到两点教训，过度的地方分权往往导致区域各自为政的乱局，而过度的中央集权又致使地方创新能力完全丧失，区域的首创精神和积极性在制度的死锁中消耗殆尽。集权与分权关系的不当处理始终是中国难以构建起有效的区域竞争合作关系的关节点。

四、区域竞争合作秩序构建中来自欧美经验的借鉴

按照托克维尔《论美国的民主》的看法，美国是独一无二、难于效仿的，这从它的区域关系构建中也可以窥见一斑，美国联邦制度下的区域关系构架是一个很特殊的例子，世界范围内绝无仅有。独立战争后，美国最早的13个州名义上组成了一个中央政府，但这只是一个松散的邦联而已，所谓中央政府不过是各州为协调州际关系和对外关系而组成的一个联合办事机构，有点像联合国。各州事实上仍然是独立王国，它们甚至为了一条河流的航行权而大打出手。独立11年后，美国人发现过度的分权往往造成各州间利益冲突无法得到解决，而利益冲突下各州政府的区域保护主义倾向也日益明显，一个有力的中央政府势在必行。于是13个州以契约形式通过了1787年《美利坚合众国宪法》。从区域关系构建的角度来理解1787年宪法，其思路其实很简单：既然州政府不能有效地处理区域冲突和跨区域问题，也无法构建统一、自由、无摩擦的一体化市场，那么各州政府就把解决相关问题所需要的管辖权让渡给联邦政府，由联邦政府来处理相关事项；而区域内部事务的独立管辖权仍保留在各州。于是就形成了中央和地方有各自明确和独立的管辖权，各自的权力边界十分明晰，形成了不相统属又相互补充和协调的区域关系治理架构。中央集权和地方分权的优势得到巧妙的结合，而各自的缺陷又得到巧妙地克服。奥斯特罗姆将这种联邦主义理念归结为"复合共和制"，并运用其多中心治理理论论证了其价值合理性和经济合理性。

欧盟在推动欧洲区域一体化过程中，逐步实现了商品和要素在各成员国间的自由流动，欧洲统一大市场的形成为资源要素在跨国界范围内的优化配置提供了可能，这对于保证欧洲经济活力和竞争力无疑意义深远。但欧盟在其一体化过程中，并不是单纯着眼于欧洲整体活力和竞争力提升，而把相当大的精力和资源投注于区域协调和区域公平上。欧盟的有效运行，除了欧盟宪法框架、经济一体化和货币一体化等最小化区际交易成本的制度安排外，也非常关注通过区域政策和与之配套的运行基金实现区域的协调和利益共享的机制建设。为了确定区域政策工具的受

益区域的范围，欧盟由欧洲委员会统计局设计出识别“问题区域”的基本统计地理单元（NUTS）。进而欧盟通过区域间GDP、失业率、环境污染等指标的衡量，对基本统计地理单元进行分类，并将问题区域分为三大类，即落后区域、萧条区域与膨胀区域，针对不同类型的问题区域制定相应的区域政策。同时，欧盟更通过多元化的区域政策工具和规范的区域基金（如共同农业政策基金、结构运行基金）来源，为达成目标提供必要保证。

五、大国区域关系治理的几点结论

其一，累积因果循环理论及NEG理论的分析表明，自由竞争的市场秩序导致了一个有效率的经济结果和经济活动集中化的空间格局，从而也造成一个差距不断扩大的区域现实画面，整体效率的增进以部分区域发展机会的丧失为代价。为此，最优区域竞争合作秩序的构建必须在整体效率增进和区际公平间求得平衡。一方面它要保护自由市场经济的运行秩序和由此造成的空间格局；另一方面，它必须高度关注区际利益冲突和利益协调，实现区域公平。

其二，中央集权有利于最小化区际交易成本，有利于维护区域一体化大市场的运行秩序，有利于资源要素的跨区域优化配置。但它对区域主体利益的忽视、对地方积极性和创造性的压制以及对其所控制的经济资源和制度资源的非市场化配置都反映出其局限。

其三，地方分权有利于区域主体利益的充分表达，也有利于区域创新能力的培育，有利于制度资源的发掘，有利于区域制度安排和政策设计更加贴近于区域现实。但失之于区域保护主义的泛滥、失之于统一大市场运行效率的降低。

其四，区域最优竞争合作秩序的构建主要取决于中央集权与地方分权关系的有效处理。从奥斯特罗姆多中心治理理论的分析看，中央和地方的权力都只能是有限权力，而权力源于公民的契约委托。公民通过契约委托把不同领域的公共事务管辖权分别赋予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其中，中央政府权力运行的主要领域是那些大家共同关心的事务，包括跨区域的事务；各级地方则对于区域内部事务拥有独立管辖权，中央政府不得

干预。就中国的实际而言，区域最优竞争合作秩序的构建关键是要厘清中央权力和地方权力运行的清晰边界。中央需要逐步弱化其经济资源配置权力和制度供给垄断，强化其维护市场运行秩序和协调区域利益冲突的核心作用，而中央区域协调政策的关键是要科学确定基本统计地理单元，并在此基础上识别问题区域，进而针对不同的问题区域提供针对性的政策和资金配套；地方政府则需要一个受宪法确认和保护的权力领域，特别是区域内部事务的独立管辖权，保证区域主体利益得到充分表达，保证区域的充分自主性和能动性，保证宪法框架下地方政府的制度试验权和制度供给权，并通过区域间的制度竞争为经济社会的良性演进提供条件。

CHAPTER 6

区域成长中的社会人文维度

未来的社会是"一个更高级的,以每个人的全面而自由的发展为基本原则的社会形式,""在那里,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

——摘自马克思《资本论》、《共产党宣言》

本书第三至五章都纠缠于区域经济问题的讨论中,而在这章又可以沿着第二章中提及的包含文化、政治等因素的社会人文领域去重新审视区域成长。这是一个愉快的话题,在讨论完面包、牛奶等形而下的问题后,终于可以飘然而上,在形而上的层面上,去关照一下人类精神领域和心理层面的问题,并从区域的社会人文[①]发展重新理解区域成长和区域经济。本章将再次重申本书的基调:把区域的社会人文发展看作区域成长最本质的内容,把人的自由的扩展看作区域成长的灵魂。在此基础上,本章讨论了分工如何塑造了区域的社会人文面貌和价值信仰体系,特别强调了:当前所处的社会既是一个由分工导致差异不断扩大的社会,又是一个由分工导致更加紧密联系的"有机团结"的社会。差异的扩大导致了文化多元的特征,而人与人更加紧密而广泛的联系导致人类需要有一个维持人类交往的共同价值基础(普世价值)。本章也讨论了区域的社

① 在本书中,社会人文因素更多地指政治与文化因素,又特别强调文化的精神层面,即文化所体现的意识形态、价值信仰和伦理道德。

会人文面貌和价值信仰体系又怎样影响到了区域经济的运行和区域经济绩效。本章还会为全书打上最后一个补丁，把国家和它的政府纳入分析的视野，讨论它们在区域成长中扮演着什么样的角色，起到了什么的作用，分析不同条件下国家（政府）的决策偏好，而国家（政府）偏好又怎样影响了区域运行的绩效。

第一节　从社会人文维度重新讲述的区域故事

我们很少注意到古代中国城市和西方城市的显著差异及其对各自文明发展的影响。同样生活在城市，有着七情六欲的一群人，他们在西方世界里经历了由臣民（或教民）到市民进而成为公民的身份转变，并把城市从贵族、神父的城市变成了市民的独立自治城市，进而又把它们改造为公民自己的城市。这种身份的转变，这种城市内涵和性质的转变，见证了西方现代文明发生、发展和成熟的全过程。我们也不太关注这样的事实：与我们毗邻而居的一群人，仅仅是由于宗教信仰的不同、价值理念的差异，就产生了迥异的生产、生活方式。当你不是作为一个游客，而是作为一个文化的体验者游历异乡的时候，多元文化带给你的，绝不仅仅是视觉冲击，而一定是心灵震撼。政治和文化（或社会人文环境）对区域的塑形作用，在新古典经济学中不会被提及。但它就在那里，让你不可能不对它投以深切关注。

一、中西方古代城市演化的殊途和最终归宿：社会人文维度的观察

城市是农耕社会分工发展的一个结果，最初它只能附着在农耕文明的躯体上，只是农村的延伸，只是农村经济社会关系和文化传统在城市空间的再现。正如斯宾格勒指出的那样："那些外表上从乡村发展起来的东西并不是城市，而是某种意义上的市场，它只是农村生活的一个利益汇合点而已。在这里，没有独立生存的问题。一个市场中的某个居民可能是一个工匠，也可能是一个商人，然而他首先是作为一个农民来进行生活

和思考的。”“乡村的市镇衬托了乡村，它是乡村图景的一种强化。”[1]但是，随着西方城市的不断变异，它逐步摆脱了农村的羁绊，独立地经营着自己的文化环境和政治生态，发展着属于自己的经济类型，并成为现代西方文明的策源地。

中世纪的西方城市，并不是一块宁静的空间，教会、教堂固然重要，君王贵族们固然可以趾高气扬，但比之农村气息沉重的保守势力和保守文化，城市显然要开放得多，新鲜的空气、灿烂的阳光总是最先光顾那些对新奇事物保持宽容甚至欢迎态度的城市化区域。中世纪后半期，随着阿拉伯世界对欧亚大陆控制能力的削弱和欧洲人对新的海上贸易通道的发掘，地中海、北海和波罗的海周边的城市开始活跃起来，潜在的赢利机会对于那些具有冒险精神的贫苦农民而言充满着诱惑，他们开始涌入城市成为工匠或商人，追寻自己的富裕梦，而贪得无厌的城市商人也越来越不堪忍受贵族、君主和教会强加的各种封建义务。于是，在城市中产生了一股力量，要求摆脱封建主控制，实现自治，获得诸如征税、拥有军队、颁布法律、发行货币等自治权利。于是，工匠、商人们联合起来，通过各种方式（如起义、说服、赎买，等等）与封建主讨价还价，在整个12世纪到13世纪，争取自治权的运动此起彼伏。最终，大量的城市获得了贵族、君主们颁发的形式内容不一的特许状。此时的城市，变成了市民的城市，封建等级制度在市民的城市中瓦解。城市的市民比之乡下的亲友拥有了更多更实在的自由和权利。城市从封建主（贵族、君主）控制向市民控制的转变，意味着一种新的秩序、新的文化氛围开始滋生。

西方城市的市民社会、市民文化比之保守的农村地区和乡村文化，更强调开放与包容。因此，这些城市也往往是新思想、新事物的温床。新教在这些地方得到认可和广泛的传播；荷兰的城市，如阿姆斯特丹，地中海周边的城市，如佛罗伦萨、威尼斯等，开始成为新文化运动的中心。这场新文化运动（我们现在称之文艺复兴）打着复兴古希腊、古罗马文明的幌子，贩卖着人文主义的新酒，把人们从上帝那里、从对天堂的幻想中招回

---

① 奥斯瓦尔德·斯宾格勒．西方的没落[M]．江月，译．长沙：湖南文艺出版社，2011：74，77.

到现实世界，鼓励他们追求世俗的富足与幸福。在市民社会里，宗教开始退守到人类生活的精神领域，变成了个人事务，宗教组织也不再是主宰世俗事物的重要机构。这一过程，也往往被学者称之为宗教世俗化过程。在市民社会里，一种自由、平等、包容的社会氛围开始种下了它的种子，在不久的未来它就会开花结果。

西方城市进入市民社会，由市民文化所主导的时候，由于市场规模有限，为了保证每个工匠有活做，每个商人有生意，就必须把他们有效地组织起来，实行统一的管理。于是商业行会和手工业同业工会应运而生。这些行会和同业工会，控制着商业和手工业几乎所有的重要方面，如对工时、工资、雇工、质量规格、广告、售卖、价格和新工艺的采用等都有严格的控制。因此，自治城市的商人和工匠虽然摆脱了封建领主和主教大人们的统治，获得了更多的自由和权利，但在经济领域仍然缺乏自主性。直到外部环境为他们提供了更加广阔的市场空间以后，行会和同业工会才失去了存在的意义。一个更加开放、包容的社会环境诞生了，而一个更加平等、自由的市场经济也应运而生了。以平等、自由为诉求的市场经济不仅仅是一种经济运行机制，也是一种社会整合力量。它扫除了各种特权（封建的特权和行会、同业工会的特权），经济主体间的平等成为一种理念和信仰，对私有财产的敬畏、对契约精神的遵守、对他人权利的尊重，成为一种新文化的底色。可以说，在这样的社会环境和文化氛围中，每个市民在事实上都成了享有平等民事权利、独立承担民事责任的公民。公民社会的诞生，意味着西方的城市完成了它最华丽的一次转身，现代文明的曙光降临到了那些热爱自由、追求公正、强调个人权利、主张包容的，由公民社会组成的城市中。

从人文视角观察西方城市的演变和现代西方文明的诞生历程，我们感受到的无非是这样一个过程：社会人文领域的不断发展，把人类从神的世界里招回到现实，并不断地赋予人类以更加平等、自由、包容的社会人文环境，从而把人类带进一种新的秩序、新的文明形态中。当然，促成这一过程中的经济因素不可忽略，但经济发展只是为这一过程提供着基础和条件，并不是这一过程的实质内容。

到此，我们如果从社会人文发展的视角重新理解中国城市为什么没有实现文明的超越时，一个更加清晰而明白无误的答案就会摆在我们的面前。

马克斯·韦伯对中国问题的一系列研究，就是从中国城市开始入手的。站在他者的立场，作为一个局外人，韦伯非常容易地发现了中国的古代城市与西方城市的重要差别。在韦伯看来，中国的古代城市从未获得过类似西方城市的自治，没有自治权的城市也就不可能像法人团体那样运转，没有诸如西方城市中的誓盟组织和自治的政治团体，不可能实现城市在法律上和军事上的独立。因此，中国城市居民也从未组成单独的市民地位团体，从未享有包括特权和职责在内的、自治的城市司法权。这些城市的居民们并不比他们的乡下亲友更能超脱于传统的家、国观念和农耕文明根深蒂固的思想意识形态。他们的精神仍然深深地扎根于乡土，他们仍然只是家族的一个分子、村社的一个成员；他们的财富最终会变成乡村里一块块田地，他们的生命也最终将落叶归根，并在他们的家族墓地里寻到属于自己的最后那一小块方寸之地。古代中国城市对农村社会和农村经济的依附性和伴生特点，决定了在它的体内不可能孕育出新的文明因子，它们只能是乡村的延伸，只能是农村社会经济关系和文化传统在城市空间的再现。

二、区域成长的社会人文底色和它的多元色彩

笔者身为汉族，出生成长在彝族地区，也多次进入藏族地区，而又工作生活在成都，对不同的社会和文化的感受自然会多一些。我深深地为一些彝族地区现代化进程中，传统社会组织和社会资源的丧失、传统价值信仰体系的逐步解体所诱发的一系列社会、经济问题所震动；为藏区随处可见的经幡、白塔和玛尼堆，为五台山下从拉萨一路叩长头而来的藏族大妈所感动。在西宁的东关清真大寺和三十公里外藏传佛教著名的塔尔寺，你会发现，仅仅是几十里之遥的空间距离，文化造就了天壤之别的两个不同世界。区域因文化而不同，因文化而精彩。

案例链接：

中国少数民族地区[①]的文化多元性和区域多样性

中国少数民族地区不仅受到汉文化影响，也受到来自伊斯兰文化、佛教文化以及基督教文化的深刻影响，外来的文化元素与各少数民族自身文化，特别是与本土原始宗教融合共生，在不同区域形成了各自特色鲜明的亚文化区，宗教成为这些区域基础性的文化标识，而传统文化演进就根植于宗教的流变之中。少数民族宗教在其流变的过程中，由于地缘特征、自然资源、对外交流等外部环境因素及政治经济发展水平、经济基础等内部环境因素的差异性，导致环境在对宗教的各个演化路径的选择上出现了明显的差别，形成多样化的宗教演化路径。由此我们可以看到多元化的宗教信仰广泛地存在于不同的少数民族地区，即使是同一种宗教，在不同的少数民族社区也存在着不同的形态，从而可以从形式和内容上加以区别。因此，民族地区是我国文化多样性最丰富的地区，如果从少数民族文化的内核——宗教来对民族地区的多元文化进行粗略分类，大致可以把民族地区分为三个亚文化区域。一是伊斯兰教影响区，主要集中于中国西北地区；二是藏传佛教影响区，分布于西藏、四川、青海和甘肃、云南等地；三是南传佛教影响区，主要在中国西南部地区。当然，民族地区文化多样性不仅体现为宗教信仰的差别，不同的民族在价值观、传统习俗、礼仪规范、生活方式等诸多方面也呈现出缤纷的色彩。即使是同一民族，由于生活的地域环境等方面的不同，也存在明显的差异。比如藏区的藏传佛教教派众多，不同区域的信仰、服饰、语言、习俗等都有明显的差

① 中国少数民族地区是指在民族区域自治制度下实行民族区域自治的地区，其行政区域范围包括：5个民族自治区，其面积为437.5万平方公里；5个民族自治区以外的25个自治州（云南8个，贵州3个，四川3个，甘肃2个，青海6个及湘西、恩施、延边等三个自治州），面积为137.5万平方公里；以及除上述区域以外的87个自治县（旗），其面积为40万平方公里。以上合计面积达615万平方公里，约占全国国土总面积的64.1%。

别，而农耕区、牧区和半农半牧区文化表现也各有差异。

以宗教为核心和主要标识的少数民族文化，不仅仅是一种意识形态、一种文化现象，它还是民族地区重要的制度安排，是指导信教群众处理人与自然、人与人之间各种关系的行为规范，或者说它是信教群众在处理各种关系的一种“惯例”；它更是少数民族信教群众的精神动力系统和深层次的心理因素，提供着人生终极意义的解释，提供着生产、生活行为的道德合法性支撑。不一样的文化氛围（社会人文环境）自然产生培育出不一样经济社会形态，塑造出不一样城市和农村，不一样的牧区和农区，不一样的经济活动和不一样的经济绩效。

区域被文化塑形，被社会人文环境改造。由此观之，是因为文化、政治的差异，使得中国古代社会完全不同于西方古代社会。蒋介石虽然是个失败者，但他对中国文化的理解及这种文化对社会经济整合作用的分析却很精当。他将中国王朝政治的特性诉诸社会和礼俗的“自治”，而非国家的控制。在《中国之命运》（文华出版社，1945 年）中，他指出：“中国固有的社会组织，在血统方面，由身而家而族；在地域方面，由家族而保甲而乡社。两方面的系统都很分明。两方面的训练和教育，亦最为古来的贤哲所致力。由个人日常生活方面的箴规，推而至于家，则有家礼，有家训；推而至于族，则有族谱，有族规。在保甲则有保约，在乡社则有乡约和社规。其自治精神，可以举修齐的实效，而不待法令的干涉。其互助的道德，可以谋公众的福利，而不待政府的督促。言教育则有乡校和社学。言赈济则有义田和义庄。言积谷则有社仓的储蓄于修筑和输浚。”[①]由此，不难看出，古代中国与古代西方的差别，不在于器物之优劣，不在于经济之贫富，实在于文化政治之殊途。古代中国之社会经济形态，实由社会人文环境所塑造。而判然有别的基督教世界与阿拉伯世界，也实源于文化底色之不同。

① 蒋介石《中国之命运》最早发表于 1943 年。有专家考证，此书实非蒋氏亲力为之，而是由陶希圣捉刀完成。这里不作区分。

第二节　分工演进、社会人文发展与价值体系的多元融合

分工造成了一个社会分层的现实，管仲关于士、农、工、商的职业划分，其实也是一种社会地位、社会角色的划分。在现代社会，分工水平达到一个前所未有的水平，由此而产生的社会分层也精细到前所未有的水平，人类个体在社会中承担的角色及形成的社会地位更加复杂而多元。上述状况既造成了无所不在、无所不包的社会冲突，也为社会的有机团结和有效整合创造了可能，为一个多元并包的人类价值信仰体系的形成和普世价值的产生创造了可能。

一、经典作家关于分工、社会人文和经济间互动关系的思考

（一）马克思关于分工的社会人文内涵的解读

分工也是马克思非常关注的话题，他不仅探讨了分工的经济意义，也特别关注了资本主义社会的分工现象对资本主义社会上层建筑和意识形态的影响。在他非常著名的阶级理论中，资本主义的分工造就了两个水火不容的阶级：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由于屁股决定脑袋（即存在决定意识，物质决定精神）的原理，资产阶级形成了他们自己的政治组织、意识形态和价值体系，并把他们的这套东西借助资本的力量强加给社会；而无产阶级也逐渐形成了对抗资产阶级的文化符号，如劳动价值、剩余价值、阶级斗争、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等等。于是，分工的发展，在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下，就变成了导致这个社会异化和社会分裂的重要原因。

在这里，马克思不是从一般意义上反对分工，他看到了分工的必然性和它为未来社会创造的各种可能性（包括一个个人自由而全面发展的未来理想社会）。他所强调的，是不同生产关系条件下，分工的社会人文后果是不一样的，社会的健康发展有赖于生产关系的调整，而不是对分工的抑制。

（二）韦伯关于社会分层及文化对经济影响的思考

（1）社会分层的理论。

马克斯·韦伯也观察到了社会分层的现实，不过他不是从分工、从生产关系因素去理解社会分层现象及其社会影响。而是通过财富、权力、声誉等三个重要因素分析了社会阶层分化的成因。其中财富因素是影响社会分层的经济因素，是实现社会分层的首要参数，经济收入或财富的多寡决定社会分层的基本状况。我们看到的诸如“天上人间”（一个因媒体曝光而名气大得一塌糊涂的富人俱乐部），“海天盛筵”（一场在海南三亚举办的多方位高端生活方式展示会），这些组织的进入门槛，只有一个字：“钱”。社会分层不单单会因为经济地位不同而产生，政治因素也是实现社会分层的重要因素，由权力[1]标准来执行的社会分层，在社会上也清晰可见。中国人的官本位意识，民间产生的仇官心理，都是由权力不对称分布而产生的社会心理和意识。社会分层还可以因为社会因素而产生，每个个体的声望[2]是实现这种分层的重要标准。在中国古代社会，一个官办学校的校长、一个家族的族长、一位退休的政府官员，甚至一个穷得响叮当的秀才、举人，都可能因为他的声望而超然于普通民众之上。韦伯认为，三种因素（或三种标准）既彼此独立，又相互联系，应该把这三项标准综合起来进行社会分层。社会分层理论为我们理解伦理道德、社会冲突和社会合作等话题提供了思路。

（2）社会人文因素对经济的影响。

马克斯·韦伯获得世界性声誉，成就其与马克思比肩的学术巨匠地位的最重要原因，是他在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兴起之间架起了一道桥梁，使我们可以从文化的角度去认识一种文明发生、发展的基因到底是什么。他在这个领域最重要的著作——《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甚至取得

---

① 在韦伯看来，“权力”意味着在一种社会关系里哪怕是遇到反对也能贯彻自己意志的任何机会。它既可以产生于对匮乏的供给和对生产资料的控制，可以产生于个人或群体在科层组织中的地位，还可以产生于法律和其他因素。

② 在韦伯看来，声望是一个人得自他人的肯定的评价和社会承认，它决定于个人的身份、教育水平、生活方式等。

了比《资本论》更持久的世界影响。韦伯不是第一个从文化因素探讨资本主义兴起的学者，却绝对是最有影响力的一个。

无须刻意寻找，观察下宗教改革后西方不同地区（国家）的发展轨迹，新教伦理影响下的国家和地区（如英格兰、荷兰和大多数富裕国家的城市），总有相对较好的表现；而从每个个体的职业分布和成功比例看，新教徒也明显占优。韦伯指出："在任何一个宗教成分混杂的国家，只要稍稍看一下其职业情况的统计数字，几乎没有什么例外地可以发现这样一种状况：工商界领导人、资本占有者、近代企业中的高级技术工人，尤其受过高等技术培训和商业培训的管理人员，绝大多数都是新教徒。资本主义愈加放手，这一状况亦愈加明显。"[①]因此，资本主义的兴起有着其特殊的精神特质和文化背景；而资本主义在其发展的过程中所呈现的种种特征，总是与新教的伦理态度遥相呼应。针对天主教徒和天主教国家何以不能取得新教徒和新教国家那样的世俗成就的问题，韦伯主要是从加尔文教的清教徒伦理与天主教伦理的差别中来寻求答案。加尔文开宗名义地告诉它的信众，一个人是否能够被救赎，是否能够成为上帝的选民，是否在天堂里拥有一个属于自己的席位，那是上帝早就命定的事情。因此，一个人不可能通过教堂祈祷、通过向教堂捐钱捐物获得救赎，不可能通过贿赂上帝或他的人间代表（教皇、神父）们来获得通向天堂的门票。但每个上帝福音的信徒都有义务在世俗世界里努力获得成功以增添上帝的荣光，必须用自己的努力证明自己配得上上帝选民的称号。于是，商人必须努力经营以赚取更多的财富，资本家必须努力生产以使自己的财富不断增殖，律师们、神父们、教师们以及各行各业的从业人员，必须怀着对上帝的虔诚态度以履行世俗社会赋予他的职责。所以，清教徒们既是入世的，他们需要用世俗的成功来证明他们才有资格成为上帝命定的选民；他们又是禁欲的，因为上帝不是指派他们到世间来吃喝玩乐，他们是为赎罪而兢兢业业地努力工作。禁欲的伦理诉求恰好与资本主义资本积累的

① 马克斯·韦伯．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M]．彭强，黄晓京，译．西安：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2：3.

要求相契合；而努力追求世俗成功以增添上帝荣光的要求，又恰恰与资本主义的工作伦理相一致。于是，在清教徒身上，看到的是一种奇怪的精神气质和心理结构。对上帝的无比虔诚与对世俗成功的不懈追求奇怪地结合在一起，禁欲与贪婪奇怪地结合在一起。

在清教徒眼里，世俗的工作是为上帝履行义务的天职。因此，韦伯说："一个人对天职负有责任乃是资产阶级文化的社会伦理中最具代表性的东西，而且在某种意义上说，它是资产阶级文化的根本基础。"[①]在韦伯看来，这种天职理念所代表的理性资本主义与新教伦理都只出现在西方文明中。而且，这种井井有条、合理而积极地追求世俗成功的理性主义精神，是西方文明独具优势的方面，它发端于古代的希腊、罗马，又以新的面貌在工商业文明中复活了。与其说新教伦理创造了一种新的文明形态，不如说新教伦理为一种新的文明形态提供了最恰当的精神驱动和道德合法性支撑。

（三）涂尔干[②]对社会分工问题及其道德含义的认识

爱弥尔·涂尔干是可以和马克思、韦伯相提并论的社会学巨匠。他的《社会分工论》、《自杀论》、《宗教生活的基本形式》等经典著作至今影响甚巨。与韦伯和马克思不同，涂尔干赋予了社会分工更多积极的道德意义。他所有研究都试图为现代社会的有效整合找到一个坚实的基础，为现代社会合理秩序的构建找到一个可以依凭的条件。他的工作也让我们看到通过社会分工构建一种和谐社会秩序的可能。

涂尔干的经典著作，主要围绕着三个话题展开：社会团结和整合靠什么达到？社会与个人的关系如何处理？集体意识对社会和个人究竟意味着什么？涂尔干把社会团结与社会整合视作一种社会事实，而使社会团结和社会整合成为可能的因素，在人类文明程度较低的阶段和较高的阶段并不相同。在人类社会文明发生的早期阶段，社会团结和社会整合的

① 马克斯·韦伯．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M]．彭强，黄晓京，译．西安：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2：53.

② 爱弥尔·涂尔干（Emile Durkheim）在中文翻译中，经常被译成不同的名字，如迪尔凯姆、杜尔克姆、杜克海姆，这里仍沿用渠东的译名。

力量来自“集体意识”(Collective Consciousness)[①]。来自同一群体的每个个体成员,由于其同质性和相似性,在风俗习惯、伦理道德、人生信仰、价值理念和世界观方面都保持着一致性,这些方面的一致性也就成为集体意识,使得个体成员产生对群体的依赖感、归属感和责任感。涂尔干把由上述依靠集体意识而形成的社会团结称为“机械团结”。而在现代社会,涂尔干从众多的社会团结或整合因素中把分工抽离出来,作为现代社会“有机团结”的根本力量。涂尔干对分工的经济意义并不在意,而是特别强调了分工的社会功能。他指出:“如果说分工带来了经济收益,这当然是很可能的。但是,在任何情况下,它都超出了纯粹经济利益的范围,构成了社会和道德秩序本身。有了分工,个人才会摆脱孤立的状态,而形成相互间的联系;有了分工,人们才会同舟共济,而不是一意孤行。总之,只有分工才能使人们牢固地结合起来形成一种联系,这种功能不是只在暂时的互让互助中发挥作用,它的影响范围是很广的。”[②]透过日益精细的分工,近现代社会造成一种新型的社会团结类型和社会整合力量,形成了一种新型社会秩序。而传统社会向近现代社会转型也是社会由“机械团结”向“有机团结”转变的过程,这一过程中由于集体意识的逐渐淡薄而有机团结尚未巩固,于是“社会失范”现象成为转型期的普遍现象。在《社会分工论》中,传统社会中集体意识与宗教一样,是用一种强制性的力量来人为地干预个体、压抑个体以造成社会团结的局面。因此,分工制取代集体意识和宗教以实现社会团结、社会整合,构建社会秩序,具有明显的社会进步意义。不过,在涂尔干晚期的著作中,他也发现了集体意识和宗教的社会作用即使在现代社会仍然巨大,对集体意识和宗教重要性的否定并不合时宜。

最后,需要强调的是,涂尔干对分工何以产生的问题,有着与斯密不

① “集体意识”是一个已经进入我们日常生活层面的词汇,它强调的是社会群体结合成一个整体所共同依赖的精神和心理层面的因素,“是一般社会成员共有的信仰和情感的总和”(雷蒙·阿隆),“它是一种与外在于你自身的某种东西进行交流的感觉,它不依赖于任何一个特定的人,但每个人都一起参与其中”(柯林斯)。涂尔干指出集体意识是个人意识的表现和结果,但又不同于个人意识,它弥漫于整个社会空间,“是社会的精神象征,有着自己的特性、生存环境和发展方式”。

② 涂尔干. 社会分工论[M]. 渠东,译. 北京:三联书店,2000:24.

同的观点，斯密把分工的产生归因于人类互通有无的交易倾向，并且从分工的经济意义论证了分工产生的必然性。而涂尔干特别强调，不能把一个事物所具有的功能作为解释它产生的原因，因为在时序上事物的产生先于事物功能的呈现，原因在功能之前。分工可以提高经济效率，这是分工的功能，但不是分工的原因。至于为什么会有分工的产生和发展，涂尔干是从人类的生存压力（如人口密度不断增加等）来解释的。

二、分工演进、多元文化与普世价值

（一）图腾与多元文化

图腾可能是人类历史上最早能被现代人识别的文化现象，也是各个民族（族群）最久远、最深刻的历史文化记忆。原始人类把那些现实中存在的动物、植物，或者由他们大脑创造出的非生物作为自己的亲属、祖先和保护神，进而在生产生活和祭祀活动中顶礼膜拜，这就是所谓的“图腾崇拜”了。图腾或许是产生于人类对自然的敬畏，也可能产生于人对自己无知的恐惧，不论其成因如何，图腾现象所反映出的事实无非是：文化是一种带有区域根植性的现象，生活在不同区域的族群，会选择不一样的文化来构造他们的精神和心理世界。蒙古民族关于苍狼与白鹿的古老传说，汉民族对龙的崇拜，彝族对神鹰的向往，都意味着千差万别的信仰体系自原始时代就已经是不可辩驳的社会现实。由此，图腾的多样性表明：从人类还很弱小的时候开始，文化就已经呈现出非常普遍的多元化特征。

古老意义的图腾在现代社会已经不复存在，但千差万别的图腾崇拜并没真正退出过历史舞台。蒙古民族仍然崇拜狼，藏民族仍然敬畏神山圣湖，汉民族仍然宠爱龙；切·格瓦拉、毛泽东不仅作为偶像，也作为一种精神图腾，被愤世嫉俗的激进青年们膜拜；自由知识分子总喜欢把哈耶克、波普尔、诺齐克打扮成引导人类真理探索的精神教父；小资们总爱拿着《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轻》或《挪威森林》之类的小册子，忧郁地坐在咖啡馆的角落里；颐指气使的官员总是派头十足，一掷千金的富豪总是要折腾他们的香车别墅。在这个现代社会里，文化的多元性已经不仅仅停留在国家、民族的层面，也体现于社会各阶层极其明显的文化品位差异上，体

现于每个个体的文化偏好上。因此,现代社会是一个较之古代社会,文化多样性更加丰富,文化差别更加明显、细致的社会。

(二)文化多样性的积极意义:来自中国各民族文化交往史的一个说明

历史上绝大多数的早期文明,如美索不达米亚文明、古埃及文明、古印度文明,都已淹没在历史长河中,唯一存活到现在的只有中华文明。究其原因,民族间多元文化的交流互动和共生发展是这个文明生生不息的动力所在。

所谓“中国人”,从来都不是纯粹的单一种族;甚至其中的多数——汉族,也是在多民族融合的过程中逐步形成的。从考古学角度,中华民族不仅可以在黄河和长江流域找到自己文明的源头,而且也可以在众多的民族地区找到自身文明的蛛丝马迹;从生物学角度,可以发现南方和北方汉族的基因差别甚至大于各自与邻近少数民族的基因差异;而进一步从文化的角度考察,中华民族的发展历史从来都是一部多元文化的交流互动史。从春秋战国以至于当代,哪朝哪代离开了对各民族交往史的叙述,就不成其为中国历史。而各民族间的文化交往不仅限于器物层次的交往。在丝绸之路和茶马古道上,留下的不仅有商队的足迹,也弥散着浓浓的文化气息。这种多民族的融合共生,通过多种文化间的碰撞、交融与彼此推动,改造着中国人的民族性格和文化基因。在可阅读到的中国历史中,大唐盛世大概是当代中国人最为自豪和最为向往的时代,万国来朝的盛况和豪迈的大国气度,至今还印在国人的记忆里。而这一时代的促成,恰恰是古代中国多元包容的文化精神和开放的文化心态所积累的能量在这一时期的集中释放。

何以开放包容的多元文化有如此巨大的能量?可以借用生物多样性的隐喻对此作出解释。一个生态系统之所以能够可持续地繁衍下去,是基于系统内物种间物质、能量和信息的交换,系统中任何一个物种在数量、状态上小小的变化都会对整个系统产生极大的扰动,而物种种类的减少,更会导致整个食物链断裂,生态系统失衡。若生态系统是封闭系统,那么生态失衡将不能得到外部物质、能量、信息的补充,系统衰退甚至消亡将不可避免。同样的道理,一个文化系统,如果内部缺少不同文化间的

碰撞、交流，这个系统就会很快失去新陈代谢的能力而失去生命；更进一步，如果我们的文化系统不能开放与包容，那么它离消亡就不远了。我们观察中华民族发展的历史可以明显地感受到，各民族间每一次文化的碰撞都为彼此提供着丰富的文化养料，为彼此注入文化活力，改造着中国人的民族性格。以草原文化与农耕文化的相互渗透为例，草原文化粗犷、彪悍、刚毅的性格长时期地影响着中国农耕地区的民族。于是，我们在边塞诗人的诗句里会体味到异域文化的性格特质；也会从"燕赵之风"、"胡服骑射"的典故里感受到少数民族文化怎样改变了我们的生活方式和民族性格；还能从敦煌壁画里感受到少数民族的音乐、舞蹈和宗教怎样丰富了中华民族的文化生活。同样，农耕文化的先进因子也通过其强大的生命力渗透到少数民族族群中，先进的文化理念、精致的器物、闲适的生活方式、书籍文字等成为各少数民族仿效的对象。

开放包容的多元文化是中华民族生生不息的动力之源，民族地区文化多样性源源不断地为我们的文明进步注入着新鲜的血液和营养成分了。而中华民族每一次的盛世，都让我们感受到一个开放包容的多元文化是多么的气度不凡！

（三）分工演进、文化多元和价值普世

在这样一个信仰多样、文化多元的社会里，人类是否需要一个共同遵守的价值体系？如果人类需要这样一种普世价值，它的核心又是什么？在各不相同的地域空间和族群中，又如何去实现它？

这些问题在发达的西方世界，围绕着自由、民主、人权、宪政等话题，形成了普遍共识，并在各种各样的文本和表述方式（如各国的宪法条文）中得到呈现。这些价值共识，最终也在超国家层面上得到确认，并集中地体现于联合国《世界人权宣言》[①]中。《世界人权宣言》一共30条，全面界定了人人平等享有的政治自由、思想自由、经济自由的种种方面，每一条

① 《世界人权宣言》是联合国大会于1948年12月10日通过（联合国大会第217号决议，A/RES/217）的一份旨在维护人类基本权利的文献。《世界人权宣言》并非强制的国际公约，但是它为之后的两份具有强制性的联合国人权公约，《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和《经济、社会及文化权利国际公约》，做了铺垫。

都是对人的各种自由和合法权利的确认、重申和强调。如《世界人权宣言》第一条指出:“人人生而自由,在尊严和权利上一律平等。他们赋有理性和良心,并应以兄弟关系的精神相对待。”第二条指出:“人人有资格享受本宣言所载的一切权利和自由,不分种族、肤色、性别、语言、宗教、政治或其他见解、国籍或社会出身、财产、出生或其他身份等任何区别。并且不得因一人所属的国家或领土的政治的、行政的或者国际的地位之不同而有所区别,无论该领土是独立领土、托管领土、非自治领土或者处于其他任何主权受限制的情况之下。”第三条指出:“人人有权享有生命、自由和人身安全。”这些条文,既是西方世界价值观的一种体现,也是人类经历长久纷乱后,希望整合人类价值体系的一种尝试。而同样的问题却一直困扰着每一个徘徊于现代化门外的发展中地区和国家。这些地区和国家长期受到西方世界的压制和打击,总是以满怀狐疑的态度,小心谨慎地对待西方文化的侵入。在这些国家和地区的激进民族主义者看来,西方文化和他的价值体系的侵入,不是侵入,而简直就是文化侵略,他们对于西方的文化沙文主义愤愤不平;在这些国家和地区的精英知识分子中,也往往有人会因为国情、区情之特殊性,对西方价值理念缺乏信心,对西方价值体系中的局限性看得分明,他们希望不仅在经济上,更在政治、文化领域,走一条的路。但到目前为止,不论是新儒家倡导的文化体系还是拉美国家自己的政治与文化道路,仍然处于探索阶段,要让这些探索中的新文化成为现代化的精神支柱,尚须时日。

笔者不是西方文化的拥趸,但对普世价值的存在并不怀疑。沿着涂尔干的分析思路,由于分工的发展,社会被分工分割为越来越小的群体单元,个人意识日益强化,在人类个体的精神和心理层面产生了日益多元和差异化的发展趋势;但分工的存在也使每个人日益依赖于社会上其他成员,分工的真正功能是在社会成员间创造出一种连带感。因此,在上述意义上,分工既造成了文化多元的格局,也为普世价值的产生提供了现实需求。当不同信仰的人群被卷入同一个分工网络体系中,或者说由于分工网络的不断扩大(比如全球化与区域一体化所造成的分工局面),具有多元文化背景的社会成员间的社会经济交往中,必然需要产生一种共同遵

守的行为规范体系，来为这些交往提供支撑，以减少交往的摩擦、提高交往的效率。被不同文化背景的社会成员共同遵守的行为规范体系，就是普世价值。因此，笔者认为：我们当前所处的社会既是一个由分工导致差异不断扩大的社会，又是一个由分工导致更加紧密联系的“有机团结”的社会。差异的扩大导致了文化多元的特征，而人与人更加紧密而广泛的联系导致人类需要有一个维持人类经济、社会、文化交往的共同价值基础（即普世价值）。

从文化的发展看，由于分工的演进，人类交往关系日益密切，交往范围和空间不断扩大。产生于部落内部，用以整合部落内部成员关系，为部落成员交往而提供的那些习俗、禁忌、图腾以及共同的价值、信仰和原始宗教，已经无法适应于更广泛的、跨部落的人员间（包括部落间）的分工和交往。需要注入新的文化因子，为这种在内容和空间上不断扩展的分工网络（或人类关系网络）提供基础和条件，以减少跨部落的分工网络的运行成本（或人与人之间的交往成本）。三大世界性宗教的产生正是基于这样的逻辑，应运而生了。基督教、佛教和伊斯兰教的产生，为更大范围的社会整合和人类关系整合提供了条件，使得人类在各自的文化圈子中能够有一套共有的话语符号、共同的信仰和价值理念，大大地降低了人类交往的不确定性，大大增加了彼此间的信任，为分工网络在更大的范围和空间上展开提供了条件。因此，从部落文化到三大世界性宗教的形成，实质上是由一套部落的价值信仰体系转换成了更一般的、普世性更强的宗教信仰体系，这种转换，使一个个的部落、个人摆脱了部落的藩篱，拥有了共同的行为规范、价值理念和风俗习惯，使分工和交往变得更加容易。

当代社会，世界正被逐步推平，分工跨越了文化地理边界，在全球范围展开。伊斯兰世界、基督教世界、佛教世界和儒家世界，需要更加紧密的分工与合作，需要跨越文化鸿沟，实现更加密切而深入的交往。这种分工与交往，更需要共同拥有一个价值基础和信仰体系，以造成“有机团结”的局面。发展中国家并不一定要遵照西方文化的东西来改造他们自己，但他们必须寻找到各种与经济、社会和文化交往的要求相契合的共同

价值基础。《世界人权宣言》、《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经济、社会和文化权利国际公约》正是适应这种需要而精心设计的文本。笔者深信，一种超越国家、民族（种族）、地域、性别的人类共同价值体系已经成为当代社会的必需，它是深化国际分工、形成更加紧密的国际（区际）交往和更加和谐稳定的国际关系的现实要求。而它的内容是数千年来人类价值思考而形成的各种成果的提炼，它必然通过对人的基本权利及人与人关系的基本准则的表述，通过对自由、民主、人权、宪政等问题的广泛讨论，形成共识，使人类的精神面貌到达更加宽容大度、包容和谐的新境界。

三、为区域的社会人文发展加冕

人是应该被超越的动物，而人类的发展更应该是一个社会人文环境不断被改善的过程。在这个意义上，可以这样来理解区域成长中社会人文发展和经济发展的关系：区域经济问题是我们讨论区域成长的出发点，它构成了区域成长的物质基础和现实条件，但它却注定不是区域成长话题讨论的终点；区域成长最终是以社会人文发展为核心，以人的自由的不断扩展为内容，以人自由而全面的发展为目标。我对马克思所有的崇拜，不是来自《资本论》中冷静而富于说服力的思考，也不是来自《共产党宣言》中激情澎湃的战斗热情，而是他深刻的人道主义情怀，是他对人类命运的深切关怀，是他对未来社会的深深期许。他梦想中的未来社会是"一个更高级的，以每个人的全面而自由的发展为基本原则的社会形式，""在那里，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人类所有的努力，不仅仅是生理冲动的满足，也不仅仅停留在吃饱穿暖的层面。人类的上述需要固然极其重要，但那只是让人成为动物的必要条件；而要成就人的本质，人类必须在精神领域里不断耕耘，在精神层面上不断超越。因此，区域成长中的社会人文维度，是区域成长的最终标尺，它体现了人类对自身命运的终极关怀。

比如关于民主那些事儿，大量的学者和政界人士对发展中国家的民主建设充满疑虑，有人断言民主会阻碍这些国家的经济发展；也有人提出

对穷人而言，面包总是比民主更重要的东西；还有人觉得民主虽好，但对于发展中国家，属于消费不起的奢侈品。对于上述观点，阿马蒂亚·森进行了有力的反驳，他指出：统计检验并不支持对民主的压制会有助于经济发展的结论；也没有证据表明穷人不在意他们的民主权利，来自印度的事实说明穷人也会像守护面包一样保卫他们的公民权利。事实上，一方面，民主作为经济发展的手段而具有工具性的作用，另一方面，民主作为发展目标，它本身就是发展的重要组成部分。

案例链接

从社会人文维度重新理解民族地区现代化

根据马格纳雷拉的定义，“现代化是发展中的社会为了获得发达的工业社会所具有的一些特点，而经历的文化与社会变迁的，包容一切的全球性过程。”由于现代化的概念来自西方社会，而现代化本身也是西方社会在近现代发展过程中体现出来的重要特征的集合，因此有学者简单地照搬西方世界对现代化的理解，认为现代化就是西方化。通常意义上就是指：学术知识科学化，政治民主化，经济工业化，思想文化领域的自由化、世俗化和个人化。我们也确实看到，西方世界现代化的道路虽各有差异，但几乎都殊途同归，似乎现代化也只有按照西方文明指引的方向前进才可能成功。

但是，我们看到一些非西方国家试图按照西方现代化的路数按图索骥的过程中，很少有模仿成功的。是什么原因使得在西方能够成功的现代化模式到了非西方国家就显得水土不服？在排除其他因素后，必须把眼光投注到西方现代化进程中特殊的人文背景上，而在世界的其他角落，对西方的模仿之所以不成功，也在于这些地区的文化往往与西式现代化间缺乏兼容性，从而导致这些地方的文化成为西式现代化的阻碍。以伊朗为例，亲西方的巴列维国王的改革与伊斯兰教传统格格不入，导致社会动荡，伊朗社会在霍梅尼的领导下又重新回到伊

斯兰传统中。因此，既要看到西方社会的成功，看到西方现代化的普遍意义，也要思考在一个缺乏西方人文背景的环境中，怎样才能弥合区域文化与区域现代化间的鸿沟，让文化自觉服务于而不是妨碍现代化的进程。

在多数的发展国家和欠发达地区，文化正成为现代化道路上的阻滞因素，导致这些地区的人们总是在对传统的怀念和对现代化的向往中蹉跎岁月。因此，阿马蒂亚·森指出，"人们不会为废弃的生产方法和淘汰的技术而落泪"，"然而，在文化事务方面，消失的传统却可能令人百般怀念。放弃古老的生活方式会导致极度的痛苦和深深的失落感"。这正是大多数发展中国家和欠发达地区面临的共同问题。森进一步认为："应该由那个社会来决定它是否要采取行动、采取什么行动来保存旧的生活方式，或许甚至为此付出相当大的经济代价。生活方式是可以保存下来的，如果一个社会决定就是要那样做的话，问题在于为了这种保存而付出的代价，与这个社会对所保存对象和生活方式所赋予的价值，二者之间保持平衡。"民族地区，不仅文化背景迥异于西方社会和祖国内地，而且由于内部文化多样性的存在，少数民族各个聚居区域文化上千差万别。很难想象，西方现代化模式和内地现代化道路照搬到这些地区会产生何种局面！

在上述意义上，民族地区现代化的内涵，必须从少数民族传统文化与现代化间的紧张关系中去寻找。在经济社会大变革的历史背景下，少数民族地区以宗教为内核的传统信仰体系面临着前所未有的压力，文化传统与经济社会发展间的紧张关系似乎预示着一个不可避免的两难选择：要么调整自身适应现代文明的规则体系，要么被现代文明边缘化、孤立化。纵观各国、各民族的现代化史，传统文化的现代性调适和世俗化过程无疑是少数民族地区经济社会现代化的重要阶梯。民族地区需要在文明演进的背景之下，通过对传统文化与经济社会动态关系的把握，寻求少数民族地区文化延承与区域现代化间并行不悖、相得益彰的可行路径。纵观西方世界的兴

起，浴火重生的过程是漫长而艰辛的。从14世纪末的文艺复兴到16、17世纪的宗教改革，再到18世纪的启蒙运动；从神权统治到民族国家的兴起、民主国家的产生。它使一个曾经被阿提拉的上帝之鞭抽打、被伊斯兰世界挤压、被蒙古大军蹂躏的旧欧洲，一跃而成为世界的中心。而这四百年，欧洲人最伟大的发现，不是发现了新大陆，也不是发现了万有引力，而是发现了人自己。文艺复兴、宗教改革、启蒙运动，都是人自身的改造运动。这些运动，赋予欧洲人的不是强健的体魄，而是强大的精神力量，这种力量幻化为对未知世界的好奇心和探索欲，幻化为追逐财富的欲望，幻化为对民主、自由的强烈诉求，幻化为对平等社会的热切呼唤。人的自我觉醒，物化为现实的生产力，重塑了欧洲的面貌。

因此，民族地区的现代化不能单纯地理解为工业化、城市化，也不能简单理解为现代技术和知识的传播或者社会生活的世俗化。工业化、城市化固然重要，科技的传播固然也重要，但在更核心的层面上，民族地区现代化首先是一个民族文化自觉的过程，是在传统文化传承和发展中寻求文化超越的过程。

第三节　分工演进、社会资本和区域成长

一、区域文化与经济互动关系的一个分析框架

（一）市场经济的道德基础

阿马蒂亚·森强调，资本主义制度（或者自由市场经济）经常被理解为一种建立在纯粹个人私利之上的安排，事实上，资本主义经济的有效运作取决于一个强有力的价值规范体系。要有坚实的法治基础来支持交易涉及的各种权利，要有普遍遵守的行为准则来保证协议的履行。文化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具有极其重要的作用和功能。

（二）区域文化与经济互动关系

这一节主要从文化而非政治的角度探讨区域经济发展中的社会人文因素。从宗教信仰、价值观、伦理规范、风俗习惯等角度理解的文化与区域的物质和技术因素，共同构成了区域成长的基础因素。

在微观层面上，文化作为区域成长的精神动力系统中最核心的力量和最深层的心理因素为公民们的行为提供着最根本的价值判断和内源精神动力。同时，文化（如宗教）还是微观行为主体为应付充满不确定性的经济实践和社会实践，弥补自身的有限理性，规避风险，确立其在不断重复的实践中所应遵循的行为规范的总和，文化为微观主体提供的价值判断和行为的道德合法性支撑，构成了行为者基本的激励和约束。在宏观层面上，文化为区域提供了被普遍认可的价值体系，帮助社会形成广泛的共识，也使得社会的高效整合成为可能。文化通过其社会认同、社会整合功能将区域各种行为主体凝聚为一个稳定的社会网络，并成为构建区域社会结构的基石，在维护社会稳定与和谐中起着不可替代的作用。文化在微观领域的作用和宏观领域的功能，深刻地影响着区域经济运行绩效（区域文化与经济的互动关系见图6－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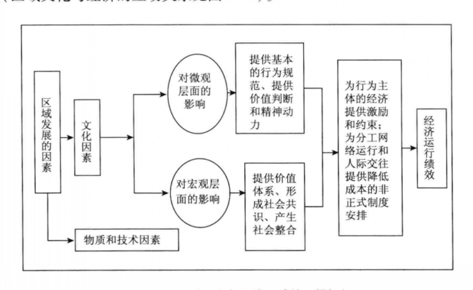


图6－1　区域文化与经济互动的逻辑框架

从经济与文化的关系分析，经济因素（特别是分工的演进）是推动文化变迁的根本力量。以宗教为例，一旦宗教被具有先进性的社会阶层所掌控，它就会被赋予新的内涵和积极的意义而实现突变，这种突变造成的冲击，能够使人从旧有传统桎梏中摆脱出来，实现人的解放。同时，经济因素又不是决定宗教形态的唯一因素，作为经长期积淀而固化的文化内核，宗教一旦被环境所选择，就会自动进入一个自我强化的累积过程，形成"锁定"，宗教的这种惰性往往成为阻碍经济社会进步的巨大保守力量，因而也可能成为传统的守望者们用以维护旧有经济社会秩序、拒斥现代文明的坚盾。世界各国和各民族的发展史表明，任何文明的延承和发展都以自身的不断调整为前提，拒绝改变就意味着拒绝进步。

二、分工演进、社会资本积累和区域经济发展

（一）社会网络和社会资本理论

20 世纪末，围绕社会网络的探讨而形成的社会资本理论在社会学领域大行其道，并在西方世界获得官方的关注，成为他们解决社会问题和社会冲突的可选理论。事实上，诞生于社会学领域的社会资本理论，很快在经济学领域引起涟漪，并与制度经济学相互配合，成为经济学者解释经济现象、认识经济运行规律、提供经济问题解决方案的重要理论分析工具。

皮埃尔·布迪厄（Pierre Bourdieu，1930—2002 年）是第一个系统提出社会资本理论的社会学家。他的重要贡献首先在于他提出了一个与社会网络相类似的"场域"概念。他指出："场域是以各种社会关系连接起来的、表现形式多样的社会场合或社会领域，一个场域可以被定义为在各种位置之间存在的客观关系的一个网络，或一个构型。"在每一个场域中"社会成员和社会团体因占有不同的位置而获得不同的社会资源和权利"。布迪厄进一步认为，社会资本是推动"场域"这个关系网络发展变化的基本力量。而社会资本是"实际的或潜在的资源的集合体，那些资源是同对某些持久的网络的占有密不可分的。这一网络是大家共同熟悉的，得到公认的，而且是一种体制化的网络，这一网络是同某团体的会员制相联系的，它从集体性拥有资本的角度为每个会员提供支持，提供为他

们赢得声望的凭证。"[①]社会资本与其他资本之间，如与文化资本、经济资本之间可以相互转换。詹姆斯·科尔曼(James·S. Coleman)则把资本分为可以相互转换的三种类型：物质资本、人力资本和社会资本，并把社会资本理解为一种社会结构资源，它决定于社会关系所形成的社会结构。林南(Nan Lin)是在社会资源讨论的基础上，提出的社会资本问题。他认为，资源分成个人资源和社会资源：个人资源是个人拥有并可以为个人所支配的资源，如物质财富、生理和心理条件、知识和技能，等等；而社会资源则指那些存在于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中，嵌入于社会关系网络的资源，这些资源不是独立可支配的资源，它只有在个人启动这些关系网络与他们进行交往的过程中才能获得。因此，在林南看来，社会资本是对个人的社会关系网络的投资(金钱或其他形式)形成的，可以在交往中得到回报的一类特殊资本[②]。罗伯特·帕特南(Robert D. Putnam)的研究对于区域问题的分析则更具意义，他认为由于一个地区具有共同的历史渊源和独特的文化环境，人们由于相互熟悉而结成一个关系密切的社区，形成紧密联系的群众性参与网络。这个网络可因对参与的激励和约束而得到维护和强化，而该网络本身所具有社会功能和经济价值就构成了社会资本。

(二)相关理论的尝试性综合

在中国，社会网络和社会资本的概念被社会学界和经济学界广泛地讨论和频繁地使用。在区域经济绩效差异的比较和成因分析，社会资本成为一个重要的参数。大量的学者(如汪丁丁)从温州、义乌等地区快速的经济发展中提炼出用社会网络和社会资本解释这些地区取得成功背后的文化因素。

(1)社会网络、社会资本和区域社会资本的概念。

在上述分析的基础之上，通过对相关概念的内涵进行梳理，可以形成笔者对"社会网络"、"社会资本"和"区域社会资本"这些概念的基本认

① 相关概念的解释来自百度百科。网址：http://baike. baidu. com/view/367181. htm.

② 相关讨论请参见维基百科的"社会资本理论"条目。网址：http://wiki. mbalib. com/wiki/%E7%A4%BE%E4%BC%9A%E8%B5%84%E6%9C%AC%E7%90%86%E8%AE%BA.

识。其中,“社会网络”指一个人同其他人形成的所有正式和非正式的人际交往关系网络。也可以这样理解,社会网络是指由一系列社会关系连接在一起的节点(个体或组织)的总和,社会网络中的个体和组织的经济行为不仅受其所处的总体社会环境的影响和制约,也受其在社会网络中所处位置的影响。因此,社会网络分析重点考察的不是个别人或个别群体,而是人与人、群体与群体之间的相互关系。通过对社会网络的分析,可以获得比制度分析细致、更动态化、更贴近现实的分析结果。“社会资本”则是建立在社会网络之上,能够使得个人、企业和区域从中得益的无形资本。对于个人和企业而言,社会资本是指个人可以通过其社会网络的节点位置,从社会网络中提取和控制资本、信息、知识或其他资源,从而实现收益增殖的能力。对于区域而言,区域社会资本是建立在社会网络基础上,利用紧密、发达、完善而规范的社会网络体系实现价值增值的能力,因此区域社会资本的积累体现在社会网络结构扁平化、规范制度化以及社会网络的紧密、发达和完善程度。笔者认为,区域社会资本主要应该包括规范理性的人际关系准则(以制度化为特征)、合理的伦理道德特征(用以提供区域成长的精神动力)、文化认同感和价值理念方面的共识。

(2)嵌入于社会的区域经济:分工、社会资本与区域经济。

经济是独立运行还是嵌入于社会的?对这个问题的回答,经济学家与社会学家各不相让。经济学家总是倾向于经济的独立性,他们认为市场经济是一套独立运行的机制,与社会没有多大关系,因此可以把经济问题抽象出来单独考虑;社会学家则强调经济运行的社会基础很重要,他们认为任何经济机制离开了社会这个土壤都不可思议。笔者倒是很赞同社会学家的观点,倾向于认为经济是嵌入于社会的观点。因为,由于分工发展而形成的市场机制和科层组织都与社会人文环境高度相关。而一些经济学家也开始意识到,世界上没有“纯粹经济理论”。其中,森对市场经济道德基础的分析,对经济学与伦理学关系的论述,制度经济学家对非正式制度的强调以及用社会资本来解释经济现象,都说明经济学与社会学日益融合的局面正在形成。

其一,随着分工的发展,社会网络正在成为区域经济系统中一个日益

重要的资源配置渠道,社会网络的优化意味着资源配置效率的提升。分工演进,不仅在经济领域形成了市场机制(用以实现社会分工)和企业等科层组织(用以实现组织内部分工),也造就了一个联系日益紧密的社会网络(或场域)。对于区域中的每一个个体而言,其实社会网络、场域的概念可以用一个很中国化的名词——“圈子”来替代。在中国生活的民众,大都会感受到,个人的成功固然与自身的人力资本和物质资本相关,但也与其所处的圈子,以及在圈子中所处的位置高度相关。圈子就是资源或者说社会资本,个人在圈子中的位置则意味着他从圈子中获取资源的能力。一个运行有效的圈子总会把资源配置到恰好需要它又最能有效利用它的个体身上,从而实现资源的优化配置。如温州的民间金融(或地下钱庄)形成的金融关系网络,在配置民间资金方面就起到过非常重要的作用;同样,产业集群的发展,如温州的眼镜业,就是通过社会关系网络严格地控制着整个行业从原料采购到品牌营销的全过程,实现了行业的高度垄断[①]。分析至此,我们也看到社会网络理论似乎存在着一个逻辑上的悖论,即:圈子作为一个社会网络,它拥有一些能够使成员获得利益或成功的资源,实现圈内的利益共享;但它也排斥和剥夺圈子外的社会成员的获利机会,损害圈外成员的应得福利,阻碍经济社会的发展。其实,笔者认为,这个逻辑悖论是由社会网络容纳的社会成员数量的有限性造成的,当一个社会关系网络的成员规模日益扩大,这种悖论就日益被化解,当该网络把社会中每个成员都纳入其中后,它就实现了所有社会成员对社会网络资源的共享。以互联网为例,当所有人都参与到互联网中的时候,就没有社会成员被排斥在圈子外了,所有成员都可以从网络中提取他需要的资源,从而实现个人的价值增值。

汪丁丁、贾拥民的论文《一个嵌入社会网络的市场经济:义乌案例》通过一个义乌商人利用其社会网络发家致富的故事,将经济学理论和社会学理论结合起来,运用博弈论和经济演化理论对义乌市场的发展提供

---

① 从此,我们也可以看到,一个社会网络的形成,会有利于网络内部的成员,但也可能造成对外部人员的掠夺。

一个独特的学术解释(相关内容见案例链接)。在这个故事里,义乌人老吕通过远途贸易及诚信和吃苦耐劳的精神,逐步建立起社会关系网,并在社会关系网中逐步进入网络中心的位置,最终成就了自己的致富梦,也带动了网络中其他成员共同富裕。所以,区域的发展不仅仅取决于市场和企业组织,也与完善和不断优化的社会网络紧密相关。随着分工的发展,社会网络存在一个持续优化的动态过程,经历了以家族和宗法制度为特征的垂直网络结构向扁平网络结构逐步转化的过程,社会网络的扁平化使得个人或组织在网络节点上的地位逐步拉平,社会从威权控制向平民化转变,这既体现了经济市场化的要求,也体现了社会进步的要求。事实上,被逐步拉平的社会关系网络,构成了市场和社会运行的共同基础。

案例链接

一个嵌入社会网络的市场经济——义乌案例[1]

在20世纪80年代,义乌是全国最贫困的20个县之一;而到2003年,义乌在全国最发达的20个县中排名第15。义乌从最穷到最富的发展,始于"廿三里[2]模式"的成功。义乌有两个广为人知的传统:第一个是诚信,第二个是远途贸易。既有远途贸易的传统,又有讲诚信和吃苦耐劳的精神,可能在浙江省的范围就义乌和温州这两个地方如此。由于太穷,20世纪60年代,义乌从省里争取到了一个特殊政策,即允许村民出外"鸡毛换糖"或者要饭。因此,当其他地区的人还在忙于批斗等事情的时候,义乌人已经进行着频繁的商业计算,开始培养出当时中国最为精细的商业判断。汪丁丁、贾拥民通过义乌廿三里镇人老吕的个人经济史,让我们见证了一个区域成长的微观层面,而这个层面是经济嵌入于社会网络的典型案例。

---

① 本案例内容摘录整理自《社会科学战线》期刊,2007年第一期论文《一个嵌入社会网络的市场经济:义乌案例》,作者汪丁丁、贾拥民。

② 廿三里是义乌的一个镇,原来是一个穷乡僻壤,当地人必须去"鸡毛换糖"才能维持生存。

老吕的个人经济史在义乌廿三里属于最常见的类型，可以划分为三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学手艺、开始经商的阶段，这也是他建立本地社会网络的阶段。在这个阶段，他逐渐领悟到什么是政治、什么是权力，形成了有深刻身体认知的真正的个人权力观念。第二个阶段，老吕成为批发商。老吕因为结婚旅行到了苏州，把成婚的定金全部投资买回纽扣而成为批发商，这样老吕在其所处社会网络中的权力地位就改变了。本来老吕处在关系网络边缘，因为他只是一个普通的货郎，从一个地方进货，然后到其他地方贩卖。现在老吕处于更重要的位置，进入关系网络的中心，开始向本村的其他货郎供货。第三阶段，老吕成为一名坐商。当时遵义比义乌要富，老吕从义乌长途贩运小商品到遵义设固定摊位摆卖。经过一段时间后，老吕经商已经有了名气。有一年，绍兴某家乡镇企业的一位推销员因为老吕的良好信誉，把当时较为紧俏、本来准备推销给国有百货公司的棉毛衫交给老吕代卖。老吕发现贵州人喜欢红色，而红棉毛衫在其他地方却是滞销的，因此老吕就包下了这个厂的存货，由此赚了不少钱，这可以说是老吕的第一桶金。由此也扩展了老吕的社会网络和人际关系。在此之后，绍兴那个乡镇企业面临的竞争越来越激烈，而原有设备却已经落后了，要想更新设备却又因为乡镇企业是集体产权，决策不灵活而受阻。于是由老吕建一个针织厂，作为配套企业加工棉毛衫，由该乡镇企业从银行取得贷款后从德国进口最先进的设备，配备给老吕的厂使用，作为老吕个人的投资，设备款项则从加工费中扣除。若干年后，老吕就成为义乌的“能人标兵”。

值得一提的是，跟老吕学过“做生意”的一些人，还有与老吕有过这样那样关系的一些人，现在都已经富起来了。例如，老吕早年经商的时候，曾带过几个徒弟，这些徒弟后来又带过徒弟。这些“徒子徒孙”，许多都已经很成功。其中一个徒孙，现在经营着全国首屈一指的饰品厂。又如，原来在老吕厂中做机修工的三个人，现在也都成为身家过亿的富豪。还有，租住老吕家房子的几个巴基斯坦客商，现在也

在义乌成功地开办了公司。致富，几乎成为一种“细菌”，在老吕周边的人群中蔓延。这就是社会网络中的市场经济。整个义乌就是一个嵌入社会网络的大市场。

其二，区域经济绩效，高度地依赖于社会资本积累。人们对江浙地区民营企业的发展印象非常深刻，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来自社会资本对经济的支撑和推动作用。我们对于晋商和徽商成功史的研究也同样看到社会资本所扮演的重要角色。随着分工的发展，区域社会资本的积累体现在社会网络结构的扁平化、交往关系的规范化以及社会网络的紧密、发达和完善程度。更一般地，区域社会资本的积累为人们提供了规范理性的人际关系准则、共同的宗教信仰、伦理道德观念、价值取向和文化认同（用以提供区域成长的精神动力），这些因素在提供个人经济激励、建立区域内紧密完善的人际互信关系和降低交易成本方面，具有无可取代的重要作用。

第四节　作为区域成长手段与内容的政治

善良的人们总是把国家看作上帝派驻地球村的天使，她们不仅面容姣好而且温柔体贴、善解人意。而国家下派到各地的“分号”，即各级的地方政府，也会本着公正、公开、透明的原则，不偏不倚地履行其公仆义务。但现实却总是让善良的人们失望。国家和它的政府从来就不是中立的，它有自己的利益取向和价值偏好。在非民主的社会，国家（政府）决策是统治者集团利益诉求驱动的结果；而在民主国家，广泛存在的利益集团左右着国家（政府）政策的走向。这意味着国家和政府在区域成长中扮演着极其重要的角色，对区域运行的后果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国家的成长、政府的成熟本身也构成了区域成长的重要内容。

一、关于国家或政府[1]的理论

（一）三种国家观及其对比

其一，霍布斯的国家观。我们熟悉托马斯·霍布斯是因为他那个“霍布斯丛林”：森林中只有那些努力向上的树木才能享受到足够的阳光、养分，才能有更多的机会存活，于是森林中看到的都是些高大挺拔、伸入蓝天的树。由此霍布斯引申出关于民族命运的思考：只有强大的民族才配活在地球上。一个民族如何才能强大？这也就成了他的名著《利维坦》[2]要解决的核心问题。在霍布斯所处的时代，神权至上，而这在霍布斯的眼中正是民族积弱积贫的关键所在。因此，一个民族国家只有从神权统治中解放出来，才能获得它发展进步的条件。在《利维坦》中，霍布斯为了反对神权社会，把国家描绘成人类理性发展的结果，强调民族国家的建立对于人类发展的重要意义。他指出，人们通过契约，把各自的自然权利委托给某个人或一群人，从而把个人意志升华为集体意志，国家就是这样一个代替个人行使其意志的工具。但霍布斯也看到，专制的民族国家在拥有了巨大的力量后，它既可造福于民族，也可毁掉民族。他借用下面这个自编的故事形象地说明了国家利维坦的双刃剑特性：在上帝造人之后，人请求上帝：“上帝啊，我们太弱小了。请你再创造一个英雄吧，让他保护我们。”上帝说：“英雄在保护你们的同时，也会欺压你们，吃你们。”这个英雄就是我们非常熟悉的国家利维坦。

其二，斯密和洛克的国家观。斯密所处的时代，民族国家已经建立，而专制的民族国家正日益蜕变为发展的阻碍性力量。在这样一个阶段，个人从神权压制中走出来，个人的利益诉求被放大了，个性被张扬了，产生了对个人富裕、自由、平等和民主的强烈需求，专制国家不能提供这些

① 在政治学领域，国家和政府应该有严格的区分。但本文的研究中，国家与政府往往被看作一个整体，不作严格区分。只是把国家看作一个具有独立意志的抽象实体，把政府看作国家意志的执行者，是一个具体地履行国家各种职能的实体性组织。

② 利维坦是希腊神话中的海中巨兽，霍布斯用它喻指力量强大的专制民族国家。

服务。在这样的时代中产生的《国富论》[1]这本书的基调是个人主义的，它关心的是国家如何让它的公民获得更多的幸福。这本书虽然是经济学奠基之作，却也是一部自由主义的政治哲学著作。书中宣布了专制主义的终结和自由主义时代的来临，在《国富论》中，斯密强调：个人理性的逐利活动，在自由的市场经济这只无形的手的引导下，会产生增进社会公利的效果；此时，政府不再是社会生活的核心，它只是维护秩序的守夜人。把政府角色定位为守夜人，不是斯密的发明，这主要得归功于洛克的贡献。

其三，马克思的国家观。在马克思的著作里，国家被贬低成一个面目可憎的小丑。在阶级社会里，国家作为社会上层建设的核心内容，是一个阶级压迫另一个阶级的暴力工具。由此，马克思声称无产阶级没有国家，号召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

在这三种国家观里，霍布斯强调了国家作为一个民族集体意志的执行者的角色定位，这种角色定位意味着国家是一个强有力的控制者，拥有不可辩驳的权威，可以超越于个人的利益诉求，调动和征集所需要的各种资源，以达成国家意志；斯密和洛克则始终小心谨慎地看待政府，强调了它作为市场秩序和个人权利维护者的角色定位，这样的角色定位事实上严格规定了政府权力行使的范围和权力行使的规则；马克思的国家理论则特别强调了国家的暴力属性和强烈的利益倾向性，强调了政府决策的非中立性。

（二）新制度经济学关于国家的理论

新制度经济学对于国家的认识相对全面和深入，特别是诺斯和约拉姆·巴泽尔的观点最具影响力，其观点可以概括如下：

其一，关于国家的性质。新制度经济学认为国家是一种具有暴力潜能的组织，是以暴力作为强制实施手段的最终第三方，国家的这种暴力潜

---

① 虽然书名被简化为“国富论”，但其实质是一部“民富论”。

能的性质是国家起源的重要依据。"暴力潜能"理论[①]指出国家的比较优势就在暴力方面，在很多时候暴力资源的集中使用优于分散使用，也更有利于契约的实施。

其二，关于国家的职能。①国家是最大的制度（游戏规则）供给者，但并不是公平的制度供给者。国家将会制定使统治者及其利益集团收入最大化的规则，并以此为前提，设定降低交易费用的规则。②国家具有产权界定和保护的职能。国家作为统治集团的工具，对产权的设计和产权变更取决于改变现有的产权安排所带来的收益的事前估计与监察和执行权利结构改变所带来的成本的事前或者事后估计之间的相互关系。③国家是所有交易的第三方实施者。特别是面临契约纠纷时，国家是以暴力为后盾的最终仲裁者。如商法仲裁最初是由私人仲裁机构组织实施，但每次由个人仲裁机构支付费用的交易成本很高，于是就产生了由个人纳税，并由国家作为最终仲裁者的制度设计。④国家还是不同利益集团利益关系的协调者。现代社会日益精细的社会分层，导致利益多元化和利益集团化，这就需要一个强有力的利益整合者、利益协调者来解决社会成员间的利益冲突，这个任务只有国家和它的政府能够执行。

其三，关于国家（政府）决策的依据。国家（政府）决策总是在追求统治者利益集团租金最大化与降低交易费用实现社会产出最大化间作出的平衡。在诺斯看来，国家（政府）决策中存在的租金最大化与最小化交易费用间存在此消彼长、不可兼得的局面。这种尴尬的情形被称作"诺斯悖论"。政府在租金最大化与交易费用最小化间的具体选择，则取决于民众与政府的博弈。

其四，关于国家变迁的认识。从独裁专制国家向民主法治国家的转变，是国家变迁的普遍方向。这种变迁的逻辑是什么？在巴泽尔建立的一个关于产权和国家演进的模型中，统治者和臣民都被假定是追求利益最大化的。在国家开始之初，臣民被假定没有财产，由此形成一个统治者

① "暴力潜能"理论参见：道格拉斯·诺斯．经济史中的结构与变迁[M]．上海人民出版社，1994.

完全控制所有财产，并通过向臣民支付固定报酬，委托臣民具体使用这些财产，而财产使用的所有成果由独裁者获得；逐渐地，由于独裁者无法掌握每个臣民个人能力的完全信息，上述产权设计并不能达到独裁者利益的最大化，于是，独裁者开始把财产界定给每一个臣民，让臣民拥有财产，以收取定额租金取代固定报酬，私有产权产生了；下一步，臣民为了换取尽可能多的自由，可以接受一个更高的定额租金，用以赎买更多的自由和权利。在这个过程中，统治者和臣民之间必须通过相互间可以置信的承诺来约束各自破坏上述产权制度的冲动，并把臣民与统治者的关系纳入法治化的轨道，臣民的自由和各项权利也得到广泛的扩张，于是国家走进一条法治化、民主化的进化轨迹。

新制度经济的上述分析颇具见地，但在国家起源、国家性质和国家演变的理论分析中，由于受到经济人和最大化的经济理性原则的前提约束，仍显薄弱和过度抽象化。与之相比，曼瑟·奥尔森的国家理论更加鲜活、形象。本书将更多地运用新制度经济学国家理论和奥尔森国家理论，对区域成长的政治维度进行探讨。

二、国家演变及其对区域成长的影响：历史描述与理论分析

（一）从专制集权向民主法制的国家演变：西方近现代的国家演变史

在无政府状态下，我们时刻都迷失在“霍布斯丛林”里，他人就是地狱，我们必须无所不用其极地击败他人，以获得生存的条件。于是，我们深情地呼唤一个强而有力的社会整合者，希望它提供我们亟需的安全和秩序，维护我们的自由与权利，提升我们的福利和幸福。于是，国家利维坦被召唤到现实世界。

在西方近现代史上，率先粉墨登场的是专制集权的民族国家。正如霍布斯所看到和希望看到的那样，这些民族国家迅速摆脱神权的束缚，集聚起强大的力量，促成了欧洲的初步繁荣。由此，我们也见证了民族国家兴起而给欧洲各民族带来的希望和荣耀。欧洲最早出现的民族国家——葡萄牙、西班牙曾经给伊比利亚半岛的人民带来了富足而奢侈的生活；普鲁士铁血首相俾斯麦统一德国后，建立了强大的德意志第二帝国，并使之

成为超越英、法的欧洲第一强国，为心高气傲的日尔曼民族找到了尽情抒发其民族自豪感的支点；沙皇彼得一世把一个破破烂烂的俄罗斯帝国，带进了近现代化的历史轨道，为俄罗斯民族带来了富强和繁荣的局面；法国，这只高卢雄鸡，在路易十四时期，达到其封建王权统治的顶峰，这一时期，也是法国封建王权治下最繁荣的时期，此时的法兰西成为了欧洲各国羡慕和敬仰的国度。

但同样是这些民族国家，也给自己的民族留下了难以磨灭的伤痛记忆。葡萄牙、西班牙在欧洲逐步边缘化了；德国经受了两次世界大战战败国的屈辱；沙皇俄国最后脆弱到一根稻草就可以把它压跨的地步，在这块土地上最终诞生了一个新兴的国家——苏联；法国在一群人攻入巴士底狱后，就进入了一个长达近100年的乱局中，虽然拿破仑为帝国带来过荣耀，但他带来的屈辱和破坏甚至更大。以上事实表明：专制集权的民族国家已经完成了它的历史使命，专制王权已经不是民族复兴的力量，而无可辩驳地成了民族前进的绊脚石。斯宾格勒在其《西方的没落》里强调了一个主题，即每一个强权都不可能改变盛极而衰的宿命。

在这之后，欧洲各国开始了国家变革之旅。人权、自由、平等、法制、博爱成为这场变革高扬的旗帜，民主化与法治化成为了这场变革的主旋律。英国自光荣革命（1688年）以后，神权淡出，王权隐退，英国变成了一个真正的由"公民"组成的国家，也由此，英国进入了一个持续繁荣的轨道。其间，虽有经济的衰退，有战争的侵扰，但依照民主和法制精神而建立起来的国家秩序从来没有动摇。相比较英国，法国的国家变革更富戏剧性。从1789年7月14日巴黎人民攻占巴士底狱到1879资产阶级共和制在法兰西最终确立，这场历时90年的国家变革，对于世界而言，更有标本意义和研究价值。法国大革命爆发后，《人权与公民权宣言》迅速被制宪会议通过，人权、法制、公民自由和私有财产权的各项原则被《宣言》所确立，天赋人权、三权分立等启蒙时代的产儿，成为民主思想确立的标志，自由、平等、博爱成为法国三色国旗的注脚。虽然经历了长时期的动乱，但法兰西民族终于浴火重生，以其独特的魅力和对世界的贡献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

国家之于民族既是幸事，也是灾难；既承载着民族的希望，也成为民族痛苦的渊薮。而以西方世界为代表的现代国家，尽管并不完善，但建立在民主、法制基础上的国家政体，建立在人权、自由、平等、私有权基础上的公民社会，已经被历史所检验，成为一种可以达成社会长期稳定、繁荣的政治生态，而这种政治生态还会继续完善自己、不断修正自己，保持它旺盛的生命力。笔者并不是对西方政治生态情有独钟，而只是深切地感受到：到目前为止，我们还找不到一种政治生态像西方世界一样，能够为国家的持续发展、民族的持续进步、社会的持续繁荣提供长久、稳定的政治支持。那种超过上百年的，持续的发展、进步和繁荣，只是在民主法制国家，只是在平等自由的公民社会才真正实现过，而这些国家到目前仍然保持着稳定、持续的发展态势。

区域不过是组成国家的一个空间单元。一方面，国家的兴衰成败必然通过区域的命运而反映出来。从这个意义上，区域命运是国家前途的注脚；另一方面，由国家营造的政治、法律体系和社会环境，由国家安排的产权制度和其他经济制度，都将通过其强有力的激励和约束功能，左右着地方政府、企业或其他组织、个人及其家庭的行为，从而决定着区域的经济绩效和社会人文发展。

（二）国家演变对区域成长影响的理论分析

国家演变好像与区域成长相隔太远，把二者联系在一起也好像过于牵强。但现实却让我们在讨论区域问题时，不得不把国家这个抽象实体纳入考虑的因素，而且是一个极端重要的考虑因素。在极“左”思潮之下，四川曾经大面积地出现过百姓饿死的惨烈景象；在改革开放的环境中，温州、义乌这些穷乡僻壤一跃而成为温柔富贵之地，曾经被计划经济逼到墙角的上海，也一下子溢彩流光，成为全国首善之地，大有盖过香港的势头。这一切的变化都与国家这个看不见却摸得着的抽象实体紧密相关。因此，一个良性运行的国家，一种良好的政治生态，对民族、区域而言实在是一种幸运。其实，这方面的讨论在第五章大国区域关系治理中已经涉及，只是这一章看问题的角度不同而已。

（1）国家向民主化法制化的演变使得国家性质从暴力型向契约型转

变，为区域成长提供稳定、可预期的政治环境。

在很长的一段时间里，国家起源的社会契约理论[1]几乎是一种共识。但从国家实际产生的过程和国家在实际运作一个政府的实践看，国家的暴力性质非常明显。这就决定了一个国家、一个政权的产生几乎不可能是通过一种和平的缔约过程来实现的。所以，每一个国家，在它诞生之初，都带着明显的暴力烙印。但是，暴力取得的政权，也会被暴力所推翻，如果国家总是处于这样一种以暴易暴的政权更迭状态，区域成长就是空谈。因此，国家政权的稳定对于区域成长而言是必需的，但是国家政权要得以稳定和长期存续，并不能依靠统治集团不断强化其暴力工具、强化其社会控制的手段来达成，俗话说，"出来混，总是要还的"，以暴力和不断强化暴力来维持的政权，必将淹没在暴力的海洋里。明智的统治者总希望为他们的政权取得一种政治合法性的支撑。而任何一个政权要取得政治合法性的唯一标志就是：民众的同意。即，一个政权只有通过民众的同意才能获得其政治合法性。于是，统治者与民众之间的关系必然从施暴者和受暴者的关系，转化为平等的契约关系，这意味着民众通过一种形式，把治理国家的权力委托给他们认可的一群人，由这群人按照契约规定的游戏规则来处理国家事务，如果这群人（现在他们变成了合法的统治者）不按契约行事，民众就有权利把他们废黜掉。于是，具有政治合法性的契约型政府就此诞生了，这种契约型国家的典型形式就是民主法制国家。

从暴力型国家向契约型国家的转型，是国家形态的重大变革，它构成了国家长期、持续、稳定存在的柱石。从此，城头变幻大王旗的以暴易暴的国家史一去不返了，此时政权的更替并不会影响国家的存续和稳定，也由此，区域获得它不断成长、成熟最基本的条件——一个稳定的政治环境。

（2）国家的产权制度安排，构成了区域成长最基础的经济制度环境，

---

① 国家起源的社会契约理论强调国家源于人民的同意，是人民把个人权利按照社会契约让渡给一个人或一群人而产生。霍布斯、洛克、卢梭均持此观点。

决定了区域经济的绩效。而产权制度的安排取决于国家的政权性质，国家从专制集权向民主法制的转型中，会日益倾向于能够不断降低交易成本的产权制度安排，从而不断优化区域成长的经济制度环境。

国家是最大的制度（游戏规则）供给者，产权制度则是一个国家供给的所有游戏规则中最重要的制度。马克思《资本论》之所以把研究对象锁定在资本主义生产关系[①]（其中，最重要的是生产资料所有制关系）上，就是看到了生产资料所有制对生产力的重要影响，而马克思也正是在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矛盾运动中分析了社会变革的动力所在。而新制度经济学家，如科斯、诺斯也运用产权理论，论证了国家的产权制度设计之于经济绩效的决定性影响。罗纳德·科斯本人说："我运用交易成本概念来证实法律体系可以影响经济体系运转的方式。除此之外，别无他求。"由于国家是产权制度的设计者和供给者，因此，国家对区域经济运行绩效负有最直接的责任。有什么样的产权安排，就有什么样的区域经济绩效。

那么国家又是怎样来设计和安排产权制度的呢？前文已述，按照诺斯的观点，产权制度既取决于统治者集团的租金最大化和交易成本最小化的衡量，也取决于统治者集团和民众的博弈能力。租金最大化的决策虽然会增加统治者集团的利得，但它会导致交易成本的增加，降低经济运行的绩效，并且会增加国家的不安定性，影响国家的持续存在。如果民众在与统治者的博弈中，有较强的博弈能力，持续增加租金额就是高风险的行为；而如果民众的博弈能力弱小，那么，统治者集团在提高租金额产生的风险成本就较低，统治者集团就有较强的动机实施不断提高租金水平的产权制度。在专制集权的国家的政权性质下，民众鲜有与国家统治集团博弈的能力，高租金额、高交易成本的产权制度就成为普遍的产权安排，导致国家成为区域经济社会发展的阻碍力量；相反，当国家的政权性质从专制集权向民主法制过度，民众的博弈能力得以不断强化，

---

① 生产关系是指人们在直接生产过程中结成的相互关系，包括生产资料所有制关系、生产中人与人的关系和产品分配关系。

统治者集团继续维持高租金水平的产权安排就会遇到极大的风险，甚至导致政权通过民主法制程序而被和平剥夺。因此，建立在民主法制基础上的国家政权，更倾向于不断降低租金水平，降低经济运行的交易成本的产权制度安排，以讨好民众，获得长期执政的资格，从而在长期内拥有租金收入。

因此，国家的政权性质从专制集权向民主法制转型的过程中，有利于产权制度的不断优化，有利于交易成本的不断降低，从而有利于区域经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纵观国家的政权性质演变历史，上述理论分析经得起历史的检验，能够很好地解释产权制度的不断优化过程，解释国家经济社会和区域经济社会长期、可持续发展的根源所在。

(3)国家作为第三方实施者和利益协调者的角色，提供着区域成长所必需的公共产品和公共服务。而国家从专制集权向民主法制的性质转变，更有利于提高这些公共产品和公共服务的供给效率和质量。

区域内部，社会经济各领域各环节的运行，人与人之间、社会经济组织之间、个人与组织之间，不可能不产生摩擦和冲突，摩擦与冲突的解决可以由当事人自我实施，但当自我实施还不能解决问题时，就需要第三方裁决和实施。在分工和交往还不很频繁的区域系统中，私人仲裁机构，可以被雇佣作为第三方，每一次仲裁都由当事人付费，由于发生频率低，这样的私人仲裁尚属经济。但是在分工日益细化与交往日益频繁的情况下，每一次摩擦和冲突的仲裁都要付费就变成交易成本很高的事情。由此，由一个统一的，以民主和法制作为执政基础的国家，依靠暴力为后盾来提供最终仲裁，既可以做到公平、公正，又可以节约交易费用，于是由国家作为最终第三方来维护契约、解决契约纠纷就变成了国家向社会提供的重要公共服务，这减少了区域经济社会运行中的摩擦和冲突，降低了解决这些摩擦和冲突的成本支出，从而为区域长期可持续发展提供了重要的支持。而作为利益协调者，国家一方面通过调节国民收入的初次分配和再分配，调节着社会各阶层的利益，很显然民主与法制为基础的国家，将更有利于国民收入的初次分配和再分配的公平、公正；另一方面，正如前文第五章第四节关于大国区域关系治理的分析，国家是区域间冲突的

解决者，是区域间关系的调节者，一个更加民主，法制化程度更加完善的国家，对于处理地区间冲突，调节区域关系，显然更加优越。

上述三点分析，都明白无误地指向一个关键，即：国家性质从专制集权向民主法制的转型，是国家之幸，民族之幸，区域之幸，它构成了区域政治生态中最基础的环境要素，为区域成长提供了重要的支撑、保障和服务功能，而国家性质的这种转变本身就是区域成长的重要表征。

三、掠夺型政府向强化市场型政府的转变：政府成熟与区域成长

国家治下的政府，是国家意志的具体执行者。如果说国家只是一个看不见却摸得着的抽象实体，那么政府就是一个看得见摸得着的实体存在，国家的各种职能通过政府这只有形的手得到实现。虽然政府的性质受制于国家的性质，但政府本身也有一个从稚嫩向成熟的成长过程，区域经济社会的发展不需要一个"萌"政府，而需要一个成熟、稳健的政府。在现代社会中，政府是如何逐步走向成熟的呢？奥尔森关于国家和政府的理论为我们提供了答案。奥尔森《集体行动的逻辑》、《国家兴衰》、《权力与繁荣》三本著作几乎是一个关于国家与政府理论的完整系列，可以说奥尔森在这个领域的贡献超过了各位新制度经济学大家，如科斯、诺思、巴泽尔等人。透过他的这些著作，我们对国家（政府）的起源，政府的偏好和决策依据，就会有非常深刻独到的认识。能以这个话题的讨论为本书打上最后一个补丁，实在是很幸运，因为一年前，我对奥尔森的理论还并不熟悉。

（1）从流寇到坐寇：政府起源和演变的一个假说。

奥尔森观察到，像中国民国时期军阀混战的时代，一些地方性政府的建立过程与匪帮从流寇变成坐寇的过程惊人一致，如东北王张作霖、西北王冯玉祥等人建立的政府都是典型的案例。为什么会是这样的？奥尔森提出了一个解释模型，在这个模型里，流寇和坐寇都以最大化租金为目标，但是二者实现租金最大化的方式却是完全不同的，进而奥尔森通过

"狭隘利益"和"共容利益"的区别[①]，分析了匪帮从流寇到坐寇转变的逻辑，从而提出了政府起源和演变的假说。在他看来，流寇由于是流动作案，没有固定的地盘，也没有固定的人民，它只能占有"狭隘利益"(narrow interest)，狭隘利益意味着匪帮与人民间的零和博弈的结局，匪帮的所得即人民之所失，在不断剥夺人民的过程中，会造成可掠夺资源的日益匮乏，匪帮将处于朝不保夕的境地；匪帮逐步意识到拥有固定地盘和固定的人民，通过税收等方式可以获得长期的收入流，而税收收入的多寡则主要取决于所控制地方的人口规模和繁荣程度，于是这个匪帮就有了强烈的动机去保护所控制地区的安全，提供必要的公共服务和公共产品，尽可能地促进该地区的经济发展和社会繁荣，从而实现尽可能多的"共容利益"(encompassing interest)。

(2)从掠夺型政府向强化市场型政府的转变：地方政府成熟的标志性过程。

流寇变坐寇的故事，隐喻了两种政府类型：掠夺型政府和强化市场型政府。掠夺型政府如同流寇，它的利益与人民利益并不相容，而且是此消彼长。这样的政府当然没有意愿去发展地方经济，区域经济和社会不仅得不到地方政府的支持，反而会由于受到地方政府的剥夺而受到强烈抑制，于是博弈的结果就只能是两败俱伤。而坐寇则隐喻了"强化市场型政府"(market - augmenting government)。这样的政府，由于与地方经济社会的发展和繁荣紧密相关，租金收入的多寡完全取决于地方经济社会的发展程度，因此，他们会想方设法为区域经济社会的发展提供助力，以获取更多的租金收入。

"强化市场型政府"的形成，意味着一个可持续成长的区域政务环境开始形成，这时政府与市场休戚与共，一荣俱荣，一损俱损，所以地方政府为了过上好日子，就必须把促进市场繁荣，提升企业赢利和保障个人权利

---

① "狭隘利益"(narrow interest)与"共容利益"(encompassing interest)的根本区别在于："狭隘利益"集团的自身利益与社会的繁荣关系不大，因而存在强烈的激励企图通过损害社会利益来提高自身利益；"共容利益"集团的自身利益与社会的繁荣密切相关，因而在争取收入再分配时比较有节制，注意减少对社会利益的危害。

作为其施政的目标。这一目标的确立，对于区域的可持续成长而言，必不可少。

（3）利益集团博弈、地方政府政策偏好与区域成长。

奥尔森关于流寇、坐寇的讨论，关于狭隘利益和共容利益的分析，关于强化市场型政府的思考，都相当精彩；但现实中，即使是一个想要促进市场繁荣以获取共容利益的地方政府，也会受到内部“分利联盟”即利益集团的影响，而在决策上偏离市场繁荣和区域经济社会发展的公共目标。而且在很大程度上，利益集团的政策游说能力决定着地方政府的政策取向。

为此，奥尔森在其《集体行动的逻辑》和《国家兴衰》中专门讨论了上述问题，笔者把他的分析结果应用于地方政府的决策，将得到非常有价值的观点。

其一，地方政府决策在专制集权的政治生态下，将完全被置于统治者集团的利益驱动之下，此时地方政府的决策目标就是地方政府及其利益集团的收益最大化。这将在很大程度上抑制区域经济社会的发展。

其二，地方政府决策，即使在民主法制的政治生态下，也不可能完全按照符合公共利益的目标进行决策。这是因为，在区域系统中，广泛地存在着大量或明或暗的利益集团，它们对政策影响的能力各不相同，所以地方政府的决策最终会偏向于政策游说能力较强的利益集团，从而导致决策偏离区域的公共目标，剥夺民众利益。

其三，在民主法制的政治生态下，利益集团的政策游说能力并不取决于利益集团的规模大小，而取决于集团内达成一致行动的协调成本和“选择性激励”[①]的效果。事实上，根据奥尔森的观察和分析，那些规模小、利益联系紧密、成员收益不对称和存在选择性激励的利益集团更容易取得一致行动，从而把政策导向有利于小规模利益集团的局面。而规模

① 选择性激励既可以是积极的，也可以是消极的，因此可分为正向激励和反向激励两种。正向激励是指通过奖励（如提供与当事人努力相匹配的报酬或允许其搭卖私人物品）的方法刺激集体成员为负担集体行动的成本作贡献，反向激励则是指惩罚搭便车者的措施，以减少成员的机会主义倾向。

很大的利益集团,却往往由于内部人搭便车的投机心理,造成高昂的协调成本,从而不能形成一致行动。于是,在这样的区域系统中,少数人控制多数人,多数人成为沉默的大多数就成为一种必然。

因此,一个良性运行,成熟、稳健的政府体系应该具有以下基本特征:首先,它应该是强化市场型的政府,从中央到地方,政府最重要的目标是为市场的繁荣提供法律和秩序,提供恰当的产权安排,提供高效的政商环境,提供高效的基础设施和其他相关公共服务和公共产品。其次,一个民主法制的政治生态,可以局部地避免政府决策的无效率,即,政府必须把自己置于民众的监督控制之下,从而避免地方政府因为自己的强烈的利益诉求损害区域整体利益。其三,即使在一个民主法制的政治生态下,也要尽可能约束利益集团游说政府的寻租行为,更要尽可能地避免少数小规模利益集团由于其在游说能力上的优势左右政府决策,从而避免一个民主政府堕落成少数小规模利益集团的傀儡和帮凶,规避政府决策背离公众目标的局面出现。这就要求政府不仅有义务让权力在阳光下运作,而且要不断地扩大民众表达其利益诉求的渠道,让社会更容易倾听到大多数人的声音,降低少数小规模利益集团与政府勾结的风险。也因此,政府成熟本身就构成了区域成长的重要内容。

跋

尽管大多数时候文字比浮云还轻佻,但我还是很认真地完成了这十多万字的码字工作。它是我对自己学术良知的承诺,是我用文字表达的自由思想和独立人格。

笛卡尔说过:"我思故我在。"只有在精神世界里,我们每个人才可以是自己的上帝,自由的意志把我们引向任何一个想去的地方。在那里,我们才可以变得很"二"、很"天真",很"傻"、很"奇葩"。"十八大"以来,中国梦成为国人追逐的理想,而这个梦到底是什么?怎样去实现它?在我们这群认知能力有限的草民心中,其实并不明晰。这篇文字,也是一个梦,它是从经济和社会人文维度编织的梦。梦境里,发展仍然是唯一的主题,但它不再是那个见物而不见人的发展,它把由分工演进而导致的经济发展过程看作发展的基础,而把由分工演进而诱致的社会人文发展过程看作发展的内核和关键。在这个梦境里,人有尊严的存在,人自由而全面的发展,永远具有最高的价值。

我不知道家族对于他人意味着什么,但它是我的精神图腾,是我生命的出发点,也是我生命的归宿地。我思想的源流和人格的塑造来自父母和长辈的教诲;而我的成长不仅得到父母的悉心呵护,也长期受惠于姑妈、四爸和五爸无私的精神关爱和物质支持,在人生每一个重要转折点上,都在我脑海里留下了他们倾力相助的深刻记忆。而小家庭,永远是我栖息的港湾,妻子对家庭的无私奉献,孩子们给家庭带来的欢乐,时刻都让我感到温馨舒适。我知道,这么多年来,我承载了太多亲友的关爱和期

许,这是生命中不能承受之重,因为我不可能报答你们于万一。我没有太多的求财欲望,我只是为肉体的存在作了小小的努力。所以,我不可能回馈你们以财富;我没有太强的控制欲,我只是为小小的尊严而希望不被控制,所以,我不可能回馈你们以权力的分享。但是,我爱你们,用心爱你们!!

我也特别感谢我的导师刘诗白教授、杜肯堂教授和高林远教授。刘诗白老师作为我的合作导师,在本书的构思、写作和修订过程中给予的悉心指导让我受益终生,而刘老师的学术风范、人格魅力,也成为我人生的标杆,虽不能至,心向往之;自我攻读博士以来的12年时间里,我长期受教于杜肯堂老师,杜老师对我写作风格的形成、学术思想的成熟,影响甚深;高林远老师则在我经济学系统知识的形成、学术能力的培养等方面给予了极大的帮助。本书能够够付梓,没有各位导师的教导,是不可想象的。

我还要特别感谢我的学院领导,感谢郑长德院长和罗晓芹书记长期以来在生活工作中的关心与呵护,感谢他们对我的鞭策与鼓励。我还必须感谢学院所有同仁的友爱与关心,特别是周兴维教授、刘晓鹰教授、周克博士、马江博士、余喆扬博士、杨胜利博士、丹增博士、何山老师、沈小涛副教授、刘彤博士、杨海燕博士和钟海燕博士(恕我不能一一罗列各位老师的名字,鉴谅!!),与各位亦师亦友的同仁广泛而有深度的交流不仅使我受益终生,也让我感恩终生。在此,向各位同仁真诚地道一声:“谢谢各位!!”

最后,本书作为西南民族大学经济学院“华风”系列丛书之一,得到了学校、学院的出版赞助;中国经济出版社李煜萍编审对本书仔细的审读以及真诚而细致的修订意见,让我感佩!这里特别向李老师表示衷心的感谢!

李皓

2013年9月22日

参考文献

[1]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一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第二版),1995.

[2]马克思．资本论(第一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5.

[3]马克思．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2.

[4]亚当·斯密．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M]．郭大力,等,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81.

[5]涂尔干．社会分工论[M]．渠东,译．北京:三联书店,2000.

[6]马克斯·韦伯．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M]．彭强,等,译．西安: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2.

[7]斯塔夫里阿诺斯.全球通史(第7版)[M].彭书慧,等,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

[8]保罗·克鲁格曼．发展、地理学与经济理论[M],蔡荣,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中国人民大学出版,2002.

[9]藤田昌久,保罗·克鲁格曼,维纳布尔斯:空间经济学——城市、区域与国际贸易[M]．梁琦,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5.

[10]奥古斯特·勒施．经济空间秩序——经济财货与地理间的关系[M]．王守礼,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95.

[11]杨小凯,张永生．新兴古典经济学和超边际分析[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0.

[12]塞缪尔·亨廷顿,劳伦斯·哈里森．文化的重要作用——价值观如何影响人类进步[M]．程克雄,译．北京:新华出版社,2002.

[13]埃莉诺·奥斯特罗姆. 公共服务的制度建构[M]. 宋全喜,等,译. 上海:上海三联书店,2000.

[14]文森特·奥斯特罗姆. 复合共和制的政治理论[M]. 毛寿龙,译. 上海:上海三联书店,1999.

[15]麦克尔·麦金尼斯. 多中心治道与发展[M]. 毛寿龙,译. 上海:上海三联书店,2000.

[16]D. C. 诺思. 经济史中的结构与变迁[M]. 陈郁,译. 上海:上海三联书店,上海人民出版社. 1999.

[17]R. 科斯,A. 阿尔钦,D. 诺斯,等. 财产权利与制度变迁——产权学派与新制度学派译文集[M]. 刘守英,等,译. 上海:上海三联书店,上海人民出版社,1994.

[18]赫尔曼·海因里希. 戈森. 人类交换规律及人类行为准则的发展. 陈秀山,译. 北京:商务印书馆,1997.

[19]托马斯·霍布斯. 利维坦[M]. 黎思复,等,译. 北京:商务印书馆,1985.

[20]约拉姆·巴泽尔. 国家理论[M]. 钱勇,等,译. 上海:上海财经大学出版社,2006.

[21]约拉姆·巴泽尔. 产权的经济分析[M]. 费方域,等,译. 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4.

[22]曼瑟·奥尔森. 集体行动的逻辑[M]. 陈郁,等,译. 上海:格致出版社,上海人民出版社,上海三联书店,1995.

[23]曼瑟·奥尔森. 国家兴衰——经济增长、滞涨和社会僵化[M]. 李增刚,译. 上海:上海世纪出版集团,2007.

[24]曼瑟·奥尔森. 权力与繁荣[M]. 苏长和,等,译. 上海:上海世纪出版集团,2005.

[25]安虎森. 新经济地理学原理(第二版)[M],北京:经济科学出版社,2009.

[26]马里奥·波利斯. 富城市·穷城市——城市繁荣与衰落的秘密[M]. 方菁,译. 北京:新华出版社,2011.

[27]魏后凯. 现代区域经济学[M]. 北京:经济管理出版社,2006.

[28]安虎森．区域经济学通论[M]．北京:经济科学出版社,2001.

[29]汪和建．经济社会学——迈向新综合[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6.

[30]保罗・克鲁格曼．地理与贸易[M],刘波,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2.

[31]马林诺夫斯基．文化论[M]．费孝通,译．北京:中国民间文艺出版社,1987.

[32]奥斯瓦尔德・斯宾格勒．西方的没落[M]．江月,译．长沙:湖南文艺出版社,2011.

[33]郝寿义,安虎森．区域经济学[M]．北京:经济科学出版社,1999.

[34]安虎森．空间经济学[M]．北京:经济科学出版社,2005.

[35]保罗・克鲁格曼．克鲁格曼国际贸易新理论．黄胜强,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1.

[36]阿兰・佩雷菲特．停滞的帝国——两个世界的撞击[M]．王国卿,等,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3.

[37]黄仁宇．万历十五年[M]．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7.

[38]陆大道．区位论与区域研究方法[M]．北京:科学出版社,1988.

[39]世界自然基金会(WWF).地球生命力报告(2008)[R].2008－2.

[40]阿林・杨格．报酬递增与经济进步[J]．经济社会体制比较,1996(2).

[41]弗朗索瓦・佩鲁．增长极概念,经济学译丛[J],1988(9).

[42]托马斯・弗里曼．世界是平的[M]．何帆,等,译．长沙:湖南科学技术出版社,2006.

[43]Myrdal, G. Economic Theory and Under－developed Regions[M]. London: Duckworth, 1957.

[44]Martin, P. Are European regional policies delivering[R]. EIB(European Investment Bank)Papers, 1999(4).

[45]Martin, P, and G. I. P. Ottaviano. Growth and agglomeration[J]. International Economic Review, 2001(42).

[46]Granovetter, Mark. Economic Action and Social Structure: The Problem of Embeddedness[J]. 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 1985(91).

[47]John Friedman. Regional Development Policy: A case Study of Venezuela [M]. The MIT Press,1966

[48]汪丁丁,贾拥民. 一个嵌入社会网络的市场经济:义乌案例[J]. 社会科学战线,2007(1).

[49]袁家冬,周筠,黄伟. 我国都市圈理论研究与规划实践中的若干误区[J]. 地理研究,2006(1).

[50]姚士谋. 中国城市群[M]. 合肥: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出版社,1992.

[51]戴宾. 城市群及其相关概念辨析[J]. 财经科学,2004(6).

[52]管清友. 曼瑟·奥尔森经济思想述评[M]. 上海经济研究,2007(8).

索引

O

P

Q